

概 述

风俗，按班固《汉书·地理志》解释：“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天目，天目山脉也，为南方之大山，以东、西天目山为主峰。山区特征十分明显，分两大水系，东部苕溪为太湖水系，西部天目溪、昌化溪为钱塘江水系。这样的地理环境促成了天目山区民俗的基本特征。位于天目山区的临安原为临安、於潜、昌化三个县，1960年行政区划调整后成为一县，风俗上总体相同，略有差异。

一

天目山自然资源丰富，历史上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乡民以传统农耕为主，生活相对稳定。“居大山谷中，桑麻丝枲之富自足，而无贫民”。以淳朴仁厚对天目山风俗进行定位是确切的，这在许多典籍中都有记载。宋代邵文炳《袞绣堂记》中说：“（於潜）俗俭而质，民劲而武，难服而易化，爱敬而不忘。”楼钥有诗：“於潜今畿邑，蜀道里里通。至今存古意，民风尚醇醲。”明钱钺《谯楼记》中记载：

“民朴以茂，恒事耕作樵采，以自食其力。少争斗讼奸。”嘉靖《临安县志》中评价：“民尚朴素，诤讼寡少。”万历《杭州府志》载：“（昌化）刀耕火种，力殫于山；菑畲刈获，力尽于地；楮漆薪炭，货值于商。勤生畜用，视弃一钱如拱璧。”康熙十四年（1675）《临安县志·旧志序》载明代临安县令黄汝亨所纂县志序：“其俗简朴而勤。”康熙十二年（1673）《昌化县志·风俗》载：“环山而处，敦土为安，俗尚淳庞，多至性。”嘉庆十七年（1812）《於潜县志·风俗》中记载：“男务农桑，女务纺织，治生之勤逾天下。朴鲁尚质，务农寡讼。”

天目山山民靠山吃山，经济上自给自足。这样的生活让天目山人常常足不出山，封闭性的生活使他们少了一点开放搏击的意识。乾隆二十四年（1759）《临安县志·风俗》引马如龙《杭州府志》：“族重迁徙，数十世不忍析箸，故著姓较他邑独蕃。然田少山多，鲜巨富，只竭力农桑，以给公输。……又乏珍产，无奇技淫巧。妇女缫丝，北工于南；商贾贸茶，南多于北。”但这种自给自足、相对稳定的生活在清代咸丰同治年间被打破了，天目山区的东中部受战争影响，当地居民遭杀戮甚广，人口仅剩十分之一不到。战争结束后，经由地方衙门推动，外地人（多为上八府）结群或举村迁入。在这些地方，当地文化与外来文化融会杂糅，其风俗也发生演变，常常呈现以当地文化为主、多元文化杂糅的民俗现象。天目山区的西部如昌化昌北相对稳定一些，尤其是昌北，民众的集体自我保护意识较强，影响相对较小，风俗尤纯。至今在昌北的铁索岩、高尖上等地还能看到当年的人们在悬崖间修筑的防御工事。

二

尽管处在山区，天目山人却素以“敦本重学”为风。宋华文阁直学士陈居仁（1129—1197）在昌化《县学记》中说：“（昌化）僻在岩谷，务本力田。教明俗化，俊秀辈出，衣冠相望。”明初任杭州儒学教

授的徐一夔在临安《县学记》中评论临安：“风俗淳固，其人素知诗书。”万历《杭州府志》载：“（昌化）家延经师，争自磨淬。”

临安尊师重教的风气由来已久。早在南梁时，玲珑街道九州山就建有九祖儒堂，是临安最早的讲学之所。唐代至北宋，昌化、临安、於潜已分别建县学。直到民国时期，三县县城都有孔庙，每年仲春和仲秋举行祭祀孔子的活动，礼仪隆重。而乡村的“文昌殿”“文昌阁”可谓星罗棋布，这也是老百姓尊重文化的心理折射，文昌殿前往往配建焚字炉，凡用过的纸张都放炉内焚烧，以示文字的神圣。

临安的书院文化起始于南宋，其时昌化有南塾书院和百丈书院。南宋大儒朱熹等曾在大涤山讲学。明万历年间，黄道周（1585—1646）创立大涤书院。洞霄宫建有三贤祠，供奉苏轼、朱熹、黄道周三人，并有刻石纪念。清初，黄之门生何瑞图又续办大涤书院。

明清时期，三县共有十几处书院，山乡幽宅常有鸿儒讲学。科举也十分兴盛，初步统计，临安三县历代科举考试中，中进士者达358人。南宋时，河桥览川的章家一门三代曾经出了五位进士；西天目洪氏一家则出了三位尚书；临安集贤村历史上曾出了十八名进士，被誉为十八进士村，这些都被传为美谈。

三

天目山风俗兼具山区淳厚之特色，加之地处浙西山区，风俗中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嘉庆十七年（1812）《於潜县志·风俗》中记载：“（於潜）崇信巫鬼，丧葬多用佛老。”这在改革开放后对临安进行的民俗文化调查中也得到了印证。胡朴安在他2013年出版的《中国风俗》（下编）中也说道：“於潜人迷信甚深，对于寒热病之传染不知系病菌之故，云是寒热鬼作祟，于是而有躲避寒热鬼之风俗。”当地山民如遇到疾病，常常采用收鬼箭、笃筷子、修吓、驱鬼神等方法进行医治。旧时天目山有钱人家家人生病，也有采用请道士来踩红砖、过火

焰山等方法驱鬼，或者放油火来驱邪，或者请夜菩萨、打黑房捉妖赶鬼。这固然有缺医少药的因素，但更多是受迷信的驱使。

正月十五，女孩子会去抬坑三姑娘，从坑三姑娘“笔”下求取姻缘；小孩常常去“摇竹娘”，盼望自己早日长大。七月初七，姑娘家则会遵从习俗，向织女乞巧。寺院官观因常有问签这一内容，成为天目山人常常光顾的地方。

天目山山高林密，人们对龙、虎、豹、山魃等，既恐惧又恭敬，产生了灵物崇拜的习俗，也留下了许多灵物的神异故事。山民对龙甚为崇拜，人名、地名多带“龙”字。境内龙灯众多，以舞龙祈求风调雨顺。丧葬风水也讲究龙脉，山区易遭旱灾，旧时“接龙”风俗甚浓。山民奉虎为神兽，视豹同虎。天目山区关于山魃的传说故事甚多，并在老山中多用暗语、不准直呼人名等多种禁忌。

天目山区多古树，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天目）山上有霜木，皆是数百年树，谓之翔凤林。”2019年9月，临安区林业局对域内古树名木进行调查，发现临安共有古树名木135种10169株。山民对古树多有崇拜，逢年过节要祭祀。对古树也有许多禁忌，如不许砍伐、不许火烧、忌钉钉子、戒挖树根等。

四

许多中华历史传说在天目山区有了自己独特的版本，如盘古开天地、女娲捏泥人、兄妹合磨月成亲、太上老君开天辟地、先有洪钧后有天、天柱撑天、太阳神的故事、仓颉造字、盘蓝雷钟鼓、彭祖气阎罗、洗炭柯彭祖、不到黄河心不死，等等，有的还存进了地名之中，如岛石镇的呼日村，“呼日”二字与后羿的传说相关。又如八百里、洗炭桥、乌排弄等，都与彭祖隐居的传说相关。昌化镇有箕山、许由亭、洗耳滩、白牛桥等地名，是因为尧帝时许由和巢父在这里隐居而得名。洞霄宫还有唐代陈季卿与竹叶舟的故事，道士叶法善带唐玄宗游月官

和西梁观灯的故事，这些都是民间传说中的经典。於潜流传着文秀才撰写文稿帮助华阳洞主嫁女的故事，收录在明李昌祺的《剪灯余话》之中；还有南朝时天目山人李清游历阴曹地府的故事，收录在南朝梁王琰的《冥祥记》中。在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中有一篇《细侯》，记载了昌化一位叫满生的教书先生与细侯的爱情故事。这些美丽的传说，为天目山风俗笼罩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五

吴越国国王钱镠对当天目山风俗产生的影响较大。钱镠功名成就，衣锦还乡，曾以玉杯、金杯和银杯宴请父老乡亲。他的家书“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寥寥数语，情真意切，流传千古，“陌上花”成为一种民歌体裁流传下来，苏轼、晁补之都曾填写了多首《陌上花》。苏轼的《於潜女》有句：“老嫠官妆传父祖，至今遗民悲故主。”写出了钱镠在天目山区的影响力。为纪念钱镠，天目山区有“临安水龙”“吴越双狮”等多项民俗活动。又传刘姓因与镠同音，部分刘姓因避讳而将繁体刘字中的“卯”和“刀”去除，改为金姓。《南宋杂事诗·卷三》载陈芝光诗句：“安榴犹自号金樱。”又注：“杭州号石榴为金樱，避钱武肃讳而起也。”

历史上临安有祭祀钱镠的风俗，旧时为春秋二祭。2023年1月，“清明祭钱王”被列入浙江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在天目山区还流传许多有关钱镠的传说，主要是在当地和吴越地区口耳相传，在《十国春秋》《吴越备史》《咸淳临安志》《祥符临安志》《洞霄图志》《钱氏家乘》等史志中也有记载，在《喻世明言》《西湖拾遗》等明清小说中也有涉及。追溯其源，最早应是东晋郭璞的一首偈语诗：“天目山垂两乳长，龙飞凤舞到钱塘……”苏轼也曾有诗：“五百年间异人出，尽将锦绣裹山川。”所有传说中最有名的有“婆留出生”“将军树”“芭蕉叶”“赶山鞭”“智退黄巢”“钱王射潮”“钱王

斋僧”“临安里钱婆留发迹”“钱婆留除淫僧”“钱王筑坝拦五泄”“钱王转世”等。2011年，“钱王传说”被列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六

旧时天目山区庙会甚多，20世纪50年代后基本消亡，到了20世纪80年代渐有恢复，但其宗教色彩大为减弱，大多演变成“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文化经贸交流活动。

天目山区历史上比较有影响的有龙岗桃花溪东平殿庙会、河桥柯宁庙会、河桥泥骆庙会、太阳东平王庙会、於潜城隍庙会、於潜包公庙会、潜川天师宫庙会、东天目梅家土地庙会、太湖源包公庙会、横畈雷公殿庙会、锦南寺坞庙会、高虹重阳庙会、青山主天庙会、青山洪庙会、青山关帝庙会、青山公山庙会、板桥如龙倡亿庙会、板桥南屏庙会等。

在天目山地方神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有一些小神祇往往由“民选”产生。有一些身份卑微的百姓遭遇冻饿而死，村人怜其不幸，遂奉其为龙王、山神之类，常年祭祀。

七

天目山区历史上佛道兴盛，风俗中多有佛道文化痕迹。

天目山大涤玄盖洞天是道教的第三十四洞天、五十七福地。东、西天目山是佛教名山。历史上曾有佛教寺院400多处、道教官观30多处。传说道教创始人张道陵出生于天目山。汉武帝时，大涤山建起了官坛，唐代则建有官观。五代时，钱镠在大涤山重建了规模宏大的天柱观。西晋时，佛图澄在潜川乐平创建了乐平寺。东晋时竺法旷在西天目山开山，梁代时宝志公在东天目山开山。五代时钱镠在天目山一

带新建或重建了许多寺院。天目山佛教、道教对当地的风俗有较大的影响，许多民俗活动都烙上了佛道文化的印记，佛道文化也使山里人彪悍的性格特征逐渐得到柔化。

旧时天目山人丧葬习俗中都有崇尚佛教、道教的一面。嘉靖《临安县志》记载“丧葬多尚佛老”。当地有些人家办丧事往往请僧道做佛事道场。旧时，天目山一带还盛行道士戏，多为设忏超度做道场。

八

从钱镠的两件事可以追溯天目山的民歌发展史。第一件，钱镠衣锦还乡时当唱起山歌《吴歌》，《吴歌》上承南北朝“吴声歌曲”，下启明代吴地“山歌”，是承前启后的经典之作。第二件，钱王给戴妃的家书里“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寥寥数语，被里人编成民歌《陌上花》。

临安民歌中的小调曾名噪一时，《李三宝》《里郎歌》在全省比赛中获一等奖，歌曲被收入《中国民歌集》。昌化民歌手王双凤曾在人民大会堂怀仁堂献唱《昌化采茶歌》。

天目山山歌号子粗犷激越，音律高亢，是汗水的宣泄，也是生活的祈愿。如《耘田歌》《打夯号子》《打麦号子》《抬石号子》《车水号子》等。战争年代的歌谣则抑扬顿挫，激情澎湃，有一种黄钟大吕金戈铁马的韵味。

一些宗教音乐也与民歌相关，宋代天目山僧无门慧开的偈语诗配上《孟姜女》调，成为佛门经典音乐。旧时天目山道教也吸收了民间音乐的元素。

清咸丰、同治年间，战乱频仍，大量外地人迁入，使临安民间音乐有了多元性，这在灯调中尤为明显。天目山各地的灯舞甚多，有龙灯、狮子灯、花灯、鱼灯、马灯、滚灯、辘灯、采凉船等，许多灯舞伴奏音乐都带有外迁人原住地的色彩。

2009年，临安市文化局组织出版了《临安民间音乐集》一书，收录临安民歌271首。

天目山风俗是一幅色彩浓艳的工笔画，道道石坎渗透着山民的血汗，厚厚黄土承载着山民的希冀，汨汨泉水映衬出山民淳朴的性情，缕缕青烟传递了山民生活的意趣。天目山风俗折射出大山的光与热，传承着大山几千年的文化，无论是粗重的劳作、频仍的祭祀，还是繁琐的礼节、贫陋的生活、蛮犷的传说，都给后人以启迪。

目 录

一 民 风

崇文敬儒 敦本重学——天目山区的勤学之风 / 002

家训与民风 / 024

崇尚孝道 / 028

二 年节习俗

过 年 / 032

漫说春联 / 036

闹灯吃元宵 / 039

从东坡访道潜说天目清明习俗 / 044

重五和重阳 / 047

六月六 七月七 / 050

盂兰盆和中元节 / 052

天目中秋月，霓裳羽衣曲 / 055

三 生产习俗

《耕织图》和天目山区的农耕风俗 / 058

竹器厂的那些事 / 067

天目船渡 / 072

放竹筏 / 075

天目山桥的风俗和传说 / 077

山村水碓 / 080

竹扁担的故事 / 083

山核季风 / 086

烧炭 / 089

四 生活习俗

建房的风俗 / 092

竹筒传书与徽杭古道 / 101

火神与天目山区的用火习俗 / 103

火桶、𥓔桶、火𥓔和火缸 / 106

半月桌和春凳 / 109

竹眠轿的故事 / 111

说说筷子 / 113

白牛——一个古老的地名故事 / 117

地名趣谈 / 121

竹竿和竹杖 / 124

五 饮食习俗

茶源和茶俗 / 128

天目山的粽子 / 132

洪岭馒头节 / 136

天目笋干 / 138

昌化索面和刀切面 / 141

天目山的豆腐 / 143

观音“豆腐” / 147

六 婚育、寿庆和丧葬习俗

洞天花烛与婚仪 / 150

聊斋故事和特殊婚俗 / 157

生育习俗 / 161

彭祖的传说和寿庆习俗 / 164

丧葬习俗 / 167

七 方言、民歌舞蹈和戏剧

天目山区的方言 / 176

昌化乡音 / 181

天目山与戏剧 / 183

目连戏 / 192

民歌民谣 / 197

民间舞蹈 / 208

八 民间信仰

佛教对天目山风俗的影响 / 212

道教对天目山风俗的影响 / 223

塔文化，从宗教走向民俗 / 233

庙 会 / 238

民间的东平王信仰 / 246

烧烽篷祈福 / 250

龙的传说 / 253

土地神信仰 / 262

山魃的传说 / 264

古树名木信仰 / 266

将军树 / 271

莲峰树魂 / 274

一

民
风



崇文敬儒 敦本重学

——天目山区的勤学之风

在古籍和旧志中，我们常常读到“庠序”这个词。《孟子·梁惠王上》载：“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汉书·董仲舒传》载：“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庠序或称儒学、学宫、学堂、书院、学塾、义学、学校等。这在天目山区的各种地方文献资料中都能看到。

学校的称谓始于何时不清楚，但在明清时期的县志中经常出现。清代、民国的於潜、临安、昌化三县县志中，都设“学校”内容，并有一定的篇幅描述。又在“艺文”卷中，收录了许多与学校相关的文章。

光绪二十七年（1901），教育家蔡元培在临安创立了第一所小学；光绪二十九年，位于於潜的天目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光绪三十二年，昌化隆山书院改为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但是，传统教育的精神依然深深扎根在天目厚土之中。

东汉道教创始人张道陵出生于天目山，自幼习儒，朝廷选贤良方正，他就任巴郡江州（今属重庆）县令。南朝陈东海太守钱逵在九州山创儒堂讲学，九个儿子也各为郡守。山区学风浓厚，在科举史上，

老三县共有358名学子进士登第，其中南宋一朝有222人（临安130人，於潜72人，昌化20人）。锦北集贤一村竟然出了18名进士，河桥览川章家一门五进士，西天目洪氏一家两代三尚书，树立了一个个诗书传家的典范。

一、於潜、临安、昌化的县学

庠序之教有官方和民间两类。临安官办的县学，有一说肇始于唐，康熙《昌化县志·建置·学校》载：“儒学初创自唐。”但年代较久，难以考证。从北宋开始，临安、於潜、昌化三县的县学创建迁修，都记述详备，在历代临安三地县志中都能看到，并常常有图表呈现。可以判断，三县县学所居学宫、文庙等皆为当时县城中的标志性建筑。为了维持日常的开支，学宫、文庙等都有田地财产甚至是基金。旧时，知县、教谕、训导都会去学宫讲学。如若科举不兴，还有人寻找原因，譬如风水堪輿方面是否遭到破坏，於潜的祈祥塔、凌云塔，昌化的秀峰塔都是这一现象的产物。

於潜儒学

於潜儒学原设在绿筠坪，清嘉庆十七年（1812）《於潜县志·学校》载：“县学旧在院南二里。”北宋崇宁年间（1102—1106），於潜儒学迁至旧县治之北的攀龙坊。南宋绍兴十六年（1146），於潜县令何佖重修儒学。嘉泰四年（1204），县令胡卫在儒学内建造藏书阁。宝庆元年（1225），县令方熙重建儒学。咸淳五年（1269），礼部侍郎、邑人赵景纬又捐资重建儒学。德祐年间（1275—1276），县令赵时祝重修儒学。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浙江行省参知政事董抃霄修儒学。大德元年（1297）毁于兵。明洪武二年（1369），知县梁诚在县西丛桂坊重建儒学。洪武十年，县丞赵义将儒学迁至攀龙坊之右。弘治十六年（1503），知县嵇钢重建儒学。嘉靖十二年（1533），立明经、论治、习

礼、听乐四堂，共计十六间。嘉靖十五年，学宫损坏，教谕陈铎请示提学僉事徐阶，将学宫重新迁至攀龙坊故址。万历四十一年（1613），御史李邦华将学宫迁至金鹅山绿筠坪，坪下有故山川坛和演武场。崇祯年间（1628—1644），知县全性和教谕张翼轸、训导周中度各捐俸重修学宫。清初，学宫的堂殿倾圯，两边庑廊都长满茅草，十分荒凉。清康熙九年（1670），知县赵之珩将学宫基地向右稍移。康熙三十二年，教谕王廷瓚捐俸建造圣门，并重整棂星门和戟门，知县孙石则捐俸禄，建造泮池桥，筑佾台。康熙三十八年，知县王克宽、教谕王廷瓚、训导汪元灏率绅士捐资重修大成殿。乾隆三十三年（1768），知县张奕、教谕张长墀、训导张羲年捐俸增修学宫，于乾隆三十五年竣工。乾隆五十年，知县李宗建、教谕叶德凤、训导莫大邦同绅士捐修戟门。嘉庆十一年（1806），川后乡廩贡生陈其诰捐造大成殿和东西两庑，并增修戟门、泮池桥，建官厅、祭品房。波后乡附贡生（举人副榜）赵璨捐修明伦堂、文昌阁，重建儒学门、北面架楼，该楼即为魁星阁。前乡贡生阮浚同、增生阮镜如、童生阮焕捐资，将崇圣祠移明伦堂之左，在明伦堂前创建尊经阁。川前乡增生罗钫捐资，将名宦、乡贤二祠移至棂星门左右，知县蒋光弼、教谕刘邦彦、教谕李江、训导张燮、典史吴万杰倡率监理，始于嘉庆十二年春，至嘉庆十三年夏落成竣工。学宫规模宏整，有先师庙、东庑、西庑、佾台、戟门、泮池、棂星门、官厅、祭品房、崇圣祠、文昌阁、魁星阁、土地祠、名宦祠、乡贤祠、忠义祠、节孝祠、龙亭、明伦堂、尊经阁、儒学门、儒学东署、儒学西署、斋舍、射圃等，面貌一新。

临安儒学

乾隆二十四年（1759）《临安县志·学校》关于“儒学”有记载：“宋建西墅县治东南，方腊乱毁，移建东市县治之南。国朝仍之。”县治在高陆时则不知。咸淳《临安志》载：“学在县西一百步，咸平三年建，后徙于县城南。绍兴十六年（1146）令王传重建，孙尚书觐为

记。宝祐二年（1254）令王櫛重修。景定三年（1262）令家之巽建师善堂。”乾隆《临安县志·亭榭堂》载：“元祐学堂：咸淳《临安志》在西墅旧县署，宋景定三年令家之巽建。”成化《杭州府志》载：“明洪武初，县治移建东市太庙山右，令袁思谦建殿庑、两斋于治南。洪武八年（1375），令贾鹏程建戟门、棂星门、明伦堂，辟射圃。洪武九年，令李宗本、县丞聂源相继重修。徐一夔为记。洪熙元年（1425），主簿张昇重建庙殿。正统五年（1440），县丞程原庆重建明伦堂。”嘉靖《临安县志》载：“景泰二年（1451），令李素、县丞萧凤阳重建棂星门，易以石柱。弘治十二年（1499），令王翔凤重建大成殿。”万历《杭州府志》载：“嘉靖间，令廖瑜辟学前路，建名宦、乡贤二祠。”清顺治间（1644—1661），令戴祚昇重建。康熙九年（1670），教谕孙震修文昌阁，浚泮湖。康熙五十八年（1719），令张淑郿、教谕谢嗣晖、训导胡德裕、典史顾廷标，与邑绅衿胡元桂、邹天荣、胡元梅、胡长炜、骆嘉伟、盛期超、童颖森、童文标、胡瑗、郑官常、胡元李、骆雯锦、胡厚重、许镒等协力重建儒学。乾隆四年（1739），训导范长旭再修儒学。

昌化儒学

康熙十二年（1673）《昌化县志》载：“昌庠肇于唐代。”文庙建于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在当时的县衙东面约一百步，而学宫此时尚未建。元祐年间（1086—1094）文庙迁于鼓楼外，接着又迁于尉廨西。到了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文庙迁于南门内。乾道八年（1172），知县卞圜将文庙规模稍稍拓展了一些，复迁于熙宁年间（1068—1077）的旧址。淳熙七年（1180），知县钱孜另选一块园地建文庙，并建起了学宫，在东庑之南复建三贤堂。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由于战乱，文庙、学宫尽毁，仅剩藏书阁。延祐年间（1314—1320），达鲁花赤（蒙语音译，意为盖印者，府州县皆设）重建，更名为尊经阁。至正二十八年（1368）复遭兵毁。明洪武二年（1369），知

县李质重建文庙和尊经阁，进一步拓宽学宫地基。洪武六年，知县王刚中建造了明伦堂和斋舍。洪武十年，知县李恒拓宽地基重建庙殿和新门庑、斋舍。正德十六年（1521），知县黄昇实施了重修。嘉靖十六年（1537），知县方铨请示提学副使陈儒，将文庙、学宫复新，并凿化龙池。嘉靖二十三年，知县涂勋进行重建。嘉靖四十一年，临安县丞李朝阳、教谕王瑁将明伦堂迁建于文庙之后。嘉靖四十四年，教谕李奎祥捐建尊经阁，并修葺堂舍。隆庆五年（1571），知县周易重修学宫。万历十七年（1589），知县周洛都重修学宫，将儒学门徙建至启圣祠东首，并筑学宫墙一百余丈。万历三十八年，国子生陈灼捐建文庙、学宫，并新建启圣宫、乡贤祠、名宦祠、土地祠等。崇祯八年（1635），署知县事张九一重建明伦堂，鸿胪寺序班郑体乾捐助。清顺治九年（1652）颁卧碑于天下学宫，知县李之蕢重整庙殿。康熙八年（1669）至十一年，知县焦桐、周颂孙相继修葺。康熙二十三年，知县谢廷玘捐建尊经阁，又改建文昌阁。康熙四十年，知县林霖培重葺学宫并建秀峰塔。康熙五十一年，知县赵鸿猷重修学宫。康熙五十三年，诸生郑龙举等修明伦堂。乾隆九年（1744），知县甘文蔚修葺名宦祠，东西设金声玉振、江汉秋阳二门，将三贤祠徙建于棂星门之右，在其东首择向改建儒学门。乾隆十三年，县令王元音大加修整学宫。嘉庆八年（1803），贡生陈世球捐修大成殿，章霭顾于明伦堂后改建崇圣祠，又详支学租银，修整两庑，浚泮池等。嘉庆十三年，邑人顾善继、方梦兰、黄铎、陈善、徐锡贵、郑克柱、姚起敬、洪立坤、孙鹤年捐输以充岁修。

道光三年（1823）《昌化县志》记述当时学宫的规模：大成殿三间，前为露台，东西庑各七间，戟门三间，门左右官厅各一间。厅左为省牲所，右为祭器库，各一间。前为泮池，外棂星石阙一座。前为化龙池，外环宫墙百余丈。学宫前左右有腾蛟、起凤二坊。棂星门外左右有金声玉振、江汉秋阳二门。戟门外左右有圣域、贤关二门。圣域门东有文昌阁三间，贤关门西有贤祠三间，文昌阁后有乡贤祠三间、土

地祠三间、名宦祠三间。大成殿后有明伦堂三间。堂后有崇圣祠三间，堂东有尊经阁三间，堂西南有忠义祠三间，教谕署在文昌阁东。训导署在三贤祠后。儒学门在宫墙之左。

旧志对三县县学建、迁、增、修之过程交代得十分清楚。在20世纪60年代，还能见到临安儒学中的许多石碑。

二、儒堂书塾

天目山区素以崇文敬儒、敦本重学为风，除了县学之外，儒堂、学堂、书塾、书院、义学等在天目山区星罗棋布，有些是官办的，更多的则是民间的，映衬了天目山区的倡学之风。正是这些机构，使得天目山区的民风得以柔化淳厚。

九祖儒堂

九祖儒堂是临安最早的讲学之所，约在南梁时创建，位于玲珑街道九州山。九州山海拔357米，左右有玲珑山和九仙山。东海太守钱逵曾讲学于此。钱逵，字通甫，一作逵甫，南朝时临安人，钱规之子。梁武帝时期曾为庐陵王国侍郎、羽林监。入陈时担任东海太守。娶琅琊王氏，生有九个儿子，皆为郡守，所居之地因名九州山。旧时有九州庙。1963年徐映璞《玲珑山志》记载：“九州庙遗址，在九州山北，因昔有九井又名九井庵。有丹井，传为葛仙翁炼丹处，水清冽，其井栏杆尚存。”南宋咸淳《临安志》中也有记载。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廖用贤编纂的《尚友录》载：“逵，字通甫，临安人。梁大同中，为庐陵王国侍郎、羽林监。陈高祖立，迁东海太守。生九子，皆掌郡符，故其地所居之山号九州山，见罗隐所为碑记。”乾隆二十四年（1759）《临安县志·山川》载：“九州山，治西南十里，旧有九祖儒堂及庙九所。”《临安县志·古迹》载：“九祖儒堂，在九州山，罗隐碑记云，东海守钱逵讲学于此，逵九子皆为郎，建九州庙。”

杨御史书塾

在旧昌化县衙后山北隅，为明御史杨誉所创。

袁翰林书塾

在旧昌化县治东南。袁翰林即袁炜，慈溪人，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太子太傅、建极殿大学士。登第前曾在此读书。

鸿山书屋

书屋之称同于书塾，也是乡间施教的机构。鸿山书屋旧在河桥镇赤石览川一带。道光三年（1823）《昌化县志》记载：“鸿山书屋：溪南二十五里，赤石鸿山之顶，现废。”在鸿山八景中有“花屋书声”一景，志中还记载有沈芝田六言诗一首：“万绿丛中插架，众香国里凿楹。真到琅环福地，隔花吹度书声。”

双桂书屋

双桂书屋位于龙岗镇的无他村，旧属株柳（九都），为国子监学录许荃建。昌化县令许小欧曾有一诗：

半生薄宦远来游，校士观风事事幽。
闲说花园多丽景，因公到此暂稽留。

叠山清舍

在昌化西五十里，邑人、荆州远安知县王梅石建。

临安义学

乾隆二十四年(1759)《临安县志·学校》中“义学”条记载：“国朝康熙二十年(1681),令张顾恒建,立西坛侧。三十六年,令郭九会移设丛桂坊茶亭。五十八年令张淑郿暂移城隍庙。六十年,于明伦堂前东偏,建屋六楹两披,置小弓田七亩五分五厘,坐落东门畷。在灵凤二图张公义学户下办粮,延师教授。额曰‘崇文宣化’,有碑记,今废,址存。”

昌化义学

乾隆元年(1736),知县王绂将县治东存留仓旧址改建为义学。乾隆四十八年毁于火,乾隆五十四年监生陈月广重建。道光初倒圯。

下余社学

在河桥镇下余村。民国十三年(1924)《昌化县志》载:“明洪武八年(1375),设在县南三十里下余村,后废。”

昌化社学

在昌化旧县治东府馆之左。民国十三年(1924)《昌化县志》载:“嘉靖年间(1522—1566),大冢宰桂萼疏请如旧制,后署印检校王鹏奉建于东府馆之左,寻亦废。万历十九年(1591),县令周洛都重建学,设教读一人,教邑人弟子学于其中,有进业者籍于县、达于府、又达于督学,选其优者进于庠校焉。”

三、书院

在天目山区,最多的还数书院,历史上记载的达数十处之多,使得山乡幽宅常常传来琅琅书声,常有鸿儒光临讲学。

南塾书院

南塾书院位于河桥镇览川。

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章樵创义学，即南塾书院。民国十三年（1924）《昌化县志》中载：“南塾：在览川，宋通议大夫章樵所创义学也，招延名师，从学之士甚众，后多有擢高科登显仕者。丞相履斋吴潜有祭南塾碑文，今遗址犹存。”

章樵，昌化览川人。宋嘉定元年（1208）进士。历海州、高邮、山阳教官。任职时，发现有人谋叛，上书力陈，后果有贼乱郡县。官吏避祸离开，而章樵却率诸生盛装坐于堂上，认真讲诵。乱贼进去，不敢惊动而退出。后升迁常州判官，以疾归，又授知处州府。以廉洁而著称。

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章氏一家有五人考中进士，有“一门五进士”之誉。

百丈溪书院

南宋末年，朱熹提举洞霄宫，并在洞霄宫讲学。有颊口义干的李方子崇尚朱熹的理学，慕名前去听讲。回家后，便在当地办学传教。李方子从学朱熹，同村的叶采学从学李方子，陈泽民又从学叶采学，儒家理学在天目山区得以传承。

后来，李方子的儿子和叶采学、陈泽民三人在百丈溪边创建百丈溪书院，由陈泽民担任书院山长，延请老师教导村里的子弟学习儒家文化。书院效仿朱熹白鹿洞书院，招生徒，订教规。后由陈泽民的养子陈斗龙担任书院山长。为亮明宗传朱元晦（朱熹）理学，后百丈溪书院改名为宗晦书院。

陈泽民与盛氏成亲后无子，南宋景定五年（1264），领养了钱塘王氏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取名陈斗龙。景炎元年（1276），陈斗龙13岁时，养父陈泽民病重，斗龙日夜汤药侍奉。但养父终究病重，不久辞

世。谁料养母盛氏跟着亦得病而卒，斗龙居丧极哀。儒学提举孙朝瑞听闻其事迹，上疏推荐斗龙为宗晦书院山长。有人告知斗龙，他的亲生母亲为王氏，在他出生后仅数月即分离。斗龙闻之大惊，与妻诀誓，一定要找到生母王氏，遂至钱塘寻找，但无人知晓。有一老嫗告诉斗龙，他母亲已改嫁到江东。斗龙便渡江一路找寻，前后寻访六年，终于在浙江台州临海永丰留贤找到。此时，生母王氏嫁在施家，已年迈。经施家同意，斗龙夫妻背母回昌化，途经百丈山，遇到盗贼。斗龙告曰：“斗龙幼不知母，求访六年方得归，今汝杀吾夫妇死无憾，但白发老母无人供养矣！”盗贼被其感动而放行。回到昌化老家，斗龙供养母亲王氏至终。

在百丈溪书院的旁边，有一座“读书林”，民国十三年（1924）《昌化县志》记载：“读书林：百丈山下，唐阎（防）于百丈溪理茅茨读书，故名。”阎防是唐代的一个著名人物，河南南阳人，开元二十二年（734）进士及第，颜真卿欲将其荐于朝，他却不接受，曾隐于终南山百丈溪，在丰德寺结茅茨读书。或是阎防来过，或是因地名相同，故命名“读书林”，以激励学子。

大涤书院（石斋书院）

大涤书院位于青山湖街道的大涤山。

南宋时大涤山建有行宫，宋高宗常常临幸于此。当时虽无书院之名，却已有书院之实，儒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提举洞霄宫时，曾在这里讲学。明万历年间（1573—1620），黄道周在这里创立了大涤书院，因其号石斋，故又名石斋书院。

黄道周（1585—1646），字幼玄，又字螭若，曾在福建东山岛的铜山石室攻读，故号石斋，福建漳浦铜山（现东山县）人。黄道周为明末清初著名学者，精通天文、地理、历数，又是书画家。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曾任翰林院修撰。贬调杭州时，喜爱洞霄宫，筑舍讲学，弟子甚多，听者云集。顺治二年（1645），黄道周组织抗清，任吏

部兼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抗清失败，被杀害于东华门，谥忠烈。数年后，洞霄宫将其与苏轼、朱熹同供奉在三贤祠，并刻石纪念。后来，其门生朱朝瑛继其业。

到了清初，黄道周的门生何瑞图续办大涤书院。何瑞图（？—1658）字羲兆，号山农，余杭人，崇祯三年（1630）举人。何瑞图在黄道周门下，习经济、性命之学，尤为黄道周器重，曾在福建漳州文明书院授书六年。崇祯五年七月下旬，黄道周抵余杭，何瑞图陪同游径山，登凌霄峰。又入大涤山，下榻洞霄宫，游历山中的大涤、栖真、归云、龙蛻、凤鸣五洞，筹筑大涤书院于大涤山麓，由何瑞图负责营建讲舍。崇祯十一年、崇祯十五年、崇祯十七年，黄道周先后五次来大涤，在大涤书院讲学，前来问学的弟子达四五十人。黄道周研究经学，著述等身，与弟子朱朝瑛、何瑞图、刘履丁等往复商榷，至再至三，所谓一生精力尽在此。何瑞图晚年寄迹南湖岳石之间，终身不入城市，吟咏不倦，著有《山农诗集》《大涤讲堂志》，康熙年间（1662—1722）还将黄道周的文章编成《大涤函书》五卷。

屏山书院

屏山书院在河桥学川，前身为盛氏别业衔翠轩，元盛明叟于此筑一“蒙斋”，为读书处。明代邑人郑德明在此创建屏山书院。知县郑国仕励精立学，几巡书院，并为书院写记。郑国仕在任时颇有政绩，调离昌化后，昌化人十分怀念，为其立祠纪念。

石岭书院

在河桥镇上卜间石岭上，为茄村程氏所创。

赤石书院

赤石书院位于河桥赤石，因所在村而名，原为朕公祠。朕公是钱镠手下的大将，应是本地人。明代武英殿大学士、礼部尚书袁炜曾在

此讲学，将祠改额为“赤石书院”。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邑人胡光炜倡捐重建。民国十三年（1924）《昌化县志》中载：“赤石书院：七都赤石，旧为朕公祠。朕公者，相传为钱氏将，祠踞赤石，明大学士袁炜尝讲学于此。改额赤石书院。乾隆己酉胡光炜倡捐重建。”“胡光炜……葺修赤石书塾，以为义学，置田亩以给膏火。”

红山书院

位于河桥赤石红山之巔，由胡氏创建，咸丰年间（1851—1861）毁于兵。

天目书院

天目书院是临安历史上最负盛名的一家书院。书院建于明万历年间（1573—1620），初时设在於潜县城的北门外，明翰林院修撰焦竑曾为书院写记立碑，但已久废。清同治十二年（1873），於潜县令陈盛治，在县治西丛桂坊复兴天目书院，由於潜全县12个乡捐地16公顷。到光绪二年（1876），书院有藏书1379部。光绪二十九年，天目书院旧址改为高等小学。

民国二十八年（1939），浙西行署驻天目山，于民国二十九年6月1日，在西天目山太子庵恢复天目书院，为浙西行署学术研究机构。院长为考古学家、留法文学博士张天方，副院长先后由吴寿彭、曹天风担任。书院采用讲会制度，对经学、哲学、史学、文学、艺术、考古等领域开展广泛研究、交流。创院刊《学术之诞生》，并收集整理出版《天目民众抗日事略》《论民族文化》《天目诗录》《天目方药录》。“天目丛书”有《浙西抗战忠勇记略》《天目诗集》《文史》《半月刊》《天目新志》《天目陶砖录》《天目文录第一集》《天目考古录》《浙西年鉴》《书院制度》等。书院藏书三万余册。先后在天目山东南地域进行30多次考古活动，并举办江南古物展览。民国三十年4月15日，日机轰炸禅源寺，书院迁至东天目昭明禅寺，半年后

迁西天目山浙西忠烈祠旁。民国三十一年10月，天目书院迁昌化阳干村，再迁株浪村，三迁林川桥头（林川村），四迁教场坪（上汤村），随后停办。历时6年，在学术研究、服务抗日战争诸方面作出重要贡献。

1996年，临安县委、县政府成立天目书院筹备委员会。1997年6月12日，临安县民政局批准天目书院社会团体法人资格和注册登记，核发证件。7月11—13日，天目书院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2001年1月，浙江省文化厅批复，同意该院为浙江省省级文化系统民办非企业单位。9月由省民政厅注册批准。张金马、沈才土等先后担任院长。书院设有文学社、书画社、经济研究社等，文学社的《浮玉》文学季刊已出刊80多期。

石门书院

位于清凉峰镇马嘯的小石门，同山人陈凤书建，陈自号阳岩处士，为人豪爽洒脱，与袁炜、胡宗宪等名人为友。袁邀其赴试，勿就；胡请其为官，勿仕。最后倾囊出，在自己宅地大起书楼。友待四方客，聚众族里子弟，力学其所，称石门书院。民国十三年（1924）《昌化县志·人物》有陈凤书传。

南溪书院

南溪书院位于清凉峰镇朱浪，由章栋创建。章栋在《南溪书院记》中说道：

余家朱浪，自余府君靖斋公课子弟，先德行而后文艺，驳驳乎风移而俗易，家修而户化矣。余因于居室之东偏创为家塾，背西面东，前园后圃，堂庑轩豁，左右开敞，非美观也，为作育人才计耳。后之为父兄者，当先以孝悌端其心，以礼让植其体。简贤师友，与之条析乎经书之旨趣，甄别乎人品之邪正，出入有提

命，行事有矩规，优而游之，日积月累，才虽中下，抑或幸以启明矣。然后教以文词，则心术端而趋向正。出可以致君民，处可以持世道，庶几家与国均有济也。

桃源书院

桃源书院位于於潜镇东的桃源山之阳，桃源山旧有许远游（许迈）道观。清嘉庆七年（1802）由於潜县令雷发馨创建，以地而名，名桃源书院，邑人陈清宪担任董事。书院管理追随朱熹白鹿洞书院的遗规。

当时，县令雷发馨请大学士、太傅、时任浙江巡抚的阮元题“桃源书院”“砥行研经”匾额。

雷发馨在《桃源书院碑记》中说：

国家久道化成，丕崇文教，各州县治于学校外复建书院，以相切磋，所以广教术而育英才至详。且悉潜州附近省垣，天目苕水之灵，历垂志乘，应必有杰出之士，攀鳞附翼，接踵而兴者。

他认为“民社当以教养为先”。遂思建书院，鼓励人才。第二年又去安徽歙县三阳聘请友人邱沾水来书院讲学，以广见闻。

清咸丰十年（1860），太平天国军攻占於潜，书院被毁。同治四年（1865），知县陈盛治和乡绅盛龄集资重建。同治七年，书院又被野火焚烧。同治八年，里人徐昌周请拨公款复修。后因此院离县治较远，求学不便，改为文武庙。

紫溪书院

建于何时已无考，旧名“紫溪书院”，因紫溪（昌化溪）而得名。因书院处昌化唐山之麓，与武隆山相连，故后又改名为“隆山书院”。书院资产颇丰，东岳庙巷口有书院房屋一堂，分布各地的田产共

计21.2亩。民国时期，曾由昌化全县捐集学院基本金两千元，存储于德和盐栈，取利息用于书院膏火、奖励学生学业。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取消，地方兴办学校，学院停办，资金本息连同院田产充县教育经费。

锦城书院

锦城书院系官办，位于临安锦城旧东门内，清道光五年（1825），由临安知县卢昆銮，学官杜立阶、金衍宗捐俸创立。书院颇具规模，有讲堂五楹。前后各有书舍五楹，东西则有卧室。书院有田产47亩，由庠发会负责提供平日膏火，以保证学子能在书院完成学业。

道光六年（1826），书院始行《知县稟定锦城书院规条》。规条确定在每年二月朔日甄别，招收录取内肄业生员、童生各16名，外肄业生员、童生各8名，附课生员、童生各8名，共64名。内肄业生、童生得在书院肄业，床榻由书院置办，课桌椅由生、童自备。每月初二、十六为课期。初二为县课，由县教谕命题考试；十六为书院掌教课，由掌教命题考试。掌教一席先由地方绅士公举文化品行兼善之人，再由县访察，果系品学兼优，而后聘任。

光绪十八年（1892），临安知县杨宗瀛捐俸，购置经、史、子、集各书存锦城书院，以供博览。光绪二十八年，锦城书院改办为敬业高等小学堂。

凌万春书院

光绪年间由昌邑绅士凌锦文创办，万春或为凌锦文的字号。书院位于唐山之麓。光绪三十二年（1906）废。1985年，凌锦文的裔孙凌集义在原址恢复书院，自任教师，免费为学生补课。

四、藏书楼阁

在天目山区，藏书楼、阁也有不少。南梁时东天目山分经台旁有庵，是一个佛教图书馆。西天目山禅源寺、东天目山昭明禅寺、玲珑山卧龙寺也建有藏经阁，主要珍藏佛教经典。五代时大涤山的垂象楼是全国著名的道教图书馆。南宋褒忠院藏书1.3万卷，为洪咨夔读书处。在临安、於潜、昌化的儒学或学宫中，均有一座尊经阁，是收藏存放儒家经典书籍的楼阁。昌化儒学学宫中有藏书阁，康熙十二年（1673）《昌化县志》载：“（圣庙）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毁于兵，惟藏书阁存。”清嘉庆十七年（1812）《於潜县志·学校》载：“嘉泰甲子，令胡卫建藏书阁。”又有“尊经阁藏书”一目，记述尊经阁所珍藏书目。在河桥览川也曾有一座藏书楼。根据记载，河桥赤石和清凉峰镇下乾山文昌阁后各有一座“敕书楼”。

东天目山分经台和藏经楼

分经台位于东天目山，是一块石头，旁有茅庵，亦名“分经台”。因传南梁昭明太子萧统曾在这里分《金刚经》而得名。梁普通七年（526），萧统的母亲丁贵嫔薨，因葬母亲一事被宫监鲍邕之诬陷，不能自明，遂与崔、张两丞游历天下名胜。后萧统隐于天目山，在此期间，将佛教最重要的一部经典《金刚经》分为32节。他所坐之石，所住茅庵，后人均称为“分经台”。萧统在这里还留下了《登天目西山赋示云麾弟》《西峰貌雪》《有所思》《停吴兴丁役》等作品。传说萧统还曾在这里集古著述编纂《文选》。东天目山八景中，“经台秋风”为其一。在昭明寺下院前，有一棵南方红豆杉，传为昭明太子手植，树干圆直，树皮呈红褐色，历1500年依旧郁郁葱葱，长势旺盛，如一把巨伞掩映古寺。民国二十六年（1937）8月中华书局版《辞海》记载：南梁昭明太子读书于西天目，参禅于东天目。冯梦祯有《游分经台》诗：

群峰行不尽，天半识禅扉。古木阴垂地，高云冷拂衣。
山僧能款客，钵饭亦忘饥。帝子遗经在，淹留恋夕晖。

黄汝亨也有《分经台》诗：

丹梯高倚石峻嶒，短屐铢衣惬共登。
万壑飞涛秋响切，千峰沉露暮烟凝。
台荒帝子留残偈，锡卓高僧郎慧灯。
寥寂东来谁共赏，孤松巅际白云澄。

民国元年（1912）出版的《东天目山志》中收录有一篇《天目藏书记》，其中数列寺院众多藏书。还有一篇《东天目藏经》，记述东天目山在清末中兴，民国元年获海盐徐士澜率子文璠，不忘嘱咐，护法殷殷，于上海频伽精舍购备全藏八千余卷，仿照日本式以铅石小字，计四十筐，连箱施助于山，永远珍藏。现在这套藏经被收藏在东天目山昭明寺的藏经阁中。

天柱宫垂象楼

五代时有垂象楼，位于大涤山道教天柱宫中，是道教天师暨齐物创建的一座书楼。

暨齐物在大涤天柱山数十年，虔诚学道，曾创建一座书楼，开间为三间，藏书有数千卷。隋唐五代时期，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应用，为印书和藏书事业的兴旺提供了技术上的保障，民间藏书家因此增多。五代十国时期，有人开始营建藏书楼。据记载，以契丹王子耶律倍所建的望海堂、暨齐物所建的垂象楼最为典范，名震一时。安史之乱中，许多道藏书籍遭损毁遗失，后赖暨齐物、申甫、杜光庭、梁文矩等在海内大力收集贮藏，使得十之四三的道书得以保留，给后来编纂《道藏》提供了基础，为道教典藏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也使天目山区

倡学之风得到振兴。宋邓牧《洞霄图志》有“书楼”一目：“一名垂象楼，暨天师所居。天师少好经史，著述不辍，其中卷帙委积左右，常昼采日魂，夜饮月魄，盖紫文之上道也……”

西天目山褒忠院

西天目山朱陀岭，旧有寺院叫“保福院”，洪咨夔常在此读书。南宋理宗为褒奖洪咨夔，改其名为“褒忠院”，院内有一座“闻复阁”，为洪咨夔的藏书楼。据记载洪咨夔任成都路通判届满，出蜀时，“得书数千卷，藏萧寺”。《西天目祖山志》载：“闻复阁为一藏书之所，有书凡1.3万卷。”洪咨夔读的经史子集，弘扬的是孔孟之道，褒忠院下方有一村，名为九狮，旧为“九思”，取《论语·季氏》“君子有九思”之义。洪咨夔（1176—1236），字舜俞，号平斋。宋嘉定进士，历任刑部尚书、翰林学士、知制诰加端明殿学士等，是南宋朝廷的重要辅臣，谥文忠。有《平斋文集》32卷、《两汉诏令钞》、《春秋说》、诗文等行于世。

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乾隆选录洪咨夔的《春秋说论隐公作》，前题“论辟唾余”引首。这幅书法在2010年6月5日拍卖中以5712万元成交，创下乾隆御笔书法作品拍卖最高纪录。

洪咨夔的长子洪勋官至兵部尚书、端明殿学士，次子洪焘任吏部尚书。一家两代出了三位尚书，在朝野传为佳话。

禅源寺藏经阁

清《西天目祖山志》中曾记载，寺院藏书凡24000余卷，分儒、释、道三部。2012年，由浙江大华集团捐资，复建禅源寺藏经楼等。

河桥敕书楼

敕书楼有二，一座位于河桥赤石，道光三年（1823）《昌化县志》载：“敕书楼，县南二十五里赤石镇。咸丰中毁于兵，故址昭然。”另

一座在县西四十七里下乾山文昌阁后。这“敕书”二字，或许是皇帝恩赐书籍，或者是收藏皇帝御笔墨宝。

五、文昌阁 文昌祠

天目山区文昌阁、文昌祠星罗棋布。

锦城旧有文昌阁。乾隆二十四年（1759）《临安县志》卷二“文昌阁”条记载：“在泮湖东，明万历间（1573—1620）谕来遇龙建。国朝康熙九年（1670）谕孙震修。六十一年令张淑郾重修。”但现仅存地名。新的锦城规划中已将它列为恢复的项目。另华石山下也有文昌祠。1963年徐映璞《玲珑山志》载：“下有文昌祠，令王炳衡建。”

於潜镇旧有文昌阁。嘉庆十七年（1812）《於潜县志》记载：“文昌阁五间，元至元十二年（1275），主簿李霖一作，赵霖重建，吴度为记。国朝康熙二年（1663），教谕屠寿征重建。三十六年，知县孙石移建于今学内。乾隆三十五年（1770），知县张奕、教谕张长墀、训导张羲年，协邑绅士重建。嘉庆十二年（1807）贡生赵璨捐修。”

昌化的文昌祠旧在儒学内，今文昌路由此得名。另有三座文昌阁。民国十三年（1924）《昌化县志》卷四载：“一治西，一治南蒲村，一治北瓦窑庄黄岩坑谷口。”《昌化县志》卷三载：“康熙二十三年（1684），知县谢廷玠捐建尊经阁，又改建文昌阁。先系文昌祠，后童志廷捐建为阁。”“圣域门东文昌阁三间。”

玲珑山上旧有文昌祠。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十月，高僧照启曾在玲珑山上建文昌祠。1963年徐映璞编纂的《玲珑山志》载：“文昌祠，在大雄殿左山阿，西南向。《李应征记》载：‘有入文昌祠迟令君语。’可知明季尚存，且为贵宾休憩之所，不知废于何时。”

清凉峰镇下乾山旧有文昌阁。天目山镇肇村村旧有文昌阁。板桥镇上田村，在《刘氏宗谱》中记有上田十景，并有十诗。其中第八首为文昌阁一景，古有诗《文昌高阁》：“乡间翠阁甚轩昂，玉成学士藉

文昌。耕读遗风传古今，凭栏敲句附滕王。”

六、文庙祭祀

天目山一带尊师重教的风气由来已久，多建文庙、孔庙、大成殿等。据史载，境内主要人群聚居地大都有文庙、孔庙、大成殿、文昌祠等，为祭祀孔子等儒家圣人的场所，民国时期都有遗存。在这些建筑前面，常常能看到焚字炉，写过字的纸，不用了应该置放炉内焚烧，不能随意抛撒，被人践踏，以示文字之神圣。

文庙还有田产、地产和山产等，乾隆二十四年（1759）《临安县志》载，临安文庙有分布各地的田产9块，共计10.2亩，另有桑地、竹地、荒地、柴山，以供文庙日常开支。

每年仲春或仲秋，要举行祭祀孔子等儒家圣人的活动，仪式十分隆重。

据民国十三年（1924）《昌化县志·礼制志》载，除了祭祀孔子外，文庙祭祀的还有四配：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亚圣孟子。东哲先贤闵子损、冉子雍、端木子赐、仲子由、卜子商有子若。西哲先贤冉子耕、宰子予、冉子求、言子偃、颛孙子师、朱子熹。另有东庠、西庠各60余人。

祭祀有着十分严格的程序，祭期、献官一、分献官二、斋戒、省牲有必须遵循的规则。文庙中的各式祭器和各种乐器有严格的登记。祝文是有模本的，祭仪也是程式化的：迎神、初献、亚献、终献、撤饌、送神、望瘞，每一个步骤不容有失。

宣统二年（1910）《临安县志》载：“圣庙仪注，先期斋戒三日，前一夕各与祭官入庙，于阶下行一跪三叩礼。……四鼓，教官率各执事人，陈设祭器祭品牲俎于各神位前。……五鼓，各官朝服，执事序公服，序立，礼生导祭官盥洗，至台阶下立，典仪唱乐舞生各就位，执事者各执其事。……乐作昭平之章，……引主祭官升阶入殿，……

至圣先师香案前跪上香，三上香毕，俯伏。……读祝位跪，……众官皆跪……，读祝文毕，……均行三叩礼。……主祭分献暨陪祭官行三跪九叩礼，通赞，赞彻饌，奏懿平之章。……乐止，通赞，赞送神，奏德平之章。……主祭官暨陪祭官行三跪九叩，礼兴，读祝者捧祝，奠帛者捧帛，恭送燎所，乐作，引赞引主祭官诣燎所。……礼毕皆退。”祭孔祝文为：“维某年某月某日致祭于至圣先师孔子。曰：惟师德隆千圣，道冠百王，揭日月以常行，自生民所未有，属文教昌明之会，正礼和乐节之时，辟雍钟鼓，咸格荐于馨香，泮水胶庠，益致严于笾豆，兹当仲春（仲秋），只率彝章，肃展微忱，聿将祀典。以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配。尚飨。”祭祀礼仪繁杂隆重，严格有序。

抗日战争爆发后祭祀停止。后因种种原因，这些建筑纷纷被拆毁。锦城街道的孔圣殿后改为临安城关完小，“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殿被拆，众多碑石皆毁。

七、儒学与艺文

天目山区尊文敬儒，敦本重学，历代的地方志书中都将儒学建设之《记》收录在“艺文”编，还有大量的诗词。

如康熙十二年（1673）《於潜县志》中就专门设有“学校”一编。“艺文”中收有记述儒学学宫的文章。如收有赵之珩《文庙告成叙》和《重建名宦祠碑记》二文，有王之皋《重建儒学记》、陈金星《建学启土告文》、章士珩《文庙成进》、汪心《修建儒学记》、林增高《重建学宫叙》，还有《山房记》。阮子孝是於潜嘉前人，万历年间（1573—1620）得中进士，授建宁知府，后升任南京刑科给事中。康熙《於潜县志》中就收录了阮子孝向皇帝递交的一篇《科场重典疏》。民国十三年（1924）《昌化县志》则设“选举志”一节，记述科甲、贡生、毕业之内容。艺文中则收录有宋陈居仁《昌化儒学记》、明高时中《重

修儒学记》、明戴冕《重建尊经阁记》、明陶懋钦《重修儒学记》、明吴之瑗《国子生陈灼独建儒学记》、明康万有《国子生陈灼独建儒学记》、清魏墀《改建儒学记》、清傅应骥《修学纪事》、清林霖培《建造儒学甲卯方秀峰塔碑记》、清魏哲嗣《郑氏重修明伦堂记》、清蔡世源《改建儒学门向方位祠署记》、清王元音《重修儒学记》等。

儒学教育本是天目山区培养人才的途径，但随着官民之间的不断推行，变成改变民风之根本，正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於潜县志·风俗》所说：“既教育之，又劝勉而默导之，向之桀骜不驯者，咸彬彬然。”天目山区崇文敬儒、敦本重学、厚德尚礼之风至今尤浓。

家训与民风

吴越国国王钱镠生在临安，葬在临安。生前有“八训”和“遗训（十训）”留世，后代子孙遵奉其遗嘱，便有了钱氏的族规诫训。现存的《钱氏家训》就是各地钱氏后裔的族规诫训的一个汇合本，为整个钱氏家族所接受，民国十三年（1924），钱镠三十二世孙钱文选将其收录于《钱氏家乘》上。其内容涵盖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四个方面，对子孙立身处世作了较为详细的规范。千百年来，钱氏家族之所以人才辈出，《钱氏家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2021年6月，《钱氏家训家教》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其实不仅仅钱氏家族有《钱氏家训》，百家姓氏都是有自己的族规诫训的。在中国历史上，族规诫训颇为流行，如《朱子家训》《颜氏家训》《包拯家训》《诸葛亮诫子书》《郑氏规范》《谢氏家训》等，其中内容都以儒家学说为根本，对家族的道德言行等作了规范，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天目山区有400多个姓氏，几乎每一个姓氏都有自己的族规诫训，而旧时族规诫训的一个重要传播场所是祠堂。临安曾有1000多家祠堂，是天目山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数千年文明史中，族规诫训成为天目山区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元素。

旧时天目山区的祠堂有着半神化和半世俗化的特征。在祠堂内有历代太公的神位画像，有宗谱族谱，有相关内容的匾额楹联等，再加上族规诫训等，形成庄严神圣的氛围，让人自然而然产生敬畏之感。如《钱氏家训》开宗明义：“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如同一把无形的剑悬于头顶，时刻提醒着本族每一个子弟。

祠堂的“领导”是族长，对本族拥有最高的话语权，通过对祠堂的运作可以实现对本族本姓的治理，是对官府行政管理的一种补充。

家训在祠堂中传播的主要形式有：家训教育、礼仪典范、激励惩罚、高台教化等。祠堂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家训或族训，首先让本族子弟从小就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应该设立什么样的目标，即在社会上应如何立身、如何处世，如何报效国家、服务人民。南宋西天目山人洪咨夔自小受家训教育，以直言敢谏著称。据史书记载，其父洪钺见其疏后，对他说：“吾能吃茄子饭，汝无忧。”可以看出，洪咨夔威震朝野的大胆直谏，与洪钺的教育不无关系。

2012年，临安市委宣传部提出建设文化礼堂的构想，在板桥上田村、太湖源光辉村等地试点，借文化礼堂的建设，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并大面积推开。这一创举不久引起全国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至今文化礼堂建设依旧如火如荼，在乡村呈燎原之势。之所以有旺盛的生命力，还是因其适应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之需，改善民风之需。在文化礼堂建设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家训、村训的建立和完善。如板桥上田村，现姓氏较多，结合钱氏、潘氏、刘氏等主要姓氏的宗谱中的家训，形成了《上田村训》，其内容包括：

爱国家

家国相连，有国有村。国家之事，视为己任，
爱国如家，赤胆忠心。国强民富，繁荣昌盛。

爱集体

茶乡竹海，文武上田。百姓共源，千枝一根。
团结同心，互敬互爱，珍惜村誉，村兴我兴。

正德行

立身天地，无愧圣贤，公心待人，处事严谨。
仁慈隐恻，节义廉退，忠厚传家，品行端正。

敦孝悌

尊祖敬宗，不忘根本，孝顺父母，恭敬师尊。
妯娌和睦，兄弟宽忍，夫唱妇随，一门和顺。

睦乡邻

邻居乡亲，相友相助，修桥铺路，惠普乡邻。
心怀宽厚，容让无讼，待客有礼，蔚然成风。

怀善心

敬老怀幼，恤寡矜孤，救灾周急，排忧解难。
与人为善，助人为乐，行善积德，天佑斯人。

尚学业

学海无涯，刻苦作舟，读书尚礼，学业有成。
练武习字，上田传统，精益求精，奋勇登顶。

务勤奋

士农工商，七十二行，勤能补拙，人人尊敬。
创家立业，勿可懒惰，一生勤奋，无限前程。

正财道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经商贸易，买卖公平。
勿贪横财，不漏赋税，交财尚义，福报至深。

持节俭

财勿攀比，量入为出，家有蓄积，遇事不惊。
婚丧从俭，奢侈无益，克勤克俭，家道可成。

重修养

洁身自好，遵纪守法，知过能改，一日三省。

富不恃势，贫不丧志，举止稳重，永享安宁。

交良友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结交友人，良莠细分。

诚信待人，勿信谗言，施惠无念，知恩感恩。

六戒

一戒吸毒、二戒斗殴、三戒行骗、四戒偷盗、五戒迷信、六戒醉驾。

上田村的民风在天目山区远近闻名，有口皆碑，与《上田村训》有密切的联系。

崇尚孝道

中国有一句古话：“百善孝为先。”为什么把“孝”放在第一位？古人云：“孝，德之本也。常存仁孝心，则天下凡不可为者，皆不忍为，所以孝居百行之先。”

天目山人在历史上也十分崇尚孝道，境内曾有许多孝节牌坊，现清凉峰镇颊口村桥东自然村、锦北街道金马村黄金坞自然村尚有两座节孝坊留下来。旧时三县的县志中都有相当的篇幅记述孝道和孝行。在众多的族规家训中，孝道始终是摆在最重要的位置。县境内也不乏含“孝”字的地名，如玲珑街道过去曾名孝感乡，又有唯孝里，金岫旧有志孝里，昌化有孝和、孝顺、至孝、孝义等里名，还有孝岭等。横畈有一村名为孝村，传有吴姓人入赘沈家，孝敬二老，尊敬长辈，和睦邻里，因而得名。

在湍口镇童家村，有一座杭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何氏宗祠（敦伦堂），前厅则刻有二十四孝图，以倡孝道。清凉峰镇杨溪村义干自然村尚存一座建于明代的孝子祠，是为元代孝子陈斗龙所立之祠。宋末元初，陈斗龙六年间跋山涉水于五省的各州各县，终于在浙江台州临海永丰留贤村寻到自己的生母，在坊间传为美谈。嘉靖继位后在国内倡导“孝悌”，听闻陈斗龙的事迹后十分感慨，遂颁旨恩诏天下，敕封陈

斗龙为“孝子”，并御题“孝子”二字，制成竖匾一方，赐建孝子祠，永树风范。这座建筑保存至今，2011年，省政府公布其为第六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这些都是天目山区倡行孝道的历史见证。

天目山区曾发生过“孝子赈饥”的故事。在20世纪初，有一位叫施友烟的竹匠，人称“施孝子”。他平时就住在天目山南於潜的西菩寺里，虔诚茹素。其身材矮小，出门常穿青灰粗布长衫，外罩黑粗布马褂，鞋袜齐足，黑白分明，天寒则头戴瓜皮小帽，衣冠整洁，行八字步。遇人必是笑脸相迎，拱手为敬。施友烟的祖籍在浙江东阳县，因母亲亡故，回原籍守墓三年，期满又回西菩寺重操竹业。

上海有一位陈姓孝子，是家财万贯的富商，母亲生病久治未愈，一夜得梦，有神人告知：以孝子身上未洗之衣煎水服之可治愈，这位孝子就在浙江。陈氏遂与母亲来浙江寻访，打听到施友烟的孝行，便到於潜找到了施友烟。施友烟推说服孝尚未期满，孝服不能轻易摘脱。陈氏说明原委，施友烟便脱衣相赠。陈氏授之以银，施友烟坚拒不受。据说陈母即以神人相授之法治，果然病愈。此后陈氏每年正月来天目山探望施友烟，并赠以钱钞礼品等，以答谢治愈母病之恩，但施友烟每次都是坚拒。两人交谊渐深，陈氏到西菩寺，都是与施友烟同榻而卧。

有一年初夏，施友烟清除床上稻草，发现稻草中有银圆二百，知道是陈氏暗中相赠，施友烟乃专程送往上海归还。二人推让，施友烟总算穿了一套新布衣回来。临别时，陈氏对施友烟说，如遇什么急事，尽管来信联系。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夏秋之间，天目山一带遇大旱，饥民遍野，以啃树皮、草根求生。施友烟见此情景，写信给上海陈氏。陈氏接信后，立即调拨救济物资，并组织医疗队，亲自来天目山区实施救济。事先以电报告知施友烟，施氏文化程度不高，便请方元铺的乡绅方天麟、方幼壮兄弟二人阅读，方氏兄弟知道事关重大，立即向县政府及邑人罗霞天反映。为表示敬重，罗霞天和施友烟等亲

往上海迎接。救济团来到天目山各地，赈饥施医，共捐给天目山区灾民救灾款三万元，折稻谷一万担，使许多天目山民渡过了难关。

在众多的善士帮助下，施友烟与上海陈氏两位孝子完成了一大善举。为了表彰、倡导这种孝顺慈善的精神，民国二十四年（1935）春，民国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曾赐予“孝子居”匾额一方。

施友烟是手艺人，生活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可是他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继承了传统的道德理念。一开始，他只是以自己默默的行为，去践行自己的理念，在他的主观思想中，并没有希望自己的孝行能影响别人、影响社会，去促成一个闻名遐迩的慈善行动，虽无心插柳，柳却已成荫，成就了他以小促大的大善之举。

由此，我们可以想到，在孝风盛行的社会风气下，孝道和善念可以成为每一个人心性自然的流露，而不带任何功利色彩。许多刻在孝节牌坊上或者记载在志书文案中的孝子，只是由于某个机遇而名垂史册，但更多的是默默无闻的平常人坚持一片孝心，他们是和谐社会的基石。只有这样，孝道才能进入健康的轨道。这才是我们向往的一种状态。

二

年节习俗



过 年

关于过年，有着这样一个传说，古代有一种叫作“年”的十分凶猛的恶兽，每逢岁末便要出来吃人。有一次它又出来，走到一个村子，见到一群人围着篝火，正要上去捉人，突然有一节竹子在火中爆裂，恶兽十分害怕，掉头就跑。跑到另一个村子口，恰巧有个孩子在抖落一块红布，太阳一照闪出一片红光，恶兽更是吓得屁滚尿流，一溜烟跑回自己的洞穴，这一日再不敢出来吃人。于是，人们知道了这种恶兽有怕爆竹声和怕红色的习性，每逢大年三十，就燃放爆竹，挂大红灯笼，贴大红对联。第二天相遇，村民还会相互道贺，庆幸自己并恭贺对方躲过了“年”这个恶兽。这是火塘边老翁给孩子们讲得最多的故事。

天目山过年的前奏大约是在腊月后半月开始的，这时候家家都已经开始杀猪、宰羊、办年货、打年糕等，而豆腐是每一家都要做的。从腊月二十起，家家陆续开始掸尘。

从腊月廿三送灶司菩萨上天开始，山民们便拉开了过年的序幕。

一、祭 灶

腊月廿三为祭灶日（昌化有作腊月廿四），亦称作小年夜。灶神亦称灶王、灶司菩萨等，传为玉皇大帝派到人间察看善恶之神。其神的由来，一说是火神重黎，为彭祖之伯祖，天目山区锦城之东有八百里，相传是彭祖隐居和墓葬处。

旧时腊月廿三到了子时就鸣炮送灶神上天。康熙十二年（1673）《昌化县志·风俗》载：“二十四日俗传灶君朝天，言人间善恶事，故于是夕祀灶。”是日，家家户户在灶龕换上新的灶公菩萨画像，菩萨旁贴“上天重重奏好事，下地日日保平安”。人们还会念《灶司经》：“念念《灶司经》，灶司菩萨生龙庭，一年四季保太平，好人好语带上天，恶人恶语丢两边，平地开花朵朵开，全家老小靠青天。”以酒食祀之，其中有麦芽糖，意为使灶君食甜食说好话，或说以糖粘住嘴无法说出该家劣迹。传灶君全年茹素，仅该日可开荤，故每家必饷以一鸡，此为“谢灶（送灶）”。也有在此日祭祀百神及接祖先。

到了腊月三十，各家又在灶台摆上供品，再念《灶司经》，迎接灶神，祈求带来平安和财富，此为“接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送、接灶神和贴门神的习俗渐渐淡化。

二、除 夕

除夕俗称“大年三十”。康熙十二年（1673）《昌化县志·风俗》载：“各帖门神春联于宅，是迎新岁也。祭神祀先，一如小年。并悬挂先像于中堂，以申瞻慕。长幼团聚欢饮，张灯炽炭鸣爆竹。有坐至深夜者，名曰守岁，是夜取安静为吉。”

除夕前夜或除夕凌晨，供三牲福礼“谢年”。除夕换贴新门神，或以红纸书春联。除夕晚设筵祭祖，全家吃年夜饭，称“分岁”。是

夕就寝特晚，或伴灯不眠，称“守岁”或“坐长命夜”。午夜时要迎灶神。

三、春 节

春节的说法是后来才有的。民国开始改用阳历，1月1日称为元旦，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

正月初一为春节之始，在天目山区黎明要放“开门炮”，寓驱邪和高升；吃“长寿面”，寓人寿年丰。昌化地区也有早晨以糖煮鸡蛋敬长辈和妇女。随后在厅堂设桌置汤团茶叶水果、糕点等供品。家长率家人拜天地菩萨、灶司菩萨、财神菩萨等。有的村要在祠堂中举行接天地仪式，人们叠起两张八仙桌，搭起天地台，上点一对大蜡烛，将天地网（写字的红纸）挂台前，由管年头的人守着，不让蜡烛破膛或熄灭，直到初三送天地，收掸天地台。

正月初一家庭主妇可休息，由男人主灶烧饭，这也体现了天目山习俗对女性的一种尊重。

这一日忌用刀、忌扫地、忌洗衣服，忌烘烤冷馒头、粽子、麻糍等食品。相传，正月初一是扫帚的生日，又传扫地会致家财漏失。

拜年是春节之要事，旧时需先入本族宗祠叩拜列祖列宗，继而在自家后堂叩拜先祖遗像。然后，晚辈按辈分排行，依次叩拜尊长，尊长回施教诲祝愿。最后，晚辈间相互贺岁。

正月初一人们一般不出门拜年。不走亲戚，不点灯，未暗即寝。昌化一带年初一要备香烛果品到祖坟上去拜坟年。

拜年是从初二开始的，延续时间很长，有“拜到大麦黄”之说，以早拜为敬。20世纪80年代后城镇流行送贺卡、电话拜年，21世纪又多通过手机短信、微信等拜年。

正月初五，俗称破五，天目山区有送五种穷神、迎五路财神之俗。五种穷神是智穷、学穷、文穷、命穷、交穷。而五路财神分别是东路

财神比干、南路财神柴王爷、西路财神关公、北路财神赵公明和中路财神王亥。这一日天目山民尤其重视。在前一晚，就准备好糕果、香烛等，祭牲为羊头与鲤鱼（称元宝鱼），寓“吉祥”“利”“余”之意。店铺也多选此日开市。初五零时开始，打开大门、窗户，鸣锣击鼓、焚香礼拜，送走穷神，恭迎财神入门。有谚称：“正月初五送穷神，穷山坞里元宝滚；正月初五请财神，五谷丰登福满门。”

漫说春联

在天目山区，春联早已代表一种浓浓的乡情，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年节风俗。到大年三十上午，家家户户都在家中里里外外贴上大红对联。因时为春节，便唤作春联。康熙十二年（1673）《昌化县志·风俗》云：“除夕各贴门神春联于宅，示迎新岁也。”光绪二十四年（1898）《於潜县志·风俗》也有类似记载。除了贴在大门两边，堂前楹柱、房门上也贴。灶上也贴上一副小的，那是给灶司菩萨的，牛栏、猪圈、羊棚，一视同仁，都有一副大红对联，那是给各路小神的。于是，家家户户便沉浸在一片喜庆的红色之中，山民们被映得红光满面，过年的气氛便弥漫了整个山村。

对联起源于何时何地很难确定，至少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孔融所作的一副堂联：“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后世一般认为起源于五代十国时期后蜀后主孟昶。有一年除夕，孟昶突发奇想，让身边的翰林学士辛寅逊在桃木板上写两句吉祥话，挂在自己卧房门口。辛寅逊写了，孟昶却不满意，还是自己捉笔，写下了“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十字对联，对仗工整，有吉庆味，又嵌有“新春佳节”四字。从此，春联便渐渐演绎为一种中华传统风俗。

五代吴越国国王钱弘俶有一次到杭州中河与钱塘江相交处的碧浪

亭，见钱塘江潮水初涨，舟楫辐辏，白帆片片，艚号声声，江面上一派繁忙景象。钱弘俶十分感叹，说道：“吴越地去京师三千余里，而谁知一水之利有如此耶。”陪同钱弘俶的龙华寺诗僧，名叫契盈，才思敏捷，颇善联句。听到钱弘俶这句话，灵光一现，便口出一联：

三千里外一条水；十二时中两度朝。

当时“两浙贡赋由海达青州”，水路三千里之遥，联中“朝”含朝贡和江潮两层含义。饱读诗书的钱弘俶，听了不禁连连叫妙。此联虽非为春节喜庆之用，但其对仗工整，音调谐美，点景切题，巧妙贴切，时事意境堪称典范，后人推敲称为“骈切”，被列“绝对”，至今为联界所津津乐道。

自此以后，天目山区春联之风兴起，无论文人雅士、富贵人家，还是普通农户，这春联都成了过年的一个重要内容。或言志抒怀、应景寄情，或祝福祈祥、歌颂太平，千余年来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春联对句，其中不乏精妙绝伦之作。

还有一则发生在临安的传说。北宋大诗人苏东坡、黄庭坚由苕溪乘船来临安，船至长桥，正是傍晚时分，但见落日熔金，澄波似镜，山光倒映，桥影如虹，又有牧童横笛，渔舟唱晚。于是，黄公兴致大发，便在船上挥毫泼墨，写成一上联，联曰：

虹影飞空，农夫齐歌普天乐；

遂即递笔给苏公，请苏公续写下联。苏东坡接过笔，略略思索，便落笔成文，对得下联：

晚霞映水，渔人争唱满江红。

句中的“普天乐”“满江红”皆为词牌名，两两相对，妥帖自然，加上一纵一收，书体各异，上联风神洒脱，下联凝重雄浑，可谓妙绝。两人相视，掷笔哈哈大笑，遂将此联送予船工。船工带回家中，挂在中堂，令四周邻舍羡慕不已，留下了一段佳话。

浙西大峡谷曾连连举办征联活动，把春联与旅游有机结合，做出了文化，做出了风情，也做出了影响。最初是在2006年举办了“新年新客、春联闹春”征联，接着2007年举办了“春联十二对、峡谷抒情怀”征联，2010年推出了“首届春联节”“虎年春联100对”征联，2011年则举办了兔年迎春“大峡谷四季景联”征联。这些活动体现了大峡谷人对对联文化的情结。

闹灯吃元宵

元宵节是中华民族最富有诗意的一个传统节日，天目山的元宵节也是如此。

元宵又称为元夕，《梦粱录》载：“正月十五日元夕节，乃上元天官赐福之辰。”相传宋初时天目山区元宵灯节为三夜，因钱王纳土归宋则添为五夜，即十三上灯，十八落灯。在这节日里天目山的习俗就两件事：吃汤圆，玩灯。

可以说汤圆是元宵节专有的节令食品，有将汤圆直接呼为元宵的。据说汤圆这个名称是清代才开始出现。这一食品是从宋代一种名叫包“馊子”的食品发展而来的。馊子，实际就是一种圆的薄饼，北宋陶谷《清异录》将这种馊子称为“上元油馊”。因这种食品是圆的，所以被称为“圆子”。“圆子”圆圆的，像元宵夜天上的月亮，人们嘴里吃着“圆子”，心里还有家人团圆的希冀。

元宵节天目山玩的灯要比吃汤圆来劲多了。

在天目山区，正月初就要开始张罗扎灯了。灯有两种，一是挂灯，二是舞灯。

旧时街市、神庙节日都要悬挂彩灯，挂灯的形制尤其丰富，有圆灯、方灯、走马灯等，明代东天目山昭明禅寺的无际禅师见走马灯，

曾作一偈：“团团游了又来游，无个明人指路头。歇却心中三昧火，刀枪人马一时休。”

挂灯多以竹条、竹丝为骨架，覆以绢或纸并彩绘而成。灯上往往写有一条谜语，便是灯谜。这些灯谜，又让节日生出另一番滋味。这是观、赏之灯，算是简单的。舞灯的花样就多了。

天目山一带灯队甚多，有临安水龙、吴越双狮、天目狮子灯、天目俞家龙灯、天目月亮桥马灯、太阳五凤朝阳、湍口变狮、乐平蚕龙灯、潜川手狮、岛石红狮、马啸滚灯、河桥鱼灯、龙岗彩凉船、板桥钱氏灯会（红毛狮子）、青山龙腾狮跃、玲珑龙飞凤舞、潜川马灯、杨岭花灯等。

临安水龙是以板桥秋口龙灯为基础，根据吴越国国王钱缪兴修水利，发展农桑，使吴越富甲东南的史实与传说而创作。

临安水龙有舞龙19人、鼓乐7人。龙身17节，长50米，龙首魁伟，眼、鼻、嘴、腹、脊、尾皆配可控发光装置。阵式分为金龙出世、金龙变水龙和水龙变龙舟3步。通过游龙跳龙、巨龙腾飞、龙鱼漫游、龙卷巨浪、龙斗旋涡、化为龙舟等舞式展示金龙出世、戏水搏浪、吸水聚气、普降甘霖、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集中国“龙”之精、气、神于一体。舞式遒劲多姿，表演气势恢弘，色彩斑斓绚丽。

吴越双狮由太湖源梅家村传承表演。20世纪30年代初为红毛狮子灯，后改绿毛狮子灯。20世纪90年代创新命名为“吴越双狮”。

申明竹制马灯源于明代宫艺，已有500余年历史。《唐昌方氏宗谱》载：方世通出生于清道光十九年（1839），方世选出生于清道光二十五年，两兄弟为跳马灯主演，后传于方国恩及方正生。清咸丰年间（1851—1861）竹制马灯遭毁。至同治十二年（1873），申明村方以钰考中拔贡第一名，为谢乡民，重兴灯艺。光绪初年重办马戏衣帽等，恢复竹制马灯表演，每逢闰月年春“竹马戏游，迎灯焕彩”，后定每八年出一次灯。民国二十九年（1940）按户自愿资助，更新服饰道具。民国三十五年出灯两次，1949年后停止出灯。1956年，方文金制作赤

兔马一匹，参加嘉兴专区民间艺术会演获奖。“文化大革命”期间停演。1986年重新恢复，并成立申明灯会，每四年出一次灯。

过去的灯是以竹子扎成，闹一次扎一次，正月十八闹完了，送灯到村子的水口，开锣喝道，燃放鞭炮，龙灯队则将龙盘起，每人点一支香，跪拜，然后焚烧。事毕返回，休锣息鼓。现今的龙头、狮头往往从专业商店购得，造型精致，龙皮、狮皮也是取用精致面料做成，一般都使用若干年后才更换，落灯习俗较前已有很大改变。

以扎龙灯为例，天目山一带有龙崇拜的习俗，因此龙灯甚多。龙灯的骨架多以竹子扎成，旧时扎龙头的竹子必须是“偷”来的，事先上山选好十年以上的老毛竹，夜晚去砍倒背回，在竹根处放一个红包，还要鸣炮而回，被“偷”者也引为吉利。然后将竹破开，劈成竹条，按形状扎好龙头和龙身，龙头部分先用两方小红纸把龙眼障住，待上灯日开龙眼。旧时，正月十三上灯，也有初八上灯，十八落灯，往往都有一套祭龙仪式，各地大致相同。锦城横街龙灯从前的龙头和龙尾都是用竹篾编成的，上灯日由族长带队到村旁护龙寺内的接龙井旁举行仪式，由住持蘸接龙井水擦龙眼，谓“龙开光”。随后每个舞龙人喝一碗接龙井中的水，方可开始舞龙。在青山湖街道横畈有一支巾帽竹叶龙队，充分体现了竹乡的特色，又打破常规，女子表演，十分罕见。

自20世纪80年代恢复民间传统灯彩，临安每年都举办元宵灯会，传承创新的灯种有三十多个，灯队有一百多支。

《广德神异录》记载了《西凉观灯》的传奇故事，也在天目山区流传，故事中的叶法善是洞霄宫的道士。

开元元年（713）正月十五夜晚，唐玄宗在上阳宫内大摆彩灯，庭院里也点起篝火，自禁门到殿门皆设蜡炬，光照宫室，荧煌如昼。当时宫廷中的尚方都匠毛顺，心多巧思，做成灯楼二十间，楼高一百五十尺，上悬珠玉金银，微风一至，发出美妙的声音，锵然成韵。灯的形状为龙、凤、螭、豹，腾踞之态，似非人力所能为之。玄宗见了大悦，急召叶法善前来。叶法善来到后，玄宗便悄悄带领他到楼下

观看，其余人皆莫知之。叶法善对玄宗说：“灯影之盛丽，天下无比，只有凉州可以排在第二位。”

玄宗说：“难道你刚才曾去游览过吗？”

叶法善回答道：“我刚刚从那里过来，一到就蒙皇上召见，匆匆赶来。”

玄宗听了他的话十分惊讶，说：“我现在也想到那里去看看，行吗？”

叶法善说：“这个容易。”

于是叶法善就让玄宗闭上眼睛，并与玄宗约定道：“必不得妄视，如若误有所视，必会发生非常惊骇的事情。”

玄宗就按照叶法善说的，闭上眼睛，感觉突然身体一跃，顿时已在霄汉之上，不久，脚已着地。

叶法善说道：“可以观览了。”

玄宗既睹西凉的影灯，连亘十数里，车马骈阗，士女纷委，连连称赞。

过了很久，叶法善道：“观览已毕，可以回矣。”

玄宗又闭上眼睛，与法善腾虚而上，顷刻，已经回到了彩楼之下，而彩楼中的歌吹之声犹未终。

在凉州时，叶法善曾用一镏铁如意当了换一壶酒。又一天，玄宗派使者去了凉州，到店中赎回镏铁如意，还给了叶法善，检验之下，果然就是原物。

除了玩灯，天目山区旧俗元宵节还要做三跳戏。第一个出台跳的是手握朱笔银锭的花面魁星，讨“必定高中”的彩头。第二个跳的是白面天官，峨冠博带，宽袍大袖，手举朝笏，展示书有“指日高升”“国泰民安”“天官赐福”等句的绣花卷轴，读书人想有功名者可在心里默念“指日高升”。第三个跳的是金面黑蟒、手捧金元宝的财神，跳毕，把元宝丢在桌上。观众则抢着说“元宝是留给我的”，以讨彩头。昌西一带此日要携供品去拜明瞻禅师，昌北则拜黄檗禅师。头

年生儿子的人家，要出钱接菩萨闹元宵。

天目山区为竹乡，元宵还有摇竹娘的习俗。夜深时，当地竹农便让小孩单独走入竹林里，选一株去年长出来的健壮的新毛竹，双脚并立竹前，在双手高举过头之处，扶着竹竿摇动，一边摇一边唱：“摇竹娘，摇竹娘，侬长我也长，旧年是侬长，今年让我长，明年侬我一样长。”当地流传竹神、竹娘能够帮助孩子长得高大结实，天目山一带汉族、畲族都有此俗。昌化一带念词略有不同：“竹哥哥！竹哥哥！今年是你长，明年是我长，后年两人一样长。”

从东坡访道潜说天目清明习俗

苏轼在黄州时，一次夜梦天目山僧道潜携诗见，醒来后只记得两句：“寒食清明都过了，石泉槐火一时新。”梦中苏轼问：“火固新矣，泉何故新？”道潜答道：“俗以清明淘井，当续成诗以记其事。”此时道潜已经离开黄州。北宋元祐四年（1089），苏轼知杭州，时道潜居住在杭州的智果精舍中。智果寺原在孤山，为钱武肃王所建。绍兴年间（1131—1162），造四圣观，将其徙于大佛寺西。智果寺中有一石泉，道潜按天目山的习俗在清明节前对石泉作了清理，使泉更为清冽。苏轼来访，道潜便擷新茶，取以泉水，钻火煮茗，招待苏东坡。此情此景，适符九年前所梦，苏轼感慨之下，作了一首《参寥泉铭》。铭曰：

在天雨露，在地江湖。皆我四大，滋相所濡。
伟哉参寥，弹指八极。退守斯泉，一谦四益。
予晚闻道，梦幻是身。真即是梦，梦却是真。
石泉槐火，九年而信。夫求何神，实弊汝神。

题中“参寥”乃是道潜之号。其时，苏轼又对道潜说：“吾生平未尝到此，但眼前所见，都似曾相识。自此登上忏堂，应当有九十三级

台阶。”数之，果如其言。即对道潜说：“我前世是此寺中之僧也，今日寺僧皆吾法属耳，吾死后，当舍身为寺中伽蓝。”又作诗《参寥上人初得智果院会者十六人分韵赋诗轼得心字》：

涨水返旧壑，飞云思故岑。念君忘家客，亦有怀归心。
 三间得幽寂，数步藏清深。攒金卢橘坞，散火杨梅林。
 茶笋尽禅味，松杉真法音。云崖有浅井，玉醴常半寻。
 遂名参寥泉，可濯幽人襟。相携横岭上，未觉衰年侵。
 一眼吞江湖，万象涵古今。愿君更小筑，岁晚解我簪。

后来道潜还真的在智果寺中塑了苏东坡像，供在伽蓝之列，留偈壁间，有：“金刚开口笑钟楼，楼笑金刚雨打头，直待有邻通一线，两重公案一时修。”《武林旧事》载：“上智果院有参寥泉，东坡题。梁广王攢所。”后寺破败。明崇祯五年（1632），有扬州秀才鲍同德，字有邻，来寓寺中。东坡两次入梦，属以修寺，鲍辞以“贫士安办此？”公曰：“子为之，自有助子者。”次日，见壁间偈有“有邻”二字，遂心动立愿，作《西泠记梦》，见人辄出示之。

光绪二十四年（1898）《於潜县志·风俗》载：“清明节，造青精饭，具角黍牲醴奠于墓。早起门檐插柳枝，妇女儿童簪柳叶，蚕桑家暖蚕种，食螺蛳，谓之挑青壳，撒屋上谓之赶白虎，盖祛蚕祟意也。寒食之夕最忌雨，无雨则麦多成熟。”

旧时，逢清明节都要做青饊，到亲人墓上祭奠。天目山区的宗祠均大开正门，举行祠祭。主祭人行三跪九叩大礼后，按辈分大小依次叩拜。午间由轮值户置酒席宴请族中众人。於潜旧有门檐插柳枝，妇幼簪柳叶之俗，以祈四季平安。养蚕的人家清明节要暖蚕种。又有食螺蛳，将壳撒屋上，谓之“赶白虎”祛蚕祟，今已淡出。传清明前一天忌雨，如果无雨预兆麦子收成好。

上坟和家祭沿袭至今。上坟在清明前后三日内，子孙亲人上坟祭

祀亡者，有除杂草覆新土，插坟标纸，备供品，燃香烛楮钱，念祝文，放爆竹献鲜花等祭祀形式。家祭则在节前三天内举行，堂前放八仙桌，置三荤三素以及酒、饭、清明馐，桌上方及左右放酒杯、筷子，下方放烛、香炉，家人跪拜。香将燃尽时，烧纸钱，主人跪拜，吹灭蜡烛，把未燃尽的香插大门外，表意送祖宗出门，然后家人开始用餐。

重五和重阳

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又称为“重五”“端阳”“浴兰令节”。农历九月初九则为“重阳”。与二月二、三月三、六月六、七月七一样，月和日是重叠的一个数字。

端午节这一日的风俗味儿尤其浓。家家户户堂前和大门要插“艾旗（蕲艾）”“蒲剑（水菖蒲）”以辟鬼邪。考究的还以艾草等缚成天师像悬于门额上。还要在墙脚四周撒石灰，贴朱书：“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诸邪回避。”城里的公寓房也插蕲艾、菖蒲。山村常以雄黄染小儿之额与手，或在前额书一“王”字。要食“五黄”：黄酒、黄鱼、黄瓜、黄鳝、咸蛋黄，以克五毒。用雄黄酒炒蚕豆，小孩佩戴香袋，还要采青木香收藏，以备不时之需。宋吴自牧《梦粱录》载“此日探百草或修制药品，以为辟瘟疾等用，藏之果有灵验”。

此日，裹粽子的习俗遍及城乡，花样风味不一。定亲或成婚的女婿要给丈人“送端午”。女儿出嫁第二年，端午节前岳母携粽、扇、手帕到女婿家，称“望端午”。旧时道士要到各乡村分钟馗像，各家回送一升米。於潜、昌化端午节还有“男女采百草相斗为戏，亲邻煮粽子并鸭蛋相馈遗，又妇人鬓插榴花，俗传可避赤眼”的风俗。

天目山区的畲族端午习俗稍有不同，他们以三根艾蒿、三支菖蒲、

三个蒜头扎为一束。在大门、窗户、房门两侧各挂一束，大门门楣上挂一束。艾蒿象征钢鞭，菖蒲象征宝剑，蒜头象征铜锤，以此把守门户，保宅平安。又以风车草水煮鸡蛋，午饭后，长辈将煮好的红鸡蛋发给晚辈。畚族有谚“五月节吃红卵，四季百病勿缠身”。有妇女把艾蒿切一段插在发间以辟邪，妇女儿童将红、黄、绿、黑、白纱线松松地系在手腕、脚腕、脖子之上，称长命索，能防瘟辟邪。系线时还对孩子强调不能开口讲话，五色线亦不可任意折断或丢弃，在节后第一次洗澡或遇发大水时，取下让洪水冲走，意把瘟疫、疾病带走。还有一个习俗是午后空闲时，村人聚一起唱山歌。

农历九月初九则是重阳节，九为阳，二阳相重因名“重阳”，二九相重，亦称“重九”。九是个位最大的数字，九九谐音久久，寓长长久久之意，现在国家将其定为敬老节。

重阳有打麻糍、登高、赏菊、饮菊花酒、食重阳糕等习俗。

打麻糍是重阳第一俗。将煮熟的糯米饭放在石臼中，反复捣杵，即成温热柔软的糍粑，将糍粑放在面板上摊平切成方片，可以长期保存。刚出臼的麻糍，蘸上白糖、芝麻粉，吃起来美味香甜，称得上是乡间最美味的食品。不光是吃，打麻糍的整个过程，都充满着乡愁味儿，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登高是重阳第二俗。节逢金秋十月，秋高气爽，正适合登高望远。民间自古就有重阳节登高的传统，又因茱萸能祛病护身，在登高之时，顺手采回山中茱萸，将其插于门前。唐代诗人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写下了“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的千古名句。

赏菊是重阳第三俗。说到赏菊，我们会想到陶渊明，他的吟菊诗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明吴之鲸撰的《武林梵志》卷八记载：“（陶渊明）常往来庐山、天目间，使一门生、二儿舁以行。……有《天目》诗。”《天目》诗即《问来使》，共五言八句：

尔从山中来，早晚发天目？我屋南窗下，今生几丛菊？

蔷薇叶已抽，秋兰气当馥。归去来山中，山中酒应熟。

诗中仿佛就是对重阳节赏菊饮酒的回忆。

赏菊之时，还要饮菊花酒、食重阳糕。重阳糕又叫花糕、菊糕、五色糕。有的还在糕上面做两只小羊，以示重阳（羊）。

此外，这一日天目山区还作兴以老菱请灶神，送老菱给老人，寓祝长寿。民俗中，这一日适合起灶，有“重阳日，打灶勿拣日”俗谚，打灶前（一般未天亮前）先请灶司菩萨，焚香跪拜，烧纸钱，请出灶司菩萨画像另行供奉，然后拆除旧灶重砌。

六月六 七月七

六月六是天贶节，七月七是乞巧节。这两个节都在盛夏，一是施，一是乞。

贶者，赠送布施也。布施什么？日光也。天贶节，顾名思义，就是老天爷把阳光恩赐给百姓，故又称为天赐日。

天贶节在农历六月初六。光绪二十四年（1898）《於潜县志·风俗》载：“六月六，汲新水作酱。是日曝书晒衣，以梅雨蒸变防朽蠹也。”天目山区民间有作酱、晒酱、晒冬衣、晒被褥、晒家中易霉物的习俗。此外，乡村农家还会驱家畜入河，可以除垢灭蚤。有俗语“六月初六，猫狗沐浴”“六月六，皇帝晒龙袍”等。这一日，儿童玩水，父母是不禁的。

天贶节还是读书人的节日。这一天，读书人作兴将书房中的书籍搬到太阳下去晒，防止因受潮而霉变。古时又有将七月七视作此节。

俗传七月七是魁星的生日。魁星主考运，读书人在七夕这天要祭拜魁星。民间传说，魁星爷跛脚，脸上长满斑点，但颇有志气，发愤用功，会试高中。殿试时，皇帝问他脸上是怎么回事，他答“麻面满天星”，问他的脚为何跛了，他答“独脚跳龙门”。皇帝就取他为状元。

七月七还与中国最著名的一则民间传说《牛郎织女》有关。

光绪二十四年（1898）《於潜县志·风俗》载：“七月七日，各乡村妇女入城隍庙礼拜烧香，络绎如市。夕间，有陈瓜果祀天孙者。是夕后，河汉不明现，早现则米贱，迟则米贵，谓之探米价，试之，甚有验。”此外，在天目山区，有七夕乞巧之俗。其日晚时，儿童女子皆着新衣，于广庭中设香案及瓜果面点巧食祭祀织女星，向织女乞巧。或取小蜘蛛，以金银小盒盛之，第二天早上观其网丝圆正，名曰“得巧”。还要吃巧果，巧果是一种油面糖蜜食品。《东京梦华录》称“笑厌儿”。又有妇女于六日晚在庭院供一碗水，七日中午将针轻掷水面，以阳光折射针影之示，占卜子女未来，针影如书状表示小男孩会读书有出息，针影如尺状表示女孩心灵手巧善女红。又有妇女采摘芭头柏叶捣汁洗头。也有儿童会采摘野花挂在牛角上，叫“贺牛生日”。

除了正月初一、重午、重阳、六月六、七月七之外，月与日重叠的节日还有两个，一个是三月三，康熙十二年（1673）《昌化县志·风俗》载：“三月上巳，俗谓三月三，为真武帝诞会，各往庙礼谒。妇女多诣园圃采荠菜花携归供神，亦杂插鬓边，谓可祈长寿。”另一个是十二月十二，为蚕神生日，特别为於潜地区所重视。嘉庆十七年（1812）《於潜县志·风俗》中载：“十二月十二日为蚕（神）生日，祀蚕神，浴蚕种。是日，酿酒置而藏之曰腊酒，味独厚。”

盂兰盆和中元节

七月十五是佛教、道教十分重视的一个节日，天目山民间习俗也受佛、道二教的影响。

在佛教信仰中，农历七月十五是僧自恣日或佛欢喜日。按照中国的佛教制度，僧人从每年的四月十六开始结夏安居，又称为雨安居、坐夏、结制等，到了七月十五这一日，结夏结束。安居圆满称为解夏、解制或安居竟。据《四分律》卷四十三《迦絺那羯度》载，安居结束时应作自恣。即安居九十日的最后一晚，大家仍齐聚一堂，检讨各人在三个月期间，言行有无违反戒律，也可互相指出对方的错失。若有犯戒者，则要当众忏悔，因此称为僧自恣日或佛欢喜日，这一日在中国就是七月十五。佛寺在此日作盂兰盆供。盂兰盆供是根据《佛说盂兰盆经》而开演的一部法门。盂兰盆是梵语的音译，意译为救倒悬。《佛说盂兰盆经》是西晋竺法护所译。此经中，记载了佛陀弟子目连救母出地狱的故事。目连的母亲青提夫人，家中甚富，但吝啬贪婪。其母趁儿子外出时，天天宰杀牲畜，大肆烹嚼，无念子心，更从不修善。母死后被打入阴曹地府，受尽苦刑。目连极孝顺，为了救母亲，以神通到地狱中，却无法将母亲救出。以食赐母，食物未到她口，便化成火炭。目连无计可施，十分悲哀，祈求于佛。佛陀教目连于僧自恣日

建盂兰盆会，借十方僧众之力超度母亲。目连便依佛嘱，使母亲得脱一劫饿鬼之苦。此后，便有了七月十五设盂兰盆会供养十方僧众以超度亡人的佛教典故。天目山各地的寺庙这一天都作盂兰盆供，并举行诵经法会，作水陆道场，放焰口，超度亡魂，信众则施斋供僧。西天目山禅源寺常举行法会，祭祀佛教历代祖师和天目山在抗日中阵亡的将士。

在道教信仰中，有天官、地官、水官三官大帝，又称三元。正月十五是天官大帝诞辰，称为上元；七月十五则是地官大帝诞辰，称为中元，即中元节；十月十五是水官大帝诞辰，称为下元。中元节这一日，旧时要在宫观内做法事、诵经以超度亡魂，演道士戏。随着宫观消失，这一习俗也消亡了。

受佛、道文化影响，天目山人视七月十五为鬼节，俗称七月半。光绪二十四年（1898）《於潜县志·风俗》载：“中元各家祀祖先，并有奠于祠庙者，谓之秋祭。夕则街上延僧施食放焰，为盂兰会，以恤孤魂。晦日各房室内外遍地点烛插香，谓之照冥。”这一日都在家中祭祀祖先，晚上备三荤三素以及老酒、米饭，往往用新米、新酱、时果等，点烛焚香，跪拜祖宗，烧纸钱，放鞭炮。八仙桌要按板缝直放，不用烧酒，女子经期忌拜。加前三日后三日共七天内，晚上都不抱小孩去屋外，节日当日小孩整天不能出门。旧时这一日多数人家都食素，屠户这一日休市。各地群众还于该日发起修桥、铺路等公益活动。

板桥乡村有开明绅士和群众捐田地资产建成的“孤坟会”，请道士拜祭，并烧香念经给孤魂野鬼，同时还举行“抢佛手”活动，“佛手”为形如手之馒头，稍大，供奉于神桌，法事完成，“佛手”由众人抢夺食用，有人抢得手指，有人抢得手臂。据传抢到者吃后可以辟邪消灾，其他地方也有类似习俗。

天目溪、昌化溪沿河有水盂习俗，即放水灯，又叫“放顺风”，船民在村口搭起法师座和施孤台，请道士做法事。天晚时每家船娘点亮搁在三角或方形木板上的荷花灯，木板上并搁食物，任其在溪河漂流，

意为屈死水中的冤魂引路。河桥一带近年恢复“放水灯”。又有陆赈，将食品放置于村头路口，沿路点烛，焚烧纸钱，给孤坟点灯，接济施舍没有子孙超度祭奠的孤魂野鬼。

旧时，天目山一带有演目连戏的习俗。逢此时，许多村庄在祠堂、庙宇或野外搭草台，除了演《目连救母》之外，还演《女吊》《跳无常》等戏。马啸等地至今有人会唱、会演目连戏。

天目中秋月，霓裳羽衣曲

八月十五中秋节在中国传统节日中是个大节，三秋恰半，故谓“中秋”。此夜月色倍明于常时，又称“月夕”。苏轼因此写了一首著名的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对着天上的明月抒发了一种深深的思恋之情。这也是中国人的情怀。因为这种情怀，才有了月桂、月宫，才有了奔月的嫦娥和她的白兔。

不仅嫦娥向往月亮，传说一位洞霄宫道士，也有“月亮一日游”的经历，他就是叶法善。宋邓牧的《洞霄图志》中有叶法善的传记：

叶法善，字道元，括苍人。……开元中，与明皇于中秋夜共游月宫，还过潞州，取玉笛请上奏一曲，仍投金钱城中。越旬日，潞州奏：中秋夜，有天乐临城，兼获金钱，以进。……初天师得道来游天柱，适钱塘江有巨蜃溺舟，经涉者苦之，青山镇长沈愈来迎，于是往焉。时潮信未至，投丹篆，江际戮之，以铁简镇于江心，遂绝其患，至今舟楫无虞，皆受赐天师也。已而回山，平居二十余载……

此外，《广德神异录》中也详细记载了这个故事。

唐开元元年（713）八月中秋夜晚，皓月当空，叶法善带着唐玄宗一起游玩了月宫，在那里聆听和欣赏了仙女演奏的月中天乐，美妙的仙乐让唐玄宗深深陶醉了。

玄宗就问其曲名，答道：“乃《紫云曲》。”

玄宗通晓音律，此时默记其曲，回来后就将其记录下来，名之为《霓裳羽衣曲》。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有“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从月宫回来途中，经过潞州城上空，玄宗俯视，见城郭悄然，而当时月光如昼。

叶法善就请玄宗在云中用玉笛吹奏一曲，玄宗说：“玉笛尚在寝殿之中。”

叶法善就命人去取，顷刻之间就拿着笛子而至。玄宗吹完一曲，还将袖中的金钱投了几个在城中。

过了十日，潞州刺史有奏本并附金钱上达：八月十五夜晚，有天乐临潞州城，并有金钱从天空撒落。

这则故事在《唐叶真人传》中有记载，明代文学家凌蒙初编撰的《拍案惊奇》中也有描写。

天目山人特别喜爱中秋这个节日。节前，亲友间互赠月饼等。节日之夜，金风送爽，玉露生凉，丹桂飘香，银蟾光满，庭院中充满了浪漫的气息。这是一个团圆的节日，小桌上放置月饼、水果、藕菱等，家人们团聚一起，沾点文的会赏月吟诗，谈论风雅；农家汉子则品点小酒，说着长者传下来的故事；有些女孩子则会在月光下放上供品，谓之“取月华”；有的还要焚香点烛，礼拜月亮婆婆。

相传天目山上有仙乐之声，也与月亮有关。清际界增修的《西天目祖山志》中记有“仙乐”：“古记，常时风清月朗，绝顶有笙箫声，又云欲霁欲雨，夜则闻空中丝竹具举，越旦，良验。”

三

生产习俗



《耕织图》和天目山区的农耕风俗

临安人历来“男务耕桑，女勤蚕织，风俗淳固，俗俭而质”。这种敦厚的民风也引起了统治者的关注。大约在南宋绍兴初年，楼涛担任於潜县令期间，受吴越国钱氏重视农桑农本思想的影响，做成了一件颇具影响的事情。他在於潜县十二乡范围内进行了广泛的农业生产和风俗的调查，然后以诗配画的形式，创作绘制了一套《耕织图》，其中耕图21幅，织图24幅，共45幅，用以指导农业生产。

一、《耕织图》的前世今生

楼涛，字寿玉，一字国器，生于北宋元祐五年（1090），卒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鄞县（今浙江宁波）人。楼涛出身仕宦家庭，擅长诗画，有《六逸图》《四贤图》等存世。宋绍兴三年六月至绍兴五年十二月任於潜县令，在任期间绘制了《耕织图》呈献给宋高宗。

宋高宗看了《耕织图》大悦，召见了他，并将《耕织图》宣示后宫。吴皇后专门为其题词。宋高宗命翰林院摹绘。摹本中的《耕图》现已无考，而彩色摹本《织图》正本一直深藏皇宫。民国期间曾散失，1984年在黑龙江大庆被发现，现藏于哈尔滨博物馆。史学界还有一

说，认为原版《耕织图》已流传至日本。

楼琬于绍兴五年（1135）升迁邵州通判，绍兴二十五年知扬州，绍兴二十六年，提举台州崇道观。后累官至朝议大夫。

楼琬绘制的《耕织图》应有两部以上，除了进献皇宫的一部，一部留在家中，可能在於潜县衙中也有留本。藏于家中的一部由其侄子楼钥题跋。其孙楼洪、楼深配上五言诗，刻之于石。

楼琬之孙楼洪为《耕织图诗》刻石题识中说：“于时，先大父为临安（府）於潜县令，勤于民事，咨访田夫、蚕妇，著为耕织二图诗。图绘以尽其状，诗歌以尽其情，一时朝野传诵几遍。寻因荐入诏对，进呈御览，大加嘉奖，即宣示后宫。初除行在审计司，后历广闽舶使，转漕湖北、湖南、淮东，摄长沙、帅维阳，持麾节十有余载，所至多著声绩，实基于此。”

其侄楼钥《攻媿集·跋扬州伯父耕织图》云：“伯父时为临安於潜令，笃意民事，慨念农夫蚕妇之作苦，究访始末，为耕织二图。耕自浸种以至入仓凡二十一事，织自浴蚕以至剪帛凡二十四事。事为之图，系以五言诗一章，章八句，农桑之务，曲尽情状，虽四方习俗，间有不同，其大略不外于此，见者因已赅之。未几，朝廷遣使，循行郡邑，以课最闻。”“夫沾体涂足，农之劳至矣，而粟不饱其腹。蚕缫织纴，女之劳至矣，而衣不蔽其身，使尽如二图之详劳……”

楼琬的《耕织图》受到历代皇朝的重视和推荐。受此影响，全国各地纷纷效仿，广为临摹，成为一部图文并茂的农业教科书，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农业科普画册，促进了当时的农业生产。

二、历代《耕织图》仿作

由于《耕织图》反映了农耕时代最重要耕与织的生产环节和习俗，因此一问世便受到广泛的关注。南宋时期，各府、州、县的衙门墙壁上都绘有《耕织图》的图画和诗歌，让官民观看，了解耕织过程和

细节。

宋宁宗时，刘松年曾摹绘《耕获图》，其中农耕二十一图和纺织二十四图，有木刻流传。宋宁宗嘉泰年间（1201—1204），梁楷也曾摹绘《耕织图》。

元延祐五年（1318），司农司苗好谦编写《栽桑图说》，将元初李声临摹的楼琬《耕织图》一起编入《农桑图说》。

元代时，安徽休宁人程桢根据楼氏家族收藏的楼琬《耕织图》副本临摹，即《程桢摹楼琬耕织图》，流传于世。

与天目山因缘甚深的元赵孟頫，曾奉旨撰《题耕织图二十四首奉懿旨撰》，其中有一诗云：

七月暑尚炽，长日弄机杼。头蓬不暇梳，挥手汗如雨。
嚶嚶时鸟鸣，灼灼红榴吐。何心娱耳目，往来忘伛偻。
织为机中素，老幼要纫补。青灯照夜梭，蟋蟀窗外语。
辛勤亦何有，身体衣几缕？嫁为田家妇，终岁服劳苦。

明天顺六年（1462）宋宗鲁曾重刊《耕织图》。

明万历年间（1573—1620），邝璠编撰《便民图纂》十六卷，其中卷一、卷二为楼琬《耕织图》摹本，并将其所配诗文改写成通俗的竹枝调。

明代杰出画家仇英也曾摹绘楼琬《耕织图》，现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康熙二十八年（1689），康熙皇帝第二次南巡时，意外获得楼琬《耕织图》，感慨“织女之寒，农夫之苦”，遂命内廷供奉焦秉贞以楼琬原作为蓝本，重绘《御制耕织图》，计有耕图、织图各23幅。康熙皇帝不仅在每幅耕织图上亲笔御题七言诗一首，还亲自书写序文，并命著名木刻家朱圭、梅裕凤镌版印之，颁赐臣工。焦秉贞摹绘《耕织图》当时在景德镇还被作为瓷器的纹饰烧制。

雍正也令画院依照楼琬的《耕织图》重绘翻刻，《雍正耕织图册》为设色绢本画，是清代重绘各版本中最精美的，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为国家一级文物。

乾隆年间(1736—1795)，冷枚(焦秉贞弟子)、陈枚都曾摹制焦图，留有绢本着彩摹绘本。乾隆皇帝将程荣摹本置于盒内，收藏在圆明园贵织山堂，同时命画院临摹刻石，所刻之石也同藏于圆明园。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烧毁圆明园，《耕织图》被掠，现藏于美国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刻石在这次浩劫中部分被毁，余石为徐世昌收藏，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共23方，其中耕图13方、织图7方，其余3方图已难以辨认。

15世纪以后，中国的《耕织图》流传到了日本、朝鲜，日本狩野永纳复刻的《耕织图》、古朝鲜版《耕织图》和金弘道画的《耕织图》，都为明天顺六年(1462)刊本的翻版。这些仿本皆与楼琬《耕织图》有直接的传承关系，这也间接反映了楼琬对於潜风俗的了解、对农业生产调查的细致。

三、楼琬《耕织图》诗画与天目山风俗

楼琬《耕织图》有画有诗，描绘的不仅是於潜农村耕织生产的现状和流程，也是涵盖整个天目山区农作耕织的状态。

如《耕织图》中有水牛耕、耙耨、耖的画面，楼琬均有诗：

东皋一犁雨，布谷初催耕。绿野暗春晓，乌犍苦肩赧。
我衔劝农字，杖策东郊行。永怀历山下，法事关圣情。

此为“耕”。

雨笠冒宿雾，风蓑拥春寒。破块得甘霡，啮膝浸微澜。

泥深四蹄重，日暮两股酸。谓彼牛后人，着鞭无作难。

此为“耙耨”。

脱裤下田中，盪浆着膝尾。巡行遍畦畛，扶耖均泥滓。
迟迟春日斜，稍稍樵歌起。薄暮佩牛归，共浴前溪水。

此为“耖”。

这些诗，写出了农田耕作的三道程序。直至20世纪90年代，还是天目山区一带耕作的写照。看画读诗，那吆牛的声音似乎在耳边响起。天目山区吆牛有简单的语言，东西部略有不同。2010年版《临安市志·民俗》载有“吆牛”一目：临安一带：向前，“嗨起”；后退，“缩缩拉”；左转弯，“留留留”；右转弯，“牵牵牵”；停下，“哗哗”。昌化一带：向前，“嗨”；停下，“哗”；右转弯，“配了”；左转弯扶犁人左向拉牛鼻绳。教小牛耕田时，旁人不能取笑，以免小牛害羞不肯学。

从布秧到插秧又有4幅画面和4首诗：

旧谷发新颖，梅黄雨生肥。下田初播植，却行手奋挥。
明朝望平畴，绿针刺风漪。审此一寸根，行作合穗期。

此为“布秧”。

春工正当时，下种看期度。乘闲携子游，策杖临埕路。
看水泛西湖，临风方日暮。农家事可知，应费心无数。

此为“初秧”。

新秧初出水，渺渺翠毯齐。清晨且拔擢，父子争提携。

既沐青满握，再栉根无泥。及时趁芒种，散着畦东西。

此为“拔秧”。

晨雨麦秋润，午风槐夏凉。溪南与溪北，啸歌插新秧。
抛掷不停手，左右无乱行。我将教秧马，代劳民莫忘。

此为“插秧”。

又有“淤荫”“一耘”“二耘”“三耘”“刈收”“登场”“持穗”“砻”“舂碓”“筛”“入仓”诸画与诗，至今在天目山区农耕中依旧保持未变。

“灌溉”诗：

堰苗鄙宋人，抱瓮惭蒙庄。何如衔尾鴒，倒流竭池塘。
耒耜舞翠浪，簦笠生昼凉。斜阳耿衰柳，笑歌闲女郎。

我们从画面上看到的旧时的龙骨水车，是天目山区十分常见的一种灌溉工具。2010年版《临安市志》有“水车”一目：“水车长度5米多，分别有车槽、龙骨、车板，两头各有旋转轮、推车手等，用杉木和硬杂木，每个部位都精心制作。大旱时用来灌溉农田。”20世纪70年代后被电动抽水机替代。20世纪90年代旅游业兴起，一度作为旅游项目让城里人体验。

禾稻成熟后，天目山区的习俗常常要祭神、谢土地。《耕织图》中有“祭神”画面，并配有诗：

一年农事周，民庶皆安逸。歌谣遍社村，共享升平世。
五风若德生，十雨苍天济。当年后稷神，留与后人祭。

此画此诗恐为后世增补。诗中后稷神指五谷之神。其实天目山区在农耕过程中，祭祀仪式甚多，并有一些禁忌。

宣统二年（1910）《临安县志·礼仪志》载：“先农坛礼注，岁以三月亥日致祭。主祭陪各官行礼均如社稷，礼毕，午刻更蟒袍，诣籍田处，赞，起鼓。农夫牵牛，官扶犁，九推毕，设香案望阙谢恩。三跪九叩，礼毕。”

2010年版《临安市志·风俗》记载：“清明前后选晴天撒谷籽。旧俗于撒谷种前，祭祀土地神、五谷神。在盛谷种的箩筐上插柳条或桃枝，以驱邪保苗。在秧田进水口插荆条，以防治虫害伤苗。撒谷子时忌说‘水余’‘干煞’‘虫吃’‘发瘟’等不吉利话。”“立夏前后拔秧，俗称‘开秧门’。旧俗要在秧田边田塍上祭祀秧田菩萨，主人帮工依次焚香点烛，跪拜秧田菩萨，祈求好年成，仪式结束后才开秧门。又有节制房事以示敬的说法。”“每年农历七月十五要举行烧田丘的仪式。事先将三荤三素斋供用桑叶包成小包，携纸、银锭、锡箔到自家田塍、田角，摆上斋供，焚烧银锭。”该志记载了保稻熟的祭祀仪式：农历七月半前选一晴天，事先扎好草船，中置诸神像并插红旗。挂帐，每幅帐上写“祭兵”“迎神”“保苗”“嫁接”“遣驱”“法事”等。请道士多人主持，和村民一起完成接神、引兵、召将、祭兵、游船、安慰、开大旗等程式。“开大旗”为仪式中的压轴戏。一根粗竹撑一面大红纸旗，竹顶插上粗重柏枝，由壮汉数名轮流举着满场跪走，每人跪走一两圈，锣鼓急点，爆竹齐鸣，众人“号号”呐喊。数圈后，众人开始抢撕大旗，撕到者预示吉利。直到大红纸旗撕完，活动结束。

在临安西部一带大年三十下午要举行“谢种神”的仪式，每户男当家要带祭品、香纸、爆竹，到田里祭拜“种神”，感谢当年丰收，希望来年风调雨顺，收成更好。

还有“碌碡”“簸扬”两幅画和诗，天目山区倒是少见，恐是习俗发生演变。

光绪二十四年（1898）《於潜县志·卷首》刊登了织图诗共26

首，画面生动，诗韵朴实，包括“浴蚕”“下蚕”“喂蚕”“一眠”“二眠”“三眠”“分箔”“采桑”“大起”“捉绩”“上簇”“炙箔”“下簇”“择茧”“窖茧”“缫丝”“蚕娥”“祀谢”“络丝”“经”“纬”“染色”“织”“攀花”“剪帛”“成衣”。此与现天目山区蚕织之习俗别无二致。

光绪二十四年（1898）《於潜县志·风俗》中载：“蚕桑之利，合境皆有之，南乡地暖，植尤盛。”2010年版《临安市志·风俗》载有“养蚕”一目：“旧时境内养蚕人家很多，传腊月十二为蚕花娘娘生日，蚕农循俗祭祀。元宵节舞龙时，蚕妇会去摸龙须、龙鳞，谓‘抢蚕花’。养蚕时，蚕室门首挂红布辟邪。蚕室忌生人出入，忌喧哗，要昵称蚕为‘蚕宝宝’。蚕室要讲究卫生，忌敲击门窗，忌讲不吉利话。蚕妇要穿戴整齐，这样会使茧子洁白优质。”

天目山区是重要产蚕区，蚕乡发生了许多事，志书中多有记载，还有一些民俗活动也是十分有趣。如蚕农常常参加每年大年三十晚上在西天目山禅源寺前举行的烧烽篷活动，从中抢来几块竹炭，放在蚕室，据说可以避免蚕瘟。在潜川乐平还有一支蚕龙灯队，每年都大闹元宵，也是一种蚕农的祈福形式。

尽管是蚕乡，但旧时普通农户穿绸缎衣服的却很少，多穿麻棉。天目山区多栽种苧麻和大麻，偶尔也种棉花，都用于织物，可做成衣服、围布、棉被、蚊帐之类。天目山区盛产山核桃，村妇纺线，两手不得空，但为了满足口腹之欲，便将山核桃放进嘴里，用牙齿和舌头竟然能将山核桃壳肉分离，吃得干干净净。此俗也颇为有趣。

四、再绘《耕织图》的於潜县令——何太青

何太青，字乐俞，又字藜阁。广东佛山顺德人，清嘉庆九年（1804）甲子科举人，嘉庆十四年己巳科进士。嘉庆十六年为於潜县令。官历於潜、德清、仁和县令，嘉兴海防同知，能诗文，工书法，

著有《潜川集》《钱江集》《海上吟》《孤云集》等。何太青是一位诗人和书画家，在任於潜县令时，临摹焦秉贞《耕织图》，绘制了一套《耕织图》，并题撰了五言绝句。何太青的版本，现存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光绪二十四年（1898）《於潜县志》中的《耕织图》是赵耀廷仿何太青绘法，并载有何太青题五言《耕织图诗》。

竹器厂的那些事

在天目山区的方言中，玲珑片是把篾匠和竹匠分开的，篾匠专指以竹篾编织各种器具的匠人，竹匠则指以圆竹打制桌椅床柜的匠人。昌化一带往往统一称为竹匠，或把打桌椅床柜的称为椅子匠。20世纪50年代临安有家光明竹器厂，厂子里有篾匠也有竹匠，“双管齐下”。

一、鲁班的笨徒弟

据说鲁班有一个没出息的徒弟，几年学下来，木工活竟然还是一窍不通。师傅看他实在笨，狠狠心便将他逐出了山门。这徒弟是南方人，无奈回到老家。山上的树挺多挺高挺大的，可他却没有办法将它们利用起来为自己谋生。总得有个生计吧，徒弟就上山砍了一些竹捣鼓，捣鼓捣鼓，便捣鼓出一些名堂来，后来竟另辟蹊径，辟出篾匠这门手艺。这徒弟对师傅的绝情也不计较，仍然尊鲁班为先师，所以后来的篾匠竹匠供的是鲁班像，用的也是鲁班尺。

只是因为徒弟在鲁班那里没有出师，所以地位仍然卑下。到大户人家做工，在众多手艺人之中，篾匠排在了倒数第二，地位仅高于裁缝，吃饭时便坐在下手，与坐在上横头的鲁班的正宗弟子木匠、泥水

匠相比，自然生出几分惭愧。过去的东家都不敢怠慢泥水工、木工，若有得罪之处，心眼小的就会在干活时做点手脚，给东家带来麻烦。但东家对篾匠却全然不用担心，他们不会做手脚也做不了手脚。

篾匠的工具相对简单，钩头刀、平头刀、刮刀、剑门、篾砵、锯、钻、泥鳅刨，一块围布，还有一把鲁班尺，比起泥水匠、木匠来则要轻装得多。别看篾匠地位低下，但手里头的活却一点也不含糊，工具少，花样精，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技术含量很高”。从前学这门手艺，都是三年徒弟，四年“半作”，七年后才能自立门户，独自闯荡江湖。师傅带徒弟，规矩也很多。例如，在雇主家里吃饭，徒弟得先给师傅盛饭，然后自己才能开吃。捧饭碗两肘挨着腰，不可两手叉开。要低着头看着自己的饭碗，不能左顾右盼，只夹靠近自己的那碗菜，师傅的筷子没有夹过的菜碗，徒弟不能动。师傅放下饭碗，徒弟就不能再吃了。因此，徒弟若是没有几下吃饭的基本功，往往要饿肚子。不过，碰到体谅的师傅，他会慢慢地嚼，等你吃饱了，他才放下碗筷。

学篾匠讲究童子功，十二三岁入门，读书就少，在这个圈子里，大都文化程度不高，识不了几个字。篾匠的大部分作业是蹲着进行的，年纪稍大者，腿骨腰板硬了再来学这活，就难以适应了。很多篾匠蹲着和坐着是一般的自在，猫下来就是大半天，似乎挺“享受”。

二、篾工的生活

光明竹器厂不算大，连厂房带食堂、宿舍、道坦也就五六亩地，七十多号人吃喝拉撒全在那里面。条件有些艰苦，因此常常进行“十八把篾刀起家”的革命传统教育。厂里有一个大池子，那是浸毛竹的。冬天砍下来的竹子叫冬竹，春天砍下来的叫春竹，厂子里用的竹子一般取冬天砍的，竹子处于休眠状态时砍下来，就不太会遭虫蛀。这时要根据用途，将竹子锯成不同长度的段状，打通竹节，放进大池，浸在水中。竹子可用至来年入冬，不会“燥”去。到了严冬季节，下

池子取竹就够遭罪的了。池子里的水放剩到淹没膝盖，篾工们卷起袖子、裤腿下池子，上面有冰，下面有竹节片，扎到了会很痛。用一篷竹丝将竹子擦干净，然后推上岸。两个小时下来，篾工们手脚红通通，又僵又麻，不听使唤，凑在火炉边烤半天，才能慢慢缓过来。

圆竹段要将其对半劈开。这是个力气活，十寸、十二寸的竹，管壁都有一指头厚，劈起来需要费点劲。先用钩头刀对半钩开个口子，然后拿刀或是竹梢一鼓作气往后拉，随着一串节奏很强很震撼的爆裂声，圆竹便裂成了两半。跟重工业的车间隆隆交响乐比，篾工车间里的声音绝对是轻音乐。劈篾时清脆的“嚓嚓”、刮篾时尖利的“吱吱”、编篾时欢快的“沙沙”、劈竹时低沉的“空空”，都是十分悦耳的。

冬天，竹子拿在手里就像拿着一块冰，劈篾时拇指肚的感觉也显得有点麻木。竹子在池子里浸得时间长了，劈最后那层篾时，咬在嘴里，有股酸味儿，令人作呕。到了夏季，便是篾匠们的光鲜日子了，可以不必遭受炎日的暴晒，躲在屋里，清凉的竹子，清凉的刀尺，编出来的席子、篮子是清凉的，嘴里哼着的小曲也是清凉的。

三、篾匠师傅

厂子里有几位师傅会细活，据说都是祖上传下来的，能够把篾劈得细如发丝，然后编成各种美丽的图案。篾席、烘篮或是簞笱等，内中也作兴编龙凤双喜之类的图案，几位做细活的师傅便大出风头。有几个晚上，一位何师傅点起200瓦的大灯泡，架起一副老花眼镜，但见青丝一根柔指轻绕，左右双手上下翻飞，就几个夜晚，一只姑娘出嫁时用的针线篮便完成了，中间是两朵黑牡丹，边上有一圈回龙纹，口子用白藤细细地扎了一圈，底部还镶上了两个小抽屉，精巧细致，活脱脱一个“美人”，叫人赞叹叫人羡慕又叫人嫉妒。

“这东西怎么编出来的？”有人问。

“这有啥稀奇？比这复杂的都能编出来。”何师傅答道。

于是他说了个带有几分凄凉的故事：传说宋代江南有一位姓胡的篾匠，手艺高超，但人长得奇丑，娶不到老婆。他就用竹篾编织了一个竹女人，大如真人，惟妙惟肖，冬天裹上绒布，夏天直接搂着，天长日久，“竹夫人”被“磨”得油光锃亮了。临终前，胡篾匠让人修了一座双穴墓，在墓碑上刻上自己和妻胡氏竹夫人的字样，叮嘱他的侄儿，让“竹夫人”与自己一起下葬。

还有一位陈师傅，打的“腰子篮”式样灵巧，结实耐用，远近闻名，得一不易。

近水楼台先得月，篾匠家庭往往多一些竹的用具和寝具。篾席是最典型的寝具，在活计中也是最显功夫的：取一根小毛竹，剪裁得当，勾好条子，敲好剑门，五根寸的，取四层篾，刮好，便开始编。厂子里有几位手艺好的师傅，不但编得整齐，还能编出许多花样。

人都说“木匠爱树，篾匠爱竹”，篾匠师傅爱竹如命，竹子在他们手上绝不肯浪费一点，取料长短相间，竹的梢头还要削成竹签。

四、老厉书记

老厉书记是“十八把篾刀”之一，在竹器厂里当过领导。“文化大革命”前是书记负责制，老厉便是书记。“文化大革命”时被打倒了。后来建立厂革命委员会，要抓革命促生产，他进革委会当了主任，但大家还是叫他厉书记。不久又是书记负责制了，他名正言顺又当了书记。那个年代，手工业集体企业日子艰难，头年竹器厂亏损2000元，接着一年亏了7000元。老厉书记因而“压力山大”，便寻思着“吃一回螃蟹”，把“手工业”的“手”字去掉一些，便八方打听，四处奔波，搞出了一条无线电元件的生产线，厂子立马扭亏为盈。

厂子越来越红火了，但他毕竟是鲁班弟子出身，又是性情中人，虽然知道凭竹匠的“巧手”编不出企业的兴盛，却丢不掉“十八把篾

刀”的情结，始终留着工厂的另一半。有事没事，总爱到另一半去转悠转悠，与篾匠们唠唠嗑，抓起竹箩提篮的，久久放不下手。按他自己的话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在他任上，调进了许多技术人员、大学生、老师等，试图用“巧脑”来维持厂子的兴盛，但是用句套话，“历史的潮流总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厂子最后还是倒了，连同另一半。

篾匠们的生活其实很简单，往往属于社会的底层。许多年过去了，人们习惯性地回忆已经走远了的过去，开始审视早已翻过的那一页人生，尽管说那时日子过得艰涩，但篾匠们还是为自己有这样的生活经历而欣慰，甜甜地勾起那些“老照片”，编织进记忆的“文件夹”。

天目船渡

过去天目山区的水文情况与现在大不相同，苕溪、天目溪、昌化溪都可通航，沿溪有许多船埠头。昌化溪水路可一直通到龙岗上面的手窰司。手窰司旧时是一个小山镇，曾经相当繁华。南苕溪也是如此，旧时横畈、青云桥、锦城、青山都有船埠头。

天目溪的航渡则可通到绍鲁、白鹤等。曾扬名四海的天目窑也是依靠水路才能红火数百年之久。天目溪上村村有渡船，村村有渡船埠头。沿着天目溪一路往下走，渡船和渡船埠头像一根长藤结的瓜，越往下船埠头越大。

最大的几个码头要数青山、河桥、麻车埠、印渚埠等。

麻车埠曾是天目溪商埠重镇，抗日战争时期也算是水陆交通枢纽，军事物资运输最繁忙时有一百多条货船靠岸，对面沙滩上就是修船工场，从早到晚十分热闹。渡船埠头以块石砌岸，长达千米，高有三四米，上面的街市有数家客栈。有客运航船往来于桐庐和麻车埠之间。

旧时昌化县的河桥镇更是有“小上海”之称。昌化溪货船运输繁忙，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航道从龙岗手窰司起，经昌化、河桥、乐平、桐庐入钱塘江至杭州。河桥是大码头，船只停泊河桥白下，多时有几十上百只。抗日战争前河桥甚至有歌妓卖唱的花船。

河桥船运业主要经营安徽、淳安、昌化地区的“三宝”（笋干、茶叶、山核桃）、“红”（茭肉）、“白”（蚕丝）、“黑”（木炭）以及簪皮等土特产，顺水运往桐庐、富阳、杭州等地销售，再购进盐、布料、药材、海鲜及日杂百货，逆水背纤运回河桥老街各大小商号，每艘船顺水可装货物近万斤，逆水减半。

在开船前，船工要买一刀肉或一个猪头煮熟了到船埠头祭祀，也有在船头祭，或在家祭。肉或猪头煮熟了，将锅盖翻转，上面平放一双筷子、一把菜刀，意为“快到”目的地。头篙撑出，如岸上有人呼叫搭船，船工不会理睬，称“发篙不回头，回头触霉头”。船工如看到有人淹水，会伸篙去救，称“救死不救伤”。船在河桥要祭柯老相公，船过青山殿要祭张天师。

天目山区的船工代代以撑船为生，以船为家。撑船辛苦而危险，昌化溪顺水从河桥到大柳滩数十里，处处是暗礁险滩，常有触礁沉船事故。行船前，要做“顺风”。船行至大柳滩，船工们要到鱼潭老相公庙里祭拜，祈求一路平安。逆水回返，要背纤、拉绳，汗流浹背，肩、足磨出血泡，步履维艰。待船至杨家埠头停泊，船工们方可在茶馆歇息聊天，上馆子吃肉。船工们有句口头禅：“冻大腿，吃大块。”

20世纪50年代后，昌化溪、天目溪水路消失，新辟青山航道以船运载货物。

旧时农历七月十五，天目溪、昌化溪畔村民要在河边搭棚，请道士做法事，男女老幼均要焚香，参拜水神。参拜仪式后，要放水灯和开游船，祈求水道平安。

随便翻开临安哪部旧志，都有关于航渡的记载。如天目溪上，唐贞元十八年（802），於潜县令杜咏凿平紫溪中的暗礁以通舟楫。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於潜县令邵文炳在紫溪的燕尾滩，凿去刮利之石，使来往舟楫畅通无阻。

唐以前，於潜至分水江的水路不通畅，光绪二十四年（1898）《於潜县志》卷十《名宦》载：“杜咏，贞元中为於潜令，开紫溪河以溉

田，又凿渠以通舟楫，民蒙其利。”又载：“绍兴间令邵文炳大兴水利，紫溪下燕尾滩，凿去刮利之石，操舟者无险阻患。元丰、乐平、清涟等塘渐就废坏，悉为浚治修筑。”自二县令治理河道后，天目溪成为一条航道，这也促成了天目窑大批量的商品瓷生产销售。

修造船业在麻车埠、河桥、龙岗等地都有，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消失。渡船都用山中坚韧木材打造，如鞋形，中可坐人。旧时打造渡船要选日子，不能与船主生辰八字犯冲。开凿前要祭拜天地神灵。香烛烧去大半时，船主要烧念过经的锡箔，放六个爆竹，以示“六六大顺”。船打造完毕，要祭河神。祭祀用三素三荤、六盘糕点、两盘馒头、两支红烛、三炷香，面河方向摆八仙桌。船主要亲手放三个爆竹，欢迎河神驾临，祈求河神保佑。还要办丰盛的下河酒，邀请亲朋帮工，宴席上的鱼禁忌翻身。旧时苕溪、天目溪、昌化溪上少桥，溪岸多设渡口，有摆渡船夫送客来往两岸间。大船可载20—30人，小船可载近10人。船夫中有义工，也有收取渡费者。

随着山区公路的开通，几条溪的河床升高，还有桥梁建造等原因，20世纪70年代后渡船已渐渐匿迹，今溪流、水库中多为游船。

为修桥保渡，旧时天目山区民间多以村为单位，建立桥、渡、路会，推选村中有威望者担任会长。桥、渡、路会一般都定农历七月十五为修路义工日，修缮路、亭、桥、渡等。此类组织一直保持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桥、渡、路会往往还有民间所捐赠的田和山为其资产，所得收入作为修桥铺路和修造渡船的开支。如昌化镇朱穴村的朱白桥会就有几亩水田和山林等，至今有一山名桥会山，旧时属于朱白桥会所有。1984年前平葛桥为木桥，是昌化县城通向县南各地的重要通道。涨水时则撑渡船。桥南端建有一渡船屋，属于桥会给撑渡人住的。据朱穴村《严氏宗谱》记载，民国初年严有恭担任会长，负责该项工作。

时至今日，天目山的船似乎已经驶远了，但溪流中仍流淌着船筏的诗韵。

放竹筏

竹筏也称作竹箬、竹排等。制作竹筏一般选用10—12寸的大毛竹，竹龄4—5年。冬天采伐下来的冬竹，因含浆少，分量稍轻，也不易蛀。先削去竹青，用炭火烤成中间直、根部稍弯、梢部翘起形状，然后在头、中、尾凿圆孔贯以坚韧山柴，现在也用钢筋替代。小竹筏用5—6根竹子，大竹筏则要用10根以上的毛竹串成。竹筏轻浮水面顺溪流撑篙而下。早先苕溪、天目溪、昌化溪的水位比起眼下要高得多，天目山一带的山农采收的竹、木、柴、炭、药材等山货，以竹筏载物顺流至余杭、瓶窑、湖州及桐庐、杭州等地出售。有时竹筏顺流成串，发大水时，有技高胆大的带头竹筏老大站在排头，手捏撑篙，乘风破浪，喊着筏号，绕过险礁危石，浩浩荡荡奔向太湖或钱塘江。

清郭九会有诗《漕仓苦雪诗并序》，序云：“临仓设于禹航水次，去县治（临安）五十里而遥。里民输漕，或以竹排，或以肩挑。……”诗中有句：“几叶竹排撑水面，两囊珠米压肩头。”

早先天目山区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桥，要过河，往往都要摆渡。渡有船和竹排两种，其中竹排最为常见。过渡的竹排比起那种放排的要稍讲究一些。

旧时木排与竹排的起走习俗也同于船。

撑船和放竹筏的竹篙，一般选两头较为匀称的小毛竹制成，长约6—7米，根部往往镶一铁头。有的镶一铁钩，放木排时可以钩扎树木。在河桥、潜川等水乡，船家忌说“箸”字，因“箸”谐音“住”，因此将“箸”改为“筷”。用筷也有讲究，忌用完餐后将筷子搁在碗上。

20世纪70年代后木船和竹筏渐消失，90年代后又兴起，演变成竹筏漂流等旅游项目。柳溪江、浙西大峡谷等皆有竹筏漂流项目。

天目山桥的风俗和传说

旧时，天目山区以木桥和石桥居多，也有竹桥。

木桥两头垒桥墩，多以松树作支架，上搁桥板，以铁链相串，遇洪水可不被冲走，今在天目山区内已留存极少。

竹桥现在也少。过去天目山区小型竹桥很多，以几根圆竹穿起，如竹筏一般，架于小溪之上，以便通行。唐杜甫有诗句：“青冥寒江渡，驾竹为长桥。”这种大竹桥天目山也曾有过，现青山湖街道有个村子名叫“竹桥横头”，因昔时以竹搭桥，便于往来，村居桥头，因而得名，估计这座竹桥是不小的。在《明皇杂录》中有一个神话，罗公远引唐明皇游月宫，掷一根竹于空中为桥，其色如白金。两人行数里，至一大城阙，罗公远告诉唐明皇：此月宫也。这是唐明皇游月宫的另一个版本，其中竹桥尤为浪漫。

石桥有拱桥和梁桥。旧时石桥多为众人捐资而建，尤其是建大桥时，需先建桥会，到各处募捐。百姓视建桥为善举，少则几斗几升粮食，多则几十上百银钱。择吉日举行仪式，祭祀水神，然后开工。竣工后也要举行圆桥仪式，立功德碑。旧时建石桥，桥上还要刻上蜈蚣等物以镇蛟护桥，传说蛟龙惧蜈蚣。桥头多建佛教经幢等。有的桥还有义田，以供行人茶水。乾隆二十四年（1759）《临安县志》载：“令

张淑郢建长桥即建亭，捐田烧茶以给行人。一田二亩，坐东门畷。”

西天目山禅源寺前跨双清溪有一座蟠龙桥，民国十一年（1922）被大水冲毁。第二年冬天，范开泰、张少林等众助资重建。此桥为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又称雨华桥，桥上有一亭，也名雨华亭。“雨华”即“雨花”，取佛陀说法、诸天雨花之意。

在天目村有一座古石桥静卧双清溪上，桥石斑驳陆离，桥旁则是枯藤老树，古道野花，颇有情趣。稍下的月亮桥村原来也有一座古石桥，尤为精致，且传说乾隆皇帝曾在桥旁歇息，遗憾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时被拆毁。东天目山上山道上有一座梅公桥，当年梅兰芳游东天目山，见此处山涧行路颇有不便，发心建了此桥，因而得名。

临安现存最古老的石桥是洞霄宫的元同桥，桥虽不大，却精致。始建于五代，曾经历宋、元、明、清的历代修整，有许多石构件都是宋代之物。桥得名于五代的著名道士闾丘方远，又名元同先生，闾丘是姓，方远是名，元同是字。元同桥是当时吴越国国王钱镠帮助闾丘方远建成天柱观的一个附属建筑。那里还有一座会仙桥，桥更小，也是古物。

在古县志中，记载有许多建桥的故事：

相传在清康熙和雍正年间（1662—1735），有一位叫郑明善的绩溪竹匠在昌化汤家湾一带谋生。郑明善为人善良，因一手篾匠的好手艺，在昌化一带很受欢迎。

汤家湾是昌化的一个大乡，村子由两条大溪夹着，南面一条叫前溪，溪流比较和缓；北面的一条叫后溪，由昌北出来，平时溪流也瞧不出两样。一旦遇雨，洪水暴涨，当地人说是蛟龙出洞，显得十分狂野。两条溪到了下游两里汇成一处，即为昌化溪。后溪的最末一段，过去没有桥，过溪涉水，洪水说来就来，不及躲防，每年总有几位乡人葬身于溪中。

清雍正二年（1724），郑明善有事要到对岸，便脱下鞋子，赤着脚选浅处踩着卵石过溪。开始还好好好的，刚走了一半，上游有洪流滚滚而来，郑明善一个趔趄，便被卷入洪水中。郑明善心想完了，该丧命

于此，突然感觉似乎有一强壮的手臂拽着他，使他没有下沉。慢慢地，他抓住了岸边的树枝，安安稳稳上了岸。

这之后，郑明善便发善心，在他的落水处募建一座石桥。由于他在这一带的人缘好，不久便募得了许多银两。几年下来，一座七孔的石拱桥便完成了，取名为“太平桥”，也是为乡人图个吉利平安的彩头。造桥的匠人为了防止蛟龙作怪冲了桥面，便在桥的两头镶上了铁鳗、铁蜈蚣等。传说铁蜈蚣一见有蛟龙出现，便会嘶鸣，蛟龙听到铁蜈蚣的叫声，立即退回身去，不敢造孽。

太平桥边上另有一河道，上有一座三孔石桥，名六子桥。传说这里架桥屡建屡毁，有一大户人家有六个儿子，发心建桥。竣工后的一个夜晚，有仙人过桥，西头和中间的大石板上踩下两个近两尺深的脚印。由于仙人相助，此后再有大的洪水来犯，桥也岿然不动。

在颊口西二里有一座石桥，叫“灭渡桥”，又叫“五圣桥”。这两个桥名，“灭渡”是一个佛教名词，而“五圣”则有多种解释。当地人一般都称呼为“五圣桥”，联想对面的孝子祠、韩世忠墓，还有义干的地名，这“五圣”可能是指孔子、颜回、曾参、子思和孟子。

相传在清道光年间(1821—1850)，有一位姓洪的徽商，心地善良，人称洪善士。这天，他带着夫人和一个家仆，沿着杭徽大道到了浙皖交界的十都童家湾。此时杨溪河上并无桥梁，河道宽数十丈，水深流急，来往行人以船渡之。摆渡的是一个泼皮，见洪善士是有钱人，便乘机大敲竹杠。洪善士见此情景，便发了一个愿，要在杨溪河上架上一座石桥，不必受这泼皮的气。

当日，洪善士夜宿童家湾，邀请当地乡绅和百姓商讨造桥大事。

老百姓欣喜万分，都愿意出工出料钱。于是就雇请当地石匠，凿石运砂，砌墩填基。不久，一座三孔石拱桥奇迹般地横跨在杨溪上。因洪善士信佛，便取名为“灭渡桥”，当地百姓崇奉孔孟，又称其为“五圣桥”。后石桥经历数次修复，至民国十六年(1927)再度重修，竣工后为纪念洪善士初修石桥的功德，有人在桥头立石碑一块，上书“灭渡桥”。

山村水碓

旧时，南方的水碓多如牛毛，它曾是山民不可或缺的粮食加工作坊。顺着山溪小河，几乎在每一个村庄都能找到一座或几座的水碓。离村不远，一条小道通向水埠头，一座矮矮的小瓦房，白墙或者就是裸露的石墙或泥墙，墙上多半爬满了藤，藤蔓中镶嵌着一个小小的窗洞，门是低矮的。几乎一年到头，里面都回荡着水轮的吱嘎声和碓头的砰砰声。

水碓的历史悠久。在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天目山下的於潜县县令楼涛有《耕织图诗》，其中第二十首就为《舂碓》：

娟娟月过墙，簌簌风吹叶。田家当此时，村舂响相答。
行闻炊玉香，会见流匙滑。更须水转轮，地碓劳蹴踏。

清代诗人厉鹗曾多次来临安，有《冬日重游大涤洞》诗，其中有句：

溪碓自鸣疑捣药，松风不断学吹箫。

除了碓房，水碓都是木头连石头构成的。做水碓的木匠称为“碓木匠”，木匠有大木、细木之分，碓木匠是大木里的一种，寻常木匠是做不了的。利用水力，各个部件计算复杂，且不用铁钉。因此在同行中受人尊敬。

碓房很忙，村坊居民用碓，要报名排号。清秋之夜，水碓的木轱辘很大，在溪水的冲击下，沉重地转动着，生出吱嘎吱嘎的声响，碓房中的碓头冲击着石臼，发出“咯咯一咚”的声响，而石磨则不知疲倦轧轧地转着圈。蹲在碓房里听，各种不同的声响交织在一起，如狂风卷过山林，狮虎吼于峡谷，又似乎千军万马在阵前呐喊。

村姑将玉米一拨一拨放入磨眼，磨缝里便挤出细细的、金黄色的玉米粉来。这种景象就是古老山村飘逝的岁月。

这样的画面充斥着南方的大山。天目山脉中，大大小小的村落，几乎都有一座相似的水碓，似乎每个水碓都刻着古老的印痕，几乎每个水碓都发生过一些动人的故事。水碓是大山的序曲，大山的进行曲，大山的小夜曲……水碓让山村变得灵动诗意起来。在漫长的农耕社会中，水碓总是伴随着天目山区的每一座山村，即便是山村通电后，它依旧在村前诉说着自己的故事。一直到村子里办起了碾米厂后，水碓才渐渐地退出历史舞台，像一位年迈的老人，含着微笑注视着年轻人的蓬勃生机，意识到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安然地停止了自己的脚步。但遇到停电、限电，或者是电压不稳定时，“老人”还时不时“吱嘎”起老腰来。

多年后，山村的水碓终于消失了，水碓的故事仿佛结束了，再也听不到那种古老的风韵和曲调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不知什么时候，一不注意，一个个水碓又在山村的小溪旁钻了出来，只是没有从前的那么大，那样的具有风情，功能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舂米碾粉的谋食之道，生产的却是胶木的原材料——木屑粉，乃是山民的生钱之路。这水碓不耗电，不耗煤，只要扒拉出一条沟，山里的水就会成为你忠实的仆人，不分昼夜，一年到头，不知疲倦地转动着，转出了“座

驾”，转出了新房。比之早先，山民于水碓更有了十二分的亲情。

吱吱呀呀的木轮伴随着现代化的脚步，在乡村又重新开始转悠，依然那样的协调。城里人来了，见了好稀奇。那种小说、电影中描绘的旧时风情竟然实实在在地展现在眼前。于是，拍照录像，兴奋异常。感叹之余，却要问一声：当今是互联网时代了，怎么还有这种原始的生产方式？在欣赏大山风情韵致时，他们却往往无法感悟和理解山民朴实的生活哲理。水碓，其实就是山村解不开的情结。懂得这情结，就会与大山又结下了一份缘。

竹扁担的故事

天目山区山民多用竹扁担，有弹性，挑谷担柴，不会伤身子。根据挑物不同的分量，可选择使用不同的竹扁担。以较粗的毛竹根端做成的硬竹扁担，可以担三四百斤甚至更重的挑物。轻的物体可以用薄竹扁担，晃悠晃悠地省力气。在天目山区的习俗中，扁担横在地上，妇女不能跨过。传说用女人跨过的扁担挑担，会生肩毒。这种说法毫无道理，带着旧时代严重的男尊女卑观念的印痕。在天目山的方言中，往往用“嫩竹扁担”譬喻没有社会经验、担不起分量的毛头小伙子。

年轻的山农好逞能，常常相互赌力。或以大簸箕担装上重物，用硬竹扁担挑，比谁担的分量重，强者往往能担起六七百斤的担子。或两人各捏住扁担的一头，左右拧，比谁的腕力大。或在田头以扁担搁在两只大簸箕上，以跃过者为胜。也算是山湾田间的一件趣事。

小学语文课本上有一篇《朱德的扁担》是大家所熟知的，那是关于扁担的一个红色故事，感动了几代人。在天目山区也有许多关于扁担的故事，还留下了许多以扁担命名的山、岭，如玲珑有扁担岭，湍口有扁担山，於潜有扁担坳、扁担山等。用特别熟悉的生产工具来取地名，这也是一代又一代天目山人的习惯思维。

在昌化，有一个金扁担的传说。一位南乡（昌南）人，挑了一担柴到西乡（昌西）去卖，走到南乡岭脚（石塘青岭），岭脚亭子边有一块大岩石，看见岩石裂开一条缝，里头有根金光闪闪的金扁担。南乡人歇落柴担，走过去把扁担取出来，左看右看十分欢喜。他想现在带在身边不方便，就又放进石缝中，想等卖柴回来再取。怕被其他人看见取走，就将石缝用小石头塞满。等他卖掉柴回转，看见自己塞的那些小石头还在，但石头缝已经合拢，金扁担看不见，更取不到了。南乡人只有眼福，却没有得宝的命。故事代代相传，成了当地的一个趣谈。

第二则是钱大王怒打潮头三扁担的故事。钱婆留年轻时挑私盐，用了一根天目山上的老竹扁担，两只箩筐像两只簸打的七石缸。一日，钱婆留挑了一担盐，放在江边沙滩上，自己到树荫底下歇脚，迷迷糊糊打了个瞌睡，醒过来一看，只剩下两只空箩筐，盐已经被江潮溶化了。钱婆留怒从心起，拿起老竹扁担就往潮头赶过去，嘎嘎嘎就是三扁担，敲得龙宫里地动山摇，龙王连忙出来讨饶认错，答应以后潮水上先来打招呼。从此以后，钱塘江涨潮，老远就轰隆轰隆响起来，提醒大家注意。

第三则是吕洞宾用扁担挑山造桥的传说。当年，临安城旁边的苕溪上没有桥，老百姓行走不方便。八仙之一的吕洞宾想帮助这里的老百姓建造一座桥，于是用一根竹扁担挑起了两块大石头，兴冲冲跑到临安城的西门外，不小心踏着一块西瓜皮滑了一跤，一根竹扁担弹得老远，弹到了玲珑乌渡里，变成了“扁担岭”，两块石头翻落，一块变作了“石镜山”，一块变作了“画石岩”。两座石山，到现在还一东一西立在临安锦溪旁。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历代名人留下很多诗，略举二首：

宣统二年（1910）《临安县志》收有吴越国国王钱镠《石镜山并序》：

咸通中，予方韶龀，尝戏玩临安山下，忽见一石屹然自立，当甚惊异。自后便在军门四十余年。昨回乡里，复寻此石，见岩峦秀拔，山势回抱，堪为法王精舍，遂创禅关，以此石为尊像之座，表其感应，因成七言四韵。

卅岁遨游在此山，曾惊一石立山前。
未能献瑞披榛莽，盖为平凶有岁年。
昨返锦门停驷马，遂开灵岫种青莲。
三吴百粤兴金地，永与军民作福田。

《全宋诗》中收有苏轼《石镜》：

山鸡舞破半岩云，菱叶开残野水春。
应笑武都山下土，枉教明月殉佳人。

山核季风

笔者曾以《山核季风》为题，模仿当地民歌的形式，以男女青年爱情为线索，写了一首打山核桃的歌词，反映昌化山民在山核桃丰收后的喜悦心情。朋友谱上曲，发表在《歌曲》杂志上。

日头爬上东山头哟，
姑娘后生进山坞哟，
山坞里一片片黄禾禾的山核树，
树丫上一蓬蓬圆鼓鼓的山核蒲。
后生子哧溜溜爬上树，
姑娘儿索罗罗满山溜，
打一竿骨碌碌山核蒲头满地流，
搂一兜扑罗罗山核倒进箩。
一竿打一搂哟，三搂并一箩哟，
一步掬一把哟，三把就一兜哟，
一兜一兜又一兜哟，
一箩一箩又一箩哟，
哎格衣子哟。

日头粘牢西山坳哟，
 姑娘后生出山坞哟，
 黄禾禾的山核一箩箩哟，
 香脆脆的山歌一蓬蓬哟，
 山歌里一串串甜滋滋的好调头哟，
 唱山歌哟，好调头哟，
 一箩一箩又一箩哟，一蓬一蓬又一蓬哟。

山核桃为胡桃科山核桃属植物，果仁香、味美，为临安老三宝之一。天目山区盛产山核桃，栽培已有500多年。临安全区山核桃面积约57万亩，占全国总面积的34%，山核桃年总产量在1.5万吨左右，是唯一的“中国山核桃之都”。可以说，山核桃是老天爷送给天目山区的一份厚爱。

1958年的春天，昌化县供销社的一位领导，不按套路出牌，带了一袋山核桃跑到北京，“溜”进了国际工业博览会，看着看着看中了一套机器，便独自闯进了设在王府井的捷克斯洛伐克驻中国大使馆，大使品尝了山核桃后，便签订了一份山核桃换机器的合同，于是昌化印刷厂诞生了。

山核桃给山民带来了财富，山民也对山核桃树产生了崇敬之情。在岛石镇银坑村有一株山核桃树王，树龄近200年，胸径80厘米，年产山核桃果约800斤，为第一“摇钱树”。山民对此树尤其崇拜，旧时每年都有人祭祀。

山核桃春华秋实，逢白露才能开打，有农谚“白露打山核”。这日子准得很，提早两天也不行，品质会差一点。如有人提前，村民会“夺竿”。

旧时，打山核桃规矩颇多。开打前必须祭祀山神、土地，开打第一棵树，要对树拜三拜，祈求平安。打山核桃者必须提前几天“忌房”，上树时需缚宽麻布腰带。树上树下的人不准讲话，打的只管打，

拾的只管拾。如小孩讲话，大人会用树叶将他嘴巴捂牢，意为“不作数”。20世纪50年代，祭祀山神、土地之俗已经淡出。

这一日，山民会起得特别早，各家各户卯时开打。老人、妇女在下面捡，后生汉子则上树打。这里的男人自小练就一身爬树的本领，“嗖嗖”就蹿上了树。但遇到高大的树，则借用蜈蚣梯，即一种单杆长梯。近处用短竿打，远处则用长竿。随着飞舞的竹竿，山核桃蒲就像雨点般落下来。打山核桃有技巧，一要准，打山核桃而不打树叶；二要巧，抖动竹竿，将力量传递到竹梢。

这几年推广张网落果技术，在山核桃林铺设大网，等待自然落果，“纱网恢恢，疏而不漏”。虽然少了一份汉子们在树上挥舞的潇洒，却提高了山核桃的品质，提高了采摘的安全性，又避免了相互间的矛盾。

打山核桃时是昌化山民最欢乐的季节，堆积了山村浓浓的乡愁，堆积了农家美好生活的希望。

烧 炭

天目山区山多林密，为山民提供了丰富的生活资源，白炭、乌炭也在其中。每年秋霜时节，山村里的后生仔们由经验丰富的老大带着，结伴去山中烧炭。

老山离村子远，每人都要从家中带足米、干菜等，挑上被褥、铺盖。老山夜晚冷，还得多包上几件衣服。

于是，村里的一帮男人就成群结队地沿着山路攀行。离村子已经很远了，山口子上有个山神庙，由石头堆砌而成，才两三尺高，里面有个牌位。众人便在庙前点上香烛，摆上供品，祭祀祷告一番，然后继续前行。山越来越深，路越来越小，林子越来越密。进入老山了，找到往年搭的炭棚，再重新做些修整，就住了下来。

还有许多禁忌，干活时要少讲话，尤其禁忌讲不吉利的话，见到蛇也不能喊。禁忌相互直呼其名，而是用“哦霍，哦霍”声招呼同伴，用暗语“草鞋翻身喽”等提示准备回家。

男人中有个头儿，因精明有见地，老山像张图印在他脑子里似的，因此大家奉他为老大。进了场子，先祭山神，然后老大便吆喝一声，一帮人便钩刀、锄头一起动手，先搭起炭窑。炭窑的外形似一条鲤鱼，因此当地俗称“鲤鱼窑”。窑长约二丈，宽约六尺，窑背高约六尺。窑

底部用黏土夯实，中间隆起，两边稍低。窑背上开3个圆孔，称为星孔，主要用于通气出火星，还借此来观察窑内烧炭的火候。在炭窑的底脚，对着上面的星孔，开出3个窑门，用以投柴和出炭。

搭好窑，接下来就是砍柴。周围都是阔叶林，大家选择拳头粗细的硬杂木柴，删去枝丫，截成二尺来长的柴段，搬进窑内，封好窑门。点火前也要祭山神，祈祷平安。然后从窑尾开口处点火。观察星孔，3个星孔都往上冒火星了，说明窑中之柴已经点着，然后封闭星孔。

三天后，冒出的烟由黑转青，且变得很淡时，说明窑中的柴已透过心了，白炭已熟。掀开星孔上的盖子，可以看到里面的柴都是红彤彤的，就可以出炭了。打开窑门，用捞钩将窑内竖着的炭条钩住，用铁制的托盘将烧红的炭撤到窑外平地上堆好，然后用黄泥封盖。火熄了，就成了光闪闪的白炭。

烧炭的过程有些地方会简单一些。靠山挖一倒梨形的坑就为炭窑，将柴直立在炭窑中装满，上面封上泥土，后面开一出气孔。前面开个门，点火使窑内杂木自燃。数日后炭熟时，就把火门和出气孔堵死。冷却数天即可开膛取炭。

在老山中的日子是寂寞艰苦的。晚上，老大会哼几曲粗粝的老山歌谣，帮后生仔排遣思家之苦，再就是讲一些山里的故事，这帮后生仔听着听着，就进入了梦乡。

炭成后，有后生仔分工去砍竹，开好条子，劈成篾，然后用竹篾编成炭篓子。山里人心灵手巧，看一看，大家都能做。接着就将白炭装进篓子，一担担挑下山，气力大的一担能挑八篓。

白炭大多拿到集市出售，挣几个小钱，以补贴家用。有一首流传在临安青云桥一带的《竹筏谣》：

乌炭白柴送余杭，赚得铜钿换米粮。

养儿养困奉爹娘，靠山靠水过辰光。

四

生活习俗



建房的风俗

旧时，天目山区住房多为徽派风格，白墙黑瓦，马头式封火墙，石库台门。境东部门上石梁较宽，境西部石梁较窄。木雕、砖雕、石雕往往比较精致。徽派建筑起源皖南地区，在继承吴越建筑文化的基础上，于明清时代形成一种建筑风格，江南许多地方的建筑模式受其影响。

天目山区西部与安徽相邻，建筑工匠与建筑工艺流通频繁，徽派建筑对天目山区的建筑风格影响极大，稍有经济实力的家庭要建住房，都以徽派建筑为荣，西部山区考究一点的民宅也以徽派建筑为主。这些建筑往往有下述特征：

五四走马楼

天目山区大户人家往往建五间四厢、左右对称的“走马楼”，前后有天井，三进或五进不等，形制特别大，因二楼沿天井四周有通道，故名走马楼。这是旧时的乡村豪宅，但多数则是一进、二进，开间一般为三间二厢。

门前有照壁

照壁呈一字形或八字形，绘有梅、兰、竹、菊、明暗八仙、姜太公遇文王等，有的则写一个大大的“福”字。

采光有天井

外墙窗户甚小，以防盗阻火，采光主要通过天井，多为木结构楼房。天井又取四水归堂，即肥水不流外人田之意。有些人家还会引一支活水，称为活水明堂。

地坪三合土

地坪一般为三合土，但有的人家用水磨砖，或者木地板。

贴门有门罩

贴着石库门常常建一门罩，是一个精致的艺术品，讲究的搞成两层歇山飞檐的。也有许多徽派砖雕，大多是琴棋书画、梅兰竹菊、福禄寿喜、龙象狮虎、凤鹤鹿、明暗八仙，有的还雕上历史人物和故事。青山湖北畔有一幢迁移来的“洪楼”，体量不大，玲珑精致，门罩尤其漂亮，外形酷似一个“商”字。相传洪氏祖宗本是一个读书人，数次参加科举考试，却是名落孙山，铩羽而归。后弃学经商，小有成就，便建起这幢洪楼，特地设计了这个“商”字门罩，屡屡请在官场的同学到家中做客，大小官员一概从商字门中进出，寓意商压官一头，从而让他的心理得到满足，也给后世留下了一段趣谈。

梁柱有雕刻

梁柱“牛腿”“雀替”上雕刻人物或花饰。厢房屏门上雕刻装饰花卉，下部浮雕人物、花鸟，精致细腻。在青山湖北畔八百里有一座从昌化迁移过来的祠堂，主梁上雕刻了一则“九世同堂”的故事。典出

《旧唐书·孝友传》：“郢州寿张人张公艺，九代同居。……高宗有事泰山，路过郢州，亲幸其宅，问其义由。其人请纸笔，但书百余‘忍’字。高宗为之流涕，赐以缣帛。”

三五级台阶

旧时建筑门前石台阶往往铺三级或五级，寓意连升三级或是连升五级。有的以刻在石板、木板上的莲和戟的图案来表示此意。

不可居无竹

宋苏轼诗《於潜僧绿筠轩》有“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句，写出了天目山人喜在住宅旁栽竹的习俗。20世纪80年代起，临安提出了发展“庭园经济”的思路，号召农民房前屋后栽种菜竹，取得了显著成果。绿竹掩映成为临安农村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旧式建筑往往因年代久远，多数已圯，保存下来的均作“古民居”加以保护。街面房多为拔廊、排门屋，楼上有走廊，前可悬挂店号匾额。典当、盐栈、中药店等大多为石库台门，多呈前店后坊的格局。现河桥、八百里等古民居建筑群里保留这种旧时风貌。乡村中特别穷的人家则居茅草坯，往往为泥墙或沙土墙。

20世纪50年代后，天目山区的建房形式趋向简单，一般人家多为三间一字形楼房，人字墙平瓦房，多数为泥墙、砂灰墙或卵石墙，内墙用黄泥石灰粉刷，打泥墙选择黏性好的黄泥。贫穷人家多住草房、泥墙草顶，每年秋后要翻盖一次。

山区就地取材用薄石片、箬叶、杉树皮盖屋。岛石镇有一株川古村，依山而建，从山脚至山腰共有五排民居呈扇形排列。大部分房屋取山中薄石片作瓦，形成一道独特风景。株川村现有50多幢石板瓦屋，保存完好39幢，其中28幢仍有人居住，居民均为高氏族裔。株川村古村落每一排民居门前和每一排民居之间都保留有完整的古道，甚至每一幢民居都保留着民居之间相连的通道。古民居的屋顶、墙基多

由板岩铺设而成，形成特色“石板屋”，石板材料取自山上，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村口两山夹峙，小溪半绕如护村河，旧时建两座吊桥，为进出“关隘”。

20世纪80年代后农村住房条件改善，多兴造小楼。90年代末，农村依托景区，兴建可自住并接待游客的楼房，样式有西有中，经营“农家乐”旅游项目。城镇住宅由单位房变为商品房，房产公司开发住宅小区，有高楼、排屋、别墅等。

天目山周边建房习俗有择基、破土、偷梁、上梁、进屋等。

择基

旧时建屋讲“风水”，天目山区也不例外。第一步就是要请风水先生看风水，察看方位、地形，然后选定屋基和朝向，称“择阳宅”。一般以背山环水，避风向阳处为佳。

破土

天目山区旧时建屋须选择黄道吉日，到新屋基祭祀土地神。祭神一般在开工破土之日或之前。有的祭祀鲁班，择吉日在动土前用稻草扎成一草结，放在屋基前，然后祈祷：“敬请鲁班先师保佑建房平安，百无禁忌。”后磕头三拜，再承诺：“新屋落成后谢先师。”礼毕，点烛烧香，用三牲福礼祭祀，烧元宝供奉。祭祀后即挥锄破土动工，东家还须给开工第一锄的工匠赏钱。

也有请日子先生举行仪式，焚香拜唱：“三界尊神，土地山神，立向破土，虔请五圣，升天达地，骑龙跨虎，驾雾腾云，明书上请，破土动工，新建高堂，速驾来临。”又执鸡唱：“手执东家一只鸡，此鸡非凡鸡，是王母娘娘殿前报晓鸡，三天一曲为吴鸡，昔当初，神栖凤凰楼，叫一声惊动天地，吉时下降，红光艳艳，五色灵光，到我台前，民间弟子，新造高堂，一切凶神恶煞快退场。”又扭破鸡冠或杀鸡赞唱：“鸡血淋淋破土神，万事吉利保安宁。”

还有手握锄头边挖边唱：“一破豹尾黄幡，二破真神七恶煞，三破四废八煞，四破山神恶煞，东破甲乙木煞，南破丙丁火煞，西破庚申金煞，北破壬癸水煞，永破中央戊子土煞，金锄落地大吉大利。”抓茶叶、豆、米撒四方。念：“一撒天上老神仙，二撒城隍老土地，三撒平安无事敬土神，破土已毕，万事大吉。”

偷梁

山区建房，正堂中间的栋梁必须到别人山上去偷，叫“偷梁”。踏看时，要选双株生的，意为偷一株留一株，不会断种。树要直，无连枝虫疤、空洞，枝条向四周伸展茂盛，象征家庭兴旺、财运亨通。选中后，点香拜山神、树神，砍倒后，在树箬头放一红包，树由两人抬回，不能碰撞或跌倒。然后由木匠取料，用凳搁好，放在僻静处。梁上不能被小孩、女人踩跨。

上梁

上梁是建房过程中一个最重要的仪式。康熙十二年（1673）《昌化县志》载：“造屋上梁，则贺以榼酒，而挂梁以采缎。”上梁旧俗繁杂，规矩颇多。新中国成立后，此俗稍淡，20世纪80年代后，此俗又渐浓。

上梁的基本程序：木匠做好梁，梁两头写有“文东”“武西”字样。吉时到，主人点香，请八字好的人把梁抬来，鸣锣、鸣炮仗迎接至新屋堂中，放置在两个三脚木马上，大红被面盖在大梁上。插香敬天地。门口须立新竹两株，竹上扎有红绸带。由外向内贴有“大竖擎天柱，高架创业梁”“广厦落成逢新岁，华堂焕彩万事兴”“江山聚秀归新宇，日月交辉映华堂”等大红对联。堂内摆放新八仙桌，上有南瓜子、桂圆八颗、红枣七颗、生花生、生鸡蛋、生肉、黄豆等供品，因民间有七子八团圆之说，取吉祥之兆。八仙桌上放一只红冠彩袍大公鸡。礼乐队敲锣打鼓迎接木匠、泥瓦匠。东家敬酒，朝里三杯，朝

外三杯，交给木匠和砖匠，各又朝里三杯，朝外三杯。酒盅放在桌上圆满一杯，放置不动。木匠领头师傅在正中唱上梁歌，其他木匠、砖匠各站在正梁两头附和叫好，有序放爆竹。木匠按斧头、金鸡、酒壶、法槌四大件吟诵《赞梁词》。常用的《赞梁词》如下：

（斧头）伏兮，日吉时梁天地开，鲁班先师下凡来。东家赶到年通月利，起造万年楼房。楼房起得高，四面来龙都来朝。四块金砖填脊柱，脊柱头上起正梁。正梁落在何处，南京城里紫金山。何人观见，鲁班先师脚踏云头观见。鲁班先师来和东家商议，东家老板是永不推辞。东边开了金库，大元宝拿了五十个；西边开了金房，小元宝拿了五十双。带了千军万马，带到南京城里紫金山。抬头一看，上有青丝盖顶，下有九龙盘桩。喜柱弯弯好根紫金梁，作的作来砍的砍。大头落在江河里，小头落在紫金山，千人抓不起，万人抬不动。趁得东家福分好，五月十三涨得黄梅大水，摇摇摆摆，摆摆摇摇，来到作场门前。何人来助力，木马将军来助力。鲁班先师手拿丈竿出场来挂线。大头挂一线，小头挂一线，中间一线弹，线线在中央。斧头劈去如龙鳞，铰来铰去八面方。长推刨推去金丝带，短推刨推去放豪光。大头雕得龙头凤尾，小头雕得双凤朝阳。斧头下地，大吉大利。

（金鸡）手拿东家一只鸡，此鸡不是非凡鸡，王母娘娘的报晓鸡。头戴紫金盔，身穿五色衣，一对红龙爪，步步踩金钱。文官听得金鸡啼，正好上朝时；武官听得金鸡啼，正好上任时。工人听得金鸡啼，空手出手满手回；农夫听得金鸡啼，左手牵牛右手犁。耕得良田千万顷，五谷丰登大有年。商家听得金鸡啼，一本万利万利全收。学生听得金鸡啼，手拿文章考状元。东家听得金鸡啼，正好上梁时。晓鸡不用刀，屋前屋后走一遭，如有恶人恶煞来过往，晓鸡一身挡。静听师人嘱，莫听下人言。匠出师人口，句句是金言。金鸡下地，大发大利。

（酒壶）手拿东家一把壶，此壶不是非凡壶，王母娘娘的盛酒壶。上有青丝宝盖，下有荷花托酒壶。壶中米酒，何人所造，杜康先师所造。一敬天，天上两位老神仙。二敬地，地下生富贵。三敬梁头，富贵双全。四敬梁尾，子孙满地。五敬老郎菩萨，代代相传，六敬门福土地，日日招财进宝。酒壶上台，万贯家财。

（法槌）手拿东家一对法槌，此槌不是非凡槌，鲁班造此八棱槌。要问此槌多少长，六寸三分随人量。此槌多少宽，三寸三分宽。一槌发到天门开，二槌发到地门来，三槌发到金鸡叫，四槌发到四季平安。五槌发到五子登科，六槌发到六畜兴旺。七槌发到七季保财权，八槌八仙来恭贺，九槌发到九子十三孙。再加一槌发到东家愿富还是愿贵，东家要富贵双全。富要富过石崇高万倍，贵要贵过窦氏高十分，富贵双全万万年。发槌下地，置田置地。

（结束语）黄道吉日上正梁，大家齐心上正梁。

《赞梁词》唱毕，用扎红带的绳子绕正梁两头，将梁吊起来安装，木匠用斧敲正。此时有人杀公鸡，将公鸡血洒在柱脚上，意为避煞祛邪。放鞭炮，抛撒上梁馒头和糖果。

民国三十三年（1944）4月，天目书院迁往教场坪。院长张天方是留法博士，仪表堂堂，风度翩翩，学贯东西，出口成章，当地人以为是文曲星下凡，对他尤其崇敬。一天，张天方和蒋兰坪相约登山，两人气喘吁吁翻过山顶，却是一个小村庄。村里有一户人家正在建新屋，屋架柱起，单等吉时上梁。有人看见张天方来了，便大声呼喊：“文曲星来了！正好，吉时已到。”于是鞭炮大作，大木师傅随唱《上梁谣》上正了梁，扔下许多上梁馒头来。这边东家和村民簇拥着把张天方和蒋兰坪迎进老屋堂前，摆开筵席，留下一段佳话。

竹管接水

旧时山民饮水多靠山泉，常常用整根竹管或对半而开的竹片将泉水接到家中，这是最原始的自来水。清际界《西天目祖山志》录有唐代姚合一首《天目山僧院泉》：

泉眼高千丈，山僧取得归。
架空横竹引，凿石透渠飞。
洗药溪流浊，浇花雨力微。
朝昏长远看，护惜似持衣。

从这首诗看，早在唐代，天目山的僧人就用上这种竹管接入的自来水了。这种竹管自来水一直沿用至现代。徐志摩在《天目山中笔记》一开始就记载了禅源寺“庙身的左边右边都安着接泉水的粗毛竹管，这就是天然的笙箫，时缓时急地掺和着天空地上种种的鸣籁”。他不但看到了这种竹管自来水，而且还听出了泉水流过竹管的声音如同吹奏笙箫。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深入开展，如今山村都使用上了新型的供水设施。

进屋

新屋落成，主人要备福礼先祭祀屋神、灶神。择定吉日办进屋酒，邀请亲朋好友前来宴饮。亲友循俗送礼，旧时送“糕元宝”（元宝形的年糕），意为招财进宝，步步登高；有送鱼、肥肉、发面等礼，寓富裕发财；也有送书画、对联、绸缎以及古董摆设。今进屋办酒，城镇一般在酒店，农村仍在新屋，送礼以现金为多，也有送书画匾额。

建房禁忌

新房择地基要看周围环境，不得左边青龙低、右边白虎高。房右

边禁忌打灶头，左边禁忌造厕，有谚“白虎怕炙，青龙怕臭”。正门禁忌朝山尖、山墙等。建房忌在庙后和庙右，有“宁住庙前，不住庙后；宁住庙左，不住庙右”之说。如果只能在庙后盖房，则忌以北屋为主房，须以西屋为主房，南、北房为配房，大门应向东开。院内房屋开门，忌两门中线正对。立架上梁时，忌讳毛女（姑娘）、孕妇、寡妇、戴孝人在场。脊檩上贴八卦阴阳鱼，桷头上贴“吉星高照”，柱子上贴“太公在此”等，门框上贴对联，上联为“安门喜逢黄道日”，下联为“上梁正遇紫微星”。

乔迁忌千金沙（意为价值千金的龙沙和虎沙，是风水术语）方向，千金沙方向随四季转动，春在东南，夏在西南，秋在西北，冬在东北。千金沙方向是凶地，相反方向是旺地，其他是平地。迁入新居，门头挂红布条，三天内忌生人进屋。

竹筒传书与徽杭古道

古时有鱼雁传书的故事。相传，曾在天目山修道的葛玄与河伯（河神）有书信往来，令鲤鱼做信使。因此，人们就用鲤鱼作为信使和信件的代称，信函往往雅称为“鱼书”“鱼函”“鲤封”等。但作为真正的信使——竹筒虽然没有在汉语言中成为书信的指代，却是真正传达书信的一个道具。

早先，翻昱岭关到安徽歙县是徽杭之间的重要通衢。《水浒传》中有一回就是描写招安后的梁山好汉要过昱岭关，与方腊的部队打了一场恶战。另有一条徽杭古道，是由马嘯到绩溪的，这条路开发要晚得多。传说这条古道，明代抗倭名将、兵部尚书胡宗宪对其进行了扩建，缘起于一条狗以竹筒传递书信。

胡宗宪（约1512—1565），字汝贞，号梅林，安徽绩溪人。嘉靖三十三年（1554），胡宗宪出任浙江巡按御史，不久又擢升为总督，管辖七省军务。在杭州，他与家人的书信来往原是通过信使走驿站传递。他有一条狗，是从家乡带出来的，颇通灵性。有一次，他想起晋代黄耳竹筒传书的故事，心想，我何不也试试？就将信件蜡封在一截竹筒中，挂在狗脖子上，告诉它送到老家。此狗竟知主人的意思，随即一路奔跑，走的并非官家驿道，而是经颊口折往马嘯，翻山越岭，到达

龙川。胡宗宪的家人从竹筒中取出信件，又将回信放进竹筒，拍拍狗的身体，狗也会意。又循老路奔回杭州。见狗没几天就回来了，胡宗宪起先以为狗半路折回，信未曾送出，谁知摘下竹筒，发现内中竟是家中的回信。胡宗宪感到奇怪，这狗怎么跑得这么快？后来有一次他又让狗送信，并让人在后面跟着，发现这狗乃是抄了近路，翻过马嘯岭到达绩溪。由此，胡宗宪就出资修了这条古道。

据传，胡宗宪的外婆家在临安马嘯的同山村。胡宗宪的父亲是竹匠，年轻时来昌化一带做手艺活，结识胡母，爱笃而成婚。婚后，胡宗宪的父亲长住岳父家。胡母有一次梦见太阳压在身上，后来怀孕，身怀六甲时，经过中堂阶沿进入后堂，曾发生石阶断裂之事，邻人便说胡母怀有大贵之人。胡宗宪童年有一段时光是在马嘯同山村外婆家度过的。传他发迹后，因无法带外婆到杭州生活，就在外婆家建造了一个缩微的西湖景观。2010年版《临安市志》记载马嘯的文化遗存中有“小西湖”：“位于同山下村，仿照杭州西湖格局，分里、外西湖，同样筑有白堤、断桥，还有万字金鱼池、拱桥、凉亭，四周栽植桃柳，设银白迎石杉。里西湖七亩，外西湖八亩，为明代御封江南七省巡抚兼杭州府刺史胡宗宪所建。”

后来，胡适从绩溪到杭州，走的也是胡宗宪开出来的这条道。在胡适的日记中就记载了一件事：他十四岁那年跟随二哥去上海求学，从绩溪上庄老家出发，经过江南第一关，到余杭一共走了七天，然后再乘船到杭州。至今，这条古道仍通，古道经过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道旁风景秀丽，有飞泉瀑布，怪石嵯峨，并有古桥、古亭等。徜徉在古道的石板路上，亦当感叹胡梅林家义犬的功劳。

火神与天目山区的用火习俗

在临安青山湖北畔，有一个地名叫八百里，意为八百岁老人居住的故里。传说彭祖曾经隐居并葬在这里，留下了很多的故事和传说。其中有一个关于彭祖的伯祖父火神祝融的故事。

彭祖的父亲是陆终，祖父叫吴回。吴回有个哥哥叫重黎，在帝喾高辛氏当权时，以西亳（今河南省偃师县境内）为都。重黎担任火正之职，负责取火、存火、用火、管火等。火是人类迈向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它给天下百姓带来了福音，有了火，老百姓便可以照明，可以煮食，可以取暖，真真享用不尽。由于取火有功，帝喾赐其名号为祝融，也就是火神。《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我国将探月工程称为“嫦娥”工程，探测深海的称作“蛟龙”号，而探测火星的则称为“祝融”号，得名即源于此，这是中国式的浪漫。古人也有把燧人称为“祝融”的。《礼记》曰：“伏羲、神农、祝融，三皇也。”又有《白虎通》一书曰：“三皇者何谓也？谓伏羲、神农、燧人也，或曰伏羲、神农、祝融也。”

重黎居住在郑，即今天陕西省的华县。现在南岳衡山海拔1300多米的顶峰就叫作祝融峰，上面还有一座祝融庙，里面供的就是祝融。

也就是说，民间信仰中的火神，可能就是重黎。后来，共工氏的部落造反，帝喾就派重黎去镇压，仗没打好，帝喾就杀了重黎，让他的弟弟吴回接任火正之职。重黎死后就埋葬在衡山脚下，现仍有重黎墓等遗迹。

重黎并无后代，后人传说祝融的后代，其实都是吴回的后人；说彭祖是重黎的孙子，也是侄孙之误。吴回的儿子有一个叫陆终的，就是彭祖的父亲。彭祖的血缘宗承应是这样排列：少典——黄帝（公孙轩辕）——昌意——颛顼——老童（卷章）——吴回——陆终——钱铿（彭祖）。

但在《山海经·大荒西经》中记载：“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百辰之行次。”又记：“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长琴，是处嵯山，始作乐风。”这里的重和黎则是两个人，而祝融有后代叫长琴的。又《山海经·海外南经》还记载：“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祝融则成为人面神兽了。

天目山区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里还有用火刀取火。火刀为钢片打成，呈椭圆形，一边钢片，一边是一小圆铁筒，铁筒用来装火媒纸，取火时，火石和火媒纸贴在一起，火刀刮打石头引起火星，沾在火媒纸上，一吹就着。其时火柴已经非常普及了，但有的山里人为省钱，仍沿用这种古老的取火方式，有的老人和汉子还随身携带火刀、火石和火媒纸，干活歇息时便打上火媒抽袋烟。

与火相关的，还有照明。旧时天目山人晚上出门，常常用松明、竹篾、葵花秆、黄烟秆等为火把，考究一点的用竹丝油纸灯笼，家中则用青油灯、蜡烛等。民国二十六年（1937），浙江大学西迁天目山，一年级学生包括程开甲等，后来还有浙西一中就读的学子们，常常借禅源寺僧人念经的烛光进行晚自修。20世纪50年代后天目山区才有煤油灯。婚丧宴请或演戏、做道场用煤油汽灯。

天目山区最早用电灯的是东天目山昭明禅寺，民国二十一年

(1932) 秋天，梅兰芳访东天目山，送给妙明法师一台从美国进口的小型柴油发电机，机房设在梅公桥边，可以提供昭明寺内二百余只灯泡照明，这在当时是非常稀罕的。

天目山区电灯的普及，应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各地建造了水电站。开始是白炽灯，慢慢地还有了日光灯、节能灯等，外出则改用手电筒或矿灯照明了。

火桶、𥓔桶、火𥓔和火缸

曾有一家省级电视台的两位记者想做一档风俗专题节目，到天目山西北的浙西大峡谷住了三天，走家串户时看到了几样稀奇的东西。才初冬，男女老少人人提了个火𥓔或者火桶，走到哪带到哪，这是其一。还有一样，就是那缸，别处的缸一般放在灶间，这里却把缸放在卧室里；别处只用来盛水，这里家家户户有一只装火取暖的缸。这怪怪的习俗还真有意思，两人决定做一档取暖的风俗节目。

说起昌化一带的取暖风俗，还真是有点特色。比如器具的叫法，相对夏天的“竹夫人”，冬天则有“烫婆子”，名称俗得极致。品类上除了火塘、火炉、火堆（篝火）等这些乡间常见的之外，还有几样很有特色：火桶、𥓔桶、火𥓔、火缸。

火桶其实是用木板箍成的凳子，底下一截呈桶状，按着一个搁炭火的铁盆子，上端则为半围桶，连着一块坐板，因取材都为杉木，分量并不重。冬天，坐在这样的凳子上，确实惬意。

𥓔桶是农家婴幼儿的站具，也是木板箍成的，有一米多高，中间有一层隔板，透着眼，下面可以搁置火盆，冬天婴儿站在桶中，头和手露在外面。

昌化的火𥓔以竹制的为主，内有铁盆，上有烘罩。相比普通的火

熨斗，嫁妆中的火熨斗尤为精致，不但篾丝细，还会打出一些花样来，再附上一个铜罩，一双精致的铜火筷，显得金贵雅致。

天目山西部地区气候较冷，有民谚“头九二九，相逢不出手；三九四九，冻煞老黄牛”。山民很早就提一个火熨斗抵御寒冷，不分老少，人手一个。然后一大早就把一大堆火熨斗排在灶前，装上毛柴炭，然后从灶膛里撬出炭火给一只只的火熨斗装上。一家人懒洋洋地钻出被窝，从烘篮里取下暖暖的衣服穿上，每人便提上火熨斗，开始扒拉碗六谷糊，完了抹抹嘴，提上火熨斗就出门。老人顺便还带上根长长的红得发亮的老烟杆，烟瘾上来可以抽袋烟。小孩子则瞒着娘姆，上楼摸把果子，铺在网盖上，热乎乎的可以解馋。《补勤诗存》中存有清代陈锦的诗《唐昌纪事十二首》，其中有《竹火笼》诗一首：

瓦盆宿火御晨寒，铜筋竹络盘四端。
千人胯下挟微热，阳春在脚行团团。
山邑箐丛苦卑湿，黄梅风雨无时节。
单衣薄袖提筠篮，冬烘直到春月三。
红闺玉手薰兰麝，女儿黄竹箱同在。
铜瓶暖酒宜黄昏，夜来并作被池温。

20世纪70年代，南京艺术学院教授沈涛曾画了一幅国画《龙岗冬色》，竹火熨斗是画中主要景物，多位名家为画题诗。前些年，临安衣锦小学还排了一个舞蹈节目“竹火熨斗”，在杭州市的比赛中获得了金奖，又在省里获得了银奖。

当然，最具特色的当数火缸。火缸通常要用竹篾打个护套，一方面保护火缸，另一方面又起到装饰作用。火缸上面有一个竹烘篮，这竹是属于南方人的，它的艺术大概也是属于南方人的，昌化的篾匠可以在器具上让自己的手艺发挥得淋漓尽致，先是用墨汁把部分篾片染成黑色，然后黑白相串，编织成各式图案，一般有福、禄、寿、喜，

花卉、田字、万字等吉祥的图案，显得既典雅美观又古色古香，富有民间地方风格。内框外周，还用竹片定型，白藤包扎，讲究的人家在一只烘篮上往往花数十工甚至百工。于是，烘篮俨然成了一件高档的工艺美术品。

因为有了火缸，客人上门，不仅可以登堂，还可以入室。几条矮凳围着卧室里的火缸，随手提起埋在火缸里的铜茶壶，给客人冲上一杯热茶、再斟上一盅土烧（酒），拼两盘花生、栗子、山核桃、薯片、糖枣、冻米糕，甜蜜蜜暖乎乎的，待客之道十分简朴，却亲热有加。烘篮白天拿开，晚间罩上可烘衣衫和被子。

半月桌和春凳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半月桌就系着这一份圆缺离合的情结。

天目山的半月桌多以红木等上等木材制成，桌面或镶云石，做工十分讲究。其特征是半桌独立，并合成圆，榫卯传制，器形典雅，精致高档，神采斐然。

很早的时候，天目山一带人家就觉得仅厮守家中一亩三分地难有出头之日。有志男儿应当到江湖上闯荡一番。出门之日，就将并合成圆的桌子一分为二，两半月分搁在厅堂前的两侧。女人在家，便是守着半个月亮，盼着另外的半个月亮。待到男人回来，两个半月桌便合在了一起，团团圆圆，那种久别重逢的喜悦之情，不用言辞，就全在这桌子之中了。

天目山区旧时乡俗，有友来访，也不宜直接登堂入室，先在门外张望客堂。倘是圆桌半月两分，便知友人尚未回乡，家中只有内眷，男女授受不亲，知趣避嫌而退。倘若见是两个半月已经合圆，便知友人已归，可入门道贺。与友人海阔天空闲聊一番，不亦乐乎。

虽此一桌，表意中却有十分的诗韵和浓浓的乡情。

凳子往往与桌子配套，但春凳不是。它是单独的存在。

春凳是一种相对高级的凳子。王世襄《明式家具研究》:

春凳的形制与条桌、条案基本相同，长五、六尺，宽逾二尺，可坐三五人，亦可睡卧，以代小榻，或陈置器物，功同桌案。

旧时，春凳是用香椿树做的，有一股淡淡的香味，不易遭虫蛀，颜色往往为深棕色，看起来十分养眼。因为是椿木制作，所以叫作“椿凳”，后来慢慢把“木”字给省了，就成为“春凳”了。

春凳的做工十分讲究，榫卯结构，往往有雕花，甚至还有镶玉藤面的，有的还带有小屉，结实耐用，根据需要，可以有功能上的差异，也可以有不同的设计和制作，很体现匠人功夫。

天目山人家嫁女儿时，嫁妆中常常有一条春凳。上面放上被褥，贴上喜字，由行郎抬进夫家，是新娘的一种体面。这种习俗沿袭至今。

不仅天目山区有此习俗，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喜欢这玩意儿。《红楼梦》第三十三回提及宝玉挨打，王熙凤有这么一段话：“你们还搀着走呢，都打成这样了，走得了吗？赶紧把带藤屉的春凳抬出来，抬着宝玉走。”看来，贾府中春凳挺大的，“带藤屉”则说明它的做工非常精致。

春凳过去多搁于床前，除了供房中坐歇，堆放衣服、杂物外，还可供婴儿睡觉。或搬至室外，或躺或坐，欣赏园中风景。现在宾馆用的床尾凳，就是由春凳演变而来。

竹眠轿的故事

古籍中常常出现“篮舆”一词，篮舆即是竹眠轿，又称作竹兜、滑竿，是一种供人乘坐的交通工具，形制不一，但都以竹制成，类似后世的轿子。讲究的四壁皆为篾编，两侧有窗，半截门帘，横搁木板，可置纸笔。简单的就是加上抬杠的竹躺椅，上有布篷遮阳挡雨，由两人抬着行走。

20世纪30年代徐志摩等来天目山乘的是这种竹眠轿。20世纪80年代后，东、西天目山多处景区都提供眠轿服务，以供游客代步。著名画家叶浅予上山坐的是这种轿子，商界巨擘邵逸夫、安子介等也是坐着竹轿上山。

民间举办灯会时，往往用竹眠轿抬神像。例如，太湖源镇梅家村每年七月十三至十五要举行土地庙会，历时三日。其中有抬土地菩萨巡游一俗，叫作出会。土地菩萨坐在无顶的竹椅眠轿上，椅子前方绑有一张供桌，沿路休息时，山民们上香拜供。四人起抬，另有四人跟在左右，随时可更换人手。

《夏书》记载：

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

蹈毳，山行即桥。

这里说的桥即为轿也。天目山一带有大禹治水的传说，於潜镇西的嵒粤山传为大禹从太湖边移来，因此又称“飞来山”。如果大禹真的来过天目山，他当时应该是乘坐竹轿。

明吴志鲸《武林梵志》卷八：“（陶渊明）常往来庐山、天目间，使一门生，二儿舁以行。”据此可推测当年陶渊明隐居天目山，日常活动也都是用此竹轿。

竹轿在宋代时较为讲究，《宋史·舆服志》载：“旧制，舆檐有禁。中兴东征西伐，以道路阻险，诏许百官乘轿，王公以下通乘之。其制：正方，饰有黄、黑二等，凸盖无梁，以篾席为障，左右设牖，前施帘，舁以长竿二，名曰竹轿子，亦曰竹舆。”苏轼数次来临安，乘的篮舆大约就是这种。苏轼诗《宿海会寺》中有句：“篮舆三日山中行，山中信美少旷平……”

明代的《剪灯余话》记载：“文信美随即答应与他们同去，果然见有一乘没有轿厢的竹轿等候在道旁。文信美坐上以后，抬去如飞，顷刻之间就到了句曲山华阳洞。使者和文信美一同进去。洞主头戴王冠，身披丝绢衣服，手持笏板，出来迎接……”

这里所描绘的竹轿较为简单，看来神仙也没有那么讲究。

明徐嘉泰《西天目山志》中有陈继畴的一首诗《从西化城寺望天目》，诗云：“不浅登临兴，篮舆伤晚行。村村皆竹色，日日是山程。……”孔元忠游洞霄宫诗《回憩翠蛟亭》有“引领篮舆上翠微”句。洞霄宫道士贝青乔《入九锁山》诗有“篮舆猿鹤讶”句。

古时，出门时的交通工具有人力抬轿、畜力拉车。官绅乘大轿，装饰华丽，轿夫4—8名。商贾、医生、士人乘小轿，轿夫2名，结构简单。明清以后，旅游只属于少数官宦、富家、文人、探险者等的专利，平民百姓无余钱出外旅游。

说说筷子

一、起 源

中国人使用筷子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产生有几种民间传说：一说是夏禹在治水时，因等不及锅中食物冷却，便用两根树枝夹起了食物来吃，于是筷子就诞生了。二说是妲己在伺候商纣王时，食物太烫，便以玉簪刺住食物，用口吹凉了，然后送到纣王嘴里。纣王很高兴。为了更加方便，后来工匠特制了两根玉簪来夹食物，于是就有了筷子。三说是姜子牙的老婆下毒欲害死丈夫，有神鸟衔来神竹枝，姜子牙用神竹枝伸进食物，发现了食物有毒。这第三说神竹枝才是真的竹筷，至于说到有验毒的功能，到后来还真的有了，但那是银筷子。说到姜太公，与天目山还真是有点缘分。据《茅君传》记载：“第三十四洞，名大涤匡盖之天，周回一百里，内有日月分精、金堂玉室、仙官考校灾祥之所，姜真人主之。”杜光庭《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也有类似记载，文中所提及的“姜真人”即是姜太公姜尚。

上述关于筷子起源的传说都不足为凭，尤其是后两种说法已被考古和文献所推翻。其实，筷子的诞生，应是先在民间，有可能源于大禹时代，经过数百上千年的改进和普及，在商代成为基本餐具。

北方多木，南方多竹，都为筷子，材质不一，南方称“箸”，北方称“筷”。上山砍柴，如果冷饭包里少带了一双筷子，便随手斫两根树枝削了，吃起来也很应手。天目山上还有一种叫作“红筷子”的小树柴，枝皮是那种十分滋润的红色，粗细也如平日用的筷子一般，因而得名。

二、习 俗

《礼记·内则》：“子能食食，教以右手……”筷子的使用要有一个适应过程，中国的孩子到了自己能够吃饭的年龄，父母就须教他们右手拿筷子吃饭。学会执筷之法是中国人生活的必修课，到后面，用筷子的规矩就多了。

在天目山习俗中，使用筷子有许多的忌讳，譬如：不可用筷子去叉馒头或别的食品，不能用筷子去推饭碗、菜碟，不能用舌头去舔筷子，不能举着筷子在菜碟间来回转。不能将筷子调头使用，那是颠倒乾坤。不可将筷子插在碗中，因为只有在为死人上供时才这样做。不能在夹菜时滴滴答答流着菜汁，那叫“泪筷”，应该拿个小碟接着。不能举着筷子和别人说话，更不能将筷子去指点别人，这样被认为对对方非常不礼貌。不可以敲筷子，也忌用筷子击盏敲碗，因为叫花子讨饭时才敲碗，不吉利。拿捏筷子也非常讲究，就是两根筷子必须平行，要是小孩子交叉着捏了，对不起，老人就会用筷子头敲他的手，交叉捏筷，有是非来。

筷子在饭店里还是客人用餐结束与否的一个标志，筷子搁在碗上，表明你用餐尚未结束，但如果服务员见你把筷子搁在桌上，他就会来收拾你的碗筷，这种约定俗成的规矩似乎已经淡化了。随之多出来的是在餐桌上多了几双公筷，文明卫生，病菌不易交叉感染，这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

2010年版《临安市志》收录了民间“笃筷子”的习俗：有人突然

感到身体不适或某部位疼痛难忍，山民认为撞鬼了，便请人来做法。把三根筷子合在一起，大头朝下，用手扶好笃在碗上，用少量水从筷子头上慢慢淋下，口里念念有词，念到三根筷子能独自站立，就确定患者确实撞上了鬼。做法的人随即拿一把刀放在碗边，口里吆喝让鬼快走，当三根筷子倒下时，表示鬼已走，患者就可平安无事。

天目山一带的风俗，筷子谐音快子，有快生儿子的祝福，因此女儿出嫁的嫁妆中也会有筷子，暗示着她不久就会生一个儿子。“筷”又含“快乐”好运，因此，除夕之夜，餐桌上往往放上新筷子以祈好运。人们还将筷子塞进大树的树洞之中，以求“平安快乐”或“快生儿子”。20世纪50年代，锦城横潭村一棵大枫树被风刮倒，村人发现树中空洞内塞满了竹筷，竟有几箩担。天目山的莲华峰有一建于元朝的大觉正等禅寺，门前有两棵巨大的白果树，树径达三米。20世纪80年代，这两棵树被砍，底部的树洞中也发现了几担竹筷。来寺院烧香拜佛的香客，中午用斋后，将竹筷插进树洞，是一些信众心灵的折射，因为筷子寄托着人们“快乐”的梦想，藏身于树神的怀抱。

三、功 用

《魏书》记载了一则谜语：“眠则俱眠，起则俱起，贪如豺狼，赃不入己。”天目山民间也有一则：“两个兄弟一般长，越过围墙偷菜秧。”筷子二根棒，挑、拨、夹、拌、撩、扒等，在中国人手中，随心所欲，得心应手。

《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曹操煮酒论英雄 关公赚城斩车胄》中有一段：

操曰：“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玄德曰：“谁能当之？”操以手指玄德，后自指，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玄德闻言，吃了一

惊，手中所执匙箸，不觉落于地下。时正值天雨将至，雷声大作。玄德乃从容俯首拾箸曰：“一震之威，乃至于此。”操笑曰：“丈夫亦畏雷乎？”玄德曰：“圣人迅雷风烈必变，安得不畏？”将闻言失箸缘故，轻轻掩饰过了。操遂不疑玄德。

那曹操说刘备是英雄，把个正在施韬晦之计的刘备吓得跌落了手中的筷子，恰好有一声炸雷，总算是随机应变搪塞过去。苏轼写《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视雷雨，每大雷电，但闻云中如婴儿声，殊不闻雷震也》一诗，其中“山头只作婴儿看，无限人间失箸人”，用的正是这个典故。

白牛

——一个古老的地名故事

白牛是个淘宝村，“宝贝”很多，在互联网上出了名。但还有一宝，竟然没人“淘”出来，那就是白牛地名的真实来历。白牛人现在用了一个现代版的民间故事，虽也美，却是舍重就轻，将真正的出典淹没了。“白牛”的地名是从许由和巢父的故事而来，包括箕山、洗耳滩、晚溪等，旧时还有许由庙、许由亭等，它是临安最古老的地名。

箕山在昌化不算出名，它就是三星村的七井坪。箕山是因山形如簸箕而得名的。民国十三年（1924）《昌化县志》载：“山名箕山。山体四面如削，山顶平坦，形如铁砧，又名铁砧坪。山顶原建有寺庙，现废。庙前有七井，水清见底，奇旱不涸。”又载：“古尧时，许由曾隐于此山。”山上还有一个小池，池中栽有莲荷。山顶另一处有由岩体分化而成的五色沙，把五种颜色的沙掺和一处，数日后即自行分开。山脚有龙潭坑溪，溪旁是杭徽古道。

洗耳滩则在白牛村，为晚山下昌化溪的一块溪滩，又叫许由滩。

而白牛的地名是因为巢父牵白牛饮水而得。明陈继儒《天目盆松》诗有句：“中顶秀擎云，犹堪坐巢父。”

许由和巢父是上古时两位隐士。传尧要把帝位让给许由，许由推

辞不受，便跑到了昌化的箕山脚下，以农耕为生。后来尧又想让他做九州长官，他听后，就到晚溪的水边洗耳朵，嫌这样的世俗浊言玷污了自己的耳朵。这时，另一位隐士巢父牵着一头白牛来河边饮水，问许由洗耳之因，许由告之，巢父就牵着他的白牛走到上游，怕白牛饮了许由洗耳之脏水。后世称他们两位为“巢由”或“巢许”。作为中国隐士的鼻祖，许由和巢父受到历代文人的推崇，对中国隐士文化乃至道家文化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

康熙十二年（1673）《昌化县志》载：“许由，颍川阳城人，耻不受尧天下，逃隐今箕山、千顷之间，相传为由故居，又有洗耳滩，其上为白牛桥，即巢父牵犊饮流处。后人尝即其地立亭，因名曰许由亭。”

《咸淳临安志》中也载：“箕山在县（昌化）西北十里，神仙所隐。”又载：“许由，颍川阳城人，一云阳城槐里人，隐此，号稽留山即今灵隐山。又昌化县晚溪有箕山。……今昌化县乃有许由亭，傍又有箕山。”

河南的颍川也有相似的记载，那里也有箕山，位于中岳嵩山之南三十里处，又名许由山，东北部并有许由冢。与河南颍川许由的老家相比，河南多了一个许由冢，昌化则多了一个“白牛”的地名，将二号人物巢父和他的宠物直接点了出来，且是白色的牛，使故事的色彩感和趣味性增强了。

对昌化的这段典故的记载也有人提出质疑。《咸淳临安志》主编潜说友怀疑昌化人把许远游和许由搞混了，他猜测是晋代的许远游（即许迈），并非尧时的许由。他在《咸淳临安志》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晚山，在县西北十里，高一百四十丈，周围三十里。晋许游所居，山下溪滩号许游滩，唐人诗：葛井许滩今古传。远游尝至於潜采药，遗迹为许游观，其事甚明。但今复号滩为洗耳滩，又引巢父饮牛为侣，号桥为白牛桥，盖因由游二字音同而讹耳。

又载：

许迈尝隐此，追慕鼻祖，故有洗耳滩、白牛滩之号，亦恐未然。迈但立精舍于余杭垂雷山，后移入临安西山，于钱唐之灵隐、昌化之晚溪无相关也，疑以传疑，姑存于此。

“亦恐未然”“疑以传疑”的措辞说明潜说友也是一种猜测而已。

可能受《咸淳临安志》的影响，康熙十二年（1673）《昌化县志》认为许由来过，游过，因此留下这些地名。志书中有尾注：“按史记，箕山有许由冢，在河南嵩少间。此亦名箕山者，盖由尝游览于是故，借其所隐以称之，善乎。钱塘陈敬亭善之言曰：箕山旧迹，在昔已无的传。矧兹流寓之地，然记载沿袭已久，固当存之，俾后人歆高尚之风，恬笼利之竞，亦风教一益也哉。”

其实许迈也是来过的，在康熙《昌化县志》许迈一目上有尾注：“邑晚山旧有迈居，迈曾采药隐此，或以许由洗耳滩、白牛桥昔迈所托迹，未信是否？”

历代文人对“箕山”“白牛”的典故饶有兴致，留下了许多诗篇。成化《杭州府志》记有无名氏《晚溪许由滩》诗的一残句：“葛井许滩今古传。”《明一统志》记有郑作肃诗《晚溪洗耳滩》，有句：“滩声汹涌几春秋，洗耳还须一枕流。”明代陈凤书诗《洗耳泉》有句：“形象悉空明，耳根何必洗。”

南宋钱时也有《许由亭》一诗：

许由亭其来远矣，名以名之，非便也，下有白牛桥、洗耳滩，皆当时事，宜揭之以洗耳。

尧舜相传自执中，一瓢赢得迈高风。

白牛桥下沧浪水，应洗人间万古聋。

清代昌化的章凤喈有诗《箕山寻古》：

欲觉高踪何处是，缘莎扳磴到层巅。
疏林不辨悬瓢树，小涧犹流洗耳泉。
凤翥云霄成已事，鹤归华表竟何年。
箕山千顷浑无定，一忆遗编一喟然。

清代进士孙应龙也曾写下《洗耳滩吊望许由庙》一诗：

何年来许迈，此地侣巢由。遂有箕山迹，难寻颍水幽。
危滩鸣断壁，落日冷荒丘。为仰高风在，瓢悬古树头。

地名趣谈

初来临安之人，对临安的地名总是感到惊异。“天目”“紫水”“鱼跳”“临天”“呼日”“太阳”“月亮桥”“洗耳滩”……明明在这字缝之间嵌有情节，衔着故事。最让人觉得有嚼头的莫过于杭昱线上那几个村名缀起来的地名联，仿佛是一根金线把六颗散落的珍珠串起，意味无穷。

藻溪鱼，跳过横塘，化龙去也；
方元鼓，鼓上更楼，太阳升矣。

作者是近代名人於潜方元的方克猷。此联以於潜镇为中心点，上联是於潜镇以东的三个地名，下联是於潜镇以西的三个地名。“藻溪”称溪，溪中当然有鱼，民间有鲤鱼跳龙门的传说。“横塘”是条分界岭，“化龙”则寄托了作者的心志，本是钱江鱼，化作太湖龙。传说，於潜镇上之牢粤山就是大禹治水时，念动真言，从太湖飞运过来的。此联也许与这个传说有关。这一句连起来就劝人奋发向上，积极进取，所谓功到自然成之意。

“方元”这地名本身就带着哲理性，方方圆圆，可喻作人生处世。

古时作兴敲更报时，上得“更楼”，喻人生在茫茫黑夜之中，能悟透玄机，登上高层境界，此时便可见朗朗乾坤红日升矣。联中尾词一“也”一“矣”也算妙绝，似乎让人见到那龙渐渐地入云，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的动态，没有这两个字，味道就不一样了。

方克猷（1870—1907），於潜方元乡人，字子仕，号凤池，又号天目山樵。他从小天资聪颖，品行端正。12岁时参加童子考试，就以第一名考上秀才，补县学生员。20岁考中举人，21岁殿试二甲为进士，在刑部任主事之职。24岁时又考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曾随钦使访问德国。后又任练军营务处会办，陆军中学堂总办、法部员外郎等职。方克猷爱抚百姓，忧国思振。他同情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维新的主张，对被逮捕的革命党人设法予以保护或营救。如，同盟会员、北京一报社主笔杭辛斋，因在报上揭露时弊，触怒了朝廷权贵，被捕关押在刑部监狱。方克猷设法保护他，后通过王国维等为之申诉方才获释。光绪三十三年（1907），不幸因病英年早逝（一传为慈禧太后毒死），享年仅38岁。

前些年，笔者也曾用大峡谷的地名凑成了一副对联：

石门鱼跳永安千顷荡；
路口马啸相见百丈岩。

横批：华光呼日。

联中“石门”“鱼跳”“永安”“千顷荡”“路口”“马啸”“相见”“百丈岩”“华光”“呼日”均为大峡谷中的山名、水名、乡村名。

此外，笔者还以地名作了一些天目山区的地名谜语：

谢太傅至此一游（秋千格·打一地名） 谜底：临安
东海一礁（秋千格·打一临安地名） 谜底：岛石
百无一丑（打一临安地名） 谜底：白牛

随波逐流（打一临安地名） 谜底：顺溪

品（打一临安地名） 谜底：三口

孔明居此夜不眠（打一临安地名） 谜底：龙岗

化龙去也（打临安两地名） 谜底：鱼跳 石门

二人竖四峰（打一临安山名） 谜底：天目山

相逢不走避暑山（打一临安山名） 谜底：清凉峰

一人担日月，出了一半力（打一临安山名） 谜底：大明山

前面两个谜语为秋千格。秋千格与卷帘格相似，谜底都要从下而上倒过来读，如同帘子往上卷起来一般。如：谜面“白胖”（打一杂志名），谜底：《半月谈》。按谜面正读猜得的“谈月半”，倒过来就变成《半月谈》，扣杂志名。卷帘格的谜底限在三字或三字以上，而秋千格谜底仅限两个字，两个字位置互换，好似秋千荡来荡去，故而得名。如谜面“望咸阳”（打一宋代文人名），谜底：秦观。“望”与“观”同义，咸阳为秦之首都，这里代指秦，连起来为“观秦”，按秋千格谜底倒过来，即为“秦观”。

地名中有浓浓的风俗，细细的咀嚼地名，也能感受到民间风俗的魅力。

竹竿和竹杖

天目山人的生活离不开竹竿。

直到今天，天目山人还时常用竹竿晾衣服。晾衣竹竿一般选取小毛竹等，粗细适中，上下均等，截取4—5米，刨平节突。取2根带叉的竹竿，靠墙而立，或取6根2米来长的木柴或竹竿，串成2个三脚架，将竹竿搁于叉上或三脚架上，就可晾晒衣服和其他杂物。走进天目山农家的院子，常常是这样的画面：农妇在纳（缝）鞋底，山崽子逗着小黄狗，晾衣竿上的衣服随风摆动，似乎就是山里的一道风景。

秋天是天目山区最诱人的季节，山核桃成熟了，漫山遍野黄禾禾的山核桃蒲挂在树上，那是天目山人的财富和希望。白露一到，男女老少一家人涌上自家那几亩山地，享受丰收的喜悦。打山核桃用的也是竹竿，有长短两种，取小毛竹，长的5—6米长，短的3—4米。爬在树上，一般用短竿，方便灵巧，够不着的站在树下则用长竿。

旧时，天目山一带的村民多饮用井水。在古井旁，都靠着一根打水的竹竿，竹竿带根，根部樨一短木。村人用竹竿将水桶灌上水，提上井口，然后担回家。

旧时放木排有一竿钩，可以扎住圆木在水中拖曳。溪中发大水时，村人用此竿钩捞水中木柴，称撩大水柴。

还有竹旗竿。旧时，处在交通要道上的村镇店铺，都会在门前立一竹竿，竹竿上挑着红红绿绿的酒旗茶幌，招引来往客商打尖歇脚。又有茶亭之类，往往是村人行善积德处所，在此特设免费茶座，给赶路人行个方便。

还有巧竿一俗，农历七月初七，有的天目山人就在庭园中立根竹竿，上面设一莲花座，谓之巧竿。并以酒食饼饵，祭拜牛郎织女，意为乞巧。

天目山区有许多畚族人，有几个村子如铜山村、众社村都为畚族村。畚族人喜欢跳舞，竹竿舞是其中之一。舞姿豪迈洒脱，热烈奔放。持竿者姿势有坐、蹲、站三种，变化多样。在有节奏、有规律的碰击声里，跳舞者要在竹竿分合的瞬间，敏捷地进退跳跃，而且要潇洒自然地做各种优美的动作。当一对舞者灵巧地跳出竹竿时，持竿者会高声地呼喝“嘿！呵嘿！”表示赞叹。如果跳舞者不熟练或胆怯，就会被竹竿夹住脚或打到头，持竿者便会用竹竿抬起被夹到的人往外一倒，并群起而嬉笑之。擅跳竹竿舞的小伙子，还往往能博得姑娘们的青睐。20世纪90年代后，天目山区建了许多旅游景区，常常将这项活动移入景区，招徕游客。

竹杖是一种拄人的竹竿。竹杖或为老年人所倚，或为登山者所用。

“禅杖”乃是佛教禅门之中，在坐禅时用以警睡之具。《释氏要览》载：“禅杖竹苇为之，用物包一头。令下座手执巡行，坐禅昏睡，以软头点之。”用这种“禅杖”触击禅者，不会感受痛楚，但能苏醒精神，防止座中入睡。

天目山人常用竹制的手杖，当地山民又称作竹拐棒。

唐代释皎然诗《采天目实心竹杖寄赠李侍御萼》：

竹杖裁鲜碧，步林赏高直。

实心去内矫，全节无外饰。

行乐聊自扶，持危资尔力。

初生在榛莽，孤秀岂封殖。

千雪不死枝，赠君期君识。

皎然是识货的，又有雅兴，知道实心竹十分珍贵，亲自上天目山采来做成竹杖，寄予朋友。

竹杖中还有一种叫丧杖，又称哀杖或哭丧棒。天目山一带的习俗，出丧时，子孙辈穿素衣、系草绳、登麻筋草鞋。孝子手里要持一根青竹管，叫“丧杖”又叫“哭丧棒”。原来此杖长一米，主要用于孝子拄扶，因孝子过度哀伤，造成身虚体弱，行走困难，设杖以扶持，后来逐渐演变为长尺余，上绕白纸。在送葬上山作封墓后，将丧杖置于坟前。

山中习俗认为竹梢棒是蛇的娘舅，蛇最怕的就是竹梢棒。春夏上山，提根梢杖，可以借力支撑身体，也可打草惊蛇，让蛇先行溜走，以防踩着被咬上一口。提竹棒、竹杖走村串巷时，则可赶狗。

五

饮食习俗



茶源和茶俗

临安有个地名叫八百里，八百岁老人居住的故里，传彭祖曾在这里隐居并墓葬在这里，有彭祖祠和彭祖墓遗迹。彭祖是养生鼻祖，据说他有养生茶，当年曾救了尧。那茶不是红茶或绿茶，而是一种“雉羹”。今天昌化人待客习俗中的“三道茶”，第一道是绿茶，第二道是冻米茶，第三道则是鸡蛋茶，即糖余蛋。后面的两道茶，突破了现在茶的概念。至今，天目山人不讲“喝茶”，而讲“吃茶”，恐怕就是这个道理。

笔者曾以彭祖的年龄或八百里的地名，设计过一道“茶”题。把“茶”字拆开，分作四个数字，分别为廿（20）、八（8）、十（10）、八（8），这四个数字用加减乘除四则运算，最后的结果是彭祖的年龄，也是彭祖的隐居地八百里——800。在数字间添上四则运算符号，使等式成立。答案： $(20 + 8 \times 10) \times 8 = 800$ 。这也算是彭祖与茶之缘。

除了彭祖，还有梅福。康熙十四年（1675）《临安县志·杂纪》：“汉梅福，字子真，西汉末人，见王莽有篡志，挂冠而去，修仙于九仙山，山下建梅仙桥，后封寿春真君。”在九仙山时，梅福首创人工植茶，被人称为“茶祖”。2012年版《临安市地名志》：“相传西汉元始年间（公元1—5年），寿春人梅福，字子真，弃官居家，隐居玲珑九仙

山，种茶以自娱。”梅福的后人自九仙山迁至东天目山脚，村子因名梅家头。梅家头的一支又迁至杭州龙井，发展繁衍成梅家坞村。1990年版《杭州地名志》载：“梅家坞，相传临安天目山有梅姓来此地定居，后繁衍成村落，故名梅家坞。”

还有一位北宋高僧於潜人辩才，曾在上天竺白云堂下、雪液池上手植千叶山茶两株，这是杭州龙井茶人工栽种最早的记载。辩才退居龙井寿圣院，又将上天竺的白云茶种苗移到龙井，于是有了最早的“西湖龙井茶”，他因此被后人尊为“龙井茶鼻祖”。

元代，赵孟頫和他的夫人管道昇都是天目山中峰禅师的俗家弟子，常来西天目拜访中峰。一次，中峰让赵孟頫抄写《心经》，赵孟頫恭恭敬敬地抄录完成，中峰就在幻住庵后面的松树林中，以天目山的好茶款待。这个故事流传下来，到了明代，宫廷画家仇英就以此为题材画了一幅《赵孟頫写经换茶图》。这幅画后为他人所收藏，但无法取到赵孟頫所抄《心经》，于是就请文徵明抄了一篇小楷《心经》，裱在一起。后来，这幅作品被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收藏，而赵孟頫抄写的《心经》则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中。这也是天目山茶生发出来的一个真实故事。

天目山盛产名茶。茶圣陆羽曾到天目山，对天目云雾茶有很高的评价。陆羽的好朋友，茶道始祖释皎然曾驻锡天目山，有诗《对陆迅饮茶天目山茶寄元居士晟》：

喜见幽人会，初开野客茶。日成东井叶，露采北山芽。
文火香偏胜，寒泉味转嘉。投铛涌作沫，著碗聚生花。
稍与禅经近，聊将睡网赊。知君在天目，此意日无涯。

还留下了《采天目实心竹杖寄赠李侍御萼》等诗。

在宋元时期，天目窑烧制“天目盏”。从天目山寺院流传至日本的几件国宝“曜变天目”等，有可能就是天目窑的窑火烧就的。如今，

天目古窑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明袁宏道和陶石簣结伴访游天目山，陶写下了七首诗，袁则写下了六诗二文。陶的两篇《天目山记》中，将天目山的景致和特产概括为七绝，其中说道：“头茶之香者远胜龙井，笋味类绍兴破塘而清远过之，七绝也。”对天目山茶有更高的评价。

天目山为佛教名山，山有好茶、好水，还有好盏，寺院常以茶为助缘，以茶问禅，吃茶悟禅，倡导“禅茶一味”，渐渐形成天目茶道。天目中峰禅师曾示众云：“俗筵以茱萸饮酒，僧舍以茱萸吃茶，理无异辙事同一家。”天目茶道规范的程序有：

起乐、焚香、涤器、汲泉、煮水、赏茶、投茶、洗茶、泡茶、奉茶、闻香、观色、饮茶、问禅、谢茶。

茶道中茶叶、茶水、火候、茶具、环境五德俱美，于是泉清茗香，令人心身愉悦，流连忘返。这种茶道也盛行于民间。

茶叶是临安的“老三宝”之一。“天目青顶”过去叫“天目云雾茶”，被列为贡茶。民国时期，“天目云雾茶”荣获南洋劝业会金质奖章。光绪二十四年（1898）《於潜县志》载：“天目山顶者，曰云雾茶，善消滞，不可多得。”还有黄岭山茶，也被列为贡茶。乾隆二十四年（1759）《临安县志》载：“（黄岭山）每年额贡御茶二十斤。”还有诸多名茶。昌化顺溪大方茶，又称桃枝茶，《十国春秋》七十九卷至八十卷记载，自后梁乾化五年（915）始，吴越国对中原王朝及北宋八次进贡茶叶，其中都有大方茶。於潜金楼茶，明万历七年（1579）《杭州府志》载：“於潜县金楼山，县南二十九里，产茶。”还有“东坑茶”“於潜王茶”“於临烘青”“桐坑茶”“眉茶”等都古今闻名，被列为名茶，曾在国际上获得金奖。

在临安民歌中有多首采茶歌曲，词曲优美，娓娓动听。20世纪50年代，昌化王双凤曾在北京怀仁堂献唱《昌化采茶歌》。

天目山人旧时多饮绿茶。绿茶以谷雨前采摘的一叶一芽或两叶一芽的雨前茶为佳品，称为“旗枪”。当地夏日有饮六月霜茶习惯，用以解暑；冬日饮红糖姜茶，用以驱寒祛湿；春节以糖茶待客。昌化还有冻米茶。

清末民初，临安有望仙阁、一乐天等茶馆，茶客有早起喝茶之习，喝茶听书，有茶博士招待客人。20世纪90年代新型茶楼兴起，有一品阁、闲云堂、润古轩、老残茶楼等，以自助喝茶为主。

旧时，各地设有茶会，多为乐善好施者捐资创办，在主要道路上设若干茶亭，每年农历五月至八月雇村妇烧水泡茶，供行人饮用。茶会有茶会山，有乡绅捐赠，也有孤寡户遗产，用于茶会的日常善举开支，不足部分由理事会摊派。太阳镇现今尚存茶会碑，记录当时茶会的兴办。昌化旧有紫云茶会，始创于清初，由乐善好施的乡绅创办，建立理事会，由乡董（乡长）兼任会长，另设理事若干人，分管各个茶亭。以十里之距设一茶亭。雇工和柴火费用由茶会支付，每月支付一次。新建茶亭多由善人独资或合资建造，至1950年停办。上营施茶会，位于上营将军岭脚，由徐长龄发起，夏秋施茶两月。七里桥茶会，位于昌化西七里桥，光绪二十七年（1901）由谢星源、赵玉华等募建。上博茶亭，位于河桥镇，清道光七年（1827）由程圣言、洪楚材等捐田屋创设。茶亭，位于河桥镇南，由余洋湖等合建，施茶以惠行人。

天目山区还有撒茶叶米一俗。山区农村习俗，茶叶米是镇魔驱邪的圣物。若有蛇窜进屋来，便认为是不祥之兆，除了小心地把蛇驱赶出屋外，还得在门口撒几把茶叶米，似乎茶叶米有镇魔之功，蛇魔再也不会进屋了。这种习俗，至今犹存。

天目山的粽子

2009年版《重修西天目山志》记载，在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以天目命名的竹子有两种，其中就有天目箬竹；国内外采自西天目山植物模式标本的则有阔叶箬竹、浙江柳叶箬、华箬竹、光叶华箬竹四种。

关于箬竹叶和粽子，大家都会想到屈原汨罗江投江自尽的故事。屈原（约前340—约前278），姓辈，名平，字原，战国时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曾官“左徒”。有着出色的才干，但他的政治改革主张始终不能实现，屈原虽忠事楚怀王，却屡遭排挤。怀王死后，楚顷襄王听信了谗言又将屈原流放。在流放途中，屈原走遍了现在湖南、湖北的许多地方，写下了许多充满爱国忧民的诗篇。后来秦军攻破楚都郢城，屈原心里万分痛苦，在汨罗江边，抱起一块石头，纵身投入江里自尽了。屈原死后，人们用竹筒装上米投入江中来祭奠他。相传多年后，有人梦见屈原，见他十分消瘦，便问：我们祭奠你那么多的食物你吃不到吗？屈原说：食物都被鱼虾吃了，你们以后祭奠，可以用箬叶将米饭裹成菱形，鱼虾就不会吃了。于是后来人们就将米饭包裹成粽子投入江中。为了纪念屈原，人们把农历五月初五他死的那天立为一个节日，于是就有了端午节，有了赛龙舟、吃粽子的习俗。梁

吴均《续齐谐记》载：

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而死，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贮米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曲，白日忽见一士人，自云三闾大夫，谓曲曰：“闻君当见祭，甚善。但常年所遗，恒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楝叶塞其上，以彩丝缠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曲依其言。今世人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及五色丝，皆汨罗水之遗风。

裹粽子也是天目山人的重要习俗，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九月初九重阳节、春节这几个节日，天目山区家家都要裹粽子。采山中较大的箬竹叶，放在锅里煮过后，用糯米裹成尖角状，一般采用粽叶丝扎紧，放在锅里煮熟，便可食用。天目山区裹粽子的花样丰富多彩，有横包粽、枕头粽、尖角粽、斧头粽等，还有抱儿粽——大粽子边上包着一只小粽子，子孙粽——三四只小粽子包在一起。天目山区定亲或成婚的女婿要给丈人“送端午”，女儿出嫁第二年，端午节前岳母到女婿家，称“望端午”，其中就有粽子。

清凉峰镇的浪广村有个“粽子节”，由传统习俗演变而来。每年农历二月初二，是土地菩萨的诞辰，家家户户都要包粽子，祭祀土地神，讨个丰年足岁。关于它的来历有这样的传说：很久以前，浪广村灾害不断，民不聊生。有一年二月初二，土地神告诉村民，浪广村节气迟，种植也要往后推，未出苗的土地可以重新种过，这样可保丰收。村民们按土地神所教的方法，每年春季，先帮邻村播完种，然后回村种地，又采用补种的方法，果然连年丰收。村民十分感谢土地神，因“种过”谐音“粽裹”，便以粽（箬）叶裹糯米而成粽子。以后每年农历二月初二，每户人家包粽子供奉土地神，久而久之便成习俗，流传至今。

在龙岗，流传着一个章家太公的故事。古时，有一外地来的章姓

人家，在龙岗汤家湾落脚谋生，靠开山种苞萝（玉米）度日，日子十分艰难。也是时来运转，某天章家汉子在挖山时，无意中发现了不知何人藏的一灰窑银子。夫妻两人花了几个晚上，才将银子担回家中藏好。从此，章家脱离贫困，置田建房，成了当地的大户人家。虽然发了财，但章家汉子始终保持本色，辛勤耕作，勤俭持家，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名望。有一年闹旱灾，南乡人缺粮，便下山到章家借粮。走到汤家湾的前溪时，已是正午时分，一伙人便坐在桥边，剥带来的粽子当中饭吃。桥边有一位衣着破烂的老汉，南乡人也不知道他是谁，等这些南乡人吃完粽子起身上路后，老汉便去捡这伙人的箬皮，一张张仔细察看。南乡一伙人这时已在章家的院子里等候章家主人回来，见到桥边碰到的破烂老头也走进院子，家人喊道：“老爷回来了。”南乡人才知道他就是章家的主人。老头当即给他们打了回票：“你们吃剩的箬皮上有许多糯米粒，恐怕家中不缺粮。只有这一位，箬皮上干干净净的，他家是真的缺粮。我家中没粮可借，仓房中还有几担瘪谷，就送给他吧。”一伙人脸红了，瘪嗒嗒地回南乡，只有那位把箬皮上的米粒吃得干干净净的汉子挑着“瘪谷”回家，其实哪里是瘪谷，都是上等的稻米。这则故事体现了天目山人节约粮食、勤俭持家的理念。

天目山区的习俗，端午节前，新媳妇的娘家人要来女婿家“望端午”，当地戏称“倒撑船”：一年中的四时八节，都是女婿拿着大包小包的礼物到丈人家“望节日”，只有在新婚后的第一个端午节，丈人家反过来给女婿家“望节”。丈母娘家挑来满满的几篮礼物，其中有必不可少的“五子登科”：粽子、桃子、杏子、枣子、扇子。粽子有细沙粽、红豆粽、枣子粽、白米粽，花样百出，有横包粽、枕头粽、尖角粽、斧头粽等，还有抱儿粽、子孙粽，主要是图吉利，讨个彩头。

天目山区还有一则粽子的谜语，谜面是：“青壳田鸡活剥皮，糖砂蘸蘸好食饥。”

有一件奇异之事让天目山的老百姓至今难以忘怀。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全国范围内饥荒连连。那两年，天目

山一带的箬竹都结了子，长出了“箬竹米”，可以食用，许多人依靠这种竹米度过了艰难的岁月。据国内研究竹子的权威、南京林业大学教授周芳纯《中国竹诗词选集》记载：“1960—1962年，正值灾荒之年，浙江天目山区，箬竹大面积开花结实，年产竹米100万—150万千克。”竹子结米，史书上也有记载。《太平广记》载：“唐天复甲子岁，……是年，忽山中竹无巨细，皆放花结子，饥民采之，舂米而食，珍于粳糯。”清康熙十二年（1673）《昌化县志·灾祥》中有记载：“明嘉靖十七年八月，昌化一带竹生穗，结实如小麦，民采食之。”“清顺治十七年冬，昌化一带竹子生实；十八年，饥民采竹实食之。”

洪岭馒头节

洪岭位于湍口镇的东南侧，原为乡建制，居住人口约3000人。每年农历六月初一、初六和十五，这里都要举办馒头节，家家户户都要做馒头、吃馒头，俗称“过半年”。这一天，在外工作的洪岭人都要赶回老家，做馒头、吃馒头、带馒头、送馒头，如同过大年一样热热闹闹。

洪岭有六个村庄，过节的时间都不一样，二联、童家、赤坑三村为六月初一，何家、西川二村为六月初六，柴家村为六月十五，这三个日子被洪岭人视作喜庆日。轮到日子的村庄，家家户户做馒头，以馒头来祭祀天地山神和祖宗，并邀请亲朋好友客人聚会吃馒头。还要送给每个客人12只馒头，寄寓一年12个月平安吉祥之意。哪一家的客人越多，主人则越荣耀。如今的馒头节还增加文艺演出和商贸交易活动，更增添了节日的气氛。

相传馒头节源于北宋年间，为当地小麦收割后感谢神祇品尝丰收成果之俗。逢节日，山民将新麦制成馒头用大篮盛好，敲锣打鼓，抬到田头、地边、山脚、溪旁，祭祀山神、土地、河神等，感谢他们给百姓带来恩惠，并供上馒头。

因为中断数十年后重新恢复，原来的一套祭祀仪式已经模糊。因

为这里与睦州相邻，受时代文化影响，有人认为是洪岭当地老百姓怀念和祭祀方腊，后来从民俗学的角度去追溯，发现与方腊没有任何关系。其时，逢小麦收割，就是为了感谢土地神山公山母的赐予而举行的祭祀活动。包括清凉峰镇的浪广村，每年二月初二举行粽子节，也是祭祀土地神。

馒头节经过了漫长历史进程，馒头的“底蕴”也显得十分深厚。现在，洪岭的家家户户都有“馒头巧手”，馒头的外形和内馅五花八门，什么小猪小狗、瓜果蔬菜，甚至花花草草应有尽有。还做出了“孝心馒头”“爱情馒头”“满月馒头”“祭祀馒头”等各式主题。这时候到洪岭来做客，不是鸡鸭鱼虾，而是馒头宴，桌上摆满色香味形俱全的各种馒头，会让每个赴宴者垂涎欲滴，吃完后，还会再捎上一袋装满馒头的伴手礼。

这些年，镇上还举办了“创意馒头大赛”。此时，巧妇们大展身手，让馒头节成了一场全民体验的饕餮盛宴。

洪岭馒头节现在已经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天目山区一个强烈的文化符号。

天目笋干

“临安老三宝，笋干茶叶山核桃。”天目笋干位列第一，确实名不虚传。

传说，天目笋干是昭明太子萧统不经意间发明的。相传，他曾在天目山隐居，留下了许多遗迹和故事。有一次，他在东天目山见一僧人念《金刚经》，没有分节标点，于是，他便取来经卷，一边煮笋，一边帮着分经。分着分着忘了锅里还煮着笋。灶洞里的火已经熄灭，剩下一点点炭火烤着，锅里的水干了，幸好没有将笋烤焦。等到萧统记起，一锅鲜笋变成了笋干。无心插柳柳成荫，一尝，这笋干别有风味，比鲜笋更胜一筹。从此，天目山就多了两样东西，一样是有了分成32节的《金刚经》，另一样就是鲜美的笋干。至今，东天目山有分经台遗迹，传说就是昭明太子当年分经煮笋之处；笋干则成了天目山山农的一项重要生计。

天目笋干采用石竹笋和红壳笋等焙制而成，肉肥、色绿、质嫩、味鲜、无污染。宋赞宁《笋谱》也有“日干甚，耐久藏”“以备蔬食，尤妙者也”的记载。1992年版《临安县志》记载，民国时期，笋干佳品有“早园凤尖”，产于临目、杨岭、东天目等地，焙制考究，蜷如虾形，色黄亮滋润，味清鲜美。2003年3月，天目笋干通过原产地标记认证。

每年春季，山农一项重要的农活就是拗笋。当令时，笋的生长速

度很快，“三月笋尖出，日夜长数指”，有时差半天工夫笋就老了。在谷雨、立夏前后，山民们纷纷挑着吃、穿、用的物品，登上深山野谷安营扎寨，突击拗制笋干。拗笋用“笋撬”，再用一个三角形的袋子，将拗来的笋从笋袋左右两边塞进去。一袋可以装一二百斤，拗时挂在胸前，运时背在背上。山民一天可拗数百斤，多时甚至达千斤。碰到下雨天也歇不下来，淋得湿漉漉的，便喝几口烧酒解水汽。傍晚便是剥笋烘笋干，有时通宵达旦。为了保证笋干的质量，鲜笋拗下来是不过夜的。大家围着一大堆笋，先用刀削，然后从顶部用手指绕落笋壳。剥好的笋肉用筐装着洗净，倒进大铁锅里煮，每百斤笋肉约加食盐三斤，煮二至三小时后取出沥尽汁水，用炭火烘干。好的笋干又肥又嫩又新鲜，色泽青亮黄润，带玉色，香味浓烈。也有用太阳晒的，吃起来便有日头气。笋干又细分为“焙熄”“扁尖”“肥挺”“小挺”等。烘笋干分三步，第一步将笋干烘至六成干。捞起后第二步将笋干再放入焙笼，盖上棉被而烘，至棉被烫手时进行搓揉，放入筐里，焖一两天。这样制作可使笋干加温均匀，纤维糖化，既保持了笋的清香，又能使笋干口感更加鲜美。第三步是把笋尖剪下，笋尖称为“焙熄”，其余的为笋挺，不剪的则称为“直尖”。笋挺和焙熄分开烘焙和搓揉，笋挺搓成圆形，肥壮的为“肥挺”，较小的为“小挺”。

笋干的包装多用竹篾制成双层小篓，中间垫上干箬叶，一般分三斤或五斤装，这种包装不易泛潮变色，香味长久。

制作笋干的木炭是特制的。山农一般在山边挖一个直径一米，深一米多的大圆洞，将半干燥的柴放在洞里烧，直到用柴将洞装满为止，烧一段时间后将火熄灭即成此种木炭。此炭火性较弱，不易将笋干烘焦。

天目山区旧有民谣《长工怨》，内容涉及拗笋：

太阳下山星满天，东家看我比狗贱。

起早拗笋上峰尖，摸黑砍柴在山涧。

挣得几文汗水钱，还要等到年夜边。

天目笋干主要由石竹笋精制而成，用石竹笋制成的笋干以“清鲜盖世”“甲于果蔬”著称，有青翠、肥嫩、清香、味美的特色。也有用早笋、猴笋、木笋、水笋、红壳笋等制成的笋干。据分析，笋干中也含有蛋白质、脂肪、糖、钙、铁、磷、胡萝卜素及多种维生素成分，有较多的纤维素。北方人称天目笋干为“地参”。

旧时，山民贮存笋干有几种方法：一是放在甕中，揸结实，上面封住口，搁置在干燥阴凉避光之处；二是小包装，放置在石灰缸中。现在居民购置不多，都放在冰箱之中，效果更好。

天目笋干为临安传统名产，主产于天目山周围的西天目、千洪、横路、临目、石门、杨岭、东天目、昌化、白牛等地，统称“天目笋干”，明正德、嘉靖年间即已为人称道。民国三十七年（1948）临安县销售笋干约1000担，於潜县销售笋干约2000担。20世纪90年代笋干生产有较大发展。2000年后，临安建立万亩天目笋竹丰产栽培科技示范基地，进行科学管理，实行标准化生产，全面提高笋干竹产量、质量和经济效益，推动竹子产业化建设，产量和产值居全国之首。太湖源镇临目村天目笋干制作技艺2008年还被列入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天目笋干还有一样非常有名的衍生产品，即笋青豆，产于东、西天目山周边乡村。把笋切成笋丝，加入毛豆，撒上盐、糖、酱油，再添点姜丝、茴香、花椒一类香料，一起烧煮，煮熟后收干汤水，在炉火中烘到八九成干，贮存在瓮里。

清康熙年间（1662—1722），东、西天目寺院香火鼎盛时，寺僧烘制笋青豆以款待香客，后为民间效仿制作。每当夏际，东、西天目山一带村民取优良毛豆，采其嫩荚，剥出豆粒，切入笋丝，加工成笋青豆，以供游人购买。天目笋青豆色泽青翠，易带耐藏，吃起来不软不硬，满口清香，余味无穷。或闲食佐餐，或助酒品茶，深受百姓喜爱，也算是一食俗也。

昌化索面和刀切面

刀切面是昌化的特色饮食，俗称“打刀面”，至今起码已有两百多年历史。

面条寓意“长寿”，昌化人都称为长寿面，习俗中老人做寿、婚宴都会推出刀切面，大年初一早餐也吃刀切面，皆是讨“长寿”“长久”之彩头。

做面条、搨麦馓是昌化农家妇女的拿手活，家家户户灶间里都有粉盆、擀面杖和面板。农家妇女就像玩游戏似的，从和面、打面、切面、煮捞，不到片刻时间，一碗热腾腾的面条就端上来了。你瞧着也是一种艺术的享受。

过去，家中聘用匠人，安排一日五餐，正餐是米饭，正餐之间的点心多为刀切面。现打现煮，爽滑鲜美有嚼头，十分受匠人的欢迎，匠人干活也特别卖力。

旧时客人上门，未到正餐时，主人往往先煮一碗过桥刀切面招待客人，这也成为昌化人的一种待客之道。

后来，昌化刀切面也步入了商业化的模式。民国时期，河桥镇上、昌化城里就有许多刀切面店，现在从昌化上街头到下街头，面店更是增加了数倍。外地游客入乡随俗，常常点一份刀切面，品味昌化人

的美食。不仅如此，现在昌化刀切面已经走出昌化，在於潜、锦城，甚至在杭州，都有昌化刀切面店。

刀切面是一种大众化的食品。在昌化，还有一种高档的面条，那就是“索面”。

索面的制作比较复杂，要经过选料、和面、索面、挂面、熟面、出面、开面、收面等多项程序。每年的10—12月，选择上好的面粉，添加适量食盐，按比例和面，将面团擀成“大圆饼”，切成螺旋形，发酵2—3个小时，索成拇指粗条，一圈圈地盘在竹杖上拉长，放进索面盒，将熟透的面插杖上架，一头插在2米高的木架子上，用手按住另一头竹杖往下扯3—4次，每次间隔10分钟，用竹棍将拉好的面轻轻分开，经过风干晾晒、脱水成型即可收面，往往一帘面要经过十几个小时方才完成。

食时，将索面置于沸水中煮2—3分钟，然后捞起放入汤料中，再过桥式放入精美菜肴即可。

天目山的豆腐

各地的豆腐制品尝过不少，味道还数家乡的豆腐制品最好。现在天目山区酒店、餐馆都会推出天目山的豆制品，尽管跟儿时吃的相差了一截，但每次仍不无得意地把这种价廉物美的佳肴介绍给客人。瞅着这些不起眼的东西，客人先是礼貌地笑笑，待品尝以后，便顾不得吃相，一副大咀大嚼的模样，吃完了还会“讨添头”。

临安与安徽毗邻，这豆制品恐怕是从安徽传过来的。据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载，豆腐是汉代淮南王刘安发明的。刘安（前179—前122），沛郡丰人。他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淮南厉王刘长的儿子，喜好炼丹之道，有八名方士投靠门下帮其炼丹，丹未炼成，却炼出了一炉白花花的琼浆玉液——豆腐花，刘安掀开炉盖，伸出指头蘸了点尝尝，味道还真不错。栽花未活，插柳成荫，豆腐也就大行于世。八名方士由此大贵，被尊为八公。至今淮南市还有道名菜，称为“八公山豆腐”。

另有一则关于豆腐的传说，说的是清乾隆皇帝微服私访到了天目山，偶然闯入一农家。吃腻了山珍海味，农家的一盘菠菜油煎豆腐却让他吃得津津有味。农妇告诉他这道菜名为“金镶白玉板，红嘴绿鹦哥”，乾隆对此大加赞叹。回到京城，让御厨照葫芦画瓢，改名为“乾

隆豆腐”。

前几年去了安徽宏村，让店家上几个特色菜，店家给上了个徽州毛豆腐，味道特别浓烈鲜美，醇正并无臭味，食之让人回味无穷。问起店家，出处还有典故：传说来过昌化大明山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他出身卑微，曾沦为乞丐，几个长工朋友常常偷几块鲜豆腐给他。有一次他出门几天，等他回来，长工给他的豆腐都长了一层白毛，饥不择食的朱元璋把毛豆腐也放进锅里煎了拿来吃。还真怪，这煎过的毛豆腐特别好吃，后来，这种豆腐便成了明朝的宫廷菜肴。这几年，天目山区的宾馆、酒店热衷于推出臭豆腐烧霉苋菜梗，给它取了一个让人吃惊的菜名——“臭味相投”。

有一次，朱元璋途经武义，店家捧出一大钵“豆腐娘”，口味特别好。细细问之，原来是将磨过的豆腐连浆带渣一起烹制的。后来在西天目山，也上来一个叫“小豆腐”的，味道胜过武义的“豆腐娘”，原来家乡还有更好的“豆腐娘”，一问，才知用的料不是黄豆，而是刚剥出来的青豆。

天目山区还有一种米豆腐，制作有点类似黄豆豆腐。将大米浸泡一昼夜，用石磨滴水磨成浆液。在锅水中加上清石灰水，倒入米浆大火烹煮搅拌，面糊呈晶莹透亮时，再以文火焖数分钟，起锅冷却切块，就成了一块块的米豆腐，炒食十分香美可口。

豆腐价廉物美，四季不断，老少咸宜，贫富皆喜。现在大江南北，不论走进哪家餐馆，都不会没有这道菜。豆腐尽管全国都有，但各地的制作方法不尽一致，烹饪手法更是五花八门，慢慢地就形成了各自的地方特色。

昌化农村制作豆腐，很有点全民化的味道。尤其是到了农历年前，便成了乡村的一道特有的风景线。逢此时，家家户户将当年存放下来的新黄豆筛选一遍，用个水桶浸泡透了，去推磨里碾成浆泥。村里的推磨虽然特别多，到这时还得排队轮个先后。磨成浆后就在明堂或者道坦里摆上黄桶，用个苕麻袋洗浆，煮浆点卤，撑起豆腐架子压成豆

腐。而做成豆腐干的则要加压，添上佐料煮上一遍，再用洗切好的稻草或者松毛丝垫上，放在火缸里烘。这几日里，还真像过豆腐节似的，大人脸上漾着笑容，孩子们清晨能喝上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傍晚，还能用根竹丝穿起一串油豆腐，香脆脆的沿街边走边咬，也算是乡村的一份时髦。明代诗人苏雪溪有诗，其中有句：

一轮磨上流琼液，百沸汤中滚雪花。

瓦缶浸来蟾有影，金刀剖破玉无瑕。

这豆腐在诗人的眼里还真是韵味无穷。

在昌化豆制品中，最有味的还数豆腐干。它的形状是独树一帜的小方砖型，放进嘴里有滋有味有嚼头，扑鼻的香气中还带着一股青草味，尤其好闻。

与昌化豆腐干相比，横畈豆腐干则为传统扁平方形，但在内涵上是做足了功夫。它有“方”“鲜”“韧”三个特征，色泽油亮，讨人喜爱，味道鲜中有甘，让人垂涎三尺，尤其受到来往客商和工人、船夫的喜爱。横畈地处临安东北部，历史悠久，曾是重要水陆码头。抗日战争时期，这里又是香粉和食盐的交易中心，人流密集，算得上是临安的重镇。

传说宋代的李清照逃难到横畈，走进一家豆腐店铺。店家见李清照主仆风尘仆仆，知是逃难之人，赶紧捧出一碗豆浆让他们喝了。李清照起身不小心将店家的一筐豆腐干碰落进了正在熬膏汤的锅里，无心插柳柳成荫，豆腐干味道变得特别好。第二天，李清照告辞，为了表示歉意，多付了一锭银子，店家很是感谢，就问客人姓名。李清照指指门外太阳映照下的清清苕溪，便走了。店家心领神会，原来是“洪日昇”，就以此为店号。后来店家知道李清照是大词人，定居在杭州，逢年过节就捎上一筐豆腐干。李清照将豆腐干分给亲朋好友，从此，“横畈洪日昇豆腐干”在杭州出名了。这个故事收录在《中国民间

文学集成·临安县卷》中。

从历史上来看，横畈豆腐干更注重品牌。20世纪30年代，横畈街上带字号的豆腐作坊就有六爿：冯日新、管协昌、贺荣昌、张会金、许中定、童泰。以冯日新水作坊做的豆腐干最有名。50年代，戚太荣继承了冯日新水作坊的传统技艺，做的豆腐干质佳味美，享誉四方。现在从事豆腐干制作的作坊有十余家。在2006年杭州世界休闲博览会中国名茶点评选中获得银奖。2011年，横畈豆腐干制作技艺被列入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天目山区将豆腐干当作果品，逢哪家娶媳妇嫁女，嫁妆中那个新马桶里藏的果子，除了红鸡蛋、生花生，还少不了豆腐干，这风俗在当地是妇孺皆知。由此，孩子们早早地就盯上这只可爱的红马桶，时候一到，便蜂拥而上，抢得一块，不但可享上一份口福，还算是讨上了吉利的彩头。

观音“豆腐”

观音豆腐，又名柴叶豆腐或草灰豆腐。半透明，碧如黛玉，是天目山区春夏时节山民家中常见的一道菜，色香俱佳，爽滑鲜嫩，味道有点野。

说是豆腐，并非以豆制成。其实它是用山上一种最常见的叫“观音树”的灌木的叶子做成。叶子呈墨绿色并散发出一种别样的清香。

为什么称它为观音豆腐呢？当地流传着这样的传说。很久以前，人间发生了饥荒。灾民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连年的饥谨，百姓们只得采野菜、挖草根、剥树皮赖以充饥。观音菩萨见了于心不忍，于是用杨柳枝洒甘露到人间，甘露所到之处长出簇簇绿树。观音娘娘又化作一个白衣农妇，带领男女上山摘取其叶，教授他们取汁做成豆腐，帮灾民熬过饥荒。自此以后每逢春夏秋初，天目山区的老百姓就上山，采此柴叶做成豆腐，就是无灾无荒的年份，也是如此。后来，大家知道了这位农妇就是观音菩萨，于是就将这种豆腐称为“观音豆腐”。

观音豆腐的制作十分简单：从山上采来观音树的叶子，将其洗干净，放在锅里或桶中，倒入开水，不停地搅拌搓揉。待锅里的汤汁有点浓稠后捞出叶子，取一容器，铺上一层比较密的过滤纱布，然后将锅里或桶中的树叶汤汁过滤，取草木灰用棉布包着在清水中洗涤，然

后将洗好的草木灰水倒入叶子浆水中不停地搅拌。待搅拌均匀后让其静置凝固，凝固后的观音豆腐便是食材了。

偶尔在菜市场中也见到有山民出售这种观音豆腐，墨绿墨绿的，像果冻一样柔滑有弹性，并散发着一丝丝异样的清香气，让人十分喜爱。烹调观音豆腐时可多加点油，掺一些红辣椒以及重口味的调料，一起放下锅煮。红绿相间，热腾腾地端上来，顿时让人食欲大开。夹一块放入口中，清新滑口，口感甚好。观音豆腐具有清热、解毒、下火的功效，也算是一道药膳吧。

也有人将其切成薄片，加入红、白糖或薄荷水制成冷饮，这种冷饮也是暑热天时的首选。

还有一种缠树老藤，学名“薜荔”，古人的诗词文章中常常写到，又名“凉粉子”，所结之果称为“木莲”，俗称“老鸦馒头”，形似柿子，又似窝窝头。采来将其洗净后切开，用纱布裹着，挤出里面的稠汁，加上凉开水，搅拌均匀，凝固后状如透明的豆腐，放上些许蜂蜜，乃是上等的饮品，天目山人管它叫“凉豆腐”。

六

婚育、寿庆
和丧葬习俗



洞天花烛与婚仪

明代李昌祺的《剪灯余话》有一篇《洞天花烛记》，是一篇带着神话色彩的传奇，写的是天目山秀才文信美为华阳洞主嫁女充当文书代笔的一段经历。故事梗概如下：

元时，於潜秀才文信美偶然出游，遇有二使，说是华阳洞主相邀。文秀才推辞：“信美乃天目山粗鄙之人，怎敢上神仙洞府造次。”

二使道：“车乘已备，不要谦让！”

文信美上一竹轿，如飞而去，顷刻即至，华阳洞主来迎：“承蒙大驾光临。女儿十五，与太湖主之二公子联姻，佳期将近，回书未得人，久仰名士，特此攀迓。”

洞主所托，文信美文思如涌，即刻挥毫而就。洞主读罢，称叹再三，遂留信美参加婚礼。

至日骈集，车马旗麾，盛况空前。灯烛辉煌，笙歌嘹亮。新婿及门，群从起迎。忽内间传命，急索催妆诗。新婿转托，信美代之为诗：

玉镜台前弹绿鬟，象牙梳滑坠床间。

宝钗金凤都簪遍，早出红罗绣幔看。

十八鬟多气力娇，妆成不觉夜迢迢。

风流自有张生笔，留取双眉见后描。

读了诗文，众皆喝彩。时见红妆百队，画烛两行，箫管喧阗，香风淡荡。新人入洞房合卺。执事者忘带撒帐文，左右失色。婿请信美立撰，顷刻，文已成就。于是从容闲雅，抑扬高下，吟诵完毕。

须臾，婿赠冰绢二匹、明珠二颗，信美拜受。

应洞主相邀，信美又献《洞天花烛诗》，众宾传玩，咸赞瑰奇。

第二日洞主特待新婿，请信美陪席。酒三巡，捧红罗二端、文锦二匹为谢。宴终遣二使送回天目於潜。还家，家人惊怪。於潜人谓遇仙文氏，至今称之不绝。

此文中略述了婚礼的程序，与天目山区习俗基本契合。也许李昌祺曾经在天目山区居住过，他笔下的主人公文秀才当年或是一位天目山区的婚礼司仪，否则，复杂的婚礼文案怎能信手拈来呢？

天目山区的婚俗，旧时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大多由父母包办，讲门当户对，如同《洞天花烛记》中的华阳洞主和太湖主一般。另有同姓禁婚、姑表不忌的规矩。担任媒妁的多为中老年妇女，俗称“媒婆”，为双方游说撮合，成婚后男女双方要谢媒。宋吴自牧《梦粱录》：“婚娶之法，先凭媒氏，以草帖子通于男家。男家以草帖问卜，或祷签，得吉无克，方回草帖。亦卜吉媒氏通音，然后过细帖，又谓‘定帖’。”这几十年来父母包办的习俗已经很少，讲的是自由恋爱。20世纪80年代后，还有各种婚介机构出现，形式是五花八门。

旧时，男女双方父母瞧对眼了，接着就是“合肖”订婚。余烈编纂的《於潜县志》：“即‘担八字’，担女方之八字送往男方也。”如生肖相合，即须互相送帖。生肖不合则“犯冲”，相差六岁称“大六冲”，忌婚配。当然到了现代，生肖相冲之说已经淡出了。

接着是订婚。订婚吉日由女方拣送，结婚之日则由男方择定。男方择日称“发盘”，发盘有头盘、二盘、三盘之分。男方向女方送择订婚日的帖子时为“头盘”，须随送荔枝、桂圆、核桃、红枣、莲子和

头盘彩礼。头盘送达后，即向女方“问庚”，即请问女方生日时辰。男方回家请星相家挑八字，拣吉日。此后，男方请先生择定“安床”和“合卺”时辰，并发出第二盘，主要送彩礼，用于女方置办嫁妆，也有将“头盘”“二盘”一起送达的。现今一般称送喜帖，女方则有像文秀才代笔的回书。结婚前夕，男家须送第三盘彩礼，用于女方置办喜酒。昌化地区称“挑四喜箩担”，又称“挑青布袋”，此风也渐淡。

婚俗中最重要的就是婚礼了，天目山区的婚礼虽无《洞天花烛记》之高贵典雅，却也很讲究。

旧时结婚前一日，男女新人均须祀神祭祖，女子出嫁要乘花轿。於潜有谚：“不来（是）抱来咯，不来（是）走来咯，花花轿子抬来咯。”旧时天目山女子以乘花轿为荣。男家发轿时，新郎身穿吉服至门口向花轿作三大揖，以示“送轿”。轿前往往有对锣、铙手、吹鼓手，后有行郎手执各种灯伞与乐队随行。女家有“哭轿”习俗，以表惜别。发轿前，男家不时狂敲大锣，以催促新娘上轿。新娘上轿前要进上轿饭，叩别祖宗，辞别父母亲友，扎“兜脚绸”，为免带走娘家财运。

铺新婚床也是蛮讲究的。新婚前夜邀请本族中一对子女多、福气好、结人缘、家业旺的夫妻为新郎新娘铺新婚床。旧时新床先铺干洁的新早稻草，寓早得贵子；然后铺上新床席，垫上新棉胎，罩上新床单，放上一对新枕头，以茭白秆草作枕芯，寓白头偕老。新枕头上放大红绸缎棉被毯子，寓生活红红火火，幸福美满。撑好帐子，寓长子传宗接代，创家立业。在枕头下面放一个红纸包，祝新夫妻和睦美满。夜深人静后，男方母亲会在新床的帐顶上压一个晒谷匾，垫被上放一个包袱，意为媳妇过门后扁扁服服，顺从婆婆。新婚之日新娘进门后，伴娘会先行检查，掀掉这两件物品，让新娘坐上床。

新娘穿红罗大袖衣，戴花冠，由兄弟抱入花轿并挽轿送出大门，其母在房内吟唱《哭嫁调》。新娘上轿前要在自己闺房化妆、梳头、洗脸、开脸（即用麻线勒去脸上细汗毛）。昌化一带新娘化妆的房中放一团箕，团箕上放一斗桶，斗桶口朝下，新娘坐在团箕内的斗桶上，化

妆时不能走出团箕，以防新鞋着地带走娘家财运。

花轿及嫁妆循原路吹吹打打至男家，男家出门恭迎，并须放铙奏乐。夫家在大门口要放一镜一筛，为镇邪之物，怕新娘子路上沾邪气，下轿时要用镜子照，再从筛子四周转三圈，把邪气除掉，然后进门。女方嫁妆中必有子孙桶，即为红漆的两只脚盆和一只马桶，陪嫁时，女方在马桶内放子孙饭一小碗、红包一个。男方迎亲，一般由小叔担子孙桶，放在新房内，小叔取出桶中的子孙饭，收下小红包，还要往马桶里撒一泡尿。新娘下轿后，有一男子（须三代齐全）背着新娘从袋袋相接的麻袋上走进大门，意为代代相传。在新娘进门踏袋时，副司仪唱起结婚传代词：

一袋传一袋，新新娘子脚踏凤凰袋；新新娘子新新郎，一双金花插在百子堂。百子堂上出贵子，贵子之中出了状元郎。一代传二代，找架麒麟送子袋；张仙送子到堂上，代代儿孙尽奇才。二代传三代，魁星提笔点元来。名标金榜上，福禄一齐来。三代传四代，天官赐福把门开；门前流水长长在，祝愿君王万万载。四代传五代，五子登科一齐来；儿孙个个高官做，个个儿孙俱全才。五代传六代，六部大人送礼来；送给新娘一贵子，天上麻姑赐酒来。六代传七代，七仙女下凡来；七仙仙女送太子，太子登基国运泰。七代传八代，八仙过海显奇才；辈辈都有雄才出，金子银子滚滚来。八代传九代，九世同居满堂开；九代传十代，荣华富贵一齐来。好一对鸳鸯进绣房，房内房外都恭喜，恭喜新娘新郎福寿长。方巾挑起，公婆欢喜；方巾上床，子孙满堂。

这些唱词在每一个司仪口中略有不同，司仪会随机应变做添加或变换。这时，新娘由喜娘、陪花姑娘陪着，跟着唱词，在鞭炮鼓乐声中进入大门。旧时，新郎新娘要在“新贵人登堂”声中，向厅堂内拜“福禄寿”三星，向外拜天地，司仪读“祝词”，现已简化。进门后，

堂上已摆好香烛，男方伴郎带新郎出堂，新郎父母坐在中堂。司仪宣布婚礼开始，新郎新娘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于是，喜娘将一条红绸交给新郎新娘各一头，新郎牵引新娘，喜娘和童男童女提着子孙灯笼引路，陪花姑娘和伴郎随后，进入新房。

婚宴也是婚礼的重要项目。男女双方均要大办喜酒，宴请宾客。女方办午宴，称“女酒”，邀女方亲友赴宴。男方办晚宴，称“男酒”。

宾客座席排列也有定规：女方午宴，大手一桌舅母坐主席，随后是娘舅和父母长辈；男方晚宴，大手一桌娘舅坐主席，随后是舅母和父母长辈。不论男方女方，如果娘舅、舅母多，都以老大坐主席。

旧时席间新郎须向尊长、宾客一一敬酒，现在则是新郎新娘一起敬。男女双方宾客到婚宴贺喜，均须送礼。旧时，山区女方送礼叫“送嫁”，一般不送钱，送的是鸡蛋、豆腐干、干果（山核桃、花生、红枣之类）、糕饼、手巾、袜子、鞋子之类；男方送礼，娘舅和其他至亲要送对联和轴子，写上祝贺的词句，多数送绸、布被面。乡亲们送几元钱，礼品交给账房登记。

世居天目山一带的畲族，婚礼上有一唱的特色。如新郎需要筷子，则要唱《筷子歌》：

各种酒菜摆上来，唯独不见两根柴。

口水一直往下流，不知有筷没有筷。

梳妆打扮后的新娘，在离开娘家前，要到厅堂中间“溜筷子”和吃“千斤饭”。这时，桌面上放着两把筷子、一碗碗饭。新娘一手拿起一把筷子，交叉着递给站在身后的哥哥，哥哥接筷后，从新娘的腋下把筷子放回到桌上。然后，新娘低头弯腰把那碗饭衔上三口，吐在桌上的手帕里，由哥哥包好手帕，装进新娘衣袋，带到夫家。据说，新娘带去千斤饭之后，年年都能养一只千斤重的肥猪。

旧时新房还有撒帐礼仪，撒帐在于祝子，是戏谑坐在婚床帐中的

新郎新娘，对新郎新娘及婚床的各个方向抛撒五谷或各类果子，如枣子、栗子、花生、桂圆、荔枝、核桃、莲子等。枣子、栗子、花生、桂圆谐“早生贵子”，桂圆还有“富贵圆满”之意，莲子则含“连生贵子”，荔枝谐音“利子”，都与祝生有关。

撒帐时是有唱词的。《洞天花烛记》中文秀才临时创作的撒帐文十分典雅：

伏以氤氲未判，固溟滓之无形；清浊既分，便刚柔之有对。粤从开辟之始，已生配匹之名，至道所存，大婚尤谨。恭维震泽新婿郎君，华阳元姬淑女，早钟间气，夙孕真姿。礼乐文章，端可作吴彩鸾之倩；功容言德，允宜为王君迥之妻。绯桃自泛于灵源，红叶肯题于流水。天作之合，神相其成。惟化工不离于阴阳，而道妙造端乎夫妇。曲房窈窕，罗帏翠被郁金香；盛服辉光，火浣单衣绣方领。揭盖露珠冠之饰，交杯互玉斝之尝。锦褥平铺，软衬金莲之袜；黛螺浓染，轻描偃月之眉。二姓百年，一双两好。燕婉既谐于伉俪，绸缪宜合于瑟琴。于以采蘋，于以采芣，克谨烝尝之荐；载弄之璋，载弄之瓦，行膺莞簞之祥。合欢诂让于名花？并蒂宛同于奇果。嘒嘒似朝阳之风，嚶嚶类春渚之鸿。响动帟屏，幔蹙龙鳞之轻细；梦回鸳枕，口含鸡舌之芳馨。奇逢已遂于结褵，善颂更陈于撒帐。请歌词语，庸助欢声。

撒帐东，罗帏绣幕围春风（唐 李贺）。红绽樱桃含白雪（唐 李商隐），元精耿耿贯当中（唐 李贺）。

撒帐西，歌舞留人月易低（唐 储光羲）。惊起芙蓉睡新足（唐 李贺），倚风晴态被春迷（唐 雍陶）。

撒帐南，新人轿上着春衫（唐 李商隐）。云髻半偏新睡觉（唐 白居易），断肠春色在江南（五代 韦庄）。

撒帐北，云楼半开壁斜白（唐 李贺）。小语低声问玉郎（唐 裴谱），春色恼人眠不得（宋王 安石）。

撒帐上，两两红妆笑相向（唐 崔颢）。淡云轻雨拂高唐（唐 李商隐），睡觉不知新月上（唐 陆龟蒙）。

撒帐下，满山明月东风夜（唐 韩偓）。冰簟银床梦不成（唐 温庭筠），美酒清歌曲房下（唐 李颀）。

伏愿撒帐之后，姑蟑交庆，家室攸宜。一掬琼浆，谩说裴航之奇遇；五双白璧，可知雍伯之阴功。纵石烂而海枯，谅天长而地久。螽斯秩秩，麟趾振振！

这篇撒帐文多为祝福新婚燕尔，用的多是唐宋诗人的名句。而天目山区常常使用的撒帐文会粗鄙一些，并带上祝子的内容，随司仪临场发挥，有时是东西南北中，有时会增加上下前后等。

闹房时常常会百无禁忌。但受礼仪影响，没有太过出格。新郎新娘入寝后还有“听房”习俗。

新婚第二天，新娘一般会带着新郎和送亲来的“新舅舅”、陪花姑娘一起回娘家省亲，俗称“回门”。这一天是原轿而来，原轿而回，不能在娘家过夜，新娘和新郎在女方娘家吃完中饭稍事休息后就回夫家。结婚满一个月，娘家父母要带着馒头、粽子、鸡蛋（或毛鸡）到女儿女婿家，然后女儿随父母回娘家省亲过夜。宋吴自牧《梦粱录》：“至一月，女家送弥月礼合，婿家开筵，延款亲家及亲眷，谓之‘贺满月会亲’。自此礼仪相简。遇节序，两亲互送节仪。若士庶百姓之家，贫富不等，亦宜随家丰俭，却不拘此礼。”

聊斋故事和特殊婚俗

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一篇《细侯》，记载了昌化满生和细侯的一段爱情故事。

昌化满生，在余杭设私塾教书。偶涉廛市，经一阁，有荔壳落肩头。抬头一看，见一雏姬倚阁上，姿色俏丽，引得他内心狂乱，一打听，知道是娼楼贾氏的女儿细侯。其名声身价颇高，满生知道很难实现自己的心愿。回到书斋，苦思冥想，整夜不能入睡。第二天，他到贾氏妓院，送上名帖，与细侯见了面，言笑甚欢，心更迷恋。便借贷银子，去见细侯，两人极为融洽。枕上口占一绝赠之：

膏腻铜盘夜未央，床头小语麝兰香。

新鬟明日重妆凤，无复行云梦楚王。

细侯蹙然说：“妾虽污贱，却总是希望能嫁一位知心之人。君既尚未娶妻，看我能嫁给你吗？”

满生大为喜悦，两人立了山盟海誓。

细侯也很高兴，说：“诗词吟咏，自道无难，于无人处，常想试试。但又怕做不好，为人讥笑。如得相从，能指教于我。”

又问满生：“你昌化老家有多少田产？”

满生答道：“薄田半顷，破屋数椽而已。”

细侯说：“妾嫁君后，当长相守，你不必再设私塾。四十亩聊足自给，十亩可以种桑，织五匹绢，缴纳太平之税有余。关门相对，君读妾织，空暇时诗酒相娱，那千户侯又有什么可羡慕的？”

满生问：“卿身价大略多少？”

细侯说：“最多不过二百金。可惜妾年轻，不重钱财，有点钱都交给母亲，私蓄之钱无多。君能筹集百两银子，就不用担心了。”

满生说：“像我这么落寞，你是知道的，一百两银子怎能办到呢？但我有个挚友在湖南当县令，屡次相召，因路途遥远未成行，今为卿故当往谋之。约三四个月，可以归复，希望耐心相候。”

细侯应诺。

满生当即放弃私塾教学去了湖南，不料挚友已被免官，居住在民房，钱袋空空，无法馈赠他。满生落魄难返，就在当地教书度日。三年仍不能回。一次满生偶尔惩戒弟子，弟子自溺而死。东翁痛惜孩子，将其告诉官府，因此被捕入狱。幸亏有其他弟子可怜老师没有过错，时常给他送去衣食等物，因而没有特别受苦。

细侯自从与满生相别之后，闭门不接待任何客人。贾氏问知缘故，无法夺其心志，只好听任于她。有个富商，久慕细侯之名，托媒人致意贾氏，不惜代价定要娶到细侯。细侯不同意。富商因为经商到湖南，打探满生的消息。此时满生之案将了，富商以钱贿赂当地的官吏，让他久囚满生。

富商回来告诉贾氏：“满生在狱中病死了。”

细侯怀疑其信不确实。

贾氏说：“不用说满生已经死了；即使未死，与其跟着穷酸一辈子贫苦，何如穿绫罗绸缎、吃山珍海味呢？”

细侯说：“满生虽贫，其人品却是高尚的；跟着肮脏商人，实在不是我所愿。况且路人传言，怎能轻信呢！”

富商又转嘱另一商人，假作一篇满生的绝命书寄给细侯，以绝其望。细侯接到书信后，从早到晚只是哀哭。

贾氏说：“我自幼对你抚育教养，你成人才二三年，能得报恩的日子不多。你既不愿系于乐籍，又不肯出嫁，怎么来谋生呢？”

细侯不得已，只好嫁了富商。富商供给细侯极为丰侈的衣服、簪环。过了一年多，细侯生一男孩。

不久，满生得到弟子们的帮助，获昭雪释放。这时才知道是富商做的手脚，然而反复思想与富商素来无仇，不明其由。弟子们捐钱帮助他回到余杭，闻细侯已嫁，心中十分痛苦。于是把自己的苦情，托卖浆的老妇转达细侯。细侯大悲，方才明白以前种种的事端，都是富商的阴谋诡计。趁富商出门，杀了怀抱中的孩子，携带自己的所有，投奔到昌化满生家中，凡富商给的衣物首饰，一无所取。富商回家，愤怒地将细侯告到官府。官府弄清事情真相，不予审理。

以上是蒲公《细侯》的故事。这故事不可能是全真，也不可能是全假，猜测就是一个半真半假的故事，是根据昌化满生和细侯的遭遇加以创作的。

在天目山区，旧时还有一些特殊的婚俗。

一是冲喜，又称霍亲，往往是男方本人或其父母病危，以冲喜之名，举行“霍亲”婚礼，将媳妇提前迎进门，显然带着浓烈的迷信色彩。有的女孩刚过门，喜未到，丈夫死了，新娘子立即成了寡妇，不免令人唏嘘。

二是典妻，山区有无力娶妻之男，典租家境困难者之妻，双方立契，典租期所生儿女归典夫。将妇女视作资财，随意遣送。

三是一妻多妾，妻子之外，还有小老婆。多为富裕人家，在天目山区比较少见。

四是赘婿，即“倒插门”，所生长子必须从女家姓，天目山区还是比较多的，《洞天花烛记》中记载的仿佛是一场招赘的婚礼。

五是冥婚，两家为未婚早逝的儿女配亲，也有定亲、行聘、迎娶、

圆房等婚礼的过程，并将男女棺木移葬一起。此俗在天目山区虽有听闻，但很少有人亲见。

六是再婚，旧时，已订婚女子若婚前亡故，女方不需退还彩礼，男方亦不会索还。若男方于婚前亡故，未婚妻须与其“木主”成婚，仍要过门守节。若转嫁，女家须将彩礼如数退还男家，换回允帖。男子丧偶续娶称“续弦”，后妻称“填房”。丧偶寡妇若再嫁，不鸣锣，不放爆竹，不坐花轿，须侧身出门，不准回头。随嫁子女被贬称“拖油瓶”。若寡妇与亡夫已自立门户，且有子者，可“招夫养子”。

最后一种是童养媳，旧时比较多见。童养媳往往受公婆、丈夫虐待，受小姑欺凌。笔者曾有一位长辈同事，还是髫年时被卖给人家做童养媳，吃尽苦头。新中国成立后终于冲出了牢笼。她向我说起那一段经历时，常常掉下一大把眼泪。

生育习俗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在天目山区，妇女生育叫“做舍姆”，妇女生育的房间叫暗房。女子分娩之月，俗称“落月”“坐月子”。

重男轻女，这在天目山区也是十分严重，即使到了现代社会，这种观念仍是挥之不去。无论是夫家还是娘家，多希望生男孩，现在好多了。于是，娘家在女儿分娩前，送婴儿所需衣帽食物等，其中帽子多为“虎头帽”“兔儿帽”，有祝祷生男孩的意思。

旧时妇女一般在家生产，临盆分娩时将接生婆请至家中待产。接生婆接生方式不卫生，常致产妇与婴儿发病或死亡，有“一只脚踏红脚盆，一只脚踏棺材板”之谚，现已无此虞。

暗房仅为服侍产妇出入，男性不得入内。产后一月之内，母亲和婆母亦不入内，以免不吉。旧时视产房为不洁之地，产妇衣裤为不洁之物，人多避之。婴儿出生三天，谓之三朝，要请接生婆帮婴儿洗澡，用开水倒入朱漆木盘中，放入艾叶或柏树叶，待水温适宜，为婴儿全身沐浴，也有用桃根汤洗浴的。孙思邈：“儿生三日，宜用桃根汤浴。”桃根汤是用桃树根、李树根、梅树根各二两，用水煮沸，去渣，用以洗浴，能够“去不祥，令儿终身无疮疥”。家人还要备糯米汤团、馄饨、茶水，点上香烛，上供灶司菩萨，祈求孩子健康平安，俗称

“三朝糯米汤团”，或称“三朝馄饨”。旧时还有办“三朝酒”，分送红鸡蛋、荔枝、桂圆、核桃、红枣等，远亲近邻都要上门吃酒、送贺礼。娘家亲友看望产妇和婴儿，所带礼品多为米面、鸡蛋、红糖等，称为“望舍姆娘”，其他亲友所送食物，称为“舍姆羹”。现今这一套都已从简，多以礼金替代。婴儿生下后，吃第一口母奶，叫开口奶。吃开口奶前，用温开水将奶头洗净、消毒。先用大黄或犀黄开口，让孩子肚里胎毒泻掉（孩子长大后少生疮毒），然后喂第一口母奶。

旧时，天目山区给孩子取名，往往在给婴儿算命后，据婴儿生辰四柱八字推算其金木水火土五行所缺，在名字中补上，以保其一生平安。旧时山区还以为贱名易养，取名“阿狗”“阿猫”“讨饭”等，为数不少。

满月是新生儿的重要日子，在天目山区，要给孩子做“满月”，这一天要“洗儿”和“落胎发”。

天目山区旧时一般要给新生儿洗浴。宋吴自牧《梦粱录》载：“至满月，则外家以彩画钱或金银钱杂果，及送彩缎珠翠角儿食物等，其家大展‘洗儿会’。亲朋俱集，煎香汤于银盆内，下洗儿果彩钱等，仍用色彩绕盆，谓之‘围盆红’。尊长以金银钗搅水，名曰‘搅盆钗’。亲宾亦以金钱银钗撒于盆中，谓之‘添盆’。盆内有立枣儿，少年妇争取而食之，以为生男之征。”

“落胎发”俗称“剃满月头”。选吉时由新生儿母亲的娘家人主持，布置礼堂，请全福人（父母、配偶、子女全有的人）抱婴儿坐在礼堂中央，剃头匠以白酒代水为婴儿润发，剃去囟门四周胎发，俗称“瓦片头”，有的还在脑后留鸭屁股形或桃形发式的，以期小儿易养。剃下来的胎发也不能随便丢掉，有的地方会把剃下来的头发搓成一团，装在母亲娘家人送的用金丝或银丝打的金银小盒中，挂在床前；有的地方则由新生儿的妈妈或奶奶用红纸将头发包好，珍藏起来。据说胎发对新生儿非常重要，一旦丢失，就会使新生儿罹病或夭亡。

这一天，天目山区人家还在糯米粉里放少量红糖，做成各种动物

形状，叫“犷糊”，然后分给邻居小朋友，以示日后长大在一起要和和气气。

满月后，孩子全身用袍裙裹着，头戴风斗帽，可抱出外兜风，让邻舍张望，邻舍见了要说吉利话。还有办满月酒的，邀亲朋好友聚会。

生子百日，亦开筵作庆。

小孩满一周岁时，天目山区有择吉时“挪周”习俗，也称“抓周”，测试孩子胆智力和前程。家人点香焚烛，祀神祭祖后，于桌上置盘，盘中摆放文房书籍、释道经卷、秤尺刀剪、升斗戥子、彩缎花朵、女工针线等，让婴儿任意抓拿，以婴儿先拈之物，判断日后孩子的发展。

该日多办“周酒”，邀亲友庆贺。还有做成糯米豆沙粉果分赠大家，称“挪周果”。

逢小孩晚上吵闹，或多病等，选合生肖的人寄拜干亲以趋吉。干儿（女）称呼寄拜父母为亲爸亲娘，说合后准备好一桌酒菜，用篮担挑到亲爸亲娘家，焚香点烛祭祖，说明某某某从今开始寄拜给某某某为干儿（女），望上代祖宗保佑，并放爆竹。亲爸亲娘给干儿（女）一根腰带、一只碗，用红纸写上干儿（女）名字和自己子女的名字，交给干儿（女）带回家贴在堂前上方，意在告知本家祖先。日后每年春节、端午、中秋节都要到亲爸亲娘家送礼，亲爸亲娘也回礼。也有寄拜给大树、大岩石、古桥、宝塔等做干儿子的，在红纸上写明某某某寄拜给某某某为干儿子，名字相应要带木、石、桥等，贴在其上，叩拜并以香烛酒菜供奉，仪式结束烧纸钱放炮仗。之后每年正月初一要到该处祭拜。

儿童到了换牙时，按天目山区的习俗，掉下来的牙齿，上牙要埋在土里或者将其扔到低洼处，下牙则要扔到屋顶上。扔时双脚并拢，说这样新牙才能长好，不会歪，也不会蛀。

山区生育种种习俗，可见其养儿不易。

彭祖的传说和寿庆习俗

寿列五福之首，最受人看重。

在天目山区也有许多长寿的传说。曾经来过龙塘山和千顷塘的宝掌和尚，相传活了一千多岁，佛教界称他为千岁宝掌。康熙十二年（1673）《昌化县志》记载：“宝掌和尚，中印度人。……谓众曰：‘吾有愿住世千岁，今年六百二十有六。’故以千岁称之。”天目山有一位徐仙姑，说是晋代大、小徐五真人的妹妹，虽然已有数百岁，但看上去如同二十四五岁的人，体态轻盈，容貌姣好。康熙十四年（1675）《临安县志》中有其传：“徐仙姑，徐五真人之妹，隐天目山北。有石庵与深坑相邻，形若道家轮藏，中有石柱，四面环空，姑于此成道，冲云而去。”还有一位曾在天目山修行的道士张三丰，传说他活了二百五十多岁。

在青山湖北畔八百里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

大约在商纣王的时候，彭祖到了八百里隐居。那时他已经活了七百多岁，看上去还是像个五六十岁的人，身手矫健，力大如牛，当时在朝野都传为奇谈。商纣王听到彭祖有此长寿异术，立即派采女来寻找。

采女是商纣王身边的一个女卿，少年得道，那时也已二百七十多

岁。采女身受王命，来到天目山，用了一个奇特的办法来寻找彭祖。

彭祖追求恬淡安宁的生活，终日练功养生，深居简出。这一日从天目山采药回来，路过一条溪，看见一位妇女正在溪中一条竹筏上洗着什么。走到桥上一看，竟是在洗炭，此时一湾溪水已经变黑，一条竹筏也成了乌排。彭祖看了十分惊异，菜可以洗，衣服可以洗，这炭怎么可以洗？不是越洗越脏吗？看那妇女十分认真的样子，彭祖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我彭祖活到八百岁，还没见到过有人洗过炭。”

那妇女一听，纳头便拜，说：“你就是彭祖，我找得你好苦！”原来这个洗炭女就是采女，这洗炭的计谋挺管用，真的把彭祖找到了。

采女就把来意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彭祖。彭祖见她一片诚意，也就把养生的一套秘诀传授给了她。取到了真经，采女高高兴兴地回去向商纣王复命了。

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满村子里的人知道了，就把溪上之桥叫作“洗炭桥”，把那条溪水流过的山垅叫作“乌排垅”，八百里的地名也是因为彭祖活了八百岁而来。

这些传说都带有神话色彩。

现在这里有一座八百里养生园，恢复了彭祖墓和彭祖祠。21世纪初从外地移来一座古建筑，作为彭祖祠。

下面聊聊天目山区的寿庆习俗。天目山旧俗认为，人以三十六岁为“本寿”。民谚云“三十要做，四十要错”，即三十岁可做寿，而四十岁则不做，因“四”与“死”谐音，不吉。境内有“男做九，女做十”之俗。父母从四十九岁或五十岁起，均由儿孙为其做寿，包括送寿礼、拜寿、办寿宴等。寿庆只可提前，不能在生辰后举办，大多于生辰当年正月送寿礼。须以红纸剪出“寿”字置粘于寿礼之上。寿礼大多为烛、面、糕、酒、馒头、联、轴、屏、画等，其中必备寿桃。女儿礼品中须有一双亲手做的布鞋。旧时寿礼都用竹制簟箩盛放，有桂圆、荔枝、麻酥糕、砂糖等果子包，有鸡蛋、索面等，礼品上压红纸和柏树枝，用红扁担挑去。

寿者堂中八仙桌披桌围，摆香炉烛台、四盘果子、两个桃形寿饽和酒，中堂挂画轴寿联。寿者穿吉服、坐中堂，受晚辈跪拜及亲友祝颂，长子代表小辈敬酒，大家分吃寿饽和糕饼果子，鸣放爆竹。富裕人家还请戏班演出寿戏。

寿酒由儿孙为父母操办，寿者坐主席，老伴相陪，其余按辈分落座；落座后，行郎端上长面线，昌化人称索面，象征长寿，由寿者先吃，然后大家拿筷子将面条捞到自己碗里吃，捞食时不能夹断。端上猪蹄，象征强健，也是寿者先吃，然后大家才能吃。吃完猪蹄后，大家向寿者敬甜酒。敬酒后，宾客可随意喝酒吃饭，及至散席。今寿庆礼仪已简化，无须跪拜，送礼大多为烟、酒、补品等，寿宴也多在酒店里举行。

除了逢十，父母六十三岁生日，女儿要买一条活鲤鱼相送，有谚“年纪六十三，鲤鱼跳过滩”。民俗中认为六十三岁是个关口，跳过此关，就能活到更大年纪。送鱼时活鲤鱼要从大门外用双手抱进厅堂，然后拿进厨房。还有六十六岁生日，其女或侄女辈须送六十六块拇指大小的肉，有谚“六十六，阎罗王请吃肉”，如果小辈给父母吃过肉了，阎王就不来叫了，有避凶趋吉之意。

旧时还有男49岁起遇生日躲避进深山或庙宇内，意为使阎王找不到，称“避寿”，该俗今已消亡。

丧葬习俗

生老病死，人之必经，而丧葬习俗也是地方习俗中的重头戏。传统习俗讲“五福”，“五福”是什么？《书经·洪范》：“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这第五福，就是“好死”，就是寿终正寝，人生一世福分如何，这也是一条重要的标准。

天目山人对人之死也是十分看重，受佛道以及鬼神信仰的影响，丧葬礼仪中带着浓烈的佛道文化色彩。光绪二十四年（1898）《於潜县志》中也说：“（於潜）笃信巫鬼，丧葬多用佛老。”这一倾向代表了整个天目山区。

丧葬习俗是从送终开始的，天目山人将亲子送终视作福气。老人将逝时，如长子未到，家人要让其喝参汤“吊命”，子女轮流日夜守护。弥留或逝世后，为其洗身换衣。逝时亲人手持清香相送，然后点烛烧纸，谓之“送终”。旧时，在断气后，要撕破一孔窗纸，称为“放丧气”，并以丝绵、纱布覆盖其脸。家人竭呼其名，称作“叫魂”。人故后，由长子、幼儿分别捧逝者头脚，将遗体移至灵堂门板之上，床板前挂白色幔帐。逝者脚跟点“长明灯”。子女至亲披麻戴孝，环坐守候，谓“守灵”。有的地方要给死者手里握一只用苡麦面捏的棒，称“打狗棒”。有的要在门口挂倒头纸，纸张数比死者年龄多两张，意为

天地各一。

接下来即遣人向亲友报丧。旧俗，报丧者右手倒挟雨伞，俗称“报丧伞”。至亲友家，进屋前将伞柄朝下放于门外，亲友应请报丧者吃糖余蛋，称“报丧蛋”，蛋成单数，一般为三只。报丧者报毕出门要慌忙挟伞前行，受报者会将一只瓷碗紧跟其后摔去，意为解除晦气。女儿奔丧要大哭进门。儿女要为死者报知来吊唁者亲属称呼与姓名，报知一回应恸哭一回。

下一步是入殓，俗称“进棺”。旧时，长者往往早早准备棺材，存置在祠堂或闲屋里，禁忌移动，传移动棺材会使其家遭殃。死者一般停尸三日，择单日入殓。入殓不能超过晚上子时，否则要等到第三天。入殓要由阴阳先生择定吉日吉时。入殓前要拜门神，意为求死者亡灵日后仍可进入家门。入殓前在棺材底部放置木炭、石灰之类，以保持干燥。请人给死者整容，让死者口中含上一块银洋（后用硬币代替），手中握银角，用丝绵包住头、手和脚，穿好寿衣（上七层衣，下五层裤，也可上五层衣，下三层裤）。时辰一到，由长子捧头、次子（或女婿）捧脚，移至棺内。由仵作（亦称“材夫”）垫正头部，然后剪开脸部丝绵，谓之“开脸”，将丝绵放置于死者生前心爱之物或亲人送的随葬品中。仵作对亲人送物须一件件报名报物，覆盖尸被。盖棺前，子女、亲友依次向遗体告别，旋即盖棺、销榫、钉钉、封棺。封棺时，孝子跪着，双手将斧子递给人主（死者是男，表叔为人主；死者是女，娘家人为人主），人主在榫钉上敲三下，表示无异议，之后才能将榫钉打牢封棺。封棺后，众人捧香行拜，存放厅堂中，摆起案桌，放置斋供，点燃香烛，择日出殡。出殡头一天夜晚，孝男孝女要随鼓乐班子到村口“送鬼”。悼唁人到礼房上礼，送钱叫“礼金”，送帐子叫“挽联”，送小馒头称“大饭盒”，送点心称“茶食八品”，送纸扎二斗称“金银二斗”，抬食箩称“堂祭壹设”。娘家人只上物品没有礼金。

开祭有家祭和路祭。家祭祭堂设自家，在厅堂置桌，放香炉、烛台和各种祭品，其中有用米粉做成的十二生肖动物。请八位或十六位

青年男子做礼生各司其事，由孝子读祭文。路祭为送葬路上，亲属或好友祭拜读祭文。女儿、女婿、外甥等都要设“路祭”，半路上摆祭品，烧香纸。昌化一带有偷丧之俗，出殡前夜死者入殓后，择好时辰，趁夜深人静时将灵柩抬出家门，搁在路旁长条凳上。

旧时，有钱人家要请僧道做佛事、道场，有一天一夜、三天三夜、七天七夜的，甚至有七七四十九天的，时间长短按丧者家庭经济条件而定，主要内容有“点灯”“拜忏”“游十殿”等，东家须殷勤招待，有谚“道士叮叮当，一夜十八餐”。贫困人家只在出殡时请道士“起棺”，以成仪式。另外要请道士到场的还有“送煞”“赶鬼”“安坟”等。20世纪70年代后一度革除僧道诵经拜忏，90年代后又有人请僧道做法事。余烈编纂的《於潜县志》中记载：“唯是近十余年来，如南区及西区于父母丧事之家，每每有做‘道士戏’之举，致近处村庄夜来观赏者，人山人海。”

出殡，俗称“出丧”。旧时，丧仪甚繁。出丧多在早晨，抬灵柩者由专事作或农村以做泥水匠为主的人担任。拜忏等佛道活动一般人家请不起，但出殡时一定要道士到场“起棺”。起灵前，有材头祭。出殡时，长男象征性背起棺材大头，次男打幡。无亲男，由同姓近亲或其他亲近者代替，背大头者和打幡人将继承死者遗产。扛棺时，须摔碎置于材头之碗，还要罩上棺材罩，一直到棺材塞进坟墓，才能收起材罩。材罩顶部面上用红色的绸缝制，上面绣有人物图像，一般是三国人物如诸葛亮、曹操、刘备等，都是民间手工刺绣而成。四面垂下五颜六色的流苏，密密麻麻，以不能显露出棺材为准。材罩成本高，村人一般租借。20世纪50年代后用得较少。

出丧时，破锣开道，声慢而沉，称“出丧锣”，棺前有“引路幡”和“宝盖”（圆形大纸伞）。孝子要戴稻草绳围白帽的“三梁冠”。灵柩后面为送丧眷属和亲友，子孙辈穿素衣、系草绳、登麻筋草鞋，手持“哭丧棒”（青竹管尺余长，上绕白纸）。毛脚女婿和未过门媳妇奔丧，要给其披一块红布，称“披红”。昌化送丧还在灵柩上放一公鸡以驱

邪。途中如遇河，境西部一带灵柩不能过桥，而要蹚水；境东部一带孝子要弓身到灵柩底下，意背柩中父母过桥，以示至孝。有钱人家还在灵柩经过的村口、祠堂、河埠、桥头设供，柩至祭之，由有声望者任主祭，行一跪三叩礼，奠酒、读祭文，送丧者皆跪地或恭立。至墓地，先祀山神，旋即举行“收山”仪式。即于寿塘内置“五谷瓶”，送丧者将“三梁冠”置于棺上，亲友绕寿塘一周。由会做泥水工的作作封墓后，把“哭丧棒”置于坟前。

出丧队伍循原路返回。长子捧神主或遗像先进厅屋，其他送葬者随后。将神主或遗像悬放厅堂，并设祭饭祭祀。送丧者须洗脸、梳头、饮糖茶。於潜地区在回丧路上还要吃炒豌豆。之前，丧家在村头路口焚一谷糠或稻草火堆，余烟袅袅，所有人不可践踏。送丧后的亲朋好友要吃“回丧饭”，又称“吃老米饭”。旧时以素食、豆制品为主，“老豆腐”必备。但现今“回丧饭”已与喜宴无异，只是丧饭有一碗“老豆腐”，以示与喜宴差别。吃过“回丧饭”，丧礼结束。

喝龙，又称呼龙。棺材进坟前，先在坟穴周围插上五彩三角旗，念《安山经》。阴地先生站在坟顶，儿、孙、媳站在坟前，用手撑开一条白被单，正面朝地，反面朝天，其余亲人站在坟四周。阴地先生高唱：“天灵灵地灵灵，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某公（指死者）三代天子九代将，九代天子代代将。金道银地看三尺，姜太公天听九丈，扬酒瓶喝山山要摇，喝水水起潮，不要看我罗盘小，寅葬卯发天地大。”白：“如要做官发财把衣角拉起来。”此时，送葬人除拉被单外，都把衣角拉成兜状。阴地先生拎一簋箩五谷米（由大米、小麦、高粱、黄粟、茶叶等拌成），一边继续唱“喝龙”歌，一边把五谷米撒向坟前的被单和送葬人的衣兜，其中被单上要撒得最多。唱：“一把白米撒到东，东海龙王行雨行梁中。一把白米撒到南，白袍小将出江南。一把白米撒到西，太阳辣辣不下西。海洋中间一块田，上下来去二十年。四两四两又四两，三两伍钱又伍钱。前面千亩田，后面果子园。父亲做天官，儿子中状元，太子太傅，礼部尚书，高官尽做，白马尽

骑，万人之上，一人之下。”白：“要富要贵？”送葬人齐答：“富贵都要。”白：“为何不下跪？”送葬人全都跪下。接着阴地先生又唱：“五把白米四方送，真龙天子坐当中，代代子孙富贵命，泥土石头变黄金。”阴地先生喊到此，一篮五谷米全部撒完。接着又一声高喊：“起立！”众人纷纷起立，把接得的五谷米，全部倒进撑开着的被单里，由儿子、媳妇拿回家摆放在灵位前。“喝龙”仪式至此结束。之后，每一次“做七”，当家人都要把五谷米分给每位家人，待七七做完，五谷米也分光了。家人们把分得的五谷米珍藏起来，意即能得到祖宗保佑。有的阴地先生说得较简单：今年今月今日今时屋穴在相，土气时出，朝阳风水，八三二十四相，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拜请历代仙师，按九平仙师，奉请本山历代仙师，呼龙来户，那布衣仙师，郭柏仙师，九天玄女仙师，呼水水上堂，节穴新龙，而我浩气，东家愿富愿贵？东家答言：富贵双全，一代高一代，代代高升。新中国成立后此俗淡出。

收山，入土当天傍晚，扎三个稻草帚。第一个稻草帚扎三个结，第二个扎五个结，第三个扎七个结，由孝子等亲人带上，并带斋供、香纸到坟前送火种，将三个稻草帚烧完，众人跪拜后返回，称“收山”。

供灵座，灵座为纸糊的楼房，一般为二层二进，东西两边各有两间厢房，整幢楼呈“回”字形。有的灵座做得尤为精致，大门前两边各有一人手持幡旗看好家门，二楼走廊里还做有丫鬟用人，屋顶上有一幅八仙过海场景图。众多人物均呈立体形。灵座两旁挂有挽联。灵座一般在三七日供放在堂厅的上横头。灵座的香火一刻不停，每日三餐要给灵座更换菜饭。一般供到断七，设宴请人做焚烧仪式。程序类同清明时祭祖，仪式完毕后将灵座抬至坟前焚香燃烧，口中不停地念“拿走拿走，全部拿走”，传如此死人到阴间里就不会穷困，不会露宿野地。有的将灵座一直供至第二年正月，待亲友宾客祭拜后再烧去。

做七，逝后每隔七天即行祭礼，俗称“做七”。从头七第一日

起，家中设“灵堂”，以灵屋（纸扎房屋）供于堂上，内放灵牌（即木主），堂上挂有子女、亲友挽联，满堂皆白。子女要向亡灵祭饭，点燃长明灯、香烛，日夜不灭。逝后七天，做“头七”，逝后十四天，做“二七”，以此类推。尤以“三七”或“五七”最为重要。临安地区以“五七”最为重要，要进行大祭。因“五七”逝者已满一月，要延请僧道诵经念佛，并于半夜“接望乡”。旧时认为此时逝者灵魂要回家省亲，家人在灵堂前天井搭“望乡台”，使逝者能登台还乡。昌化地区以“三七”最为重要，亲友们都要拿香烛、纸钱、爆竹再来祭奠。宾客祭奠，孝子回礼。孝子以丰厚午宴招待来客。宴毕，摆案再祭，然后将堂上挽联拿到屋外焚烧，在灵屋内用锡箔元宝叠满，抬到墓前焚烧。烧时，子女向墓四周抛撒茶叶、大米，示意为死者抢地盘。做七一般到“五七”为止，也有到“七七”的，最后一次谓“断七”。

现代提倡厚养薄葬，丧葬礼仪渐趋简化。20世纪80年代后期，全境逐渐实行火化，骨灰盒多送往公墓。

挑重阳担是天目山区西部之习俗，凡头年重阳后到第二年重阳前去世的人，三亲六眷故旧都要在九月初五到初八之间挑重阳担，担内有麻糍、豆腐、香、纸、爆竹，到墓前祭拜，有谚“重阳未到，饿鬼先叫”。

做忌日，每年亲人逝世之日傍晚，在家中正堂摆八仙桌，设六座，桌上置酒、饭、馒头、肉、豆腐等斋供，焚香点烛，三次筛酒，家人三次跪拜，烧纸钱放爆竹，再拜，吹熄烛火，未燃尽的香移插大门外，撤席。

做阴寿和圆百，逢整十龄时要为先人做寿，称“做阴寿”，主要亲友参加，女儿送纸衣裤两套、纸鞋一双，斋供比忌日丰盛。

值百龄要先人“圆百”，在其生日或冬至进行。正堂直拼两张八仙桌，上置三进大纸灵房，内设灵牌。灵前供饭、馒头、大肉、豆腐四碗，继放其他菜肴或果品糕点，下放香炉烛台。前一傍晚，子女持领魂幡去先人坟墓前点香，持香撑领魂幡返回，众家人在灵前共拜，

该夜香火不断。当日，亲友乡邻各备香前来祭奠，每到一家（人），执事者放三个爆竹，焚香三根。跪拜，东家陪拜。东家备丰盛中餐招待所有来人。饭后全体参祭者共拜，烧元宝。事毕撤斋供，熄香烛，以纸锭灌满灵房，抬至墓地，诵读房地契，最后一起焚烧。圆百后，子孙们不再做忌日、阴寿，唯正月初一拜坟年，清明节上坟。

浮厝，这是旧俗，俗称“冷葬停坟”。一是人死后，算命先生认为不宜立即入土热葬者，二是远离故土一时难以归葬者，均可作浮厝处理。即用砖石将棺木围砌于地上，以黑瓦盖顶，形同小屋，也有穷者仅以稻草包住棺木，停坟暂不入土，待后卜地而葬。常有数年不葬或长久浮厝者。冷葬仪式如同一般热葬。入土时，须在清明、七月半或冬至这三天里将棺材抬入坟中，如棺木已朽，则捡残骨装入小棺中再入坟。

移坟，请风水师择日，点香烛、供祭品、烧纸钱，告知旧坟内亡灵，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因某某原因，特将尔坟由此处迁移至某某新址等话，然后由材夫等掘开旧坟。如棺木尚完好，则抬棺木至新坟；如棺木已朽，则捡出亡者残骸，按位置和残存陪葬品一起放入小棺中，移至新坟内。捡骨时须撑伞，不能让尸骨见到阳光。

七

方言、
民歌舞蹈
和戏剧



天目山区的方言

方言是宝贝。从方言中，我们可以寻找地方史的渊源，品味乡土文化的香醇，咀嚼老家的味道。经过数次的调查和研究，大家认识到，天目山区方言是非常有特色、有价值的方言。

一、跨度较大

临安的行政区划由过去的於潜、临安、昌化三县合并而成，境域面积达3118.8平方千米，为浙江省第二。受行政区划的影响，方言也分为三大块。区境西北部与安徽毗邻，界域相互交叉，方言也相互影响。区境地形呈狭长形，酷似一头河马，河流分属两大水系，东部大多地区属太湖水系，西部和东部少数地区属钱塘江水系，这种特殊的地理形势形成了方言的复杂性和差异性。所谓的“十里不同音”，在这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尤其是在昌化昌北的一些地方，相隔不远的村民语言交流都有困难。

从全国的方言分布来看，天目山区方言属于吴语区。锦城、锦北、青山湖、玲珑、锦南、高虹、太湖源、板桥、天目山、於潜千洪、太阳横路、潜川乐平、清凉峰马啸、岛石新桥的部分地方等为吴语太湖

片临绍小片。龙岗龙井桥、鱼跳、上溪和岛石的部分地方为吴语宣州片太高小片。清凉峰镇的顺溪、阳川、新燕、浙川，岛石镇的桥头、榧川、芦塘、尖山、坦里、西舍坞等为徽语绩歙片。原昌北的部分地方、太阳镇横路和於潜的部分地方为江淮官话洪巢片。此外，还有分布在天目山、於潜、昌化、龙岗等的新安江水库移民，则为讲淳安话和遂安话（方言归属未定）。还有太湖源镇光辉、於潜镇铜山、太阳镇沈家等为浙江畲话。

二、一种十分成熟的方言

天目山区方言语汇庞繁，表述细腻，民间俚语、谚谣非常丰富。说句夸张的话，山村妇人夸起人来，或者骂起人来，叽叽呱呱从上街头到下街头都没有一句重复。

形成这种特点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天目山人居住的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厚，方言相对成熟；二是历史上数次外来人口的迁入，外部方言与本地方言的交融以及外部方言的影响；三是境内历来尊儒重学，传统的经史诗赋丰富了方言的语汇。

三、历史悠久

据考古发现，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片土地上刀耕火种，繁衍生息之久。天目山区方言声调为七声调，无翘舌音，部分字前后鼻音区分不明显，“WU”“HU”往往不分，“HU”音也读作“WU”。在昌化方言的声母中很少有J、Q、X的发音，许多普通话中J、Q、X发音的单字都发作Z、C、S，此为昌化方言一典型特征。至今方言中还有许多的古音和古汉语词汇。如：昌化方言称“桌子”为“台月”，“拍桌子”叫“搨台月”，“走路”叫“行路”，“绳子”叫“索”，“公牛”叫“牯牛”，“漂亮”叫“标致”等。昌北方言称“砍树”为

“伐木”。龙岗镇“无他村”读作“靡土村”。全临安“没有”都可以“靡”替代。

又如“解”读音如宋《广韵》注“佳买切”。“江”读音如宋《广韵》注“古双切”。“讲”读音如宋《广韵》注“古项切”。汰[da²⁴]（临安片），洗，例“汰衣裳”，《广韵》去声泰韵，徒盖切。挖[do²⁴]（临安片），拿，《集韵》平声戈韵唐何切。柯[k^hu⁴⁴]（昌化片），抓，捕捉。《集韵·麻韵》“柯，弱也。”“柯，护也。”掄[te^hin⁵³]（临安片），按。《集韵·沁韵》：“掄，按也。邱禁切。”隄[ge²⁴]（全临安），斜靠，站立。《玉篇》二十二阜部，巨慨切：“隄，企立也。”塢[foŋ³²⁴]（临安片），脏、灰尘。《广韵》上声董韵邬孔切：“塢，尘起貌。”梗[kuaŋ⁴⁴]（於潜片），量词，《广韵》上声庚韵，古杏切：“梗，枚梗也。”髁[k^ho⁵³]（临安片），膝盖。如：“脚髁头”，《广韵》平声歌韵，苦何切：“髁，膝骨。”跼[gu²⁴]（临安片），蹲。《集韵》平声模韵，空胡切：“跼，跼蹲貌。”镬[fuo²]（临安片），锅子。《广韵》平声豪韵，胡郭切：“镬，鼎镬也。”揎[eye⁴⁴]（昌化片），捶拳之意，《集韵》：荀缘切，手发衣也。囤[k^haŋ⁵³]（临安片），藏。《集韵》去声宕韵，口浪切。“囤，藏也。”掇[tə²⁵]（昌化片），手端物。《广韵》入声末韵，丁括切：“掇，拾掇也。”炆[u⁵⁵]（临安片），火、灯等熄灭。《字汇补》平声模韵，乌古切：“炆，火熄也。”念[nie²⁴]（临安片），二十，《说文解字》作“廿”。当地宗族家谱中常将“廿”写作“念”。

四、人口流动的影响

天目山区历史上曾出现过几次大规模人口流动，外来人口尽管在多数场合都使用临安方言，但原语言也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临安方言的语汇和音调，从而使天目山区方言发生演变。

1. 根据资料记载，东汉至两晋时期，有许多文人士大夫隐居于

天目山区，如葛洪、许迈、陶渊明、干宝、谢安，是否可以推知，这个时期还有更多的平民百姓也迁来天目山区？

2. 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天目山区涌入许多外来的居住者，尤以来自北方为多。据记载，南宋时有章惇、何执中、卫肤敏、吕好问、许景衡、许翰、范宗尹、吕颐浩、朱胜非、李纲、赵鼎、张浚、沈该、周葵、叶颙、魏杞、蒋芾、陈俊卿、叶衡、王淮、葛邲、赵汝愚、钱端礼、郑清之、范钟、谢方叔、吴潜、董槐、程元凤、江万里、马廷鸾等，共计一百六十余位朝廷高级官员提举洞霄宫，此虽为虚职，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过洞霄宫。宋时天目山佛教兴盛，全国各地的学人络绎不绝前来参访。南宋时天目窑十分红火，大量窑工流动至天目山区。

3. 清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军多次从安徽宁国、歙县和本省的淳安、分水入境，连年战争，当地人口锐减，战后有众多外来客户迁入定居，尤以东中部为多。

4. 临安境内有少数民族约5000余人，主要是畲族。据族谱中记载系清季自浙南陆续迁入，现分布在临安片和於潜片各地。在小范围内使用畬语。畬语是畬族使用的一种汉语方言，与客家话、闽语等方言接近。例如古全浊声母今读清音；非组部分字读[p]组声母；溪母部分字读[h]或[f]声母；部分地点有[m、n、ŋ]和[p、d、ʔ]韵尾；声调6个，有小称变调。

5. 1958年，因建造新安江水库，大批的淳安移民迁入天目山区。

随着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来自不同方言区人之间语言的接触和碰撞，词汇方面呈现出杂糅多元的特色。如“午有[ŋ²²ŋiu³¹]”（没有），这明显是受绍兴方言的影响。昌化片“阿啦[ɦa²³la³³]”（我们）与宁波方言相似。将“玉米”叫“苞罗”，与丽水一带方言相似。将“做坏事、不讨人喜欢”说为“不得人歇”，这与金华一带方言相似。

五、现代社会发展对天目山区方言的冲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普通话在天目山区普及，由此北方语言词汇大量融入天目山方言，虽仍使用方言语音，但方言的原真性明显弱化了。

随着生活形态的改变，方言中一些旧名词逐步被淘汰。如建制名称“都”是古时相当于乡的行政建制，现在这种建制已不存在，只保留在地名中，还有保、甲等，地名中也很难找到了。

新名词一方面丰富了方言的词汇，另一方面也使方言趋向同化，失去了特色。如现代政治词语：所有制、初级阶段、党派、阶级、剥削、压迫、革命、改革等。又如社会文化词语：搞定、愿景、忽悠、通天、换防、二进宫、药头等。新度量衡名词：公斤、千克、克、克拉、公里、千米、米、分米、厘米、公顷、平方米等，原有度量衡名词斤、尺、寸、亩、分等则与新度量衡名词同时兼用。还有外语词汇：拜拜、OK、桑拿、模特、摩登、幽默、卡拉OK等。现阶段网络语言发展很快，产生了许多新词汇，也融入方言之中，如佛系、躺平、内卷、悲催、嘤瑟、吃瓜群众、烧脑、虐菜、拉风、喷子、么蛾子、标配、一波流、嘴瓢等。

人说“时代是方言的杀手”，随着社会的发展，交通、通信的发达，方言的特征和特色不断被弱化，这是不忍看到却又无可奈何的趋势。

昌化乡音

在汉字文化中，字义变化小而读音变化大。如果贺知章如今回到老家，乡童定以为是哪位华侨，便要“笑问客从何国来”了。

尽管古音变得很多，但一些方言却还保留有古音的特点，甚至偶尔也有与古音的读法契合。上学时读古诗文，用普通话诵读总觉得平仄难辨。老师就教我们一招，用老家的方言去对照，果然很灵。原来一直为一口难改的乡音苦恼，没想到乡音对读古文还十分管用，更有了几分亲切感。还有另外的一些体验，如对有“圆”这一层意思的东西，家乡话都是用“葫芦”“骨碌”之类的双声发音，如说“脑袋”就是“葫芦头”；绳子打个圆结，称作“蒲络头”；形容特别圆时就叫“骨碌丝圆”。细细体会，这种发音还很具有形象性，与古代的读音也应是契合，这在古文中也可以找到例证。老家把“游泳”说成“凫水”，“桌子”叫“台𠬞”，说“赶快”为“犯紧”，称“弟弟”为“弟郎”，“淹”称“渥”，“溢”称“漚”，“喷涌”称作“漈”，等等，这在古文中也能找到例子。也是巧合，“台𠬞”与英文 table 相近，就有人戏说英文 table 是对昌化方言“台𠬞”的译音。

“洗脸”昌化人读作“司面”，“司”与“死”谐音，据说曾发生过很大的误会。姓氏中，陈、秦、程都是一个音，胡和吴、黄和王、赵

和邵、李和吕也都是不分的。有人说，昌化方言中声母只有z、c、s，没有j、q、x，更没有zh、ch、sh，多数时候就是这样的规律，可也不尽然，譬如“猪”“珠”等还是j的发音，不知道古音是否如此。有位老师跟我说，龙岗人叫“无他”为“靡拖”，这其实是古代的读法。细想一下不错，至今现代汉语中的“靡”即为无的意思，方言中说“还靡来”就是“还没有呢”，以“他”或“它”为声音读作“拖”的字也有一些，于是大略可推出把“无他”读作“靡拖”的道理了。

方言是有价值的“老古董”。“眼乌珠痛”，哪里是真痛，分明是瞧什么人都不顺眼；用“老笋蒲头”形容固执己见、听不进别人意见的人。这种语言表达多么精彩。还有打人的脑袋称“脑搭”，弯起手指敲人脑袋叫“栗壳子”，打巴掌叫“搨果”，虽是表达粗鲁之行为，却也十分形象直白。“老虎搭蚊虫”是指轻而易举的意思，简直就是传神。昌化方言中有的词语十分特殊，譬如说身体不好有两种：病情较轻身体不舒服叫“好意煞”；病情较重，大约躺在床上起不来的叫“旯搭呜”。打瞌睡叫“摇好钟煞”，这种古怪的发音让人很难理解，但其词汇之丰富细腻却不得不让人佩服。还有第一人称的表述，“我”是“哦”，也用“哦依”表示，后者显得更加亲切或确定。“我们”若是范围大一点时用“阿拉”，范围小一点用“阿搭”，后者有更加亲热的感情色彩，比之普通话来尤显细腻准确。

乡音，是我们这代人一个解不开的情结。可是，话说回来，普通话对中华民族也尤为重要。为了民族的繁荣富强，我们须更准确地去操持普通话，让普通话与方言兼容并存、共同发展。

天目山与戏剧

天目山旧时城乡常见有草台戏班子演出，有绍兴大板、三脚戏竹马班、徽剧、京剧、木偶戏、目连戏，甚至话剧等，又有庙会、灯会等。有外地的戏班子，更多的是本地人的自娱自乐。民国时期临安、於潜、昌化三县都设民众教育馆，有游戏场、小剧社、音乐室、阅报室、民众茶室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70多年也很热闹，专业的有临安、昌化越剧团，业余的有老三县文化馆和后来的乡镇文化站，常常组织戏剧演出，广受天目山人喜爱。

一、天目山的老戏台

旧时，城市固定的娱乐演出场所称为“勾栏瓦舍”，是中国戏剧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也曾兴盛一时。宋吴自牧《梦粱录》：“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不知起于何时。”瓦舍约是现在的文娱中心或是剧院，勾栏约是戏台。旧时，天目山区农村也建起了许多的戏台，有别于城市中的勾栏瓦舍，虽然没几个人算得上票友，但天目山人的骨子里就是爱看戏，爱看徽州二黄调、睦州三脚调、绍兴乱弹、金华滩簧等，最受欢迎的还是落地唱书

绍兴文戏，也就是嵊县越剧。受戏班子的影响，本地人也会学着唱念做打，搭起几个草台班子，也上戏台过把瘾。如明代，清凉峰镇大鹄村请了个师傅，搭起了一个唱徽剧的目连戏班子。清光绪年间，岛石胡氏成立了彩云班。晚清时，板桥则有了“芦山毛竹班”，演唱越剧。民国时期，杨岭金岫搭起了越剧“鲁家班”，湍口镇二联村有一个竹马戏睦剧团。这种亦农亦艺的戏班子在天目山区的山村中数不胜数。与之相匹配，则有许多的老戏台，或粗犷，或精致，或单建，或附于庙祠。相对正规的是城隍庙戏台。2008年出版的《临安市文化志》记载：“宋至清代，境内民间杂戏盛行，活动场地以祠堂庙台为主。宋时，临安、於潜、昌化三县，建城隍庙，均设戏台。”山村有族姓的大祠堂，祠堂中也都有戏台，但如今保留下来的不多。太阳镇的东平王庙、清凉峰镇马啸山边的陈家祠堂尚能见到。也有临时搭的，光绪三十二年（1906），乐平外伍村程姓宗祠，村人抬来八只稻桶，搁上门板，搭起一个小草台。嵊县说唱艺人高炳火、袁福生、钱景松、李世泉、李茂正、金世根等上台演出，实现从落地唱书向舞台戏剧的转化，让乐平外伍村成了越剧首演地。2009年“越剧首次试演地”被列入临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抗日战争时期天目山朱陀岭上也有戏台，许多剧团在这里演过戏。20世纪60年代，山区村村都建起了大礼堂，隔三岔五就有戏场子。锦北街道的八百里，也有一座古戏台，叫卢山戏台。它原来在板桥镇上田卢山的半山腰，夹山道而建。戏台坐南朝北，观戏厅坐北朝南，一条山村古道穿过其间。前几年，戏台及戏厅一起迁至八百里养生园，将其立于湖中，称作水上戏台，厅台之间有一水道。与原来的格局相比，则另有一番风韵。戏台建筑为重檐歇山，多数用材为红、白榿木，是一座精致的清代建筑，已有数百年历史。建筑中的木雕保存完整，戏台抬梁下刻有和合二仙、戏曲人物、狮子戏球等图案，十分精美。两金柱上有楹联“此曲只应天上有；斯人莫道此间无。”上联用杜甫《赠花卿》中句，下联反杜诗之意而用之，妙趣横生！横批是“思

无邪”，由著名书法家盛力人所书。据传，越剧的著名老演员筱丹桂、周宝奎、张湘卿、贾灵凤、高芳臣、筱灵凤等都在这座老戏台上唱过戏。20世纪50年代后锦城、於潜、昌化建成了国营剧院、影剧院。

二、抗日战争期间天目山区的戏剧

笔者翻阅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日报》，发现临安人与戏剧特别有缘。稍加留意，便能读到许多剧团的消息，如民族剧团、锦西剧团、武肃剧团、昌化平剧社、天目山平剧研究社、血花剧团等。

民国二十八年（1939）12月27日，《民族日报》刊登消息，临安锦西剧团进行兵役宣传，剧团有30多人，分别在天目、苕溪、灵岫、青云等乡演出。这个团大约由机关文员组成。有的报道更明显。民国二十九年3月16日刊登消息：“临各机关职员组武肃剧团。”民国三十三年2月13日报道：“昌化县各机关所组之平剧社也将在县府大礼堂公演。”民国三十二年2月24日《民族日报》的字迹已经漫漶不清，标题隐约看出为《浙西行署组建业余剧团》，可能就是天目山平剧研究社。5月21日则登了一条广告：天目山平剧研究社在西天目山智度岭（朱陀岭）举行演出，有雏凤和陈大炯主演的《珠帘寨》《问樵》《闹府》，风水居士和郑柏英主演的《骂殿》，陈锦元主演的《追韩信》，梁坦仙主演的《操琴》，钱植之和赵克义主演的《回窑》，沈鸿和张连元主演的《空城计》。9月26日，《民族日报》再刊登消息，天目山平剧研究社将再度演出，剧目有《八义图》《武家坡》《四郎探母》《女起解》《捉放曹》《三娘教子》《华容道》等。

从报道上看，天目山一带的演出，其剧种十分丰富，有话剧、越剧、平剧、京剧、睦剧等，大约话剧是非常受欢迎的。民国三十三年（1944）2月13日《民族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129剧团在昌化县政府大礼堂公演四幕话剧《得意的人》。”在一张日期已经无法辨认的《民族日报》上发现一条消息：血花剧团应昌化县各界联合剧团之邀，

到昌化城借隆山小学演讲台公演，节目有话剧《魔窟》等。

剧团之间还会有一些交流。民国三十年（1941）10月7日《民族日报》刊登消息：“民族、晓风两剧团在孝丰县图书馆中举行联欢，讨论拓展天北的剧运。”

三、抗日救国的民族剧团

上面这些剧团都还是敲敲边鼓的，当时最最有名的是民族剧团。《民族日报》从不吝惜对民族剧团的赞誉，有关民族剧团的信息很多，其中不乏长篇累牍之文章。

民族剧团是民族文化馆下属的一个艺术团体，成立于民国三十年（1941）元旦。团部设在朱陀岭西麓忠烈祠。团长墨易、副团长兼总务陈才庸、指导员李益中、剧务李滨、演出黄健、编导沈西芑，研究组长齐驱、宣传组长关非蒙、演出组长金松。演职人员多时达50余名。民族剧团在浙西前线慰劳抗日将士，宣传抗日救国，揭露敌伪阴谋。民族剧团演唱歌曲有黄自的《红旗飘飘》《抗日歌》，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在太行山上》，李益中根据《在太行山上》的曲谱作词《在天目山上》，贺绿汀的《游击队之歌》《垦春泥》《打东洋》，张寒晖的《在松花江上》等。演出戏剧有陈白尘的《魔窟》，夏衍的《雾重庆》，曹禺的《日出》《雷雨》《原野》，还有《三江好》《放下你的鞭子》《最好一计》《张家店》《国旗飘扬》《大明英烈传》《野玫瑰》《桃花源》《小城故事》等。

民国三十一年（1942）秋，副团长陈才庸被浙西行署杀害于西天目山龙潭。此后，导演金浪涯、演出组长金松等7人被捕。民国三十三年，民族剧团随民族文化馆迁昌化汤家湾前山下，演职人员仅剩10余人。民国三十四年夏迁淳安，9月30日，在杭州国际大戏院公演《大明英烈传》《野玫瑰》等剧目。10月浙西行署撤销，民族剧团完成历史使命。

四、《杨立贝》和昌化越剧团

昌化越剧团的前身为上海文华越剧团，团长是张湘卿，1956年5月，张湘卿带着上海文华越剧团到了昌化县。县政府和民众非常喜欢，专门建造了一个院子给剧团，平日里嘘寒问暖，把班子当作自家儿女一般。第二年，招牌由“文华”变成了“昌化”，改名为昌化越剧团，在昌化扎根落脚下来。张湘卿就成为昌化越剧团的第一任团长。1958年，王天一创作了大型现代越剧《杨立贝》的剧本，以发生在天目山下的一个真实故事为原型，描写了杨立贝遭地主欺压，状告无门的遭遇。昌化越剧团立即排练，导演还是张湘卿，主要演员是陈少芳、徐桂兰、黄明君、梁红玉、裘宝宝等。1960年，昌化越剧团携《杨立贝》一剧，参加了嘉兴专区的戏剧会演，随后又参加了浙江的全省会演，引起了文艺界的轰动。接着就在全省巡回演出了300多场。1963年受上海方面邀请，在上海又演出了128场，场场爆满，座无虚席。1963年秋，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在杭州饭店礼堂观看了昌化越剧团演出的《杨立贝》，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和全体演职员合影。这一年昌化越剧团被评为省文化教育战线先进集体。这以后，有24个剧团排演或移植此剧。1963年，文化部出版了单行本《杨立贝》在全国发行。1964年，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将该剧改编成电影，影片名为《血碑》。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剧团中不少演职员遭批斗，演出停顿，1969年撤销了昌化越剧团，主要艺术骨干并入临安越剧团。

五、临安越剧团和“小京班”

1951年2月，临安专区越剧实验剧团建立。1953年专区撤销，改为临安越剧团。1969年撤销临安越剧团。1971年，招收男女青少年

建立文宣队，时称“小京班”。男女合演，演出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杜鹃山》《龙江颂》《瑶山春》等，并演出越剧小戏《半篮花生》《红松站》等。1977年2月移植改编京剧《小刀会》，在临安剧院连续上演56场。1978年复建临安越剧团，演出《血手印》等剧目。1982年举办“小百花”越剧艺训班，一批演员脱颖而出，获得省小百花奖，剧目也多次获得省、杭州市优胜奖。演出《陌上花》《巡按与县令》《井台会》《玉山家事》等。20世纪90年代中期采用承包方式，后经营不善消亡。

六、彩云班和官升班

彩云班由昌北岛石胡氏组建于清光绪年间，演员均为男性，徽腔，文戏武功兼备，在安徽宁国、绩溪一带颇有名气。民国二年（1913），由胡官升接手，易名“官升班”，有演员30余人，融徽、京二剧于一体，经常在昌化、於潜一带演出，主要有《独木关》《黄鹤楼》《追韩信》《三岔口》等剧目。

七、金岫鲁家班、四喜堂、龙凤高升舞台

《越剧溯源》一书载，早在19世纪中叶，就有许多嵊县的说唱艺人在临安一带活动。嵊县马塘村的说唱艺人金永邦、金永辉分别在玲珑庆仙和杨岭金岫两地定居并终老一生，墓葬当地。金岫村村民有不少是由嵊县迁居而来，骨子里都爱戏、爱越剧。民国时期这里曾组建了3个戏班。

民国二十二年（1933），金岫村建起一个“鲁家班”，老板叫鲁伟，金岫人，酷爱越剧，曾让人从嵊县招来30多个艺徒，办成了一个戏班子，艺徒统统改姓鲁，故称“鲁家班”，聘请高师传艺。翌年9月，在临安锦城城隍庙首演，接着又在杭嘉湖地区演出，并赴安徽、江西、

江苏、福建等地巡演。以越剧为主，兼演绍剧、京剧。1949年后，改名民生剧团，不久解散。

民国二十三年（1934），村人石文彬、黄先德、张汉、殷阿荣四人合伙组建了一个戏班子，叫作“四喜堂”。招收本地艺徒20余人，在昌化、於潜一带演出，后来去杭嘉湖一带演出《彩楼配》等剧目。两年后的春天在昌化演出时，由于被国民党政府怀疑牵涉政治问题，戏班子听到消息，逃回金岫，“四喜堂”也就此散伙。

民国二十五年（1936）冬，村人钱梅璋吸纳了原来在“四喜堂”里的部分艺人，又从嵊县招收女艺徒，聘请京绍武师来教戏练功，因采用男女合演，所以命名“龙凤高升舞台”。一开始演武戏，有绍剧《龙虎斗》、京剧《白水滩》《泗洲城》，后来也演文戏，有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双珠凤》等，在杭嘉湖一带演出。后来改为女子越剧，又在杭州羊坝头国货商场小剧院等处演出。全民族抗战爆发，剧团解散。

嵊县的“高升舞台”在临安一带演过几年戏，曾得到过鲁伟的接济。“高升舞台”出过许多名演员，筱丹桂、张湘卿、贾灵凤、高芳臣、筱灵凤、周宝奎等，大多在临安乡村的舞台上打过几年滚，并在这里使自己的演技逐步走向成熟。有记载，民国十九年（1930）冬，“高升舞台”在锦城镇上演出，那些演员只是十三四岁的女孩子，演出效果却非常好。金岫村闻知也请过去演，一共演了十几本戏，有《文武香球》《梁祝哀史》等。后来，上海文华越剧团到昌化落户，成为昌化越剧团，“高升舞台”的张湘卿任团长。

八、芦山毛竹班

板桥镇上田芦山村的山上多毛竹，旧时芦山村的村民背毛竹到余杭出售。毛竹卖掉后，一班村民便在余杭城里演越剧，笙箫管笛、竹管胡琴鼓样样都拿得出手，在余杭城里小有名气，被称作“芦山毛竹

班”。芦山村崇尚武术，有“红毛狮子”，又都喜欢戏剧表演，过去山村中建有戏台、戏厅，十分考究，“芦山毛竹班”就在这里排戏演戏。1949年正式成立了芦山越剧团。“文化大革命”时，戏箱行头、曲谱全部被烧毁，芦山越剧团也就解散了。

九、二联村睦剧班子

睦剧历史悠久，是一种古老的戏曲剧种，相对较为小众，开始称为竹马班，主要流行于浙西和徽州地区，中心为淳安和遂安，古属睦州府。清道光二十年（1840）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从业余的竹马班发展为半职业的三脚戏竹马班。光绪二十六年至民国十六年（1927），从半职业的三脚戏竹马班发展为职业的三脚戏常班。1949年定名为睦剧。

由于从竹马戏演变而来，睦剧演员都具备扎实的武打功底。它的唱腔分湖广调、三角调和杂调三大类，总体上显示出诙谐风趣、亲切自然的风格。睦剧有大戏、小戏两大类。大戏同于其他剧种，而小戏的特点则剧情简明风趣、语言通俗、边歌边舞，表演生动自如。以喜剧、闹剧见长，其题材主要反映农村劳动生活、婚姻爱情等，只需有生、旦、丑三个演员即可表演，如《小拜年》《南山种麦》等，有着浓厚的乡土文化色彩。

湍口镇二联村睦剧产生于明末清初。那时候，每年农历正月初，就有淳安的三脚戏竹马班来演出，白天跳竹马，晚上演大戏。受其影响，约在宣统二年（1910），二联村青坑口成立了三脚戏竹马班，抗日战争爆发后停止。1960年又恢复二联睦剧团。他们找出了当年的道具：刀、枪、剑、棍等，配齐了鼓板、先锋、唢呐、板胡、三弦、二胡、锣、鼓、钹、镲等乐器。在三年困难时期，老艺人也未放弃睦剧的传承，白天挣工分，晚上排戏。《君子图》《山伯访友》《三女拜寿》等大戏在周边三县各地巡回演出。精湛的艺术功底，字正腔圆的三脚

调感染了许多观众。1961年，参加昌化地区的文艺会演，《年三十夜的风波》获演出二等奖。“文化大革命”期间偃旗息鼓。2002年，重新恢复。2006年，几位老艺人创作了《母女山村行》《山清水秀二联村》《山村的笑声》等，在洪岭高山馒头节文艺晚会上大放异彩，深得山区百姓首肯。

2014年，睦剧被列入临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目连戏

天目山区有目连戏，长期以来已成风俗。但因为特殊时期造成的文化断层，这一风俗逐渐淡去，仅有个别地方还保留着一段文化的记忆。2006年，天目山区的目连戏被列入了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且属濒危抢救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现在这一习俗还保留有香火传承的是天目山脉起首处的清凉峰镇大鹄村。这个村在镇之西北，海拔255米，村域面积为17.02平方千米，2006年共有661户，1873人。

目连戏的主剧目是《目连救母》，这是《佛说盂兰盆经》中的一个故事。故事叙述了目连拯救亡母出饿鬼道的事情。

某时，佛陀住在舍卫国的给孤独园，那时目连刚证得六神通，打算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却发现他母亲堕落在饿鬼道中受苦，瘦得皮与骨相连。目连见此情形，感到非常悲哀，便用自己乞食的钵装满饭菜，以神通力送去其母亲处。目连的母亲一看到饭，便用手去拿，可是饭还没到口，就变为火炭。看见这情形，目连非常伤心，立即将此事禀告佛陀。

佛陀说：你母亲罪根深重，不是你一人的力量可以救拔的。虽然你的孝顺之心可以感动天地，但是所有的神力都帮不到你，唯有依靠

十方僧众的威神之力才可以令你母亲解脱饿鬼之难。我现在就告诉你解救你母亲的方法：

七月十五十方僧众解居自恣的时候，为过去的七世父母并处于困难的现世父母，预备各种美食、水果、用具、香油、灯烛及卧具等，并将食物放在盆中，以供养十方僧众。

在这一天，一切僧众，不管是在山林间修学禅定，或已得四果阿罗汉者，或在树下经行者，或具足六神通者，或能自在教化者，都会来接受供养。更有十地菩萨大人化现比丘，杂在大众中同受供养。

如果有人能供养这些僧众，现在及七世以来的父母眷属都能脱离三涂（地狱、饿鬼、畜生）的苦难，及时得到解脱，衣食不缺。如果那人现世的父母还健在，则会富乐安康，已故的在三恶道中的七世父母也会马上转生天上，享受种种快乐。

这时，佛陀就让十方僧众先为布施供养的施主及他们的七世父母咒愿，接着端正心意，然后才享用食物。于是，僧众们便将供养的食物安放在佛塔前，接着一起为施主们咒愿，然后才各自享用食物。

这时候，目连非常欢喜，不再伤心流泪，因为他母亲在此日脱离了本要经历一劫的饿鬼之苦。

这部经弘扬了孝道的思想，与儒家思想相契。南梁大同四年（538）七月十五，梁武帝在同泰寺举办了中土的第一次盂兰盆法会。到了唐代，盂兰盆法会便广泛地在民间流行。时至今日，盂兰盆法会已成为佛教寺院的一项重要活动。每年的七月十五僧自恣日和佛欢喜日，西天目山的禅源寺、东天目山的昭明寺都要举行盂兰盆法会。

2015年农历七月十五，时逢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西天目山禅源寺和浙江大华集团就共同举办盂兰盆法会，以祭祀天目山的抗日

阵亡将士和佛教历代祖师。

自唐以后，随着孟兰盆会的盛行，目连救母的故事广泛地在民间流传，并有变相（佛经故事图画）和变文的流行。在敦煌发现的目连救母变文有十六则。

后来由这些变文逐步向俗文化演变，形成了目连的戏曲。元末明初《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明郑之珍《目连救母行孝戏文》三卷，清人又继续扩大而成为十本《劝善金科》。就这样，“目连救母”以俗文化的形式登上了民间的舞台，成为一种劝人向善、劝子行孝的戏教，而且还不断地将剧目加以丰富，添加了许多情节描述：目连遍历地狱寻母不遇，凭借佛陀的锡杖才得以入阿鼻地狱见到母亲，后又承佛陀亲临地狱，放光动地，大破地狱，于是目连的母亲得以脱离地狱，转入饿鬼道。目连又依佛陀所嘱广造孟兰盆，救拔母亲脱离饿鬼道而入畜生道，变成一条黑狗。目连又接引黑狗七日七夜诵经忏悔，才使母亲又得转人身。最后目连劝其母亲求生西方佛国。变文中让目连的母亲历经地狱、饿鬼、畜生三恶道，对三恶道中的种种苦处极尽描述，这是变文的一大特色。

天目山区的目连戏班子一直比较多，它们的传入和传承各不相同。据清凉峰镇大鹄村章迎正回忆，大约是明代的时候，从徽州来了一位瞎子戏先生，到大鹄村后，时不时唱些戏文。村民觉得蛮好听，就让他教。这个瞎子会的就是目连戏，一边唱，一边给大家讲解，三天三夜才把一本目连戏唱完。传说教完后，他的眼睛突然复明了。大家特别高兴，一起把瞎子戏先生唱的戏文编成剧本，然后分角色扮演。眼睛复明后，戏先生也在大鹄村定居下来，带着大家演，目连戏就这样在这一带传开了。章迎正在10多岁时还看过村里演目连戏，那时戏班子的师父叫章金源，是本村人。章金源传给了同村的许志荣。章迎正老人回忆，大鹄村的目连戏12年演一次，一旦开演，就必须演七天七夜，中间不能停歇。目连戏，又称太平戏。据传承人许志荣回忆，民国时期，大鹄村里有太平戏剧社，属民间风俗社戏活动，人数最多时

有50余人。每12年会演一次。就这样，一代一代，大鹄村目连戏传承了下来。后来的演出频率加大，周期缩短，二三年就要演一次。据村民王立芳回忆，20世纪60年代前期还演过两次，最后一次是在路口自然村的章氏祠堂，由目连戏爱好者自发组织演出。

除了主剧目《目连救母》之外，还有许多的穿插戏，这些戏的内容有些是根据其他故事改编的，也有一些是现编的。戏班在外演出时，常把耳闻目睹的“善事”“恶事”记录下来，编进目连戏中去。大多为孝敬父母、尊敬长辈、与人为善、祈祷平安、驱邪避灾、年丰人康等，具有一定的教化功能。这样一来，目连戏的穿插剧目多达一百二十折之多。

穿插戏多是讽刺社会恶行现象，带有讽喻并有浓烈的喜剧色彩的故事，这些故事不离因果报应的主线，但情节曲折，滑稽幽默，故事性强，也受到百姓的喜爱。也有少量插科打诨，带恶俗趣的，但大多都劝善惩恶，具备正面导向。如“张蛮打爹”，张蛮打了爹，对众人说道：“从前我们打爹的时候，爹逃了就算了，现在呢，爹逃了还是追着要打！”强烈讽刺了“世道衰微，人心不古”的现实。

大鹄村的目连戏也有许多的插戏。据章江海回忆，1962年昌化县文化馆要求村里排演目连戏，还把村里15位演过目连戏的人召集起来排练一出《劝善》，也属于目连戏中的一个插本，分总本和副本，讲的是傅相之妻刘青娣亵渎神明被打入地狱，他儿子傅罗卜救母心切，遍历地狱，终于母子团圆。

目连戏的演员往往不是职业优伶，而是业余的农夫工匠，劳动之余临时组织成班，过了兴头便即解散，各回老本行，做自己的事去了。这些人所用语言常常是地道的土语，尽管服装道具极为简陋陈旧，却因它的亲民性，极受百姓喜爱。久而久之，老百姓往往将那些道具简陋、衣冠不整的普通戏班子也称作“目连行头”。但也有讲究道具服装的，戏中会出造型较为细致的天地神祇、牛头马面、妖魔鬼怪、夜叉罗刹等人物，还有地狱中锯磨鼎镬、刀山寒冰、森罗剑树、铁城血漉

等，犹如吴道子画的《地狱变相图》，阴森森的恐怖感觉，让观众浑身起鸡皮疙瘩。民俗中大凡演这类戏之前，戏班子都要点上火，四面叩首祷告一番。

村子里演目连戏一般都在祠堂、社殿、神庙中，或在空旷处搭起舞台。

清凉峰镇大鹄村的目连戏也有一些特征：

以“徽戏”为根。大鹄村因与徽州靠近，表演程式沿用“徽戏”传统套路，说、唱也用徽腔，相对来说戏剧艺术是比较成熟的。表演时，说、唱、演既可融于一体，也可单独进行，形式多样。

昼息夜演。大鹄村的目连戏有规定的演出时间，一旦大戏上演连续七天七夜不间断。白天邀请其他剧团、剧种或社会戏剧团体演出，晚上才演目连戏。

大鹄村的目连戏有说唱、小戏和大戏，说唱一般在庭院、堂屋进行，一般不上舞台。小戏是单本戏，大戏是连台本戏。大鹄村目连戏除了主剧目连台本戏《目连救母》以外，还有单本戏《尼姑下山》《富相开善门》《十八层地狱众生相》《天堂在人间》《瞎婆儿与痢痢儿》《十月怀胎》等剧目。《劝世文》则为说唱戏。

今天，从很多传承痕迹上还可以看出，《佛说盂兰盆经》和盂兰盆法会对天目山区的民间社会习俗产生了深刻影响，它曾是天目山风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民歌民谣

天目山的民歌当从钱王的两件事说起。

第一件事是钱王当年衣锦还乡时，作了一首《还乡歌》，虽还是通俗易懂，但乡民一时难以听明白。于是，钱王又唱起了当地叫作《吴歌》的山歌：

汝辈见侬的欢喜，别是一番滋味子，长在我侬心底里。

歌词中用的是本地方言，并用七言句式，简单明了，众人也合着拍子，与钱镠一同唱起，一时欢歌笑语，热闹非凡。据说，此歌上承南北朝的“吴声歌曲”，下启明代之吴地“山歌”，也算是承前启后的经典之作了。

第二件，钱王王妃戴氏，娘家在横溪郎碧。每年春季，戴氏都要回娘家住一段时间。这一次住的时间长了，钱王便修书一封，虽则寥寥数语，但却情真意切、细腻入微。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这九个字平实温馨，情愫尤重，一时传为佳话。后来，被里人编成了《陌上花》的民歌，在临安民间广为传唱。北宋时，苏东坡来临安，听到里人之歌后，颇有感触，便仿民歌体写下了《陌上花》三首并引：

游九仙山，闻里中儿歌《陌上花》。父老云，吴越王妃每岁春必归临安，王以书遗妃曰：“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吴人用其语为歌，含思宛转，听之凄然，而其词鄙野，为易之云。

其一

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
遗民几度垂垂老，游女长歌缓缓归。

其二

陌上山花无数开，路人争看翠辇来。
若为留得堂堂去，且更从教缓缓回。

其三

生前富贵草头露，身后风流陌上花。
已作迟迟君去鲁，犹歌缓缓妾回家。

苏轼的学生晁补之一口气写了八首，其中二首云：

其一

临安城郭半池台，曾是香尘扑面来。
不见当时翠辇女，今年陌上又花开

其二

陌上偷来为看花，饶声鸂鶒莫天斜。
犍车缓缓随芳草，不去桃源阿母家。

还有一位叫谢启昆的，《陌上花》诗也写得挺有品位，他这样

写道：

铜九夜警龙无睡，稀闻宴乐春行围。
钱王高唱还乡曲，晋国初从陌上归。
归日新妆临石镜，翟衣光并镜衣映。
花开十里露初干，少时女伴争来看。
功臣山外烂如绣，香尘不动人依旧。

历代还有许多诗人都以此为题，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陌上花》一曲到了明代还是人皆能歌。在杭州九溪那边的林海亭上有一幅绝妙对联：

小住为佳，且吃了赵州茶去；
日归可缓，试同歌陌上花来。

下联也是用此典。

从两段故事可以看出临安民歌民谣悠久的历史 and 习俗。清代学者王士禛评论：“‘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二语艳称千古。”

天目山人长期处在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居大山谷中，桑麻丝枲之富自足”。歌谣中也有这种情感的表达，如天目山区广为流传的一首歌谣《除了皇帝还是我》：

脚踏炭火炉，手拿芭萝棵。
腌菜豆腐过老酒，除了皇帝还是我。

短短四句，得意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临安民歌中的小调是出过风头的。1956年，昌化文化馆组织了一批音乐干部到昌西一带搜集民歌和民谣，其中张文清搜集的《李三

宝》(原名《十不亲》)、朱臣煜搜集的《里郎歌》在浙江省第二届民间音乐、舞蹈观摩演出中都荣获一等奖,并收入《中国民歌集》,由中国唱片公司灌制了唱片,受到好评。1957年3月,昌化歌手王双凤还随浙江代表团参加了全国第一届音乐周,在北京怀仁堂献唱了昌化《采茶歌》。

爱情是临安民歌的主要题材,占了一半以上,如《望郎来》:

梅花正当正月开,梳头打扮出房来。
梅花落地如雪白,开门扫雪望郎来。
兰花正当二月开,燕子衔泥飘飞来。
梁上雏燕呢喃语,眉开眼笑望郎来。

这里是两个月,一直要唱到十二月,从中也能体会到临安乡人的浪漫情怀。负有盛名的《里郎歌》也是以爱情为线索:

门前喜鹊喳喳叫,
大红对子挂两边,
里郎里郎里里的郎,
蜡烛堂呀么堂前照,
新郎新娘来拜堂。
红花绿叶两相对,
知心人儿配成对,
里郎里郎里里的郎,
哥哥嫂嫂多恩爱呀,
明年生下宝宝来呀。

音调柔和,旋律优美。

有一首叫《望山郎》的民谣:

太阳下山四面黄，娇娘出来收衣裳。
衣裳搭在肩膀上，手扶竹竿望山郎。

简单直白，情真意切。

劳动是临安民歌的一个组成部分。十里不同俗，临安三千多平方千米土地，不同的《采茶歌》就有三种，王双凤唱的《采茶歌》流行在昌化一带：

二月（里）采茶茶抽芽（呀），
姐妹双双去采茶（呀）。
姐采嫩茶妹采片茶，
采（呀）采遍一般香（呀）。
二月（里）采茶茶抽芽（呀），
姐妹采茶手脚勤（呀）。
姐采多来妹采少（呀），
多多少少装回家（呀）。
十二月里倒采茶（咯），
牡丹花，待明年（呀），
茶篮挂在高楼上（呀），
小莲姐（呀），归还人家茶钱，
神仙花儿香待明年（呀）。

歌词清新，曲调委婉，似乎能够闻到淡淡的茶香。

反映劳动者疾苦也是临安民歌的一个常见题材，如《班工歌》：

太阳呵呵上山啰呵呵不下哎山，
做天班工啰呵呵实在难，
东家呵呵三餐吃格白米哎哎饭，

一碗猪肉罗呵呵放中央。
太阳呵呵上山啰呵呵不下哎山，
做天班工啰呵呵实在难，
班工呵呵三餐吃格芭萝哎哎饭，
一碗菜干罗呵呵过三餐。

在歌词中添加了具有方言特色的象声词，使得民歌的地方特色和感染力得到了加强。

有一首《打铁谣》，也是充满生活情趣。

金打铁，银打铁，打把锄头挖田缺。
挖着一只三斤四两大花鳖，送把丈人老头过年节。
丈人老头叫哦侬屋里歇，哦侬还是回到家里去打铁。

临安民歌虽然也以爱情类为主流，但生活类的民歌也占不小的比例。

李家出了个李三宝，
说起那个三宝真正不好，
天天在家困懒觉，
田里山里不去哎跑。
说起那个三宝真是一个宝，
说起那个三宝真正不好，
天天在家陪老婆，
讨了老婆丢了哎娘。
说起那个三宝宝宝宝，
说起那个三宝真正不好，
别人劝他他不听，

你说糟糕不糟糕。
暖三郎当，郎个郎子里，
里个里子郎，郎个依子郎。

这首《李三宝》的歌词内容是讽喻性的，对懒、逆、不听劝谕进行了无情地鞭挞，反映了当地淳朴的民风，遣词用句也带有浓郁的民间色彩，平实朴素，不取华丽典雅。此类题材还有《良言歌》《跌赌歌》等。

有一类是童谣儿歌，如《火焰虫》，韵味悠长。

火焰虫，夜游虫，茅草窠里点灯笼。
点得高，吓煞猫；点得低，吓煞鸡。
鸡肚肠，蛮蛮长，老鸦拖去搭蒲棚。
蒲棚倒倒来，老鸦哭起来；
蒲棚挽起来，老鸦笑起来。

有一首《山麻雀尾巴长》，跳跃性的思维，让人目不暇接。

山麻雀，尾巴长，长来长去接姑娘。
姑娘矮，嫁毛蟹，毛蟹轻，柯老鹰。
老鹰飞过山，骑牡丹。牡丹开，请秀才。
秀才娘子命不好，嫁着一个驼背佬。
驼一驼，瘸一瘸，瘸到前山岭上断了腰。

《山里山》带着大山的气息，又涂上了天目山佛教的色彩。

山里山，湾里湾，萝卜开花结牡丹。
牡丹娘子要嫁人，石榴姐姐做媒人。

媒人到，好商量，轿子到，哭爹娘。

爹娘哭三声，落轿拜观音。

观音娘娘看我头，金花银花戴满头。

观音娘娘看我脸，杭州白粉擦一脸。

观音娘娘看我手，金镯银镯戴满手。

观音娘娘看我身，大红袍子穿上身。

观音娘娘看我脚，粉红裙子盖小脚。

畲族民歌也成为临安民歌的一个特色。居住在临安的畲族约有4000人，多从丽水等地迁徙而来。临安畲族的风俗民情比较浓郁一些，比如过端午节，他们在艾蒿、菖蒲中还加三个蒜头，分别象征旗、剑加铜锤。以风车草水煮成红鸡蛋，他们有“五月节吃红卵，四季百病勿缠身”的谚语。这一天，妇女、儿童将红、黄、绿、黑、白纱线系在手腕、脚腕、脖子之上，称长命索，到了午后村人还会聚一起唱民歌。这些歌都是畲族自己的民歌，歌词丰富多彩，有一首在其他地方叫作《高皇歌》的，在临安的畲族族群中称为《盘古王歌》，这是畲族民歌中的代表作。前半部分叙述了远古时期的龙麒创建畲族的神话传说，后半部分记述了畲族由广东向浙江迁徙的史实，被视作畲族的史诗。临安现存的《盘古王歌》全篇共76节，304行，是民国十九年（1930）的手抄本。其中有许多带有神话色彩：

贤皇高辛在朝中，刘氏君秀坐正宫；

正宫娘娘得一病，三年头昏耳又痛。

高辛坐天七十年，其管天下是太平；

皇后耳痛三年久，便教朝臣叻先生。

先生医病是明功，取出金虫何三寸；

皇后耳痛便医好，金虫取出耳怀痛。

取出金虫三寸长，便使金盘银斗装；

一日三时仰其大，变作龙孟丈二长。
 变作龙孟丈二长，一双龙眼好个相；
 身上花斑百廿点，五色花斑朗毫光。
 丈二龙孟真稀奇，五色花斑花微微；
 像龙像豹麒麟样，皇帝取名叻龙麒。
 尤麒生好朗毫光，行云过海本领强；
 人人肽见心欢喜，身长力大好个相。

临安山歌小调的音调柔和，少有高亢绵远的，但是在号子中，也能品味到粗犷激越的风情。如《耖田歌》：

耖起耖耙管纳个吊子弄耘稻禾，
 去年收起千把担，今年要收万把箩。
 送郎来哎。

有汗水的宣泄，又有生活的祈愿。还有《打夯号子》《打麦号子》《抬石号子》《车水号子》等，音律高昂，配合劳动的节律，起到一种情绪调节的作用。

宗教音乐也是临安民歌的一个部分。主要有佛教音乐、道教音乐和基督教音乐。道教音乐有全真教科仪音乐和正一教道场音乐。正一教的祖师是出生在天目山的张道陵张天师，从某种程度说，临安也是道教音乐的发源地。临安的宗教音乐有《焚香调》《行香调》《上香调》《游十殿》《玉皇宝忏》《步虚调》《劝世文》《花名宝卷》等。

《劝世文》《花名宝卷》等都为宣卷调，是民间宣传因果报应，演说佛教故事的一种形式，对人们起着一种警世教化作用。

宋代天目山有位叫无门慧开的僧人，著有《无门关》一书，记载了许多禅门公案，其中第十九则公案中有一首偈语诗：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有人将其以民歌《孟姜女》调配上，禅味尤浓，成为佛教的经典音乐。前些年在衡山举行的中国佛教音乐会上，长长的序曲和尾曲都是反复吟唱这首曲子。

南宋诗人、刑部尚书、天目山人洪咨夔曾参加了一次民俗活动，写下《浮玉道士琴》（浮玉是天目山的别名），运用想象的手法，描写了天目道士琴的美妙声音：

老蟾亭午潭澄阴，
雄虬怒吼雌虬吟。
空岩纳息耳应心，
写之以神寓之音。
大音激越风振林，
细音窈眇云起岑。
天机不动天和深，
非亏非成非古今。
博山一点蓬莱沉。

临安在清咸丰、同治年间遭遇战乱，乡人遭杀戮者甚多，所剩无几，使得临安的文化出现了某些断层，民歌可能也是如此。之后，便有大量的祖居上八府的或者更远的人群迁移到了临安，多数是举族而迁，这些族群一方面接受本地的文化，另一方面也继续保留着原来居住地的文化，这使得临安的民间文化有了更大范围的杂糅，同样，民间音乐也具有了多元性，这在灯调中尤为明显。临安各地的灯舞甚多，有龙灯、狮子灯、花灯、鱼灯、马灯、滚灯、辇灯、采凉船，等等，大多只有器乐伴奏而不歌。那些来自上八府等地的族群，他们出的灯

舞伴奏音乐都带着原住地的色彩。

《临安民间音乐集》收集了临安民歌271首。对此书，文化局、文化馆花了很多年的时间，里面有很多人的心血，如张文清、朱臣煜、陈乃昭等，执行主编龚小祥也是音乐人，倾其身心，终有大成。

近年来，不少音乐家模仿临安民歌的风格和曲调，创作了一批民间情调十分浓郁的作品，使临安民歌得到了发扬和光大。

民间舞蹈

天目山民间舞蹈有三类：

风俗类舞蹈。最具特色的是民间灯彩舞蹈，著名的有临安水龙、吴越双狮、天目狮子灯、天目俞家龙灯、天目九狮红毛狮子、天目月亮桥马灯、太阳五凤朝阳、湍口变狮、潜川手狮、岛石红狮、河桥鱼灯、板桥红毛狮子、天目九龙灯、玲珑龙飞凤舞、青山龙腾狮跃、乐平麒麟灯、学川马灯等，这类舞蹈场面热烈奔放，气韵明快生动。

生产生活类舞蹈。如流行全境的采茶舞、乐平蚕龙灯，在舞蹈中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劳动的场面。又有青山朱村凤辇花轿、青山八戒背媳妇、龙岗采凉船、杨岭金岫花灯、龙岗云头舞、锦城竹火熄舞等，此类民间舞蹈众多，使人浮想联翩。

宗教地方神信仰类舞蹈。天目山是佛教、道教的圣地，民间舞蹈也受其影响。如天目山禅源寺和洞霄宫的烧烽篷中的民间舞蹈，又如道士舞、送瘟神舞等。此外，还有民间地方神信仰和其他信仰，更成为许多民间舞蹈的主题，如祭祀钱王仪式中的舞蹈，祭孔、祭社稷等活动中的舞蹈，各种庙会中的仪式舞，马嘯滚灯、湍口辇灯，等等，往往带有恭敬、庄重、舒缓等特征。

曾经在天目山区盛行的几种生产生活类舞蹈有：

花竹棍舞

花竹棍舞又名打莲湘、花棍秧歌。不知起源于何时，一度流行于天目山南部和西部。据记载，1950年龙岗镇群干村曾自发建立起了一支业余花竹棍舞表演队，常常在附近村庄表演，很受欢迎，20世纪60年代初曾参加昌化地区的文艺会演并获奖。

花竹棍长约1米，直径约2.5厘米，中间1—2节凿空，穿进若干铜钱，竹棍两头扎上彩绸。花竹棍舞都由身着彩绸服装的年轻姑娘表演，人数不限，单独一人也可表演，人多可列队表演。表演时姑娘穿上红、黄、绿色民族服装，头戴红色兔耳帽，脚穿八爪鞋，鞋前装有杨梅球。每人手持一根竹制花棍，随着花棍舞动，内中的铜钱发出“嚓嚓”的声音。花竹棍舞动作有敲肩、敲足尖、敲足背、敲脚跟、旋转等，前拍后挡边唱边舞。队形变化有直队敲、回头敲、绕圈敲、抽花敲等。此舞蹈适应不同的场地表演。

20世纪50年代，昌化县文化馆和於潜县文化馆都曾举办花竹棍舞培训班。

竹竿舞

竹竿舞，又称竹杠舞，是畲族、黎族、苗族、壮族、佤族、瑶族、京族等少数民族流行的一种舞蹈。

清代有畲族群体迁居天目山区，因此天目山区也盛行竹竿舞。20世纪90年代在旅游景区中也纷纷推出竹竿舞项目，参与性强，游客十分喜爱。

竹竿舞豪迈洒脱，热烈奔放。持竿者姿势有坐、蹲、站三种，变化多样。在有节奏、有规律的碰击声里，跳舞者要在竹竿分合的瞬间，敏捷地进退跳跃，而且要潇洒自然地做各种优美的动作。当一对舞者灵巧地跳出竹竿时，持竿者会高声地呼喊“嘿！呵嘿！”表示赞叹。如果跳舞者不熟练或胆怯，就会被竹竿夹住脚或打到头，持竿者便会

用竹竿抬起被夹到的人往外一倒，并群起而嬉笑之。善于跳竹竿舞的小伙子，往往博得姑娘们的青睐。

竹火熇舞

天目山区气候寒冷，火熇是山民的主要取暖器具。一到冬天，山民很早就会提个火熇抵御寒冷，不分老少，人手一个。前些年，临安衣锦小学排练了一个舞蹈节目“竹火熇舞”，一群孩子在上学路上，提着竹火熇，俏皮活泼，嬉笑打闹，反映了天目山区小学生们快乐的生活。

八

民间信仰



佛教对天目山风俗的影响

天目山佛教对当地的风俗影响甚大，天目山的许多民俗活动都深深烙上了佛教文化的印痕。

一、庙会中的佛教文化

旧时，临安境内有众多的庙会活动，一部分为佛教寺院的庙会，另一部分是道教或地方神的庙宇举行的庙会，但里面往往也夹杂着佛教文化。如东天目梅家土地庙会，其在每年七月十五前后三天，其中十四日要念佛做功德，十五日则要放焰口。太湖源包公庙会的仪式也相似，并在中午安排斋饭。佛教将包公视作伽蓝神，如中天目的普照寺塑有包公像。

直接为佛教寺院组织的庙会如板桥如龙倡亿庙会。如龙寺建于西晋永嘉二年（308），民国五年（1916）僧倡亿在寺中圆寂。寺院每年四月十四前后做道场，诵经拜佛、祭祀倡亿、放焰口超度亡魂，还有演戏和商贸，逐步形成庙会。

过去，清凉峰镇一带有一项非常出彩的类似庙会的风俗活动，就是抢老郎菩萨。老郎菩萨即是明瞻和尚，是南宋咸淳年间（1265—

1274) 龙塘山普济寺住持。据记载,明瞻是於潜人,排行第二,村人呼其为徐老二。自幼聪明好学,博览群书,通晓天文地理诸子百家。自幼茹素,12岁离家出走,皈依佛门,深研佛经,通晓医道。后明瞻治愈镇南王母妃所患乳痈,被敕封为“大宋七祖大师”。明瞻选定龙塘山建造寺院,当地百姓奉其为“神佛”,尊称“龙岩祖师”。圆寂后,百姓塑其像,在寺中供奉,以后逐步演变成昌西一带老百姓崇拜的地方神。从元末开始,在昌西原前十都(顺溪)、后十都(洲头、颊口)、十一都(马嘯)等地,流行“抢老郎菩萨”习俗。其中有七八个村轮流坐庄,轮到坐庄的村在秋后选黄道吉日,每户一人,并有仪仗队、马灯、采凉船、滚灯相随,去普济寺接老郎菩萨像到村里供奉。老郎菩萨像为榔树雕成,高一米多,重约百斤。每年十二月前,由漆匠飞金,选吉日开光,僧人念经祝祷,其他各村都前来祭拜。

抢老郎菩萨仪式定在每年正月初二。先要搭台,背靠一墙,三面凌空,前面大多为大畈麦田。由“舵手”即力气最大的人护卫放在台中央的老郎菩萨像,并由僧人祭祀念经。接着,各个村的文艺表演队伍进行“跳兵”演出。传龙岩祖师是皇帝派三千御林军送归,而后此三千人死于阴兵洞,“跳兵”是为超度士兵亡灵。主祭人手撑纸马(幡),一声令下,各个民间艺术队开始表演,有马灯、踩高跷、叠罗汉、采凉船、滚灯等,在松明、竹把、灯笼照耀下持续三个多小时。深夜子时,主持人一声令下,火光全部熄灭,台上台下漆黑一片。主持人从台上抛下卸去双手双脚的老郎菩萨躯干。台下每村选出聪明健壮的年轻人,在黑暗中你争我夺,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不得出声,一直争抢几个小时,庄严而神秘。到寅时许主持人宣布结束,抢夺立即停止。抢到菩萨的人紧紧抱住,由台上主持人宣布当年的老郎菩萨到某某村去。抢到者先上台祭祀,然后给菩萨装上手脚,与同伴一起抬到自己村中,供奉近8个月,秋收后选择吉日,敲锣打鼓将菩萨归还龙塘山普济寺。民国初年,抢菩萨时房屋倒塌,多人被压,但未伤一人,村人说是老郎菩萨保佑。此项活动少则有几百人,多则几千甚至

上万人参加，整个昌西甚至安徽歙县、绩溪都有人来。该俗沿袭至20世纪50年代初。

二、节日中的佛教文化

佛教节日在天目山民俗中多有体现，如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信众都要到寺院礼拜。四月初八为佛诞日，诸寺院各有浴佛会，僧尼辈竞相以小盆贮铜像，浸以糖水，覆以花棚，铙钹交迎，遍往邸第富室，以小杓浇灌，以求施利。

还有腊八，康熙十二年（1673）《昌化县志·风俗》中载：“十二月初八日，寺僧多建法会，以杂蔬果作糜粥，邀诸檀施者猷焉，谓之腊八粥。”改革开放后寺院活动逐步恢复，全区多数寺院都在腊八前开始煮腊八粥，与信众结缘。

在春节，大年初一多有人到寺院烧香，并以争得头香为荣。

在天目山一带也盛行狮子崇拜，除了寺院庙宇门前有放置石狮的习俗外，村祠或大户人家门前也有放置狮子的，内中梁柱牛腿也都刻有狮子。尤其是民间灯彩，天目山一带有着众多的狮子灯，有红毛狮子、绿毛狮子、软腰狮子等，西天目九狮村有九狮灯，东天目有吴越双狮等。

龙与佛教有很深的因缘，龙也是天目山的一种图腾，龙的崇拜已成为天目山的一大习俗。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逢干旱都要求龙王降雨，节日则要闹龙灯。临安水龙是天目山龙文化的一个典型。锦城街道的横溪黄龙则有特殊规制，传此龙灯为吴越国国王钱镠和其结发妻子戴氏芙蓉所赠，戴氏夫人是横溪郎碧人，年年春节回乡省亲，赠此龙灯，与民同乐。传此龙灯接的是护龙寺中接龙井中的龙神，当地每年扎好龙灯，都要到护龙寺中，请寺院中的住持以接龙井中的水为黄龙开眼。

三、丧葬仪式中的佛教文化

旧时出丧，有钱人家要请僧道做佛事道场。1949年后，这些习俗逐步淡化。至20世纪90年代，此习俗又有恢复，并越发受到重视。因道士渐稀，现在多请僧人做法事，农村死者家属常请一些老妪为死者念佛。临安一带都要做七，逝后每隔七天即行祭礼，昌化一带以三七为大，临安一带以五七为大，一直到“七七”，谓“断七”。做七本是由佛教经典而来。天目山民间歌谣中有《哭七七》一曲，内容虽是少妇哭诉丈夫早逝的悲伤，但亦能明显见到佛教文化的影踪。“头七到来哭哀哀，手拿红被盖起来。风吹红被四角摇，好像我郎活转来。……四七到来做道场，亲戚朋友都到场。廿四和尚团团转，奴奴打发去装香。……六七到来见鬼王，鬼王见过见阎王。牛头马面两边站，当中独跪我的郎。……”有的寺院设置逝者牌位，多为后辈将前辈的生辰忌日写于牌位之上，寺院长期以经忏超度。如在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的妻子去世后，赵孟頫多次请天目山中峰明本禅师下山为她举行超度法会。赵孟頫《尘事帖》中有记载。

四、生产生活习俗中的佛教文化

唐大中元年（847），黄檗和弟子楚南至千顷山建慈云禅寺（后改龙兴寺），现存遗迹。寺南有山，名黄檗山。传说中黄檗法力高深，在当地留下许多神奇故事。昌北一带有七十二社尊其为地方神，称为“老菩萨”。其非泥塑木雕，而以画像为尊，高六尺六，阔三尺三，合九九之数。画下面三分之二为黄檗全身坐像，上为皇帝敕封的圣旨和皇印，并以黑绫封住。每年要请画师重画祖师像，将旧画像上方二枚印启下，裱至新画像上。在为画像开光前需择吉日到洞前“跳兵”，由当地人画上脸谱，穿红着绿。有手执钢叉，有骑“马”撑旗，有敲锣

打鼓放鞭炮，浩浩荡荡从苦麻洞起神，天黑时来到开光处，通宵达旦欢闹，观者如潮。

旧时，昌北一带夏至前后有安苗节，七月十五要安秋，都请老菩萨（黄檗祖师），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传老菩萨管七十二社，安苗须提前约定，由总社安排日子，各村不一，由管年头的通知到各户。到此日，村民带锡箔、香纸、蜡烛、炮仗及供品，先在庙中参拜神像，随后巡看青苗。巡行队伍前面有大开锣喝道，随后数人抬着老菩萨的画像，接着是锣鼓、唢呐、钢叉、三角旗队，最后是其他村民的队伍，每人手执红绿小旗，依次巡遍村民每一块田地。回到庙中再行参拜，求老菩萨保佑风调雨顺，无虫无灾。“行香”结束后解散。也有村巡行结束回至家中祭拜。另有安秋，在农历七月十五举行仪式，与安苗仪式相似，但在每户的供品中增一“秋”包（面粉做成长椭圆形，似蜗牛状、背上用菜刀划横斜条路纹，里面包糖或芝麻）。逢大旱或虫灾，也要举行仪式求雨除虫。当地村民遇牲畜有病，也会求助祖师。该俗沿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画像保存至今。

在龙岗等地，有一项保稻熟的民俗活动。农历七月半前选一晴天，事先扎好草船，中置诸神像并插红旗。挂帐，每幅帐上写“祭兵”“迎神”“保苗”“嫁接”“遣驱”“法事”等。请道士多人主持，和村民一起完成接神、引兵、召将、祭兵、游船、讨、安慰、开大旗等程式。“召将”为请“太岁”“五圣”“城隍”“土地”等。据传，这些神中“土地”往往见怪，称“赖土地”。“祭兵”为焚香祭拜各路兵马。“游船”为保熟仪式的核心内容，拾稻草扎成的大船，敲锣打鼓，逐村巡行田畈。“讨”即求问吉凶，游船回来在庙前各路兵、神、菩萨处“讨”。以两个半块四五寸长形似水牛角的竹根，由道士合在手心，口中念祷词，然后双手松开让竹根落下地，两半平面朝下，为阴，不吉利；两半平面朝上，为阳，中平；一阴一阳，大吉大利，为菩萨同意，叫“放”或“胜”。菩萨不放，道士得重新扔一次，每扔一次，所念之词都应不同。直至“放”“胜”。“安慰”，即请菩萨安心帮助做好法事。

“开大旗”为仪式中的压台戏。一根粗竹撑一面大红纸旗，竹顶插上粗重柏枝，壮汉数名轮流举着满场跪走，每人跪走1—2圈，锣鼓急点，爆竹齐鸣，众人“号——号——”呐喊。数圈后，众人开始抢撕大旗，撕到者为吉利。直到大红纸旗撕完，活动结束。该俗20世纪50年代后淡出。这项活动是受黄檗祖师信仰的影响，活动的许多内容十分相似。

昌西一带元宵节要携供品去拜老郎菩萨。头年生儿子的人家，要出钱接老郎菩萨来村闹元宵。建房立柱，户主用金银纸三张、香三支，把香卷在金银纸中间称为“老郎”。由木匠把“老郎”置于东正中屋柱上，以期家宅平安。待泥水匠墙砌到此处时，才可将“老郎”拆除。该俗沿至20世纪60年代。

在龙塘山石林“万山天窟”旁有一洞，称为“悟道洞”，一名“坐禅龛”，方广逾丈。传为明瞻禅师当年跌坐其中，获神通三昧。后有安徽一位云游和尚来此，也在洞中打坐两年，悟出了“得子诗”一首，刻于洞壁，现已模糊不清。昌化一带有多年未得子嗣者，上山来此洞顶礼膜拜，祈求一子半女，传甚为灵验。

龙岗镇外川村有一棵千年银杏，附近众人争拜其为“亲娘”，并视作观音，每年农历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来树下祭拜。寄拜后多数人要相应改名，将树名嵌在人名当中，如柏生、柏荣、樟兴、樟根、桂香等。这种习俗明显是受观音信仰的影响。

《花名宝卷》是南方的一种唱书，曲调委婉动听，唱词以佛教教义劝人为善为宗旨，以一年中每月盛开的鲜花名引头，在天目山一带尤为流行，对教化民众有着特殊的作用。“花名宝卷初开言，诸佛菩萨降来临。茶花开来早逢春，媳妇贤良敬大人，保佑公婆寿千岁，门前大树好遮阴。孝顺公婆为第一，自己也要做婆身。你若不把公婆敬，生男育女也虚文。在家买些公婆吃，何用南海去斋僧。一心只管行孝道，皇天不负孝心人。”也有一些民谣，饱含浓郁的佛教文化。如《牡丹姐姐》中有如此唱词：“抱上轿，哭三声，下轿拜观音。南海观音笑盈盈。”又如一首《山里山》的民谣：“爹娘哭三声，落轿拜观音。观音

娘娘看我头，金花银花戴满头。观音娘娘看我脸，杭州白粉擦一脸。观音娘娘看我手，金镯银镯戴满手。观音娘娘看我身，大红袍子穿上身。观音娘娘看我脚，粉红裙子盖小脚。”

在清袁枚的《子不语》中，天目山一带多猴，山中人多有蓄养而役使的。有罗某，是临安的大户人家，得一猴，自其幼时，即教以杂事，非常灵慧，洒扫则地无纤尘，拔草则根株齐起，煮茶执爨，一一皆会。浇灌花卉，枝叶间虫蚁，都一一搜剔无遗。还能握笔作画。天目山还有斋猴的习俗，欲斋猴者，先往韦驮殿烧香陈祝，在菩萨前称某某日子来山斋猴，僧人为之悬牌晓示。届期，主人买馒头一千枚，置于禅源寺外隙地。清晨，群猴毕集，有一老猴，白髯尺许，行走伛偻，旁有二猴，亦白须，相与扶持而来，群猴跪迎。老者南面就地坐，群猴拱手亦坐下来，安静不哗。有二侍者捧馒头献老猴，老猴食，然后群猴共食。食毕，向主人拱手拜谢而去。

五、民间传说中的佛教文化

天目山是佛教圣地，受到佛教文化影响的民间故事在天目山一带较多。

南宋时，龙塘山上有一座普济寺，住着一位高僧明瞻龙岩祖师。相传有一次他去杭州，遇到了愁眉苦脸的济公和尚，因为济公所在的净慈寺遭了火灾，欲重建却少木料。龙岩祖师就说：“我那山上就有许多的大树，你要多少给你多少。”济公和尚说：“龙塘山距杭四百多里，不通水路，如何运来呢？”龙岩祖师说：“这有何难！龙塘山上有个池，我将木头放进池中，你在净慈寺里凿一口井，就在井里捞就是了。木料够了，你喊一声就是了。”于是，济公就在净慈寺里凿了井，龙岩祖师就将木头放进龙塘山上那口池里，然后脚一踩，木头就在净慈寺的井里冒了出来。不久，净慈寺的平地上就堆满了木料。济公算了算差不多够了，就对着井里喊了一声：“够了！”龙岩祖师听说够了，脚

下一松，最后一根只踩了一半，净慈寺井里也只冒出了一半。造到最后，济公却发现少了一根梁，想到井里还有一根木头，拿了绳子去拉，可再也拉不出来了。至今，龙塘山的池里和净慈寺的井里，那露出的半根木头都还在。

天目山一带流传着一则民间故事《三斤血》：一穷人到财主家做了三年长工。第三年腊月廿三，送过灶司，财主对长工说：“你吃饭不付铜钿，困觉不付铜钿，三年合并算清爽，净付三十铜钿。”长工没有办法，只好拿了三十铜钿出门。到坊间，买了三斤青油，送到庙里点灯。寺院方丈知道长工要来，便把寺院打扫干净，让大小和尚都出山门迎接，极为隆重地把长工接进方丈室，又是泡茶又是请其用斋，受到了极高的礼遇。这件事传出去，财主听到了，心想，长工送了三斤油竟然如此风光，我去庙里，看方丈如何待我。于是财主就让人挑了三担油，送到寺院。到了山门，竟然无人迎接。有一个小和尚过来，让挑夫走偏门。财主粗声道：“别人三斤油进正门，我三担油为啥走偏门？”小和尚道：“师父说，昨日那位施主的三斤油，实在是三斤血，而你的三担油容易得很，跟水一样。佛门讲一个诚字，不在施物的多少。”财主听了脸色一阵青一阵白。虽是一则民间故事，其寓意却十分深刻。

还有一则《南无阿弥陀佛》的故事。说是一个叫阿弥的人，很穷，但忠厚善良，给南无山下的张员外打长工。有位叫小三的，母亲生病，家里断了粮，就偷了张员外的六谷，张员外追问，阿弥就说是自己偷的，张员外不信，故意问：“田里的稻谷是谁偷的？”阿弥以为也是小三干的，便也承认下来。张员外是一个善人，知道阿弥是想代人受过，也就不追究了。后来，村子里来了一个叫花子，身上长了许多虱子，又得了病。一位长工就跟阿弥说：“叫花子没地方睡，让他和你一起睡吧？”阿弥可怜叫花子，便同意了。谁知第二天起床，发现叫花子死了。阿弥就将尸体背到南无山上，挖了坑，正想埋葬，叫花子却活了过来，身上异香扑鼻，拉着阿弥的手说：“善哉，善哉，你心肠

真好，可以成佛。”说完，和阿弥一起驾起五彩祥云一起飞天走了。后来，人们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是山名，阿弥是人名，陀佛是驮佛的意思，是为了劝人为善，学做阿弥这样的好人。这虽然曲解了佛教中“南无阿弥陀佛”的本意，少了一份恭敬，却不失劝人学好的善意。

也有现代真实的故事，如胡月耕先生访问写成的《德钦和尚护宝树》一文。说的是临安锦南柯家头有一座胜因古寺，20世纪50年代遭毁坏，只剩几间破房和庙前一棵600多年的罗汉松。守候古庙的最后一个和尚叫德钦。“农业学大寨”时，柯家村的书记命令民兵突击队将罗汉松砍掉，德钦和尚死命保树，躺在被挖开的土坑里，双手紧紧护住罗汉松的树根，并说：“这棵树是开山祖师栽下的，历代师父浇灌培育，谁要伤它，我跟他拼命。”众人无法，只得打消砍树的念头，这株罗汉松逃过一劫。至今仍挺立在胜因寺旧址上，还被列为“临安市古树名木”，成为当地的一道风景。

另有天目山月亮桥《倒拖鞋观音》的故事，主题是劝人要行孝道。《观音豆腐》的故事，主题则要大家在生活中对佛常生感恩之念。也有故事是揭露假僧人贪心未除、行凶作恶的，如《米济山》《狗迁寺》《火烧红梅寺》等。这些民间口耳相传的故事或多或少带有教化功能，也体现了佛教文化的影响。

天目山是韦驮菩萨道场，韦驮菩萨在天目山有数则民间传说。相传，很久以前，韦驮尊天菩萨与地藏菩萨发生了误会，化身打脚僧从九华山下来，途经龙飞凤舞、狮蹲象踞的天目山，萌生在此结庐之念。不久，他就在东天目山建起了一座伽蓝。一天，他同时在杭州、富阳、昌化等地出现，祈请各处高僧大德及善信于六月初三光临天目山，届时举行开坛升座的大法会。这天一早，钟鼓齐鸣，祥云绕殿，瑞兆映门。诸山大德如约前来，十方善信辐辏云集。锦幔华盖，彩灯鲜花，经声佛号，盛况空前。钟响三遍，僧伽进坛，信众依次而入，拈香点烛维那击磬，合掌三拜毕。“行脚僧”沐浴更衣，肩披紫袈裟，神态端庄，在悠扬的佛乐声中登上法座。一声鼓响引磬木鱼齐发，念吉祥之

神咒，诵甘露之真言，迎香花，降法雨，一切如仪。法事圆满后，四众缓缓散去。就在此时，座坛法师即位，“行脚僧”却突然失踪了！众人四处寻找，均不见其踪影。至晚，佛前之灯不点自明，一盏油灯，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再仔细一瞧，发现神坛上多了一尊菩萨，一尊全身戎装，手执宝杵，威武端庄的韦驮尊天菩萨之坐像。僧众见此，钟鼓齐鸣恭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传说，从前天目山寺院里供佛菩萨的烛台，富阳送来的用锡打，於潜送来的用铜镶，孝丰送来的用铁铸，昌化送来的用石凿。韦驮菩萨像前用的是富阳的锡烛台。富阳有一个吕百万，娶了三个媳妇都没有生育，又娶了第四房，怀孕了，十一个月了还没生，遇到难产了。这时来了一个天目山僧人，在吕百万门口敲木鱼。吕百万信佛，就把僧人迎进家中。僧人说：“施主要得贵子了。”吕百万眉头紧皱，说是老婆难产。僧人便给了吕百万一包药，让孕妇服下，不一会儿，顺利产下一男儿。吕百万五十岁得子，喜出望外，对僧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询问僧人法号，回答说是“危渡”。几日后，吕百万到天目山还愿，问来问去都不知道有一个叫“危渡”的僧人。吕百万记起，僧人戴了乌木戒指，又满寺院找。发现韦驮菩萨像的手上戴了乌木戒指，想到“危渡”谐音韦驮，认为是韦驮菩萨显灵，便发愿重塑韦驮菩萨金身，特地定制了一副精美的锡烛台。

另有一则传说。临安一带有一年遭天灾，稻米无收。寺院里的粮食吃完了，寺中僧人数日粒米未进。正在此危急时候，有七八个汉子挑了粮食送来寺庙。老僧问起缘由，汉子们说，我们员外有一位闺女，半身瘫痪，百医无效，前几天一位自称是天目山的青年僧人送上灵丹妙药，立时痊愈，这些粮食便是员外谢医的。寺中僧人觉得奇怪，本寺年轻僧人并未说起，且都不懂医道，怎么会有此段因缘？让汉子们指认，一个个都不像，看到韦驮菩萨的像，说与此菩萨相貌极似。寺中僧人方知是韦驮菩萨显身，护佑僧人。

在民间风俗中，韦驮菩萨还成了地方保护神，百姓遇到难事要事，

便向韦驮菩萨祈求护佑。在天目山一带，逢大旱，百姓都会到寺院里来，向韦驮菩萨祈求降雨。清光绪十五年（1889），旱情实在厉害，官员率百姓向韦驮菩萨求雨，立时降雨，旱情缓解。此事上报朝廷，光绪皇帝还御赐“福佑潜城”匾额，惜在民国三十年（1941）日寇轰炸禅源寺时被焚毁。现寺院中悬挂匾额已非原物。

道教对天目山风俗的影响

天目山是道教的发源地之一，旧时道教宫观比较多，山区的风俗中因此也增加了许多道教元素，使得风俗文化较之其他地区显得更加丰富多彩。

一、道教与年节

天目山人在逢年过节的习俗中，许多地方有道教元素或受到道教文化的影响。

正月十五，道教为上元节，宫观中有祭祀神祇、诵经和法事活动，民间有集资定制大香大烛，在宫观神像前焚烧的习俗。民间灯会中多绘有道教故事。清凉峰镇路口滚灯，其中就有八仙的造型，铁拐李身背葫芦，汉钟离子摇葵扇，吕洞宾腰挂宝剑，张果老倒骑毛驴，韩湘子口吹洞箫，何仙姑笑坐莲台，蓝采和手提花篮，曹国舅恭持玉板，个个栩栩如生。

农历五月初五，旧时天目山区农村居民要在墙脚四周撒石灰，贴朱书“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诸邪回避”等。旧时这一日，道士要到各乡村分送钟馗像，或尺幅黄纸，盖以朱砂，画上天师灵符等，贴

于中门，而各家则回送给道士一升米。有的用泥做成张天师像，以艾为头，以蒜为拳，放在门上。以此来避邪。如今这一习俗中的道教元素渐淡，仅插艾叶蒲草，表意旗和剑。

十月十五为道教之下元节，道教认为下元为水官解厄之日。天目山区的宫观皆要诵经做法事，设斋建醮，解厄荐亡。民间也备菜肴，祭祀祖先、神灵等。

十二月廿三晚为灶君上天庭向玉皇大帝奏事之期，家家户户在灶龕换上新的灶公菩萨画像，菩萨旁贴“上天重重奏好事，下地日日保平安”。念《灶司经》：“念念灶司经，灶司菩萨生龙廷，一年四季保太平，好人好语带上天，恶人恶语丢两边，平地开花朵朵开，全家老小靠青天。”以酒食祀之，其中有麦芽糖，意为使灶君食甜食说好话，或说以糖粘住灶君嘴无法说出该家劣迹。传灶君全年茹素，仅该日可开荤，故每家必饷以一鸡，此为“谢灶（送灶）”。到了十二月三十，各家又在灶台摆上供品，再念《灶司经》，迎接灶君，祈求带来平安和财富，此为“接灶”。昌化将十二月廿四晚称作小年夜，祭祀百神和接祖先。灶神亦称灶王、灶司菩萨等，传为玉皇大帝派到人间察看善恶之神，也被列为道教系列。

二、生产、生活和道教

天目山一带的生产与生活中夹杂着许多道教的元素。

商店开张，企业经营，有时请道士诵经做法，祈求发达，并张贴一些“八仙过海”等道教题材的绘画。

民间建房，照壁和马头墙上多绘有道教故事的壁画，尤以明暗八仙、姜太公遇文王等最常见，砖雕木雕也多刻明暗八仙的故事。在建房过程中，必须举行一个非常隆重的上梁仪式，上梁犹如人之加冠，其中《赞梁词》中就有诸多道教的元素。“一敬天，天上两位老神仙。二敬地，地下生富贵。”“八槌八仙来恭贺”等。这种上梁的习俗沿用

至今。

道教建设宫观，也有上梁仪式，《洞霄图志》中就收录了陆维之撰写的一篇《洞霄宫昊天殿上梁文》，从文中内容可见，高宗皇帝、韦太后、吴皇后等都参加了这次活动，这是天目山区历史上规格最高的一次上梁仪式。

七月十五，在天目山区各地还要举行保稻熟的祭祀活动，事先扎好草船，置诸神像并插红旗。挂帐多幅，上书字。

久旱未雨时，天目山民多往龙祠、龙潭求雨，也有到道教宫观中求雨。如到天师宫、洞霄宫以及其他宫观求雨，据传十分灵验，旧书多有记载。如唐大历四年（769），黄岩等地久旱无雨，求遍各地神庙无果，后来到洞霄宫求雨，立刻应验。又后唐天成四年（929），吴越大旱，上年十月起至次年春夏无雨。钱王派大臣到洞霄宫投龙筒，次日傍晚即倾盆大雨。康熙三十六年（1697）和康熙四十二年，海宁两次干旱，县令送匾到洞霄宫，孙练师的弟子陈戴墨法师祈祷后，大众仰天观看，见黑云中似有天神像，不久倾盆大雨。

官方祭雨，仪规严谨，且有祭文。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於潜县志》有“普惠王庙”一目：“普惠王庙在天目山，祀天目山神。后梁乾化五年（915），武肃王奏请于朝，敕封王号。嘉庆六年（1801），奉抚宪阮飭、於潜县令赴山致祭。嘉庆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复奉抚宪阮遣官致祭。”并附有祭文。

祭普惠王文

维大清嘉庆十四年，岁次己巳春二月丁卯朔，越二十有八日戊午，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浙江巡抚部院阮元，谨以少牢之仪，致祭于天目山神。曰：“天目两山，作镇杭湖，出云降雨，汇于县区，唯吴淞口，入海尾闾。洞天福地，神明所都，雷兴电掣，龙起云浮，开晦霁阴，风收驱除，宜晴而晴，野无沮洳；宜雨而雨，嘆都立苏。神功圣德，佑民非虚。近年数郡，水旱堪

虞，田未丰获，潦浸田庐，长吏省恩。政刑有渝，未能感召，致鲜嘉符。今致洁蠲，民隐上疏，香醴入山，牲帛载途，拜求灵祐，惠此越吴，蚕桑倍收，麦稻大余，功祐圣世，恩及农夫，疆吏祈报。谨竭其愚。尚飨。”

三、道教与庙会

天师宫位于潜川镇紫溪村，原为张道陵故宅，后建为宫。初建约在东汉，最后修建于清代，共三进，约500多平方米。民国时期曾有50余位道士住在宫内，1949年后道士逐步散去，内中神像毁于1968年，建筑约在20世纪70年代被毁。据紫溪村村民李石生介绍，旧时天师宫常常举行庙会。举行庙会时，先要在天师像前供上祭品，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有时还要请道士戏班或地方剧团演戏。庙会期间，各路商贩汇集，商贸交流十分活跃，附近许多村子的村民们赶来，参加祭祀张天师的仪式，守庚申，还有更多的人来看道士戏班、剧团演出，也购买日常用品，已经成为当地一个习俗。

除了天师庙会，天目山区举行的其他庙会中也带有许多道教的元素或受道教文化的影响。

农历七月廿四，龙岗镇桃花溪的东平殿举行庙会，要请本地道士做道场。

青山湖街道主天庙，内供朱大天君，每年四月廿三夜里，邀道士诵经礼忏，吹打乐器、法器，乡民焚香礼拜，火铙声、鞭炮声整夜不绝。

农历五月十三，青山湖街道关帝庙举行庙会，旧时每年要请和尚、道士诵经念佛，法器齐鸣，青锋台（戏台）日夜演戏。

旧时在农历大年三十夜晚，与禅源寺的“烧烽篷”活动相似，洞霄宫也有“烧烽篷”传统习俗。这是一项以洞霄宫为主体，附近村民协同参与的祈福活动。最后一次是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大年三十举行。

四、天目山区的道士戏

随着民间戏曲的兴起，道教的传播与戏曲形式相结合，形成了道士戏，主要是为办丧事人家设忏超度做道场。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寓意深刻，场面非常热闹，受到老百姓的欢迎。虽然有浓厚的迷信色彩，但惩恶扬善、祈求太平、劝人为善的主旨对社会仍有积极作用，是一种有益的教化形式。

道士戏分为阴事、阳事。其中阴事就是为丧事服务，家中死了人，死者家属请道士去为死者超度亡灵。其中有演一天一夜的，称点灯拜忏；也有演三天三夜至七天七夜，在演出中，有时家属和观众亦可参与表演。

主要程序有：

启建：开场，敲“急急风”锣鼓、放爆竹鞭炮；迎神，先迎张天师，再接本地的菩萨神祇。

礼忏：一至八人不等，每人手拿云帚。如八人时四个跪下，四个站立，跪在香案前唱念道教《经忏》，念完四句后，跪下的道士站起，站着道士跪下，为死者超度。

设席：死者子女孙辈和所有亲属中的小辈听从道士号令，在棺材前的香案上，向“死者亡灵”敬香、敬酒、敬饭。

游十殿：道士唱积德行善之词，领死者魂灵去见过十殿阎王。堂屋两边挂上表示人死后去阴间因果报应的十殿画屏（称佛帐），一边角上放一张半桌，半桌后面坐着化好妆的“阎王”，半桌两边坐牛头马面，威严肃穆。一“道士”手执铜铃和领魂幡在前面边走边唱领路，随后跟着手捧灵牌的孝子，其后所有子孙亲属列队边哭边走，这样绕场走上十圈。每走一圈，“阎王”都要审问走到面前的人死者生前有无做过杀人放火、谋财害命之类的恶事，要“他”从实招来，以求赦免。“阎王”的惊堂木，往往震慑、劝化的是观戏之人，从而产生教化

功能。

道士平时穿青色对襟衣、青色灯笼裤，脚穿黑色布鞋。到了演戏时，一般穿古装蓝色长袍，袍上绣有阴阳卦图，头戴方巾帽，帽上绣有字，肩披黄色披风，下着绿色灯笼裤，脚穿“八卦鞋”。

道具主要有焚香炉、朝板、铜制摇铃、云帚、木鱼、七星剑、白色招魂幡等，一般都从戏剧服装店购买。

道教戏中的音乐也非常美妙。道士戏节奏缓慢，场面悲切。表演时，道士们手执云帚或朝板、铜铃、招魂幡等，边演边唱，演时配有念词，唱时配有极具特色的曲调和锣鼓，形态动作与古装戏相同。

道士戏与佛教的目连戏相似，其中内容也多含有佛教文化的内容。如“十殿阎王”的概念就是受佛教文化的影响而来，而《目连救母》则是佛经中的一则故事。

道士戏在1959年前较为普遍。据文化部门调查，民国时期，昌化镇有以余祖槐（石坎人）、曹来法（箬建人）为首的道士戏班子在昌化、於潜、宁国等地演出。民国三十四年（1945），潜川镇牧亭村童均宏、方连富拜潜川镇麻车埠村的张汝锦为师，学习道士戏，两年后，即能单独带队演道士戏了。1947—1958年，道士戏班常受死者家属邀请，在於潜地区演出。

1959年以后，道士戏逐渐消亡。

五、道教和地方神

在於潜、昌化一带的民俗中，张道陵是他们信奉的地方神。这里以天师教为尊，遇事常请道士施天师法术，境内还流传有较多张天师的传说。旧时各地的天师后人以及当地信徒都要去天目山、生仙山天师宫祭祀张天师。旧时，天师宫常常举行天师庙会。举行庙会时，先要在天师像前供上祭品，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有时还要请道士戏班或地方剧团演戏。

旧时，昌化溪可通航，船过青山殿，都要祭祀张天师。遇到久旱未雨，当地村民也有来天师宫求雨。据调查，求雨活动中未有大型的踏街活动。但乐平村去河桥抬柯相公求雨沿途游行时，不能经过天师宫门口的大路，必须绕道而行。据说有一次未绕道，经过天师宫时，发现柯相公的神像表皮有裂损，传冒犯了张天师，后来均绕道。

於潜城南门外和西区木杓溪，两村有从福建迁来的人口，因此旧时建有“水灵宫”，供奉顺天圣母、临水夫人陈靖姑的神像。陈靖姑（767—791），福建人，父亲陈昌为朝廷户部郎中。受家庭影响，陈靖姑从小信奉道教，13岁去江西闾山学法，15岁学成归来。后嫁于刘杞。遇皇后难产，道姑陈靖姑助产有功，被德宗皇帝封为“天仙圣母”。父母身患痼毒，道姑陈靖姑手执宝剑，念经朝咒，绘写灵符，割股救亲，治好了父母之沉痾。唐贞元七年（791），身怀六甲的陈靖姑，为助胞兄、闽国天师陈宁元，脱胎祈雨，被妖魔所害。后福建百姓立道姑陈靖姑为地方神祇，并随迁居，成为於潜一带的地方神。

六、道教与婚丧习俗

丧葬多尚佛老。如出丧，旧时许多人家要请僧道做佛事道场，还有做“道士戏”的。20世纪70年代后一度革除僧道诵经拜忏，90年代后有恢复。

婚仪中也含道教的元素，新郎新娘要在“新贵人登堂”声中，向厅堂内拜“福禄寿”三星，向外拜天地等。《结婚传袋词》中则有：“一代传二代，……张仙送子到堂上……”“二代传三代，魁星提笔点元来。”“……送给新娘一贵子，天上麻姑赐酒来。”“六代传七代，七仙女下凡来；七仙仙女送太子，太子登基国运泰。”“七代传八代，八仙过海显奇才……”

七、道教与疾病治疗

道教中有一路为武道士，多为病人祛除病魔，或为房屋宅基以及其他地方驱赶邪魔鬼怪。山里人逢家中有人生病，请医抓药均无效，旧时会请道士来踩红砖过火焰山、放油火、请夜菩萨、打黑房捉妖、收鬼箭等驱邪赶鬼。新中国成立后，这些迷信习俗已渐消亡。

踩红砖、过火焰山

病人家中将白炭倒在堂前烧红，再取十余块青砖放在白炭中烧红，道士念一盆符水，名叫“六月冰”，带领大家脱了鞋，脚底抹过六月冰水，接着赤脚板从红砖和炭火上踩过去，来回三至五次。接着，道士将红砖捧到房子的角角落落放好，再到炭火里打滚，直到炭火熄灭。帮忙的人把炭灰清扫倒掉，再将病人从卧室扶到堂前坐定，道士进行审问。

放油火

家中有人生病医治无效，请道士放油火驱邪。堂前中间搭好砖头架，上面放一口铁锅，倒半锅菜油，下面炭火烧旺，将菜油烧滚。道士念咒后手伸到锅里去洗手，吐出一口水，炭火越来越旺，后道士一诀咒语，油火全灭，这样反复三到五次。

请夜菩萨

病人生病医治效果不好，请卜卦先生占卦，如果卜卦先生说有邪气，就要请夜菩萨送鬼：一只米筛放在病人床前，米筛里放三荤三素六碗菜，三杯酒，三双筷，点起香烛，祈告一番，用菜刀在床沿上响敲三下，令野鬼快走。然后米筛捧出房门，捧到三岔路口或河坑边放下。一路走来不可回头看，碰到人不可讲话。香烛、锡箔、黄表纸烧

过，再把酒菜吃光，走人回家。菜碗等物放在地上，三天后病人家属去洗净收回家。

打黑房捉妖

家中有人生了病，久治不愈，就请道士来打黑房除妖。夜里，病人房里不点灯，道士和帮忙的人从离家半里路的位置烧香叩拜请祖师下界，备用的三至五支土枪经道士盖印，土枪里装满火药，没有铁砂子。道士穿戴法衣法帽，肩背号角土枪，手抓一把细砂，拿着马鞭，由熟人带路走向病人房间。一脚踏进房门，道士把砂子撒到房里，猛喊一声，枪指着病人床底一阵乱打，锣鼓同时响起，整屋灯火通明，道士挥舞一阵，在病人身上盖上法印，然后离去。

赶鬼

病人生病久治不愈，要请道士做法事赶鬼。道士用稻草编成辫，盘成一条草船，船长约2尺，宽近1尺。大船盘7层辫，小船盘5层辫，船上插4个纸扎人物：东平王、太子、艄公、水手，另插一些彩旗。纸船置正厅中，香案摆病人房，正上方竖张天师牌位，桌上摆斋供。时辰到，道士一手持桃木剑，一手持香，在病人屋中做法，家属手拿香火跟着。道士念咒，念罢符咒，道士持香先敬牌位，然后围病人转一圈，用剑拍床。另一人端起收在筛子里的斋供，一声呼啸，走出大门，众人一边急敲锣鼓，一边“噢嘘！噢嘘”叫喊，一直赶至村口水边，烧掉草船、纸牌，意为已将鬼赶走。旧时，众人把斋供食物分吃光各自回家，现把斋供食物倒掉，把碗口朝下放在地上，第二天一早去收碗。

收鬼箭

身上某处突然疼痛，旧时天目山山民以为被鬼箭射了，就请巫婆神汉收鬼箭。巫婆神汉焚香点烛，口念咒语。咒语中多有“太上老君

急急如律令”或“我奉太上老君意，急急如律令”句。有人受惊吓时，巫婆神汉口中念的咒中有“我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请出”句。於潜一带农村如发现小孩生病唇白、手脚抽搐、胸腹发胀，往往请巫医来退土气，念的咒语也有“姜太公在此退土，百无禁忌”句。山民走夜路时碰上鬼邪，巫婆神汉所念咒语也有“我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之句。

潜川天师宫守庚申

天师宫位于潜川镇生仙山，原为张道陵故宅，后建为道宫。初建约在东汉，最后修建于清代，三进。现仅存天师井、天井、柱础等遗址。旧时当地人在正月初一到天师宫烧香，祈求天师保佑一岁平安，此俗一直至天师宫被毁。天师宫旧时有守庚申活动，每逢庚申日，信徒先在天师像前供祭品，然后坐夜，通宵守庚申，从庚申日酉时（晚七时）开始，至辛戌日卯时（早七时）结束。此项活动约在20世纪50年代末停止。

守庚申是道教练外丹的术语。起源于道教避三尸之说。道教认为人身皆有三尸虫（又称三彭、三虫），能记人过失。每逢庚申日，三尸虫趁人睡时将人之过恶禀奏上帝。故此日之夜晚应不睡以守候之，此即守庚申的由来。三尸虫之上尸名“清姑”，中尸名“白姑”，下尸名“血姑”。或上尸称“彭倨”，中尸称“彭蹶”，下尸称“彭矫”。

塔文化，从宗教走向民俗

临安历史上曾有十几座古塔，现留下来的有5座古塔（不包含数百座历代僧人的古墓塔）：功臣塔、普庆寺石塔、祈祥塔、南屏塔、秀峰塔。

一般认为，塔的概念和形制，起源于印度的“窣堵波”，是为了保藏佛的舍利、遗物和经卷而建造的。佛教在东汉时传到中国后，几乎历朝历代都盛行建塔，但是，它的功能、结构和形式都根据当时的文化特征而改变，结合中国建筑的传统，把原来的“窣堵波”缩小了，加上了多层的塔身。临安的5座古塔，建筑时间刚好经历了五代、宋、元、明、清五个朝代，从它们身上可以看到各个时代的建筑风格，看到塔文化的演变过程。

塔文化一开始与佛教有关，后来逐渐演变得广泛起来，有的用于军事，有的用于交通，明清两代出现了文峰塔、文星塔、风水塔等，成为塔文化的主要倾向。

功臣塔

功臣塔位于锦城街道功臣山，建于后梁贞明元年（915）前后，由吴越国国王钱鏐所建，是五塔中最古老、最完整的一座塔，也是浙江

省现存的最早的一座楼阁式塔，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2001年6月，国务院公布其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钱镠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据记载，唐僖宗光启三年（887）钱镠应募从军，天目洪湮禅师见之，执其手屏左右谓曰：“好自爱，他日贵极，当与佛法为主。”后钱镠屡建奇功，发迹后在杭州兴建了不少寺庙佛塔。在临安老家，舍宅建寺，即功臣寺。功臣塔为功臣寺的配套建筑。除此，在这前后钱镠还建造了与佛教有关的朗山塔、海会寺经幢两座。特别是海会寺经幢，杭州太守、宋四家之一的蔡襄曾撰文《海会寺碑记》：“杭州临安县海会寺，梁大同中始作，号竹林。及五代贞明之初，钱吴越王又新之。……当是时，吴中浮屠居虽百千数，无是伦者。”

南屏塔

南屏塔坐落昌化镇南屏山，本地人称之为南塔，也是一座佛教建筑。民国十三年（1924）《昌化县志》载，南屏塔建于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熙宁六年五月初，苏轼曾到昌化，留有诗二首，诗中并未提及此塔，因此判断，应是熙宁六年后所建。清康熙六年（1667）秋，南屏塔遭雷击其顶，塔身渐圯。康熙十五年，昌化县令涂铨上任，捐一年俸为倡，募得千余金重修南屏塔。当时的募资修塔，就是打着兴科甲的旗号，“他日唐昌人文之蔚起，科第之蝉联，地方之蕃庶丰阜”。1997年8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其为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普庆寺石塔

普庆寺石塔坐落在青山湖街道洪村村，建于元至治三年（1323），在塔建筑史上为宋元过渡时期的典型作品。这里原有一座唐代的寺院，是径山寺的下院。宋延祐年间赐额，明洪武年间重建，后毁。现存寺中的这幢元代石塔，使人们仍能想象当年普庆寺的壮观气象，也是

当时佛教兴盛的一个见证。2013年3月，普庆寺石塔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祈祥塔

功臣塔、南屏塔、普庆寺石塔始初都是佛教建筑。但从明代开始，随着风水学的兴起，塔的文化功能从佛教走向世俗的文峰科举。这以后临安所建之塔皆为文峰塔。

科举制度的兴起，士子之间竞争激烈残酷。受风水堪輿学的影响，地方官员常常在地理风水上去作出改变，认为这样可以助兴文运，这就使文峰塔应运而生。清代高见南著《相宅经纂·文笔高塔方位》中有：“凡都、省、府、州、县、乡、村，文人不利、不发科甲者，可于……平地建高塔，皆为文笔峰。”这种现象以南方最多，成为文化与建筑史上的一道独特景观。

於潜祈祥塔就是这种民俗文化的产物。祈祥塔坐落在於潜镇南的官堰山顶，建于明崇祯九年（1636），1988年12月，临安县人民政府公布其为第二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后为杭州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3年重新修缮。康熙十二年《於潜县志·建置志》中载：“祈祥塔，县南五里，崇祯丙子，张恒岳、谢泰来倡建。歙邑冯塘、程文范助银五百两。按旧志载，无名氏题寂照寺壁，云：於潜何不发科甲，官堰山头少宝塔，宝塔何年造得成，只待耳东马角生。塔既建，联蜚数科。青鸟之说，洵应如桴鼓。但今塔尚隔官堰山数峰，或尚有遗功可举，当俟后之识者。”古人认为，浙江的灵秀之气出在天目，而於潜处在天目山脉的肘腋，灵气应该最为深厚。但於潜一段时间来科甲之运很弱，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於潜三面环高山，只有南面“其势奄伏不振”，缺少回荡之势。

这种民俗文化的力量是惊人的，因而於潜本地人张恒岳、谢泰来、沈在宥倡建宝塔，歙邑冯塘、程文范巨额相助，还有於潜的全民响应。

这几位倡建和捐建者是谁呢？根据旧县志记载，张恒岳、谢泰来都是当时的社会贤达，一位是士绅，一位是读书人，积德行善，名闻乡里。沈在宥则是当时於潜县的教谕，湖州长兴人，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沈在宥考中戊午榜举人，并出任於潜县教谕。塔建成的前二年，也就是明崇祯七年（1634），沈在宥还考中了进士，据《大明金榜录·崇祯七年甲戌科殿试金榜》，沈在宥列二甲第四十一名进士。康熙《於潜县志》列有其传：“明，沈在宥，字元弢，长兴人，崇祯四年由举人任教谕，博学坊，行课士之暇，则登高，度形势，见邑南诸山奄伏不振，捐俸创首建塔山巅，名曰祈祥。后科第稍振，皆如公所计度云，甲戌成进士，仕至福建宪副。”

到了清嘉庆五年（1800），文风犹嫌不足，当地人又在官堰山上另筑一塔，塔名“凌云”，坐落在於潜镇官堰山，与其北侧山顶的祈祥塔相呼应。双塔相映，十分壮观。传因此“地脉兴”而“人文焕”，又有人科举高中。后在民国三年（1914）遭遇雷雨倒塌。2020年於潜商会募集款项在原址上重新复建。

建于清代的昌化秀峰塔也是如此。秀峰塔，俗称东塔。坐落于昌化镇东的东塔岭头，建于清康熙四十年（1701）。塔曾遭雷击，塔顶和塔身均受损，1999年重修。1988年12月，临安县政府公布其为第二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现为杭州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据《建造儒学甲卯方秀峰塔碑记》中刻有：“自国朝辛丑迄今四十余年，武犹接踵，文则未能继起焉。”请术士细察风水认为，“甲卯方低陷，宜建塔以盖文峰，更引白下皖上补救”。当时的昌化知县林霖培捐俸以倡，建成此塔。民国十三年（1924）《昌化县志》载：“康熙时，方士献策，镇东甲卯方系昌化之文峰，宜建塔。康熙四十年乡绅捐输遂建。”

由于塔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长期以来，也留下了许多关于塔的故事和传说。传说秀峰塔的金塔刹掉进了深潭，需要八个亲兄弟才能抬上来。有一家刚好七兄弟，缺的一位则邀了一个老表，一起去抬塔

刹。眼看就要成功。老大喊了声“老表”，马上露了馅，塔刹就骨碌骨碌滚回深潭，再也抬不起来了。其他塔也有许多传说。功臣塔有“夫妻蛇神”，普庆寺有“袈裟化塔”，祈祥塔有“凤凰相会”，南屏塔则有“师徒造塔”等传说故事。

从五代至清朝，临安的古塔文化，从宗教走向了文峰，这是时代趋势，也是人们精神心理的折射。无论统治者还是平民百姓，他们把塔作为一邑一乡之华表，都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尽管生活十分艰苦，但捐款修塔、造塔却绝不吝啬。人们希望本地多出一些官宦才子，可以荣宗耀祖，福荫一方，这也成为临安乃至中国塔文化的一个特色。

庙会

天目山区的庙会众多，大致分为佛教道教庙会、城隍土地庙会、地方神庙会，其中以地方神庙会居多。

一、佛教道教庙会

板桥如龙倡亿庙会

如龙寺建于西晋永嘉二年（308），历代香火旺盛。民国五年（1916），僧倡亿在如龙寺圆寂。传四月十四为倡亿生日，寺院每年此日要做道场，或七天七夜，或五天五夜。邀请附近寺院僧人及香客前来。先由住持介绍寺院和倡亿菩萨历史，并宣布祭祀开始，接着僧人及香客诵经拜佛、焚烧纸衣裤等，结束前要放焰口，超度冤魂。其间，庙里有戏班演戏，有各种商业活动，逐步形成传统庙会。“文化大革命”期间，庙会停办。近年来又恢复。

锦城寺坞庙会

农历二月十九举行。寺坞旧有法会寺，建于后梁乾化五年（915）。

庙会由九个村庄轮流操办。该日，九个村庄香客数百人前来赶庙会，先由十余位耆宿乡绅开读祭文，然后举行祭祀活动。中午在寺内吃斋饭。寺毁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庙会随之终止。

二、城隍土地庙会

於潜城隍庙会

农历十月初三至初七举行，为於潜一年一度的传统庙会。祭祀神为於潜城隍菩萨，十月初三为其生日和出巡之日。旧时前后演戏四五天，四乡均组队献其所能，有乐队、踩高跷、落地八仙、舞钢叉、流星等项目。由八乘大轿抬着城隍菩萨，开锣喝道，巡行大街，出南门至下浮溪，折杏花村、金家村至甲子山，经后渚桥入北门还城隍庙，行程十五里，尽一日之兴。杭州商贩亦携布匹、新衣、皮货等前来摆摊赶集。於潜各乡于庙会前后亦多有戏班轮演。

於潜城隍庙二进二廊，所供塑像各六，合为十二座，即为於潜全县十二乡之神主。於潜城隍菩萨之妻供在后殿，端庄貌美。头进左右门侧塑白红二马，作高跃急驰状，各为马夫紧勒，姿态逼真，塑工精细，甚为壮美，民国十五年（1926）冬遭捣毁。

东天目梅家土地庙会

东天目梅家村北口有土地庙，又称罗大明皇庙，所供土地头戴宰相帽，身穿黄龙袍。传庙会兴起于明朝，每年七月半前举行，历时三天。七月十三组织仪仗队抬土地菩萨出会。出会队伍由锣鼓队和4支土枪带头，4名轿夫抬土地神，4人扮为佣官，手持木棍、头戴圆锥形高帽，2人背玉斧红缨枪、2人持龙棍，以及12面蜈蚣旗、12面彩旗共24人。从梅家村出发后，走南庄、光辉到碧淙、由口、射干，绕到龙溪、横溪，再回到梅家村。村民沿路跪拜，焚香叩头。十四日念佛做功德，十五日放焰口。“文化大革命”中停止。

三、地方神庙会

於潜包公庙会

於潜纱帽山有包公殿，有泥塑坐殿包公和樟木雕出殿包公二像。并建有戏台和两旁可坐几百人的看台。每年七月初一，四乡八里村民会聚殿外。吉时一到，两名轿手将出殿包公像从后移至前殿，给包公穿官袍戴乌纱帽，端坐殿中，点香烛供三牲，随后众人进殿朝拜，爆竹锣鼓齐鸣。斋头诸人抬包公上轿，起轿时对天鸣炮。大开锣鸣锣开道，随后是“回避”和“肃静”牌、龙虎旗、大刀长矛，扮成张龙、赵虎、王朝、马汉的肩扛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和平头铡护在包公轿左右，轿后是乐队。队伍先向北到牛上头村，守候在村口的村民立即供三牲，点香烛迎拜。然后从田埂小路到上骆，最远时抬到绍鲁、交口等地。然后回到庙中。后几天请戏班唱大戏，有专人负责到各村凑米、凑菜给戏班。该俗延续至20世纪50年代初。

太湖源包公庙会

太湖源镇很多村均建有包公庙。射干村包公庙约建于清中期，三间二厢，中有木雕包公坐像，帽子有如旧戏中的帝王帽，脸古铜色。左右二判官分执笔和簿，站在石墩上，高约2.5米。庙前有一广场，能容近千人，中间有溪流，两旁以石板铺设。南边为戏台，约100平方米。庙里平日香火旺盛。每年农历七月十五举办庙会，四方乡邻会聚，九时许开始祭祀包公，中午供吃斋饭，下午请戏班子演戏。20世纪50年代停办。

河桥泥骆庙会

农历六月初一始举行。该日，村里族长带人到鱼潭，抬柯老相公

像至泥骆村，供奉在徐家厅堂，家家户户备供品、香烛、银锭、锡箔祭拜。六月初三，先请道士做道场，然后抬柯老相公游塘畈安苗。前有开锣、宫车，后有龙凤、蜈蚣旗幡以及銮鸣、锣鼓，村民随后，绕田畈一圈，将柯老相公像抬回徐家厅堂摆放三个月，至十月初再将柯老相公抬回鱼潭相公殿。

横畈雷公殿庙会

约在明末形成。殿内供奉雷公菩萨和其他神像。每年农历六月廿四举行庙会，焚香点烛，请僧人念经，墙上增挂十殿阎王像，殿外有商贸和文艺活动，中午供吃斋饭。20世纪50年代停办。

高虹重阳庙会

旧为高乐、虹桥最盛行的庙会。庙会旧有田产四十多亩，每年重阳节以钱王庙为基点做戏三天三夜，并办斋饭。至重阳，由八抬大轿抬钱王塑像，鸣锣开道，直至临安锦城。该俗新中国成立后淡出。

三口南屏庙会

南屏庙位于三口村二龙山麓，供奉神像为溢封吉庆明王的钱镠第三子，乡人感其恩德，为其建庙和塑像。庙前建有古戏台一座。旧时每年农历九月廿三举行祭祀活动，村民自筹资金，邀请剧团演戏三天三夜。其时桐庐、富阳、余杭及县内板桥、青山、锦城、玲珑等乡镇村民前来进香祭拜，盛况空前。

河桥庙会

农历十月初十至十二举行祭祀活动。祭祀神姓柯名宁，俗称柯相公，相传是五代吴越国国王钱镠属下，躬临治水，造福百姓，称道一方，被钱王封为灵应侯。柯宁相公在河桥大柳滩治水，当地百姓感恩，为其在大柳滩建造相公庙，并在河桥下街建造行宫。农历十月初十，

河桥百姓要到大柳滩相公庙，将柯相公塑像抬至下街行宫摆放数天，到十月十二柯相公生日，庙会执事为柯相公像洗脸更衣，戴上官帽，穿上官袍，准备好全猪、全羊及供品香烛祭祀，后由四名轿夫抬像游街，前有开锣、宫车，后有銮驾护卫，一路鸣放爆竹，沿街百姓户户开门恭迎，焚香叩拜。相公行宫前面为戏台，中有道坦，可容数千人。从初十起上演京剧、睦剧、越剧等，三天三夜锣鼓不息灯火不灭。庙会期间有万人涌集，来自上八府、下三府、安徽等地的戏班商贩参演展卖。1969年“七五”洪水时，柯相公庙被冲毁，行宫亦在同年被拆。20世纪80年代后期恢复河桥庙会，但已变成单纯的商品交易会。

青山公山庙会

公山庙位于公山西脚，始建年代无考，宋时曾修复。供奉的公山菩萨为钱武肃王第三子。每年农历十月初三抬公山菩萨出位，祈求诸事平安，风调雨顺。四邻乡民在庙前搭戏台，邀请戏班演戏三天三夜，朱村猿车和流星、青山狮子、研里龙灯等民间艺术队伍参演。香客近万人，庙内供斋饭。庙会1953年停办，1957年庙被拆除，1992年朱村村民募捐重建庙宇三间。

太阳庙会

农历十月廿四至廿六举行，为太阳镇一带一年一度的传统庙会，祭祀神为东平王和东平娘娘。十月廿四是“东平娘娘”的忌日，也是她嫁给东平王的日子，十月廿五为回门日，十月廿六为走亲日。其间，当地百姓抬着东平王夫妇塑像吹吹打打，热闹非常。廿四日上午先在东平王庙前开光，然后分别到太阳村、界头村、八亩村（姑娘的外公家）巡游。附近的老百姓也会在这三天内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庙会踩街队伍有大旗队（擎举108面将帅旗），旗上绣龙凤、牛、蜈蚣、十二生肖等图案，队旗后面是72名持械手（持锡制兵器），随后是20名男子、10名女子组成的“躲祸队”。这些人头扎黑纱巾，男的左边

脸上贴神仙符，女的右边脸上贴神仙符，意为跟着东平王和东平娘娘能避灾祸保平安。参加庙会的民间表演队伍有马灯、花灯、狮子灯、花棍、踩高跷以及民乐队、腰鼓队、秧歌队等。参加庙会的人数有两三万，成为於潜一带著名的庙会活动。其间，有演戏耍猴、南北杂货、各色小吃等，还逐步形成了带有土特产商品交流性质的集会。“文化大革命”时中断，1986年恢复，已举办数十届。近年规模扩大，参加人数增多，现已发展成为太阳镇以商品物资交流和文化活动为中心的经济文化活动。庙会时间也从3天延长至5天。

桃花溪东平殿庙会

1949年前，每年农历七月廿四始在大峡谷镇桃花溪东平殿进行祭祀东平王活动，时间长短不一，长时七天七夜，短时三天三夜。仪式有开光、演戏、做道场，祈求东平王保护地方太平，百姓平安，庄稼有好收成。由一农户养一头龙猪，各农户交粮食、蔬菜等，提前布置好场地。七月廿三杀龙猪，先将龙猪割一刀，拖它在东平殿走一圈，众人在后敲锣打鼓，边唱边跳，然后宰杀。虽显残忍，却不失为一种与众不同、具有地方特色的风俗。请来戏班子及本地道士几天几夜连续演戏、做道场。后来，此风俗淡出，今庙也已不存。

株柳东平王庙会

因农历七月廿四为东平王的诞辰，每年在此日举行庙会，宰杀牛羊，设牲礼举行祭奠仪式，搭戏台演戏，并举行踩街游行活动，附近村民赶来参加，久之成为土特产的交易集会。

昌化东平王庙会

昌化镇一带原是去株柳将东平王塑像抬来，因经常与各地的祭祀日发生冲突，于是在老县城也建了东平王庙，并举行东平王庙会活动，有各种踩街游行活动。

青山关帝庙会

关帝庙位于青山古街东，共六间房，内供关圣帝君，有戏台，始建年代无考。每年农历五月十三关帝生日，都会举行庙会。其间，巨烛高烧，火铳声、鞭炮声不绝于耳，和尚道士诵经，法器齐鸣。青锋台（戏台）日夜演戏。四乡八村男女老少都赶来，杂耍卖艺小摊小卖云集，场面宏大。遇下雨，众人不散，谓关帝的磨刀水能淋掉邪气。20世纪50年代停办。

青山洪庙会

洪庙实为土地庙，内祀石大明王，相传已有800年历史。明嘉靖、清光绪年间二次重修，有重修碑记。旧时每年举行庙会，行会时鼓乐喧天，彩旗招展，火铳、鞭炮齐鸣，沿途百姓争睹盛况。新中国成立后庙宇被拆除，庙会停办。

钱王庙会

宣统二年（1910）《临安县志》载：“钱武肃王庙，岁以二月十六、八月廿四致祭，行二跪六叩礼，余仪同庙祭。”祭仪因战乱一度中断。光绪三十一年（1905）临安县令陈为鉴、邑绅俞廷献合捐墓祭洋一百元，存店生息，以供祭品。后经俞绅芳禀县立案，每岁守土官春秋致祭，恢复祭祀钱王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祭祀活动停止。1997年11月，市政府举办‘97中国旅游年暨钱王故里文化旅游节。11月2日下午，有关部门领导、钱王后裔、各界人士2000余人在钱王陵园举行祭钱武肃王典礼。祭祀活动程序：主持人宣布市各界恭祭钱王典礼开始；请主祭人拜厅；请陪祭人就位；请主祭人盥手（礼生端铜盆盛水备毛巾上）；请陪祭人盥手（礼生转端给每位陪祭盥手）；鸣炮14响（放爆竹人员点燃燃放，稍有间隔）；击鼓14响（击鼓人登上鼓台，击鼓14响，稍有间隔）；撞钟14

响（撞钟人登上钟台，撞钟14响，稍有间隔）；奏乐（浙江歌舞团民乐队奏《将军令》，约5分钟）；献酒（紧接奏乐后，8名抬酒人员在乐曲声中将大酒坛从门阙抬上主祭台，其中3名礼生捧酒碗一只趋前，1名礼生打开酒坛，舀酒于碗）；请主祭人敬酒，一敬酒（主祭从礼生手中接过酒碗，双手举过头顶，置于祭桌上），再敬酒（过程同前），三敬酒（过程同前），乐止，向钱王行礼：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请主祭人恭读祭文（礼仪捧祭文上交给主祭，同时播放音乐伴奏）；献舞（祭舞演员从前两侧登台，音乐起，起舞）；礼成（锣鼓队齐奏）。司仪宣布：请全体参祭人员进钱王陵前谒陵（由导引、召集人、领队带领依序分两路从两侧进钱王陵墓地）。谒陵仪式程序：谒陵仪式开始；各界代表敬献花篮；向钱王陵行礼：三鞠躬；谒陵仪式结束。与祭钱王有关的活动有钱缪研究学术研讨会、文物书画展、旅游产品展示与交易会、综合文艺晚会、群众性文体活动等。2023年1月，清明祭钱王列入浙江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民间的东平王信仰

东平王信仰本源自北方，自南宋迁都后传入天目山区，久之，已成为天目山区一种特色民俗文化。东平王信仰反映了天目山区人民对古代英雄的崇拜，展现了他们崇尚忠贞勇敢的价值观，也寄托了山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一、东平王崇拜的由来

东平王即唐代将领张巡（708—757），字巡，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新唐书》载为邓州南阳）人。唐代中期名臣。唐玄宗开元末年进士，历任太子通事舍人、清河县令、真源县令。安史之乱时，起兵守雍丘，抵抗叛军。至德二年（757），安庆绪派部将尹子琦率军十三万南侵江淮屏障睢阳，张巡与许远等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死守睢阳，前后交战四百余次，斩敌将三百名，杀叛军十余万，有效阻遏了叛军南犯之势。后终因粮草消耗殆尽、士卒死伤殆尽而被俘遇害。朝廷册封其为扬州大都督。到了宋代，朝廷册封其为“东平威烈昭济显庆灵佑王”，民间简称为“东平王”。唐大中二年（848），张巡的绘像还进入了表彰功臣的凌烟阁。其后，百姓念其忠诚勇敢，遂敬其为

地方神。随着南宋迁都临安，许多北方官员百姓也跟随迁居南方，并将平时供奉的地方神带到了南方，东平王张巡的崇拜现象也是其中之一。

二、天目山区的东平王庙宇

天目山区距杭州（南宋时称临安）甚近，受南宋迁都的影响甚大。也是尊张巡之忠义勇敢，又往往祈福灵验，东平王信仰便开始散布天目山区，并为天目山人所接受，在山区各地多列祠庙。锦城街道、太阳镇、清凉峰镇株柳村、河桥镇、昌化镇多处、龙岗镇桃花溪村（原鱼跳乡桃花溪村）、岛石镇等地都曾有过东平王庙。

锦城街道有东平王庙，设在长桥西侧小山上。据清宣统二年（1910）《临安县志》载：“东平王庙，在治东南沙井门外，祀唐睢阳大都督张巡。巡故有庙，在汴宋南渡，凡汴之有庙者，皆得徙祀于杭。咸丰间寇毁，光绪初邑绅胡锦标等创捐重建。”往昔也有庙会祈福活动。此殿俗称东门殿，现已改为佛教寺院。

位于西天目山南的太阳镇有东平王庙，据康熙十二年（1673）《於潜县志》载：“张忠靖（张巡）庙，在县西十八里西菩山（即指今之太阳镇），祀唐中丞张巡。”现每年农历十月廿四至廿六仍举行盛大的传统庙会。

太阳镇东平王庙位于村东，据传初建于南宋年间，屡毁屡建，至清代又重新翻建。庙由南北相对二殿组成，坐北朝南的为“圣像殿”，殿内供奉有“东平王”和“东平娘娘”塑像。坐南朝北为“庆功殿”。两殿中间有约300平方米的一个广场。庆功殿北筑有高台，可演戏。为什么在东平王身旁有个“东平娘娘”呢？传说在清代，有一年的十月廿四，一位姑娘到东平王庙烧香，抬头见张巡的塑像英俊非凡，心中生起爱慕之意。礼拜毕，依依不舍回身离开，跨出庙门时，恰巧被屋顶落下的一张瓦片当头砸中，当场身亡。因这姑娘漂亮贤淑当地闻名，

乡人怜其爱慕英雄，遂筹款将她塑成像，侍立在张巡像旁，视为东平娘娘。

位于天目山西面的清凉峰镇株柳村原有天目山区最大的东平王庙。据康熙十二年（1673）《昌化县志》载：“东平王庙，在株柳，邑人章铨有记。”又载：“（七月）二十四日为东平王诞日，乡人俱设牲醴奠祭，或鸣锣刺刀于臂，及一切扮演故事，往酬神愿，邻村毕集，远口货俱赁厂地铺易，谓之赶会。”道光三年（1823）《昌化县志》中也有“东平张王庙”一目：“在县西三十里朱柳，其神显于宋，以七月二十四日诞辰，江浙两省俱有灵应。明行僧绍隆重修庙宇。”章铨有《记》云：“公讳（张）巡，邓州南阳人，开元进士，以御史中丞。安禄山叛，张固守睢阳，屡破贼兵，抗节而死，年四十九。后之朝廷屡以册封。”1949年前多有祭祀、庙会、祈福消灾等活动。现已倒圯荒废。

位于天目山西面的昌化镇有东平王庙，据2010年出版的《昌化镇志》载：“东平王殿 其神为唐御史中丞张巡。旧时，昌化县有大殿5处，分别在株柳、赤石、览川、荆州、岛石。当时，昌化百姓对东平王信仰有加，逢旱涝虫灾，则祈求消灾。芦岭、上营村曾有其殿，规模不及上述5处。已圯。”

三、东平王崇拜对其他习俗的影响

对东平王的信仰所形成的庙会、祭祀、求雨、祈福消灾等一系列的风俗活动，促进了天目山民间音乐、民间灯彩的活跃和繁荣。庙会和其他的祭祀活动都伴有音乐舞蹈，各种艺术形式或应运而生，或锦上添花，推陈出新。

太阳东平王庙会一直延续至今，规模宏大，当地的民间艺术也因之得到了丰富。如民间灯彩“五凤朝阳”便是应祭祀东平王活动而诞生，艺术起点较高，曾获省市大奖。昌化镇原水南村（现合并为

双塔村)龙灯、西街村龙灯均为祭祀东平王活动而生。朱白村庵里彩凉船为往昔接送东平王所排练的民间节目。昌化镇五丰村(现合并为昌化镇九龙村)九坑桥大莲花、昌化镇原石坦村(合并为朱白村)半坞里抛滚叉是村民在民国三十六年(1947)为送东平王像回殿而学的,有高难的技艺。村民们在演练中不断完善进步,形成特色,成为东平王祭祀活动中一项重要的民间艺术表演。另有岛石红毛狮子、河桥鱼灯等也参加了祭祀东平王的活动。活动中运用的各种音乐形式,如进退时用的《急急风》、游龙时用的《长城曲》、钻龙门时用的《调灯曲》、盘龙和退壳时用的《阴阳曲》,还有民间曲调《昌化大莲花》等,十分精彩。

东平王崇拜是天目山区地方神信仰的一种模式,管中窥豹,从中可以了解天目山区民俗文化的一角,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烧烽篷祈福

西天目山禅源寺及周边百姓有烧烽篷传统习俗。这一习俗肇始于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有一年，天目山一带夏秋无雨，五谷枯萎，蚕遭瘟疫，民不聊生。寺院僧人开义举，在大年除夕晚上举行烧烽篷的法会，为当地民众祈福。后来逐步演化为山农和寺院共同的习俗，每年在除夕举行。据笔者分析，烧烽篷的习俗可能与祭竹神相关。传说竹神是家中的福神，晋代曾寓居天目山的干宝所著《搜神记》中记载了一则故事：“临川陈臣家大富。永初元年，臣在斋中坐，其宅内有一町筋竹，白日忽见一人，长丈余，面如方相，从竹中出，径语陈臣：‘我在家多年，汝不知，今辞汝去，当令汝知之。’去一月许日，家失大火，奴婢顿死。一年中，便大贫。”旧时天目山区在农历二月初八和十二月初八是要祭祀竹神的，通常把三根竹子搭在一起，放在三岔路口，供上供品。

西天目山烧烽篷习俗从大年初一开始。寺院里的看山和尚每天从山上带回一根毛竹，竖在棚中。一直到除夕夜，将毛竹搬至寺院的山门广场，搭成一篷，并为其披上柏枝。待吉时一到，由寺院中的主持僧诵读祈福文，然后点燃烽篷。寺中僧人围绕烽篷经行，念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等。诵经毕，赠送福礼。随后由周边村子里的龙灯、

马灯、狮子灯，分别上场表演。然后敲响祈福钟声。“烽”谐“丰”，有吉祥的寓意，烽篷燃烧即将过心时，向某个方向倒坍，预兆来年此为吉位。烽篷燃尽后，山农纷纷争抢烧剩的竹炭。有的在烧烽篷时许愿求子，取回竹炭放在床下；有的取回家作“蚕花”，消除蚕病；有的取回家放在厅堂上，以为辟邪。

余烈编纂的《於潜县志》中记载：“天目山禅源寺每年必于平时伐大堆毛竹使干，至除夕过年，将之竖立搭成宝塔形，点火燃着，干毛竹二三百株，一时壁剥蓬拍之声大作，响彻云霄，火光烛天，四山通红。寺僧与入山过年客千余，重重围住，场面壮观。此为於潜尚保存‘爆竹一声除旧’古风。‘除旧’者，除恶鬼‘山臊’也。今之所谓‘火炮’，即为‘爆竹’之由来。”

“烧烽篷”一俗延续了300多年。民国三十一年（1942）日本战机轰炸了禅源寺，此习俗仪式方才停止。至20世纪末，禅源寺复建后此俗又重新举行过一次。参加活动的还有月亮桥竹马舞、俞家九龙灯、九狮红毛狮子等。

竹马舞又称马灯。天目山镇月亮桥村泗部竹马舞有数百年的历史，“文化大革命”中一度停止，2001年恢复。泗部竹马舞共有12匹竹马，其曲调欢快、舞姿优美，有浓郁的民间地方色彩。2003年获市元宵灯会银奖，2004年获“吴越风”元宵灯会金奖，并参加2004年西湖博览会的演出。竹马分马头和马臀两段，以竹子扎成骨架，糊上彩纸，内可置灯烛。舞者前装马头，后置马臀。旧时仅为春节期间活动，现则每逢喜庆节日，竹马舞都会出场表演，也是“烧烽篷”活动中的主要表演队伍。有庆太平、庆丰收、纳财福、五谷丰登、马到成功、飞黄腾达之意。

一都村俞家自然村位于西天目山脚，村里有九龙灯，也有数百年的历史，“文化大革命”中一度停止。俞家九龙灯由一条大龙、8条小龙组成。大龙长30米，分12节，以竹子为骨，绸布做龙皮，头尾为绿，身子为黄，由14名精壮汉执舞。小龙每条长2.5米，也以竹子为

骨，绸布做龙皮，分绿、蓝、红、黄、黑、白诸色，龙的下巴安一块小木板，板上装有一根70厘米长的木棍，一人一龙，由8名年轻女子执舞。表演时，由红、绿相间的龙珠引大龙、小龙忽左忽右、忽高忽低，或摇头，或摆尾，或盘旋，或纵跳，腾挪飞走，金光灿灿，五彩缤纷，节奏欢快，曲调动听。旧时为春节时表演，是“烧烽篷”活动的主要表演队伍，现每逢喜庆节日都出场表演。

九狮村原有九狮灯，20世纪40年代初改成双狮灯，即一雌一雄，颜色为一青一红。除了有两只狮子之外，还有四牌灯。先由四牌灯站好四点，锣鼓响，双狮冲进场内，摇头摆尾，绕场一圈。表演有“开四门，金元宝，剪刀花，凹六角，上顺肩，双连丝，生小狮，嬉小狮”诸阵式。狮舞扑闪腾挪，纵跳翻滚，极具阳刚之气。也是“烧烽篷”活动的主要表演队伍。

因寺院位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了防止森林火灾，明令禁止野外用火，此俗停止。

无独有偶，洞霄宫也有烧烽篷祈福活动，其肇始于何朝何代无从查考。最后一次是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的农历大年三十夜晚。这一日，洞霄宫所有的殿堂灯火通明，道士在道长的带领下，恭候在门口。附近几个村的村民将准备好的燥毛竹段抬来殿前广场，架空搭好。吃过年夜饭后，村子里的锣鼓队和乐队绕遍全村，于是跟随的村人越来越多，然后浩浩荡荡地来到洞霄宫，在宫中道士的引领下，进入了大殿广场。锣鼓队和器乐队摆好架子，吹拉弹唱，热闹非凡，大家围着一张张桌子坐下，一边品尝着瓜子、花生、寸金糖、白麻片等，一边欣赏着乐曲鼓点，感受浓浓的年味。快到深夜时分，竹篷被点燃。毛竹都未开节，熊熊的火焰中发出噼噼啪啪的爆裂声，把活动推向高潮。大家盯着燃烧的烽篷，直到火堆熄灭方才散场。有的村民还捡一些竹炭回家，作为辟邪之用。

之后，洞霄宫和村庄遭到日本鬼子侵犯，变成了一片废墟，这一习俗消亡。

龙的传说

天目山是佛教圣地。在佛教中，龙也是三界众生中的一类。佛教中的龙文化传到中国后，已与中国的龙文化融为一体。在三藏十二部中，也有在龙宫中演讲的佛经，如《佛说十善业道经》，就是释迦牟尼在娑竭罗龙宫中讲的。娑竭罗龙王的幼女到释迦牟尼说法的灵鹫山前，听释迦牟尼讲说《妙法莲华经》之后，向释迦牟尼佛进献宝珠，即刻转为男身，腾空而起驾祥云往南方无垢世界示现成佛度众。佛教中尊称德行崇高的僧人为“龙象”，如“西来龙”即指从西方来的高僧。

一、黄龙蜿蜒莲华峰

无门慧开（1183—1260），浙江杭州良渚人，俗姓梁，名慧开，字无门，世称“无门慧开”。幼年礼天龙肱和尚，广习经论。年长参礼黄龙派月林师观，苦参“无”字话头，历六年豁然省悟。悟后驻锡于天目山莲华峰，建无门庵，继续深入探究禅门宗论。宋淳祐七年（1247），理宗诏无门入文德殿，敕赐金襴法衣，赐号“佛眼禅师”，并敕建国仁王寺，以示褒扬。景定元年（1260）四月，无门命工匠砌塔，八日塔龕砌成，自撰龕语云：“地水火风，梦幻泡影；七十八年，一弹指

顷。”书毕，跏趺而逝。其所撰《禅门无门关》，对后世影响极大，其中第十九则后有诗偈道：“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宋嘉定年间（1208—1224），无门慧开从江西黄龙山来西天目山，相传挟着一条黄龙上了莲华峰，驻锡在无门洞。筑一茅舍，称“无门庵”。莲华峰上有一池，称为“独角龙王池”，那条黄龙就在那池中栖息。平时，无门慧开在无门庵中修行，那条黄龙则是盘在无门洞前的松树上。天目山周围数百里的老百姓凡遇有旱情，便会登上莲华峰，向无门慧开禅师和那条黄龙求雨。

明万历年间徐嘉泰编纂的《西天目山志》载：“慧开，……自黄龙山挟龙来无门洞，龙每蜿蜒松上，祷辄应，而孟珙、吴潜、郑清之闻于朝，召对所致雨者，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耳。遂赐金纹伽梨。”清际界增订的《西天目祖山志》卷二：“无门庵，莲华峰北，宋无门开道者驻锡处，旁有独角龙王祠。”

后来无门慧开去了杭州的黄龙洞，这条龙又跟随去了杭州，黄龙洞、黄龙峰也因是得名。与在天目山时一般，黄龙多盘在松树上。“凡夏雨初霁，有物蜿蜒松上，气茆茆而黄，其黄龙焉。”

宋淳祐七年（1247），国内遭遇大旱，太子少保孟珙、丞相吴潜、郑清之，上书理宗皇帝，说到无门慧开的道行，并有黄龙相随，一定能为苍生救枯槁。理宗皇帝因而下旨，召无门慧开到选德殿演法。无门慧开升座后，静静地坐着，并没有说什么。过了一会儿，便下起了倾盆大雨，旱情得到解除。理宗皇帝十分高兴，向无门慧开请教：“你用的是什么法术？”

无门慧开回答：“寂然不动，感而遂通。”

理宗皇帝十分欣赏无门慧开，就赐号“佛眼禅师”，赐金襴衣，封那条黄龙为“灵济侯”，并在黄龙峰下，为无门慧开建了一座护国仁王寺。

清际界增订的《西天目祖山志》中载：

无门开禅师：名慧开，杭州人，万寿崇观禅师法嗣也。初驻锡天目莲华峰下，旁有独角龙王池。及出世，尝说法龙兴之黄龙山。后栖定保宁寺，偶卓锡西湖北山，有石砢研不合如砺，忽雷震，划然出泉，甘冽澄若重渊，遂以黄龙洞呼之，岂龙随锡至耶？理宗宝庆四年（1228）不雨，咸诣洞祷，辄应甘霖。淳祐七年（1247）复大旱，少保孟珙、丞相吴潜、郑清之奏师鸿需屡验，召入文〔选〕德殿，设法座，演说真乘。

白龙显灵东天目

在东天目山有一白龙池。传道钦禅师到径山，有心建立佛教道场，但山上缺地，仅有一白龙池。池中白龙遂将此池变为旱地，献给禅师，白龙自己则移居到了东天目山，由此留下了白龙让地于道钦禅师的故事。民国三年（1914）《东天目山志》卷之二：“白龙池，《名胜志》：在东天目山，即径山白龙让地于钦禅师，避居此池者。下有洞，旁石室可容百余人，中有龙池，云是天之一目，深不可测，常兴云作雨，旱祷辄应。”

到了明代洪武元年（1368），东溟法师来东天目山修习佛法，建一庵，名平溪庵，庵下有白龙祠。东溟法师就在这里修学了十几年。后来他想离开东天目，刚跨过平溪桥，此时山中忽起云雾，有一白龙在云雾中显形，先是一爪，后显全身。于是东溟法师就打消了离开的念头，回到平溪庵中，专心致志修习并绍隆佛法，终于有大成就。民国三年（1914）《东天目山志》卷之四载：“东溟法师，……洪武初间遂东天目，建平溪庵，隐住十余年。……其庵下有白龙池，师欲起念下山，龙即兴雾现形，曲为拥护。”

二、钱塘江降伏婆龙

清《大龙塘山志》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相传宋咸淳八年（1272）五月初十，钱塘江口有一条婆龙肆虐，决堤灌城，浸及杭城，并殃及皇宫。度宗皇帝十分焦急，随即想起了明瞻禅师，便点燃香烛，向着西方龙塘山的方向祷告。没多一会儿，就有祥云出现在江上，但见明瞻禅师在云中举钵向着江浒，且以尘帚挥向空中，忽然就有天花四布，散落在水面之上，犹如珠缨宝络。此时但见那条婆龙从江中跃起，飞至云中向着明瞻禅师俯首磕头，明瞻禅师就引玉钵收之，婆龙蜿蜒而前，进入了玉钵之中。钱塘江水患随即平复。度宗皇帝十分高兴，又加授明瞻禅师为“广应妙济至仁大德禅师”。

《大龙塘山志》中有圣旨内容：

朕王天下，天神庇沐，尔祖师法水安危，圣德显化，福国寿民，可多见矣！除前合行敕赠赞图等事外，本月十日，钱塘江口婆龙驱浪，洪水涌城，仰天祈祷，祥云出现，幸尔法禅，举钵盛归，始全家国，获沐洪恩莫大矣。足道高德垂，实为万年香火，天下灵神，以经原由事理，后开基址山地以为递年香烛用费，毋许军民侵扰。故违，执此上闻。故札。全符。

其一，敕赐明瞻祖师一品金织衣一道等事。

其二，赠诏显化祖师明瞻赞像，经筵法宝，御札一道一事等件……

敕封尔明瞻授七祖龙岩广应妙济大德祖师，欲尔慈悲仍前。

法禅荡扫妖氛，诸胡寇尽，普救苍生，再造家国，君逸民康，丰稔五谷，誓共山河，至诚祷祝。

谕进心香，妙应是足，须至，指挥尉怀朕命，故敕，如右牒，到奉行。

受封后，明瞻禅师随即捧钵回山。龙塘山上有一龙池，明瞻禅师将钵中之龙放于池中。此后，只要祷告，婆龙即立致云雨。明瞻禅师居龙塘的三十余年中，杭、睦、徽、宣四州时和岁稔，无焦禾灼稼之旱情。民间遇有疾厄，辄向明瞻禅师求治，明瞻也以杨枝水洒之。明瞻禅师圆寂后，周边县乡但遇旱灾，皆上龙塘山向婆龙祈求。

三、天目山的龙脉

说到龙脉，都是从昆仑山说起的。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西天目山志》云：“昆仑之山实分三龙入于震旦，其南龙出吐蕃之西，下丽江，趋云南，绕沾益贵竹关岭而东去沅陵，复别为三分，其一过庾岭，度草萍，至黄山天目而止。天目盖发祥昆仑也。”南龙自黄山进入浙江后，分两支，小的叫昱岭山脉，大的则称为天目山脉。天目山脉起自清凉峰，经东西天目至杭州，余脉又延伸至太湖，乃至苏南等地。

天目山为杭州主山，狮蹲象踞，雄镇东南，有天目为首之说。天目山旧曾名“龙首山”，便是由是得名。西天目山、东天目山、余杭径山，三峰矗立，南有功臣、玲珑、九仙诸山排列，若儿孙环侍，天造地设，鬼斧神工。龙脉与风水有关，刘伯温认为天目山一带为“南龙一最大地也”。有人问他：“何人足以当之？”刘伯温答：“非周孔其人不可。”又有人道：“南龙之次有临安，其龙脉自天目山分入钱塘。”

明田汝成《委巷丛谈》云：“杭州山脉发自天目，然天目有东有西，东天目之脉萃于余杭，结局于径山；西天目之脉萃于钱塘，结局于西湖。故天目者，杭州之主山也。王气郁葱，帝王奠宅，而钱氏偏霸、宋室南迁，兆不诬矣。”

宋度宗时，天目山发生过一次崩塌。有人议论：“天目崩，地脉绝；潮不应，水脉绝，国事去矣。或有为之诗，云：天目山前水啮矶，天心地脉露渔溪。四周冷浸孤陵月，未必迁岐说果非。”古人认为天目山之兴废，与杭州相关。张志道诗：“天目山来孤凤歇，海门潮去六龙

移。”盖有感于绍兴时事。

四、天目山的龙地名

天目山古称龙首山，山上有不少带“龙”的地名，如东天目山有白龙池、龙泉庵、龙王堂、龙门长寿寺等；西天目山有龙峰尖、龙穴、独角龙王祠等；东、西天目山都有老龙潭，两边山顶各有一龙池，天目由此得名；两山间有龙须岭、龙须庵、神龙川等。这些以龙命名的地方往往是高僧大德修道之处。

龙池

东、西天目山山顶各有一龙池，久旱不涸。民国元年（1912）《东天目山志》载：天目“上有二湖，谓左右目。登陟险阻，数日乃到岭顶。多蛟龙，池潭三所，最上池，人不可近，气臭逆人，不可久视。又山神作白鹿形，第五月震泽龙会，必多风雨。又云，天目山特秀基墟，跨陟四郡，有上下龙潭，深不可测，怪物出其中。”又载：“天目龙池有垂崖，崖下有滴乳，民采之以疗疾。岁旱潦则函币精祷，投于池，回旋溯而上，已而下沉，如有物契之，或少慢，或浮而出，凡祷皆然。”

龙穴

在莲华峰原大觉正等禅寺附近。《咸淳临安志》记载：“在至道宫殿西，架画梁之侧，其大逾寸，穴外回环之状，径二寸许，若有物盘旋而成，欲雨则云气出焉。”这个龙穴并不大，仅一寸大小，穴的外面呈环状，如有物盘旋而成，直径也不过两寸左右，但在天将要下雨之时，穴中就会吐出云气来，龙穴之称由此而来。

龙须庵

在现太湖源（临目）龙须山。据民国元年（1912）《东天目山志》

载，元高峰原妙先时在龙门长寿寺（太湖源），后来发现龙须岭“有二水流出若龙须”，遂转入龙须庵。苦修五年后，有一晚，因同宿道友把枕头推落堕地作声，使高峰原妙廓然大彻，自谓是“如泗州见大圣，远客还故乡，元来只是旧时人，不改旧时行履处”。九年后迁西天目山狮子岩。

老龙潭

东、西天目山均有老龙潭，东天目山在香炉峰下，西天目山在西关龙潭。西关龙潭旧有龙王祠，北宋崇宁三年（1104）赐“昭应庙”额，政和三年（1113）还敕封天目山龙王为“渊源侯”，累封“广祐”“灵济”“孚惠王”。宋天圣四年（1026）诏定天下名山洞府共二十处，杭州西天目山老龙潭列第十九。宋时，每年都要投放龙筒，就是给龙王的信。到了元代，每年春秋有司致祭。

白龙池

乾隆二十四年（1759）《临安县志》和民国元年（1912）《东天目山志》有相同的记载：“白龙池，《名胜志》：在东天目山，即径山白龙让地于钦禅师，避居此池者，下有洞，旁石室可容百余人，中有龙池，云是天之一目，深不可测。”

龙泉池

在龙泉庵附近。其泉从两石孔中下涌，上出石孔，状如龙鼻，有无数小鱼在鼻孔中卵化而出。水之多，约可溉田十余亩。左边另凿三方池，径各丈许，池上有丛桂、松柏、冬青树，垂影池中。当暑气犹蒸，金风微动，布以匡床净几。炉烟一缕，南华一篇。读罢之暇，看游鱼队队争啖花影，乐哉鱼乎，乐哉人乎，何以非濠梁之庄子，冷泉之玉局乎。惜此佳景未经品题，正如绝代佳人，难免生居空谷之叹耳。山人诗：龙泉汨汨最怡情，洗涤尘心一点明。活泼源流休错认，出山

犹是在山清。

龙池山

位于岛石镇西北太平里村。民国十三年（1924）《昌化县志》卷二《輿地》：“县西北八十里，曲径盘旋，其岭有庙，庙前有塘，塘外有井，龙宅焉，胜概极奇。”

龙须岭

在湍口镇金燕村。康熙十二年（1673）《昌化县志》：“龙须岭 县南四十五里，地曰金村，石山莎草厚如茵褥若龙须然，其岭有龙王庙，庙后有石镜，其下有潭，蛟龙所宅。”

五、求雨天目龙

据闻一多《端午考》，端午节是我国古代百越民族一个龙图腾的节日，距今至少有四五千年的历史。那时候居住在江南的吴越百姓由于不断受到水旱灾害的威胁，便希望“龙”能保佑自己。山区易遭旱灾，以为龙可赐雨，旧时“接龙”风俗甚浓。东天目山大仙顶龙池边有清雍正十三年（1735）镌刻石碑，记接龙求雨之事。有的村民到天目山来，捉住碰到的第一个“活口”，即蜥蜴、小蛇、小鲵、游鱼等（不选青蛙，因其叫声像“干”），称“吊个活龙”。欢呼一番，然后将“活龙”装进葫芦里，把葫芦吊在杠子上，众人小心翼翼护送下山。接龙队伍须沿溪走，途中如遇有人戴凉帽或撑雨伞，便上前将其凉帽或雨伞打掉。要抬着“活龙”在村庄、田畈、山边到处转，然后放置在村中大屋后，村人要去焚香朝拜。如“活龙”接来后不久就下雨了，村人会对“活龙”赞扬朝拜，然后把“活龙”放掉。如“活龙”接来后还是不下雨，就将“活龙”放在太阳底下曝晒。据传在“活龙”接下山沿溪走时，往往就有乌云聚合，大雨滂沱。

洞霄宫也有关于祈雨的记载：唐大历四年（769），黄岩等地久旱无雨，百姓求遍各地神庙无果，后来到洞霄宫求雨，立刻应验。后唐天成四年（929），吴越大旱，上年十月起至次年春夏无雨。钱王派大臣到洞霄宫投龙简，次日傍晚即倾盆大雨。民国时期，临安逢干旱，百姓要将洞霄宫村庙里的用樟木雕刻的龙王菩萨像〔方丈里的庙里有两尊龙王菩萨，一为泥塑，一为木雕。香樟木取材于上铜山（白泥山）〕，敲锣打鼓抬出，从天柱岭往桥头方向，经石亭子、响板桥到余杭南湖等地祭祀。出行前要为龙王菩萨梳洗，换上新衣，用蛋清涂抹菩萨脸部和身体，焚香参拜。

六、天目山区闹龙灯

天目山一带有龙崇拜的习俗。逢节日尤其是春节，都要闹龙灯，因此龙灯甚多。龙灯的骨架多以竹子扎成，旧时扎龙头之竹必须是“偷”来的，事先上山选好竹，到了夜晚去砍倒背回，在竹根处须放一个红包，还要鸣炮而回，被“偷”者也引为吉利。做好龙头，先用两方小红纸把龙眼障住，待上灯日开龙眼。旧时正月十三上灯，也有初八上灯，十八落灯，往往都有一套祭龙仪式，各地大致相同。有的请寺内僧人诵经，请龙附体，由住持点睛，谓“龙开光”，这之后方可开始舞龙。一般到了正月十八落灯日，送老龙到村子的水口，开锣喝道，燃放鞭炮，将龙盘起，每人点一支香，跪拜，然后焚烧老龙。事毕返回，休锣息鼓。

在天目溪水源多的地区，也有在端午节赛龙舟的。据近代学者研究，端午节原也是祭奠龙的节日。华夏先祖以龙为部族图腾，伏羲、女娲、舜、禹都是龙族的领袖，而端午节是祭龙大典中最为隆重的一天。每逢五月初五，一些地方会举行活动，将各种食物装在竹筒里，或裹在树叶里，一边往水里扔，献给龙吃，一边自己食用。为了取悦龙神，还在急鼓声中，在水面上驾龙舟，做游戏给龙神看。

土地神信仰

历史上，土地神祇的信仰遍及各地。同样，土地神也是天目山区供奉最普遍的神祇。旧时锦城、於潜、昌化、高虹都有城隍庙，供奉城隍菩萨。在山村则多社庙、土地庙、山神庙，至今留存尚多。锦北街道现还存东岳庙，供奉东岳大帝，香火甚旺。湍口和湍源陆家旧时也各有东岳庙，供东岳圣帝木雕坐像。其中湍源东岳庙祭祀由附近十个村轮流做庄，每年腊月三十从山上庙中将菩萨抬至村中，换上新袍，各村村民都来该村供奉，到正月二十八，全副銮驾出动，数千村民送其回庙，仪式隆重。东岳大帝的信仰也属于土地神祇的范畴。在天目山区有许多围绕土地神的祭祀活动，如东边的东天目和西北的昌北新桥诸村，在农历二月初二土地神生日时也举行祭祀活动。

旧时，天目山区的社庙都建在村口，常常举行庙会。社庙往往有戏台，还常常演戏。境内各村一般正月初要到社庙上灯，四时还要去祭祀。社庙多供土地神，也供其他神像，有的还供观音、地藏等像。

各地所奉土地神出身多有不同。天目山镇土地庙供奉一张姓本地人，相传因有功于宋高宗，死后被封为明王，当地人称“张大明王”，

其像戴王帽，每年四月十八张大明王生日举行庙会，这是出身高贵的。还有出身贫贱的，清末民初时，有一老一少上龙岗镇白马崖采石耳，因遇大雪在崖壁上相拥冻饿而死，当地人怜悯其遭遇，将这对父子奉为山神，还筑了一个小庙，称“老嫩两相公庙”。

山魈的传说

天目山区旧时传说有一种头大、唇红、目凶、脸圆，棕发遮面、吼如人笑，有鬼魅般面孔的山怪，名山魈。

在现代动物学中，山魈是猴科灵长类动物，又名鬼狒狒。体形粗壮，头大而长，鼻梁鲜红，鼻两侧有深深的纵纹，颌下有胡须，毛为褐色，蓬松而茂密；腹面为淡黄褐色，毛长而密；头部掩于长毛之中，背脊为红色，形似鬼怪。山魈为群居动物，小群落生活，成年山魈性格暴躁，凶猛好斗。常嬉戏于深山丛林及岩石间，花豹是它们的主要天敌。

旧时，天目山区，山魈也是蛮多的，故山魈的传说故事也是很多。

这里的老人常说，如果在老山中遇到无缘无故有石头滚下，听到类似人的怪笑声，那都是山魈所为。在天目山区山魈的传说故事甚多，有《山魈送帽》《山魈戏妇》等。

山民防山魈有几种方法：

一是给小孩戴银镯，传山魈怕银子发出的光；二是在门上贴虎符或中堂挂虎画，传山魈怕老虎；三是夜行时不吹口哨，不敲刀夹，以免惊动山魈；四是不要拾取山中衣帽等，传为山魈所变，

有时它会隐身而戴红帽；五是在大山中相互不直呼其名，以“噢嘿——”之声招呼。

此外，还有用敬、请、打三种方法。

在上山敬山神时，也敬山魍，并祝祷“请山魍回避”“请山魍照应”等语。

山民从山中回家后突然中邪昏厥或胡言乱语，被认为是山魍摄取病者魂魄，请道士或和尚做法或拜忏，从山魍处讨回病者的魂魄。

打是用武力或法术驱走山魍、索还病人魂魄的仪式。有人扮成山魍，冲进病人屋内，屋内道士或和尚将他团团围住，吹响法螺，齐声喊打，并放铙示威，将山魍赶出村外。然后将病人送道观或庙宇静养。如遇有人在高山失踪，全村青年汉子会聚，背猎枪，扛火铳，敲铜锣或洋铁箱，举火把去找寻，一路上枪、铳齐发，锣钹齐鸣，往往在次日清晨或两三天后找到。失踪之人大都蜷缩在峭壁下，变得神志不清，胡言乱语，传为被山魍勾走魂魄。

古树名木信仰

天目山区有许许多多的古树，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天目“山上有霜木，皆是数百年树，谓之翔凤林”。20世纪90年代进行过一次调查，共有古树名木8684株。有14种珍稀树种，国家一级保护的有野银杏950株、南方红豆杉126株、天目铁木5株。国家二级保护的有华东黄杉17株、金钱松230株、榧树489株、榉树40株，还有连香树、凹叶厚朴、鹅掌楸、香樟、浙江楠、香果树、羊角槭等。树龄在500年以上有109株、1000年以上有9株。西天目山金钱松，最高的高达62米。河桥镇勤建村的一棵银杏树，胸围达9米。

山有古树，山民爱树敬树，认为有树神寄住，于是就有了古树名木信仰。他们往往将古树名木神化，并相信会带来福祉。古树名木得以留存，民间对古树名木的信仰也是重要原因。

天目山区寄拜古树名木为干爹、干娘之俗甚为流行。

东天目上阳村有一古柏，抗日战争爆发至今先后有400多人寄拜。乐平陈沈村村口有一大樟树，民国初年以来先后有200多人寄拜。马啸大成村村头有一大苦槠树，近50年先后有70多人寄拜。颊口桥东村周家湾有一大银杏树，近7年中先后有60多人寄拜。顺溪白果村有一大银杏树，近50年中约有上千人寄拜。

如果家中有小孩晚上吵闹，或多病等，民间往往会去寄拜大树，做其干儿子、干女儿，祈求树神保佑。

寄拜树神时人们得备香烛酒饭，三荤三素，在树下供奉片刻，报上子女姓名和生辰八字，口说“寄拜某某（树名）大王座前，我子（或女）某某某（子女姓名）寄拜你为干爹（或干娘）”。让小孩跪拜，并将事先写好的红纸贴在树上，讲究一点的则以木牌挂在树枝上。至今走到乡间，还会看到古树的树干或者树枝上贴着红纸，挂着木牌，琳琅满目。

平时对古树就要浇灌培育，逢年过节还要探望，并以香烛佳肴供奉。龙岗镇华川村外川自然村有一棵千年银杏，许多人拜其为“亲娘”，每年农历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都有人在树下祭拜。这种习俗也使得村子里的大树免遭砍伐，得以与村子共存，这是不是古人的聪慧之处？由于风水习俗的缘故，天目山区的山村旁边往往还有一座封禁山，山上树林特别繁茂，其中不乏古树名木。

寄拜树神后，多数人要相应改名，一般将树名嵌在人名当中，如柏生、柏荣、樟兴、樟根、桂香、桂英等，因此在天目山区取这类名字也特别多。有家产女，会将红线一头系一枚铜钱，将红线铜钱抛向柏枝，若是挂住，便可取名“柏莲”，可得树神护佑。

天目山的山民们相信古树能治病。相传清乾隆皇帝上西天目山，将山腰之巨杉封为“大树王”。此后，山民即相信“大树王”的树皮能养颜润生，包治百病，纷纷去扒剥，天长日久柳杉枯死。天目山民间也以为大银杏树能治病消灾，常有山民在树上挂“吾子病魔缠身，乞望银杏大王为除病降魔消灾”等字牌。也有人在大樟树上贴上“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小儿郎，樟树先圣积阴德，帮我儿郎消灾殃”“保佑我儿疾病全消，永无灾难”等字条。

天目山山民们以为古树能镇魔辟邪，会给村子带来阳气和豪光。家染阴气，就去请树神到家中驱除阴气。有人“着白日鬼”，家人将其生辰八字写于红纸贴在树上，祈求树神驱鬼。家境贫困以为遇上“晦

气鬼”，请树神赶走晦气鬼保佑发财。通常在树上贴“祈求树神保佑我家吉星高照鸿运当头”的红纸，并用红线在树丫上挂一串铜钱。

在古树信仰中有许多禁忌：

一是禁忌砍伐。大树名木因被神化，不能砍伐。民间流传砍古树必会大祸临头。二是禁忌火烧，火烧大树会烂脚而死。大树被烧多因雷击所致，也有农民烧山煤灰时因防范不周，将大树焚毁。如果不小心将大树焚毁了，便要按照族规重重处罚，而且要向被焚之树残基请罪。三是禁晾女衣。大树名木被视为神树，代表雄健与力量。旧时男尊女卑，认为女人衣裤会污秽神明，故民间称大树上不能晾女衣，否则要有灾祸。四是禁钉钉子。民间视大树的树身犹如人的身体一样，不能钉钉子，山民看见有人在树身上钉钉子，一定会指责，要他立即拔掉钉子。五是山区民间规矩，禁止对古树挖根、攀枝、摘叶、偷果。伤根等于伤人双脚，攀枝等于砍掉人双手，摘叶等于拔掉人头发，偷果等于偷走人的儿孙。六是禁坐树桩、树墩。有些大树虽被砍伐，树神尚在，大人小孩都不可坐树桩、树墩。

在漫长的岁月中，每一棵古树名木都有它的故事。

西天目山有“五世同堂”野生银杏树，位于西天目山老殿下方海拔960米处的悬崖绝壁上。据采样测定，此树龄在1500年以上。其家族共22株，生于同一树桩。1978年出版的《中国植物志》第七卷《裸子植物门》载：“银杏为中生代孑遗的稀有树种，系我国的特产，仅浙江天目山有野生状态的林木。”

西天目山大树王为杉科，位于开山老殿下方，现已成枯树，胸径2.33米，需5人合围，树龄约2000余年。清际界增订的《西天目祖山志》：“大榲櫟，亦名千秋树，草木状，一名披杉，干高十余丈，大十数围。”于20世纪30年代枯死。

上阳桧柏王，又名天目水晶柏，位于太湖源镇上阳村。树干呈螺旋形扭曲，形如麻花，枝叶有针、圆、扁三种形状，树身呈蘑菇形。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临安县志》记载，此树系梁代栽种。1993年

出版的《杭州的山》一书称，“树龄高达2000年左右，为杭州地区树木老寿星”。传乾隆皇帝见到此树，呼作神柏。当地村民视作镇村之宝，严加保护。附近许多人认树为父，常来祭拜。

学士松，位于玲珑山风景区三休亭南外侧。树高15米，胸径188厘米，埋入土层约1米。“文化大革命”时被扒去树皮约0.33平方米，深入基部。此树传为苏东坡手植，由此得名，明志有载，已近千年。

清凉峰白果王，位于清凉峰镇白果村，村以此树而得名。树为2株共生，树高28米，胸径160米，冠幅20米×15米。树龄约1500年。传说朱元璋被元兵追杀，情急之中爬上此树，利用茂密的枝叶藏身，躲过一劫。

绍鲁古青檀，位于於潜镇绍鲁村，树龄逾千岁。清嘉庆十七年（1812）《於潜县志》载：“古青檀，在县北绍路（鲁）村，一木大十围，中空嵌玲珑，连理四布，垂荫如盖，高百尺，广可五、六丈。”历代有诗咏。明代袁炜有“时经秦汉有长春”句。

胜因山古罗汉松，位于锦南街道上甘柯家村胜因山，传为唐代僧人所种。“文化大革命”中险遭砍伐，为寺院中一僧人竭力保护得以幸免。

禅源寺罗汉松，位于禅源寺天王殿前，传为清康熙四年（1665）玉林国师手植。民国三十年（1941）4月，日本侵略军飞机轰炸浙西行署，禅源寺化为焦土，但此树奇迹般存活下来。

昭明寺红豆杉，位于太湖源镇东天目山昭明寺下院前，胸径100厘米，树龄1500多年，如巨伞掩映古寺。传此树为昭明太子在寺院中分《金刚经》时手植。现寺院为明代建筑。

郎碧金银桂，为2株，位于横溪郎碧村花园，树龄约350年，居东一株为金桂，树高14米，胸围1.76米；居西一株为银桂，从地面分出两主干，胸围1.54米。传为吴越国王妃戴氏所栽。戴氏每年回乡侍奉双亲，一次住久了，钱缪修书道：“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古人称“二语艳称千古”。又传为明末当地进士章立帜所栽。

鱼跳唐白果，位于龙岗镇鱼跳外川村中，胸径2米，树龄约1000年。黄氏十一代家谱载：“唐白果，陈姓种植，子孙永远不得砍伐。”当地人将此树视作观音化身，于农历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前来祭祀。

民国《昌化县志·艺文》载有王守勋作《千顷山娑罗树歌》：“千顷之山何嵯峨，由来人世号仙都。灵草仙药生岩阿，巢父许由作行窝。中有仙株名娑罗，相传往种来大罗。交枝附萼开四月，香气直馥跋提河。因风拂拂舞龙蛇，鸱鸢孰敢巢其柯。为有贤劫神佛呵。我欲采之颂太和，担书曳屣聊行歌。”

将军树

欧阳修所撰《新五代史·吴越世家第七》中记载：“临安里中有大木，繆幼时与群儿戏木下，繆坐大石，指挥群儿为队伍，号令颇有法，群儿皆惮之。”文中提及的大木就是将军树。

这棵树长在临安锦城的大官山钱坞垅，传说是一棵女贞树，当年粗有数围，树冠遮天蔽日，树下有一巨石突兀，拔地丈余。曾是吴越国国王钱繆儿时经常玩耍的地方。传说其时村中小儿游戏，相赌谁人可以坐上巨石，便可称“王”。那石头又陡又滑，众人都无法攀上。当时的钱繆还叫“婆留”，他看出了门道，猿身爬上这棵大树，抓着树枝一使力，像荡秋千似的荡至石上，稳稳当地坐在上边。众孩童见他这么机敏，十分佩服，一个个都口呼“大王”，拜倒在地。于是钱婆留便站在树下，操练群儿，一进一退，都按兵法。到钱繆发迹衣锦还乡时，曾为这棵树披上锦缎。后来人们就将这棵大树称作“衣锦将军树”。

苏东坡是钱繆的“粉丝”，他在杭州任通判时，于熙宁六年（1073）八月，到临安来查勘，在知县苏舜举陪同下，巡行三日，曾游吴越王遗迹等，见到了此树，还专门题了一首《将军树》的诗：

阿坚泽畔菰蒲节，玄德墙头羽葆桑。

不会世间闲草木，与人何事管兴亡。

诗中前两句用了两个典故。首句中阿坚即是前秦的苻坚，传说苻坚的祖父苻洪时，家中的水池中长出蒲草，有五丈长，有五节像竹子，大家都认为是吉兆，因此称他家为“蒲家”。后来在祭祀天神中，得谶文“草付应王”，遂取“苻”为姓氏。苻洪的孙子苻坚果然做了国王，建立了前秦。东晋太元八年（383），苻坚率80万大军，企图吞并东晋。相传隐居在临安的谢安东山再起，成为东晋的宰辅大臣，以8万军队迎战前秦。谢安运筹帷幄，在淝水以少胜多，大败苻坚。

第二句说的是刘备，幼时在涿郡老家，屋东南角依着篱笆有棵桑树，高五丈余，遥望如同一辆羽葆盖车似的，往来的人们都说此树非同一般，当出贵人。刘备与族中诸小儿在树下嬉戏，还说道：我将来要乘此羽葆盖车。果然后来刘备在纷争中建立蜀国，成就大业。

苏东坡以将军树与菰蒲节、羽葆桑作比，感叹道：如果不懂得其中隐藏的含义，这些都不过是世间寻常的草与木，怎么能预示国之兴亡、人之祸福呢？

到了南宋初，曾知临安府（杭州）的孙覿（1081—1169）也曾题了一首《将军树》：

当年树下逐儿嬉，直到将军衣锦时。

老干千年龙化后，如今空有寄生枝。

此诗首句写嬉树，二句写褒树，三四句写老去和重生。从中可知，其时将军树的主干已枯，旁生孙枝。

曾主管台州崇道观（？—1170）的员兴宗也有《将军树》一诗：

细马轻裘缓缓归，一樽原野亦光辉。
如今更讶将军树，土木如何衣锦衣。

作者对钱镠封将军树，为树披锦的行为提出了质疑。诗中还用了《陌上花》的句式。

南宋王执礼在理宗时，也写下一首《赋将军木》，前有自序：钱王微时尝避难此木下，后贵显封为“将军木”云：

脱急曾闻匿异人，论功仅得号将军。
长身已逐云烟去，赖有孙枝记旧勋。

诗中了也写了此时的将军树主干已枯，却有孙枝繁茂的现状，但前二句却增加了钱镠曾在树下避难的信息，未曾见到其他相同记载。

传说这棵将军树一直有人祭祀，受人护持。宋以后虽没有再看到咏将军树的诗词，但是大树崇拜的习俗还在，钱坞垅的大树也还在，而且不止一棵，但已不知谁是将军树了，或者根本已经更新换代了。

莲峰树魂

西天目山莲华峰上面有一寺院遗址，谓大觉正等禅寺。寺院前有一片树林，一棵棵都挺大，有柳杉、枫香、银杏、香樟、松和柏，据说还有好多树的故事。万历四十二年（1614）《西天目山志》载：“莲华峰，在天目山西麓，奇峰叠砌，约有二十余里，皆松杉森列，辰光隔辉。至元间建大觉正等禅寺。”

那年头，寺院里有巡山和尚，护林且又植树，又刻立禁碑。有了寺院，有了僧人，莲华峰的树木就葱郁起来。书载清汤太史《天目古树歌》有句：“山有招提树必大，此山古树无乃太。举头不见长安日，世间疑被扶桑盖。”歌中“招提”即指佛教寺院。

书中还有一段“勒石禁伐”的记载：在莲华峰，元代中峰禅师在这里建起了大觉正等禅寺，寺院门前有两株银杏树，到明代已有数围之粗，乡人将此树卖给了他人。寺院中有一位冯姓居士，长年在寺院护法，住在上客堂。有天晚上，冯居士梦见两个白胡子老翁央告他：“我俩明日有灾，特来央求居士援救。”居士醒来感到很奇怪，次日清晨，走到寺院门口，见有数人上山，正持斧准备砍树，冯居士想起昨夜之梦，明白是两位树神托梦，急忙上前制止，并偿还树款，将两树保了下来。之后，还刻了一块禁止砍伐的石碑，立在寺院门前。

至20世纪50年代初，时值“土改”，有些地方干部要求将国有的天目山分给农民。当时天目山区的领导说，那得问问天目山的和尚。这位领导便来到禅源寺问住持和尚：哪些地方要留下来？和尚一口气报了多处，这位领导便说“行”，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可是，不知是和尚漏报了，还是其他的原因，天目山西边的莲华峰却未被列入其中，以致成了天目山的第一大憾事。

这块石碑在那里站了数百年之久，无人敢打两棵树的主意。那些年中，寺院的香火越发旺盛，两棵银杏树也越发粗大，越发茂盛。渐渐的，树下部长出了空洞。来寺院的香客，以天目山一带的民间风俗，中午用斋后，便将竹筷插进树洞中，以求平安快乐。那筷子寄托着人们“快乐”的梦想，藏身在树神的怀抱。

但是，数百年后这块石碑倒下了，被淹没了，终究没有挡住“历史的潮流”。寺院渐渐衰落，僧人也少了。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寺院建筑都被拆除，栋柱木料被弄下山，造了礼堂什么。只剩下几间石墙房，留给最后的那位僧人居住。有乡人上山干活，也在此处歇息。寺院虽然已成废墟，但那两棵银杏树却依然挺立，还有周围的许多柳杉、枫树、樟树等，形成了一道大树的风景线，也印证着这个古佛道场悠久的历史。

20世纪80年代，村里作出了一个极其愚蠢的决定，将这片山判给了某人。之后，便是一场浩劫，成片大树纷纷倒下，那两棵银杏也未能幸免。倒下后，树洞中那好几箩担的筷子，随着“快乐”的梦想散落了一地。村里的老俞带我们去看，银杏树的根部直径竟达三米。老俞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银杏树，早就有人盯上了它们，是因为寺院里那位僧人守着，不敢动。后来僧人死了，不然，谁也别想动那片树林。只因僧人有上乘的武功，十来个人近不得身。

浩劫过后，莲华峰只剩下了零零落落几棵树，一棵是巨大的黑枫，那树怪怪的，村里的孩子买不起墨汁，常常提个破罐去接树干中淌出的黑色树汁。买家试了试，果然，恐有不吉，便放过了，此树因而

劫后余生。还有一棵被雷劈过的糙叶树，盘根错节，千疮百孔，姿态竟然胜过公园中任何的树桩造型，虽是美丽，却已无料可取，也逃过此难。

西径山双林寺，寺前数株粗达两人合抱的枫香，“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欲取其材。据说是夜闻树泣，心生恐惧，遂罢手。特殊的因缘让它们躲过灾厄。可是莲华峰的银杏，因为有了冯居士、僧人，树神终于无人可以托梦。大树倒下不久，传砍树人也遇到了果报，村人疑是树神的报复。

康熙年间，禅源寺的玉林禅师栽下两棵树，一棵是罗汉松，一棵是翠柏。三百多年了，依然旺盛，成为寺院中最亮丽的风景。

掩卷而思，我们怀念冯姓居士，怀念大觉正等禅寺的武僧，也怀念天目山区的那位领导，以及所有天目山林的守护者。